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罗斯福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50 周年,使广大人民了解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业绩,我们特此出版《二次大战三巨头》,这是我社出版的《二次大战三元凶》的姊妹篇。本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生动地描述了“三巨头”在决定人类命运的这一伟大战争中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情况,同时也描写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

本书是用章回体形式撰写的,全书近百万字,共分三册。

第一册为:《纵横捭阖——斯大林》;

第二册为:《身残志坚——罗斯福》;

第三册为:《临危受命——丘吉尔》。

作者前言

被称为“二次大战三巨头”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虽然政治信仰不同，各自的经历不同，但是在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总目标下，他们团结起来了，结成了统一战线，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们不会忘记，在那法西斯强盗横行的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当权派摇尾乞怜，奉行绥靖政策，因而使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在他兵不血刃地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以“闪电战”征服了波兰和北欧，接着希特勒就向英、法开刀了。号称几百万的英法联军，在纳粹进攻面前，仅 11 天就垮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不足一个星期也相继沦陷。大半个欧洲处于法西斯铁蹄蹂躏之下，像一只风雨飘摇的破船。人们普遍担心，欧洲要有一个新的漫长的黑暗时代。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是斯大林率领苏联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歼灭了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从而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军民的最高统帅，而且为促进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的美国，处于另外一种情况，它没有直接遭受希特勒法西斯的入侵，和平主义弥漫全国。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的罗斯福，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以惊人的魄力冲破了孤立主义的束缚，以“租借法案”的形式有力地支援了英、苏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又毅然决然地同德、日、意法西斯宣战，从而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支柱之一。他领导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英、苏等 20 多个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大同盟。他以半身不遂的病残之躯，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和盟国首脑多次会晤，运筹帷幄，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费尽了心血。难怪有人说，罗斯福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而且也是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

丘吉尔的情况和斯大林、罗斯福都不同，他是“临危受命”，是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之后上台执政的。当时，他面临的局势确实是严峻的，上台没有几天，就遇上敦刻尔克的大溃退。顷刻之间英国的防务解体了，可以说要人没人，要武器没武器。就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施政演说，表示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丘吉尔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鼓舞了英国人民，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使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员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 亿以上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为 1.1 亿多，历时 6 年之久，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四大洋。战争造成的伤亡和损失难于作出确切的统计，军队和平民的伤亡约在 9000 万人以上，其中以中国和苏联伤亡人数为最多。军费消耗约为 11170 亿美元，经济损失估计超过 4 万多亿美元。战火夷平了众多的城市，

毁坏了无数的工厂、住宅、铁路、桥梁，以及无数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在艺术和学术上的成就或遭到毁灭，或蒙受了巨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

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 40 多年了，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参加德黑兰三巨头会议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逝去多年了。最后去世的是丘吉尔，他活到了 90 岁，1965 年隆重地安葬在英国他自己的庄园里，当时他离开政界已有 10 余年了。罗斯福死于 1945 年 4 月，正值希特勒德国投降前夕。斯大林比罗斯福多活了 8 年不到一点。而他们三人在德黑兰会晤时，都是反希特勒同盟国的首脑。那时深受前所未有的战争折磨的世界人民都密切注视着“三巨头”的每一行动，倾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因此，德黑兰会议的召开自然吸引了全人类的注意力。那时，不仅深受蹂躏的欧洲各国期待着“三巨头”首次会晤时要作出的决定，轴心国也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该三国会议的结果。反希特勒同盟“三巨头”是否善于协同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当时文明世界的命运。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50 周年，为了表彰“三巨头”的历史功绩，促进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笔者根据 20 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苏美英三国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史料，编写了《二次大战三巨头》。在撰写过程中，笔者曾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进行过广泛的交谈，力求避免片面性，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表述；但由于笔者政治水平和历史知识的局限，难免有不受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解力夫

身残志坚 罗斯福

第一章 荷兰后裔

总统出身富豪家，荷兰后裔众人夸；
博览群书兴致广，狂风恶浪无奈他。

在美国历史上，有两个姓罗斯福的总统，一个是第二十六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另一个是他本族的侄子第三十二届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支系，但都是荷兰移民的后裔。到富兰克林出生时，罗斯福家族已有几代人在哈得孙河畔定居下来。

关于罗斯福家族的祖源问题，富兰克林说：“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一切具有这个姓氏的支系显然都来源于一个叫做克莱斯·马顿曾·范·罗斯福的人，他是在1648年以前的某个时候从荷兰迁来的。”像在此以前和以后来到美国的许多移民一样，克莱斯在横渡大西洋时也把昔日的历史扔掉了。谁也不知道他是从荷兰什么地方来的，他的父母是谁，他来到美国定居时有多大年纪。由于围绕着家族始祖问题上的这种神秘之雾，罗斯福家族中一些常对祖先不恭的人暗示，克莱斯可能是“离法警只有咫尺之遥”的恶棍，也可能是不虔诚的犹太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但是定居在哈得孙河畔的罗斯福家族的后裔，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头脑灵活，视野开阔，他们经过艰苦劳动和辛勤经营，日子过得都不错，有的竟爬到社会的高层变成了殷实富户。

富兰克林的曾祖父艾萨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西奥多·罗斯福进入白宫以前，是这个家族中最有名望的人。他是银行家、实业家、政治家，并由于婚姻关系成了哈得孙河贵族的一员，但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一等级中仍效忠于英王乔治三世的许多人，他为美国的独立事业甘冒牺牲生命和丧失财产的危险。他曾在1775年接管政务的纽约地方议会中任职，是代表该市的最初两个州参议员之一。美国独立后，他直率地鼓吹支持宪法，并成为争取批准宪法的先锋。

到了1828年，富兰克林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诞生了。詹姆斯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和一个坦率的胸怀。他是民主党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刚交20岁的时候，在母亲的支持下，于1848年在动荡的欧洲作了一次重要的旅行。在使意大利挣脱奥地利的控制、争取自由解放的高潮中，他正在欧洲。他参加了几次争取意大利解放和统一的战斗。有人说，詹姆斯在意大利参加了为统一意大利而战斗的加里波第的红衫党。自由事业获胜后，他返回美国在海德公园村定居下来。

詹姆斯在完成拜伦式的壮举回到家乡不久，就进了哈佛大学法学院，1852年获得法学学位。获取这一资格后他又弃法经商，大力经营煤炭与铁路业务。他当上了特拉华—哈得孙铁路的副总裁和几个轮船公司的经理，并在德卢思附近买下了大约1300英亩绵延起伏的林地。站在家里阳台上放眼望去，可以越过高高的树梢瞥见源远流长的大河和远处紫色的卡塔斯基山脉。詹姆斯对田园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庄园中饲养肥牛和骏马，他培育了“格洛斯特”，那是第一匹能在2分20秒之内跑完：英里的骏马。

詹姆斯虽然喜欢乡村绅士生活，但并不长住乡间。他多次去欧洲旅行，他的命名为“蒙农”的私人车辆载着他周游东部海滨。他生性善良，平易近人，热爱生活。詹姆斯和丽贝卡结婚一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夫妇俩决定按孩子父亲的名字给儿子命名，但詹姆斯不喜欢添在名字前头的“小”字，

于是给儿子起了一个可资区别的名字：詹姆斯·罗斯福·罗斯福，家人和朋友们都亲昵地叫他罗西·罗斯福。这就是富兰克林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这个幸福的家庭遭到了不幸，1876年丽贝卡溘然去世，这使丈夫极为伤心。但詹姆斯丝毫没有想到，那个曾经驱使他为了一个外国的自由而战斗的浪漫主义精神，目前只是处于临时的休眠状态，在他遇到萨拉·德拉诺小姐后，詹姆斯旺盛的生机才又重新迸发出来。

说到詹姆斯和萨拉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美妙的故事。早先，在海德公园村和奥伊特湾这两个罗斯福家族支系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詹姆斯经常到住在纽约的老西奥多·罗斯福家里作客。在188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应邀参加一个小型宴会，被来宾中的一位漂亮的姑娘迷住了。他的眼睛像扫描机一样，死死地盯住了她。女主人罗斯福夫人看到这般情况，随即介绍说：“詹姆斯，我想这里的人你全都认识。只有这一位，已米的朋友萨拉·德拉诺小姐。”随后，她又对女客人说，“这是我们的堂兄，海德公园的詹姆斯·罗斯福先生。”

的确，萨拉·德拉诺是惹人喜爱的。她丰满漂亮，雍容大方，黑眼睛，满头的栗发，一副标准的容貌。萨落的父亲沃伦·德拉诺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富商，30岁以前在中国做生意发了财。她的母亲凯瑟琳·莱曼出身于马萨诸塞州的另一个望族。沃伦·德拉诺发了大财后回到家里，在哈得孙河西岸纽堡附近买了一处叫阿戈纳克的庄园，它位于海德公园村南边大约20英里处；1885年9月21日，萨拉·德拉诺出生在这里。

在宴会上，詹姆斯尽可能地和德拉诺小姐坐得近一些。他的蓝眼睛炯炯有神，浓黑光泽的胡须似乎在兴奋的和风中飘拂。他的言谈闪烁着机智。经过交谈，他们发现原来彼此差不多，可以算是邻居，因为海德公园和纽堡附近德拉诺家的所在地阿尔戈纳克之间只隔一条哈得孙河，相距20英里左右，而且詹姆斯在业务上和萨落的父亲沃伦·德拉诺也很熟识。他们彼此探询了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朋友，两人因而更加亲热起来。

詹姆斯竟怀着年轻人的热诚，向这位比他年龄小一半的姑娘求爱。他尽管已经52岁，但看上去很年轻，因为他过着优裕的生活，又爱好户外活动，身体非常健壮。双方果然一见钟情。萨拉落落大方，毫不犹豫，詹姆斯话音一落就满口答应了。姑娘认为，詹姆斯·罗斯福是她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他的高大身材足以盖过她自己5英尺10英寸的身长。他的眼睛碧蓝，他的脸色经过风吹日晒显得格外红润。他的衣服是伦敦裁制的，但是他的举止行动却丝毫没有异国风度，就像他的马是一匹纯种骏马一样，典型的一派美国绅士的风度！

姑娘同意了，下一步就是正式登门拜访了。当萨落的父亲德拉诺先生听到詹姆斯请求允许向他的女儿求婚时，感到十分惊讶。当然，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说，詹姆斯·罗斯福是合格的。但从年龄上说，他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因此，他向女儿转达詹姆斯的来意时，说：“你今年才26岁，你的求婚人却比你大一倍，论年龄他可作你的父亲！”萨落的姐妹们，特别是年轻高做的卡西，更是强调这一点。萨拉却根本不理睬他们，她丝毫没有考虑年龄的悬殊，她用同样的语调回敬父亲和姐妹们：“我爱詹姆斯·罗斯福先生，别说他的年龄比我大一倍，就是大两倍我也心甘情愿！”就这样，1880年10月，萨拉和詹姆斯结婚了；从此，她搬到海德公园村，同詹姆斯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回首当年，萨拉认为她那次到纽约西奥多。罗斯福家作客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有一次她对儿子说：“如果我当时不去那里，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孤寂一生的‘老处女德拉诺’”。但是，她独守空闺倒不是因为无人来求婚。照她父亲的说法，“年轻人络绎不绝地来向她求爱”，在他看来，想娶他女儿的这些人都配不上她。他们不是太年轻，就是年纪太大，或者没有社会地位或名望，要不就是觊觎着她将来要继承的100万美元的遗产才追求她。只有詹姆斯是个例外，萨拉一见他就产生了好感，并深深地爱上了他，而且忠贞不渝。

萨拉同詹姆斯结婚一年后，于1882年：月30日，生了个10磅重的男婴儿，这就是后来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命运赐给他的是英俊的容貌、善良的性格和聪明的天赋，而且他父母肯定孩子长大后将热爱航船和大海。萨拉把孩子放进祖传的樱桃木小摇篮里，用脚踏动着它；嘴里哼着一支奇特的催眠曲：

一只美国船啊，顺水顶风跑啊！
风儿吹又吹呀，我的好伙伴啊！
船长和大副哎，都是美国佬啊！
风儿吹又吹呀，我的好伙计啊！

萨拉很喜欢这首水手起锚时唱的劳动号子，因为这支歌使她想起了8岁那年去中国时乘坐的“惊喜”号。德拉诺一家是以航海为生的水手、海商和冒险家。她父亲沃伦·德拉诺先生，年轻时曾带领自己的船队到过中国。

1857年的经济恐慌使他破产之后，他前往香港，重新积聚了加倍的财富。他在香港期间，派人把妻子和全家接来。这次海上之行，除了水手们教给她的那些劳动号子之外，美丽的海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富兰克林的诞生，给这对忘年之交的夫妇带来了无穷的欢乐。由于没有兄弟姐妹跟他争夺父母的宠爱，富兰克林成了他们小天地的核心。他们不想宠坏他，他的生活受到了严格的而又出于深情的管束。5岁以前，母亲一直让他留着垂肩的金色卷发，穿着童装，以后又坚持要他穿她的祖先默里族特有的苏格兰式短裙，富兰克林8岁时才说服母亲给他买了几套英国海员式的服装，快到9岁时才被允许自己洗澡。在整个童年，他都必须符合母亲规定的各种标准，甚至在他当了总统后，母亲还时常在严寒时提醒他穿得暖和些或穿上御寒的套鞋。萨拉与富兰克林之间存在着一种温暖体贴的关系，她给予他安全感和充分的自信心。

富兰克林不仅受到父母的疼爱，父母还培育了他的广泛兴趣。

富兰克林从小就由父亲每天扛在肩头带着去巡视庄园。待长大后就骑马去作这样的远征。每天他们骑马经过修剪过的草坪和草地，顺着车道走上驿路，然后穿过也属于罗斯福家的田地。富兰克林养成了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到了夏天，他常带着狗去挖土拨鼠的洞穴，他常常平躺在草莓树丛中间，吃着被太阳晒暖了的世界上最好的草莓。

罗斯福一家非常喜欢海德公园，但也喜欢振翅远飞。自从在坎波贝洛岛上建造了别墅之后，他们每年夏天总要在那里住些时候。芬迪湾的激浪使小岛与世隔绝，生活在这个小岛上就像生活在海上一艘大船上一样。风不管从何方吹来，都带有大海的凉爽、潮湿和咸味。在小岛没有被灰蒙蒙的浓雾笼

罩的时候，极目四望，到处是一片浩淼的蓝色海水。即使在浓雾之中，那些装着铃铛的浮标不时发出的铿锵声，也能经常唤起人们对海上生活的回忆。后来大海使富兰克林萌发了到海军学院学习和从事海军生涯的梦想。

富兰克林对在海上航行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对童年最早的回忆就是跟着父亲乘船出航。他们曾经游览过欧洲大部分地方。富兰克林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就像对本国一样的熟悉。

14岁时，他已随父母赴欧洲作过8次旅游了。海上生活不仅培养了他战狂风胜恶浪的勇气，而且还使他掌握了驾船的技术。当富兰克林的个子还没有长到他父亲那只51英尺长的“半月”号纵帆船的驾驶盘那样高时，他已经在船上掌舵了，甚至在刮风的时候也是这样。

16岁时，他有了自己的小船，一只21英尺长的单桅快艇“新月”号。他曾驾驶这只船勘探过芬迪湾多岩的海岸。许多年以后，当富兰克林当了海军助理部长时，他发现自己对这一带海岸的知识很有用。有一次，在视察缅因州沿岸佛伦奇湾的海军设施时，他曾亲自驾驶一艘驱逐舰通过坎波贝洛与大陆之间的危险通道，他的熟练的驾驶技术博得了海员们的称赞。

富兰克林还是一个热心的博物学家。

11岁时，父亲给了他一支小口径猎枪，因为他已答应对哈得孙河流域特有的鸟每种最多只捕一只。鸟的数量和种类越捕越多，居然达到300多种标本。直到今天，富兰克林收藏的达切斯县的鸟类，仍旧属于最丰富之列。沃伦·德拉诺看到外孙爱鸟极为高兴，于是给他弄到了一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终身馆员的资格。据罗斯福的传记作者内森·米勒说，有一年夏天，这一张镶有金边的馆员证却在伦敦派上了意想不到的用场。当时，富兰克林正同自己的家庭教师阿瑟·邓琅去南肯辛顿博物馆参观精致的鸟类标本，而人们告诉他这里不对一般公众开放，因为威尔士亲王、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即将来此主持一个新建侧厅的落成仪式，人们只有凭请帖才能入场。富兰克林灵机一动，掏出自己的纽约博物馆的馆员证向看门的一晃，就同邓琅进去了，于是他们就像要人一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富兰克林的再一个爱好是集邮，他搜集邮票的活动早在8岁就开始了。邮票使他着了迷，因为他可以把世界各国都收纳到自己的集邮簿中。若干年前，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由于父亲前往中国，就开始集邮。后来她把集邮簿送给弟弟弗雷德，他接过来后，努力加以扩充。当弗雷德舅舅看到小外甥富兰克林非常认真地摆弄他那少得可怜的邮票时，就在他9岁生日那天，把自己珍藏的集邮赠给了他。这就是富兰克林集邮的老底子。由于他的勤奋和得天独厚的机会，他的集邮范围之广，价值之高，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且成了他终生的爱好。

富兰克林是在养尊处优的家庭中长大的，可以说他要什么有什么，一切都是现成的，但这并不是说富兰克林对于贫困一无所知。他的家族具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传统，他的父母深感自己对不幸的人们负有义务，而且把这种义务感深深地刻印在孩子的脑海中。罗斯福一家不仅对上层有着广泛的联系，而且对下层也有着多方的接触，他们对政治有着特殊的敏感。

富兰克林5岁时，父亲詹姆斯曾带他到白宫会见自己的好友克利夫兰总统。总统为了报答詹姆斯对民主党的支持，表示要让詹姆斯担任驻荷兰的公使，但他谢绝了这项任命。詹姆斯说：“总统先生，能够像我一样为您效劳并享受这一荣誉的人多得很。我太喜爱海德公园了——还有我的那些马和

牛。克利夫兰先生，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的主要愿望是使妻子萨拉幸福，还想为小儿子富兰克林今后美好而有益的一生打下一个基础。”不过这次造访使詹姆斯大为满意的是，克利夫兰任命了他的曾给民主党捐过一大笔钱的长子罗西为美国派驻维也纳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后来又被派往伦敦担任同样的职务。在少年富兰克林的记忆中，这位总统面容憔悴，心情忧郁，正为国内的政治、经济难题搞得焦头烂额。当詹姆斯和儿子起身告辞时，克利夫兰抚摸着富兰克林的头说：“我的小朋友，我要向你表示一个奇怪的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当美国总统。”这句话在这个早熟的5岁孩子的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认识到入主白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富兰克林的父亲詹姆斯完全同意好友克利夫兰的意见，他不打算让自己的爱子去从事政治活动。竞选公职不是士绅的职业，尽管詹姆斯的远房堂弟西奥多在1880年被选进州议会时曾使家人吃了一惊。实际上，在富兰克林出生前一年，詹姆斯就曾跑到纽约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阻止他的乡亲们提名他当国会议员。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希望他的独生子也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当个士绅，甘愿在哈得孙河畔过宁静的生活。她说：“我所能力我们的儿子设想的最高理想是长大后像他父亲一样，正直诚实、公正仁慈，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人！”但是，命运之神却偏偏与人作对，谁知45年后打破美国历史记录连任美国4届总统的正是她的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呢！正是：命运之神巧安排，驰骋政坛违母愿。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章 青春岁月

拼搏精神贯始终，豪爽大度一精英；
青春岁月最珍贵，哈佛大学赢赞声。

富兰克林。罗斯福潇洒英俊，热情奔放，信心十足地去迎接生活。

1896年9月，他终于离开母亲的怀抱，进入美国著名的格罗顿公学。这所学校是按照美国上流社会教育思想建立起来，专为豪门巨富子弟进入名牌大学作准备的预备学校。它于1884年建立，很快就跻身于历史超过百年的著名寄宿学校之列。

格罗顿公学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是恩迪科特·皮博迪博士。他是一名牧师，生于1857年，是新英格兰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他的办学方针是强调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要求学生不要自命清高，而要投身到政治之中。他认为学校的职责就是培养新的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有教养的领导人，以便扭转美国南北战争后道德标准低落的情况。“心悦诚服地服务于上帝”是皮博迪传播的箴言，他向全国社会名流的子女们布讲这个服务福音——服务于上帝，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类。他宣告：“如果格罗顿学校的某些学生将来没有投身政界为我们国家作一些贡献，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激励。”

对罗斯福来说，除了自己的父母外，对他影响最深的要算是格罗顿了。他在那里度过了4年，而且终生部与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保持着一种出于真挚与怀有敬慕之情的大往。正如他后来对皮博迪说的：“40多年前你在老教堂讲道时谈到，在今后生活中不能放弃儿时的理想。这些理想就是格罗顿的理想——是你教导的——我努力不将其忘记。你的话现在还铭记在我的心里。”

格罗顿公学灌输强有力的基督教义，提倡斯巴达式生活。在海德公园的家里，罗斯福拥有一间俯瞰草坪的舒适房间，而在学校里，他寄宿在宽6英尺、长10英尺的房间里；这里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人口处挂一帘子，聊以代门。每天早上7点钟，学生们被持续的铃声唤醒，接着在宿舍督监的吆喝声中去洗冷水浴，不管是什么季节，天天如此。8点15分，孩子们作早祷，接着去上课。一天的正餐安排在中午。下午的其他时间排满了课和必需参加的体育锻炼。再洗一个冷水浴后，穿上漆皮鞋去吃晚饭，然后是晚祷和自习。从早祷开始直到晚上同每个学生握手告别，恩迪科特·皮博迪就像是一个仁慈的帝王主宰着学校生活。在年轻的罗斯福的心灵中，皮博迪校长已取代了他父亲的地位，而他的父亲已进入垂暮之年。富兰克林在当了总统后曾给皮博迪写信说：“在我性格形成时期，我有幸得到你亲手指引和你的风范的激励，我把这看作我一生的福祉之一……对于你一贯给予我的和现在给予我的一切，我深怀感激之情。”

格罗顿的教学方法独具一格。虽然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国家领导人，但奇怪的是几乎不讲授有关美国的课程。教师们十分卖劲地让孩子们熟悉英文经典著作，每天晚上为他们朗读。在第一学年，富兰克林学了拉丁文学、希腊文学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文学，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代数、自然科学和神学。他的第一次成绩报告单表明，按十分制评分标准计算，他得了较好的平均分7.79分，在全班学生中名列前5名。但是，他的体育课却比较差。格罗顿是崇拜体育明星的。皮博迪认为，一个合格的学生应该是合格的运动家，应该

有运动健将的拼搏精神和豪爽的风度。可是罗斯福是个瘦高个，身高 5 英尺 3 英寸，体重只有 100 磅，其体力不能支持格罗顿盛行的橄榄球、篮球和划船，他擅长的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和帆船驾驶在格罗顿又不时兴。罗斯福可不是一个甘愿让同学冷落的人。他自动组织了橄榄球啦啦队，还自愿充当篮球队管理员，这样他就与学校中许多著名球员的关系密切起来。

虽说罗斯福在体育上不能出入头地，可他擅长辩论，是“辩论学会”的成员。他主张给予菲律宾以独立，主张加强海军力量。16 岁那一年，美西战争爆发，罗斯福准备和几个同学一起投笔从戎，参加海军去打西班牙人。可是，他忽然传染上猩红热，被隔离起来，失去了参战机会，然而他的参战愿望从西奥多·罗斯福身上得到了补偿。那就是人们认为他的堂叔老罗斯福在麦金利政府的海军助理部长任内，对发展美国海军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他本人还亲赴前线，于是，老罗斯福成了富兰克林心目中的英雄。虽然如此，他还是反对兼并夏威夷。

在格罗顿的这几年，富兰克林一直遵照皮博迪教导的社会福音教义，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和慈善工作。他参加了以在附近农村中主持礼拜仪式为宗旨的传教协会，协助开办照顾波士顿穷苦儿童的圣安德鲁斯儿童俱乐部，参与新罕布什尔州阿斯奎姆湖畔为同一目的而开办的夏令营的工作。有一年夏天，他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夏令营主持人。传教协会曾派他和另外一个学生去照顾一位 84 岁的黑人妇女——南北战争期间一位英雄的遗孀。他们的任务是每周去看她几次，看看她是否缺煤缺水，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罗斯福认为这是一件愉快的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1897 年春季，富兰克林对政治、特别对美国海军的兴趣又一次受到了激发。长期以来他对那位精力充沛的远亲西奥多·罗斯福堂叔越来越敬慕。西奥多在辽阔的西部养成了健壮的体格和坦率的胸怀，后来到哈佛大学完成了学业。接着，他就卷起袖子，劲头十足地投身于当时公认的所谓“肮脏的政治交易”之中。富兰克林看到在他身上确实体现了皮博迪博士“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类”的精神。西奥多因而成了这位年轻人终生追求、学习的榜样。就在这一年，富兰克林阅读了美国作家麦克莱的《美国海军史》和马汉海军上将的《制海权的影响》和《纳尔逊生平》。马汉对海军战略基本原理阐述得十分明晰透彻，使富兰克林读起来感到既有所启迪又是一种乐趣。富兰克林的传记作者奥尔登·哈奇说：“罗斯福一生中曾反复阅读这本著作，最后就像移居美洲的英国请教徒熟悉《圣经》那样熟悉它。”

临近毕业时，罗斯福表示想进海军学校，将来当一名海军军官。他的想法与父母的希望相距太远了。他们认为他是独生子，父亲已经 72 岁，海德公园的一份不小的产业总得有人掌管。父亲说服了他，并建议他进哈佛大学法律系。父母认为法律是通向“锦绣前程”的跳板。

1900 年 12 月 8 日，父亲因心脏病与世长辞了，给富兰克林留下了 12 万美元的存款。他母亲萨拉夫人更富有，从外公那里继承了 130 万美元的遗产。当时物价很低，一磅牛排只要 25 美分，一个高级厨师的月薪也不过 30 美元。因此，这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他对这些并不过分在意。

1900 年，罗斯福在格罗顿的学习结束了。在 6 月 25 日的授奖会上，他意外地得到了拉丁文奖，奖品是 40 卷一套的莎士比亚全集。他描写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心里乐滋滋的”。他在从格罗顿寄出的最后一封家信中写道：“搏斗已经结束，战斗已获胜！”今后摆在他面前的又是一个新的学习历程了。

当 1900 年 9 月 25 日罗斯福从纽约来到哈佛时，这座大学正处于“黄金时期”。当时的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是在美国推行自由选修课程制度的首创者，他在哈佛大学已当了 30 年校长，在其第四个 10 年，也就是最后一个 10 年的治校期间，这所学校就由一所小型的地方性大学变成了著名的学府。教员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在总数大约 1700 多名大学生中，既有罗斯福俱乐部里攻击“莽撞”的犹太人和西部人放肆的贵族阶级的公子哥儿们，又有力哈佛大学争光的优秀的外地人。这是围绕着不同轴心旋转的两个世界。

哈佛大学是美国东部权势集团为造就上流社会接班人的名牌大学。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前 140 年，它就创建了。罗斯福家族与这所大学的渊源不浅。富兰克林的当总统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和父亲詹姆斯·罗斯福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哈佛人的生活很散漫，完全不像格罗顿那样要求严格，甚至可以整个学期吃喝玩乐，到期末时才请私人教师突击补习一下以应付考试。哈佛大学约有 300 多个富豪子弟，多数醉心于波士顿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忙于学校所在地坎布里奇镇名目繁多的著名俱乐部的竞选活动。这种生活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越是名门或与名门沾亲带故者花费就越大。不过，富兰克林的兴趣不在寻欢作乐方面，而集中在政治上。似乎西奥多·罗斯福这颗正在升起的明星，已在召唤富兰克林担任公职了，他希望有朝一日爬上社会的顶峰。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选读了特别适合政治生涯的课程。他在摆在面前的五花八门的课程中，选择了历史和政治作为主修课，而把英语和演讲作为副修课。他也学习拉丁文、法文、地质学和经济学。他在后来说：“我在大学里学了 4 年经济学，教给我的全部东西都是错误的。”但罗斯福不是书呆子。他对一位无吸引力的，近视眼的英国史教授的讲课感到厌烦，于是跟着班上的同学一个个地从窗户和太平门溜了出去。他跟哈佛大学的许多名流学习过，但谁也没有像皮博迪博士那样激起过他对学习的渴望。他曾对莱思罗普·布朗说过，他学的课程同哈佛大门以外的现实很少联系。这些课程就“像是没有电线的电灯。你需要灯是为了求得光明，如果你不能扭亮它，它就毫无用处。”

哈佛大学同美国其他大学一样，体育活动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可罗斯福的体格使他不能在这方面出人头地，身高虽然已经超过一般人，但体重只有 146 磅，距标准的运动员体重至少差 20 磅。因此，足球队、划船队都不能入选，女孩子们打趣地叫他“妈妈的乖儿子”。但是，罗斯福在另一些方面却获得了成功。

为了炫耀自己的家族，他在大学二年级就曾以《新阿姆斯特丹的罗斯福家族》作为论文的题目。他在论文中谈到这个家族的“进步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时说：“罗斯福家族具有活力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民主精神。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由于自己出身高贵就可以游手好闲而取得成功。相反，他们觉得正因为出身高贵，如果他们不能尽到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他们将得不到原谅。”富兰克林通过对本家族“真正的民主精神”的宣扬，为自己进入政界提供了理论根据。这种“精神”之所以说是民主的，并不是指与群众打成一片或主张人类的根本平等。相反，它带有杰斐逊主义的味道，即要求富贵人家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谋福利，而不光是为了赚钱。罗斯福就是这样开始形成自己对于精神遗产的看法；这样一个看法，加上西奥多·罗斯福的榜样和恩迫科特·皮博迪的教导，推动了富兰克林参与

团体和政治活动。

入校一年以后，富兰克林参加了哈佛共和党人俱乐部，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管他父母的政治信仰倾向民主党，他却卖力地为共和党人竞选，虽然他自己还不够参加投票选举的年龄。大选前不久，他随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大约 1000 名学生参加了一次火炬游行。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办《红色哈佛报》的工作。为了扩大影响，他要求当时担任纽约州长的堂叔——他所崇敬的英雄西奥多·罗斯福来校发表演说，并在演说后接受他的访问。于是校刊编辑部就吸收他为助理编辑。接着他的堂叔作为麦金利的伙伴与民主党的布赖恩竞选总统。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的政治态度为人所注目。富兰克林就向主编提出要访问校长，主编认为不可能得到回答。富兰克林坚持要试试看。哈佛校长接见这位学生记者时，态度之严峻果然不出所料。他冷冰冰地反问道：“我为什么必须告诉你投谁的票呢？”富兰克林说：“这是因为，如果你的投票代表你的信仰的话，你就应该乐意把你的影响放到天平上去。”就这样，在这位年轻人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埃利奥特一改声色俱厉的态度，高兴地回答了这位学生记者的问题。富兰克林采访的这一独家新闻，不仅登在《红色哈佛报》上，而且成了全国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

1901 年 9 月麦金利总统被刺身亡，42 岁的西奥多·罗斯福便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新总统在任期内，实行了众多的改革，在民众的眼里，他是“摧毁托拉斯的炸弹”和“大棒”的挥舞者。富兰克林在密切地注视着这位堂叔的“德政”。

新总统最初的措施之一是实现美国的诺言，从古巴撤军。接着就是通过联邦垦荒法案，为西部公有沙漠地带的灌溉计划提供资金。但是，他真正同保守的保留政策决裂还是在 2 月间他开始促使托拉斯破产的时候。克利夫兰总统在任期内，曾经对资本的大规模合并忧心忡忡，合并的目的是为了由垄断组织来控制国家的工业命脉。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到 1902 年，托拉斯运动已经发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以致它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灵中投下了恐惧的阴影。托拉斯是一种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组织，它们有力量规定社会公众购买的几乎每种商品的价格。他们公然蔑视美国政府。西奥多上台之前，谁也约束不了它们。国会曾通过一项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是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使法律付诸实施。

1902 年 2 月，西奥多·罗斯福决心解决这一难题，他命令司法部长诺克斯出面检举摩根最近出世的巨大“婴儿”——北方证券公司，它将美国北方几条主要铁路联在一起，然后加以控制。总统用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词句阐述自己的理由：“对于最大的公司就像对国内最卑微的公民一样，应该加以约束，使他们严格顺从人民的意愿。”

西奥多·罗斯福主张，联邦政府要充当国内各种互相冲突的经济力量之间，特别是劳资之间的仲裁者，保证对各方持“公正态度”，而不偏袒任何一方。这样，西奥多·罗斯福就成了“托拉斯的克星”。对于美国工厂的巨大生产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西奥多也感到自豪。但是他认识到，从新的工业联合企业托拉斯中产生的弊病必须加以抑制。他坚决认为，稳健的改革是防止激烈动荡的唯一稳妥办法。

在外交政策方面，西奥多·罗斯福引导着美国“朝着更加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的方向前进”。他喜欢引用他称之为西非谚语的一句话：“说话温柔，

大棒在手，定能成功”。 “大棒”就是美国新海军，是他敦促国会建造起来的，其实力堪与世界诸列强相比。

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热忱地拥护他的堂叔西奥多贯彻“自由主义原则”的这种激动人心的政策；不过，他对新任总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门罗主义”引申的原则有点将信将疑。

富兰克林·罗斯福由于在格罗顿就学了大学课程，所以在3年中就读完了获得文学士学位的必修课程。但是，为了利用在秋季这一学期里当选为《红色哈佛报》的主编，他必须继续在坎布里奇呆一个学年。因此，在1903年9月，他报名考进了研究生院，其目的不在于获得更高的学位，而是为了争得主编的职位。他说：“我的全部余暇都用在这份报纸上，我在大学里为人事公职所做的最好准备也许就是办《红色哈佛报》。”当时《红色哈佛报》是一张有4个专栏、4到8页的报纸。在罗斯福参加之前，报纸的内容枯燥乏味，思想保守，不敢得罪校方。罗斯福给它注射了一针“现代新闻学”，加速了它的血液循环，从而也增高了全校教职员工的血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章之一是罗斯福针对哈佛校方写的一篇社论。他要求给哈佛大学陈；日的宿舍配备适当的消防措施。

在社论发表后的第13天，芝加哥的伊罗夸伊戏院失火，死了588人，其中大部是妇女和儿童。有一个人给主编寄来了一封不署名的信，暗示校方也同芝加哥的政府官员一样犯了渎职罪，但主编罗斯福并未接受这个意见，仍以克制的措词继续要求给宿舍配备更多的消防设施。他的活动终于在5月份获得成功，从而大大提高了他在学生中的威信。

1904年6月，罗斯福从哈佛大学毕业。

12月宣布与安娜·埃莉诺·罗斯福订婚。埃莉诺属奥伊斯特湾那一支的罗斯福家族，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兄弟埃利奥特的女儿。

1905年3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同远房堂妹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在纽约举行婚礼。婚前，埃莉诺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长信。信里引了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一首诗。诗中写道：

除非你能发誓，“生死不渝！”
否则，别称之为爱情！

埃莉诺虽然出生在一个豪门之家，但她幼年时的景况是很令人同情的。在她很小的时候，慈爱的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埃利奥特·罗斯福由于贪酒，最终也丧了命。埃莉诺是由她的外婆霍尔太太拉扯大的。外婆家在哈得孙河旁的蒂沃里，住在一幢叫作“橡树台地”的阴森森的大宅子里，靠油灯和蜡烛照明。在霍尔家的孩子中，埃莉诺的母亲排行第一。埃莉诺在“橡树台地”有一位年轻快活的姨母和一个嗜酒如命的小舅舅瓦利·霍尔。她的小弟弟霍尔·罗斯福也寄养在那里。霍尔太太管不住自己家的孩子，于是作为一种补偿，她就以最古板的方式管教这个外孙女。这位老太太死守陈规，严格非凡，埃莉诺差不多就像贵族家庭中的未亡人所喂养的金丝雀那样不能自由。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一些零零星星的知心话里发现，埃莉诺童年时代仅有的一点光辉就是对她那迷人而又极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倾心热爱。除此而外，她总是闷闷不乐。这位孤寂的不幸的姑娘，直到去英国留学后情况才发

生变化。她在艾伦伍德学校读了3年书，这使她的人生观大力改观。在女校长索维斯托的关怀和教导下，她神采焕发，虽说长得不漂亮，却显得端庄娴静，别具一番风度。她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具有某种独到的见解。在有些问题上，比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的还多。

年轻的罗斯福相当惊讶地发现，自己对这位腼腆、聪敏的堂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这种感情既是对她那种自怨自艾的体恤，也是对她的聪明才智的爱慕。罗斯福认为，埃莉诺实在好极了。她待人接物都具有极其严格的标准，可是又不偏执小气。她在社会学方面有着惊人的新颖见解，并且以亲身的经历作依据，因为她在纽约新拓居民区和儿童医院工作，对穷苦大众的疾苦了解得比罗斯福更深透。埃莉诺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慈善事业。她殷切地希望投身于妇女所能从事的各种活动。和罗斯福一样，她也十分热爱生活，不同的是：罗斯福笑容可掬地面对生活，她则把满腔激情蕴藏在心底里。

这一对青年人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只要两人稍长一段时间不见面，罗斯福就发觉自己对埃莉诺莫名其妙地思念不已。相反，当他们在一起时，他俩就变得毫无牵挂，其乐无穷。在罗斯福的友谊的阳光照耀下，埃莉诺就像一朵花苞那样盛开怒放了。但只是在他保证“生死不渝”后，埃莉诺才答应同他结婚。

他们的婚礼是在当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亲临主持下进行的。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宾客如潮，冠盖云集，但大部分人是为了瞻仰总统的丰采而来。当总统的汽车抵达举行婚礼的处所时，掌声如雷，欢声震耳。婚礼主持人是格罗顿的老校长皮博迪博士，新娘保护人是她的总统叔叔。西奥多慈祥地挽着侄女，亲手将她交给富兰克林·罗斯福。仪式完毕时，西奥多·罗斯福向富兰克林·罗斯福表示了亲上加亲的祝贺，然后走向宴会厅。客人们紧跟着总统蜂拥而去。据说，西奥多·罗斯福对这次婚礼和作为总统的威风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此以后，埃莉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得力助手，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举行正式记者招待会的总统夫人和独立的社会活动家、报纸专栏作家，她为罗斯福入主白宫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如鱼得水情切切，贤妻相夫意绵绵。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章 崭露头角

竞选议员显神通，初出茅庐就扬名；
夫唱妇随相提携，政治角逐似蛟龙。

罗斯福结婚后，在妻子埃莉诺的鼓励和帮助下，更加积极投入紧张的政治漩涡中。

1907年他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进入了顾主多为华尔街大商家的著名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布律师事务所，充当初级书记员。这个职位空悬了两年，求职的不少，但没有人入选。进入这个事务所，意味着将来必定名利双收。当事务所负责人听说总统的侄女婿有意在法律界服务，立即招聘罗斯福。但是，对政治颇感兴趣的罗斯福，并没有真正把法律事务所的工作放在眼里。

在担任律师期间，罗斯福结识了許多人，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他是一些著名俱乐部的成员，是当地义勇救人会成员，圣詹姆斯圣公会堂教区委员，这些都为他从政作了准备——立足本区，赢得社会名望。对此，罗斯福对一些要好的朋友并不隐讳。他说他不会永远搞法律，一有机会就要去竞选官职，他的最终目的是想当总统，他认为白宫是一个强者的讲坛。

1910年早春，罗斯福的机会来了，代表达切斯县的州参议员职位出缺，州民主党的头头们想把这个被共和党人垄断了32年之久的公职夺过来。头头们看中了罗斯福这个28岁的青年人，这除了考虑到他的家族背景外，还因为他们被罗斯福在一次野餐会上发表演说的风度和技巧所打动。民主党负责人帕金斯对他说：“如果你要去竞选参议员，你就得脱去这双黄靴子，换一条像样的裤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时没有给予他们肯定的答复。他对民主党委员们头脑里想些什么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一如既往，向来是以长远眼光来观察国内的政治风云。

当时美国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人心浮动。

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曾授意选择威廉·霍华德·培夫脱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便继续推行他的改革政策。随后，西奥多·罗斯福就大摇大摆地穿过非洲食肉动物聚居的原始地带作了一次有趣的旅行。当他回到美国时，他发现塔夫脱已经落入政治庸人之手。这位新总统的精神和他圆滚滚的躯体一样，毫无棱角，根本不是那些鼓吹“一切维持原状”的老油子们的对手。党又被那些原地踏步的顽固保守分子抓了过去。

1910年，西奥多奔走全国，将那些他认为背叛他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共和党内的进步分子站在他一边，全国厌恶反动倒退。在新泽西州，被列入民主党候选人名单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宣称：美国“政府容忍邪恶冒头，这使我们许多同胞对我们制度的自由产生怀疑，并且鼓吹通过革命来反对这些制度”。富兰克林·罗斯福谨慎地审度了形势，鉴于共和党的分裂，他相信这股普遍不满的情绪，会像正在升起的飓风一样，把民主党的迪克斯吹上纽约州州长的宝座，甚至风会越刮越猛，在他的选区里刮出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来。至少这是一个机会。当晚，富兰克林·罗斯福给帕金斯主席送去了肯定的答复，三天后正式提名。这是罗斯福第一次在政坛上的搏斗。

但是，罗斯福的母亲和多数亲友都反对罗斯福去作一次他们认为“毫无

成功希望”的竞选。只有她的妻子对他的决定毫不怀疑。她表示，凡是丈夫愿意干的事，她都支持。当时，埃莉诺刚生了孩子，大部分心思花在孩子身上，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她赞成丈夫所作的决定。

罗斯福决定试一试。他给住在奥伊斯待湾的西奥多·罗斯福打了个电话。

“特德（西奥多·罗斯福的爱称）叔叔，我准备竞选纽约州参议员。”

“干得好，我的孩子！我早就说过，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进入政界才是！”

“不过，我是在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上。”富兰克林补充说。

一阵闷雷般的怒吼声几乎震得电话线都在颤动。

“你这个卑鄙的兔崽子！”西奥多咆哮道，“你这个叛徒！你不想想，这不是在开我的玩笑吗？这不是故意和我作对吗？再说，你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是不可能获胜的！”

富兰克林心中有数，他对获胜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他的秉性就是这样，一旦决定，就力争获胜。他把竞选建立在对农民提供同情的援助和反对按党魁意志办事上面。作为政治家的休斯州长曾经是一个诚实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他揭露过北部各城市的共和党机构按党魁意志办事的情况，那比纽约民主党操纵市政的但慕尼黑还要臭不可闻。罗斯福充分利用这一点，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说：“正如诸位听知，我接受被提名是绝对独立的，我并不效忠于任何个人，我不受任何势力集团的影响。”他强调一切政府包括联邦的、州的、县的以及镇的，全部根基在于它们的地区代表性。他反对那些蛮横的党魁们贪污腐化、结党营私。

罗斯福想一鸣惊人。他一心想打破先例，有声有色地表演一番。这位初出茅庐的政治家，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关系是他竞选中一笔很重要的资本。他租了一辆红色的旅行车，插上许多小旗，这还是地方选举中第一次使用汽车进行竞选。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面对农民听众大骂城市的两党大亨，攻击塔夫脱政府的高关税政策，使农民贱卖农产品，贵买国外进口的制成品，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的讲话受到农民们的热烈欢迎。

罗斯福一天要跑好多地方，发表 10 多次讲话。埃莉诺对丈夫的竞选活动十分关心，她经常挤在会场里听罗斯福发表竞选演说。

当她看到高个子的大夫走上讲台时，着实为他捏一把汗，紧张得像一根扯紧的钢索。他讲得很慢，有时停顿得很长，以致使她担心下面的一句话会接不上来。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时还不是一位演说家，但是，他却以诚恳的力量抓住了听众。埃莉诺为他感到非常自豪。

当时自由主义的潮流正处于高涨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尽管是初出茅庐，却是一名具有说服力的竞选家，结果他与康内尔双双中鹄。这股强大的潮流还把约翰·迪克斯推上了州长的宝座，使民主党在近 20 年中第一次取得了纽约州参众两院的多数票。罗斯福在 3 万张选票中以多于对手 1140 票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全国一半以上的州长职位由民主党人担任，包括新泽西州，当选为该州州长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

运气与机会伴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了奥尔巴尼。他甚至还没有对任何一个法案投票之前就已经成了纽约人所皆知的政治人物了。他是一个新当选的州参议员。按照路易斯·豪的说法，是“第二个罗斯福走上了 30 多年前西奥多·罗斯福就已赢得声誉的舞台，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事情”。记者们匆匆忙忙地发表关于这个穿高领衣服、带金色夹鼻眼镜、热情洋溢的年轻贵族的专题报道。《纽约时报》驻奥尔巴尼一位老资格的记者 w·阿克塞尔·沃

思在 1911 年 1 月 4 日是这样描绘他的初次露面的：“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在本届议会开幕的那天，轻松地步入参院大厅。他有一张证书证明他有资格坐在保留席的一个座位上，他来认这个座位了。他不引人注目地来到白色标记的 26 号桌子边，坐进了桌子后面那张有座垫的大皮椅子里。这是参院里代表哥伦比亚——帕特南——达切斯选区的代表席……从此，这张桌子和坐在这张桌子后边的人就成了公众注目的地方。”

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在参议院会上露面时才 29 岁。他的仪表和从容不迫的举止引起了民主党党阀们的注意。纽约州总部但慕尼厅的头头蒂姆·沙利文看着罗斯福的背影，对手下人说：“又是个罗斯福家族的人。这家伙还年轻，在他翅膀还没有硬的时候，把他搞下来是不是更保险点？”但是，罗斯福却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强者。

在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当一名州参议员并不需要多大才能，当时州参议员中大多数人是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年薪只有 1500 美元，而且有一半时间要住在开销比较大的州首府，大多数人都感到经济拮据。罗斯福则既非饱食终日的平庸之辈，又不是靠薪俸为生的寒酸小吏。他在州参议院力主改革，呼吁建立一个任人唯贤、不受政党机器控制的廉洁的好政府。他的许多主张与 19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平民主义相似，但又注意不吓跑中产阶级。西奥多·罗斯福任职时提出“公平施政”的口号——保证公平无欺地发牌给每个人，人人都可以过上好日子。但是，到他辞职时，穷人的境遇并未改善。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一名州参议员，无力对全国政治施加影响，但他却有力量引起全国舆论对他的注意。

罗斯福要进一步打出自己的旗帜，于是一场标新立异的造反斗争开始了。原来州议会要推选一名联邦参议员去接替昌西·迪普，他的任期到 1911 年 3 月 4 日就要结束了。党魁们内定了绰号叫“蓝眼睛比利”的希恩。看来中选的就是“蓝眼睛比利”了。但是，希恩是一个标准的雇佣政客，在政治上有一段令人沮丧的趋炎附势的历史。罗斯福决定不投希恩的票，哪怕自己的政治生涯未曾开始就告结束。他打算不顾核心小组对自己的成员拥有绝对约束力的这条党规，毅然采取这种立场。那些大都来自州北部的独立不倚的民主党人围绕希恩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反对派；通过自然选择，他们公认富兰克林·罗斯福为领袖。在民主党议员中，只要少了 20 张票就足以使州议会陷入僵局，无法选出希恩。就这样，在众、参两院联席会议举行表决时，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首的造反派投了其他候选人的票，希恩因缺少 20 张票而落选。于是全部火气都发泄到 20 个“造反”分子的头上。但慕尼厅的首领们陷入一片混乱。

党魁们对他们施加压力了。罗斯福的追随者们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且遭到暗算。他们的私人企业受到阻挠，他们的抵押贷款被催还。罗斯福四出奔走，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处境窘迫的，他等款接济；情绪消沉的，他就鼓气壮胆。但慕尼厅分子千方“百计地进行分裂破坏，编顺口溜对罗斯福进行讽刺挖苦：

罗斯福和他的计划怎么啦？
改革派跟着熬煎受苦。
花言巧语给他们打足了气，
却又让他们大败输掉，声誉扫地。

罗斯福怎么啦？
声名狼藉。

“造反派”虽然受到了打击，但他们终于阻止了希恩当选。它的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纽约州的边界。这样大吵大闹了一番，使下面的事实变得家喻户晓：由州议会选出参议员的这个古老制度，往往会挫伤全体选民的意志。一个强大的运动早已掀起，它正朝着直接选举参议员的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方向发展，“反希恩战斗”在罗斯福的亲自推动下，给这个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他成功地使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敦促纽约州国会代表团投票造成这项宪法修正案的决议。

1912年5月，国会把这个第十六条修正案提交给各州；1913年5月31日，它开始生效，这次罗斯福造反的一个间接的然而十分重大的后果是：它给民主党的改革分子带来了新的信任与威望，因此促成了“新自由”的预言家伍德罗·威尔逊的崛起。

反希恩斗争之后，1911年秋，罗斯福去拜访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两人见面并不如想象的热烈。一个所谓理想主义的学究政客，与一个政治思想还没有完全定型的崇尚实际的政客之间，一下子确实找不到多少共同点，除了年龄相差26岁之外，更因为威尔逊不了解这个年轻人。经过一番交谈，罗斯福被博学、善辩、冷峻而又热情的老州长所吸引，罗斯福几乎完全赞同威尔逊的政治主张。事后，罗斯福高兴他说：他发现了一个“依靠理智而不是情感来使人折服的人”。

罗斯福后来在说明为什么他支持威尔逊时，称威尔逊是“纠正美国人再也不能忍受的境况的那场运动”的先锋。他说，威尔逊“十分了解广大工人的劳动福利和社会福利问题”，在“改善各类人的生活状况”的斗争中是个靠得住的人：在关税、控制托拉斯、保护自然资源等当前重大问题上，威尔逊的立场对所有进步人士都是个鼓舞。在整顿民主党的政治，将它提到更高的道德水平方面，他是一名成功的领导人。

1856年，威尔逊生于美国弗吉尼亚的斯汤顿。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政治经济学教授，以课堂授课和写作而著称。

1902年，威尔逊被选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致力于把学校改造成一所出类拔萃的智慧学府，教职员热烈欢迎他的一些改革，但对其他一些改革却采取反对的态度。由此而造成的不安定的局面，也许是影响他决定接受保守派民主党人要求他于1910年竞选新泽西州州长的原因。

甚至在竞选期间，他表示不受保守派和提名他的党派核心的约束。他宣称，与他自己的党的“老板制度”哪怕有“最小程度的”合作，“我都应当看作是自己永远的耻辱”。威尔逊支持一个广泛的提倡改革的政纲。作为州长，他实现了他的诺言，很快使新泽西名列于进步州的行列。

罗斯福为威尔逊横溢的才华和深邃的智慧所倾倒。他信心十足地回到了奥尔巴尼，决心全力支持威尔逊的事业。他相信威尔逊是唯一能以进步路线领导民主党的人。他到全州主要的民主党人士那里去游说，和他们一起组织了纽约州威尔逊联合会。这是一个推进威尔逊运动和为威尔逊搜罗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

罗斯福在决意追随威尔逊之后，准备了一篇全面阐述自己政治、经济观点的声明。这就是罗斯福于1912年3月12日在纽约州特洛伊对人民论坛发

表的讲演。这篇讲演第一次隐隐约约地勾画出“新政”的某些轮廓。罗斯福赞成让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便为中国人民谋取最大的福利。同时，他还措辞谨慎地反对在私有财产的使用与公共福利发生矛盾时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罗斯福深信，关于个人自由的传统观念，已不能应付当时美国的社会动荡，因此主张采取对付这一挑战的新理论。他说：“事实证明，竞争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但过了这一限度就无能为力了。而我们目前必须争取的合作却能发挥竞争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对合作的定义是“为整体的自由而奋斗”，认为仅满足于个人的自由还是远远不够的。

罗斯福决意为威尔逊助选的行动，可把妻子难住了。埃莉诺是西奥多·罗斯福叔叔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但丈夫偏偏支持西奥多的对手威尔逊。不过埃莉诺坚持以往的原则：凡是丈夫支持的她都支持。于是，她陪伴丈夫出入于支持威尔逊的各种集会。她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精力充沛，口若悬河，心中暗暗高兴，下时地祈祷他的事业获得成功。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在1912年春季总统候选人的预选中，威尔逊只得到少数几个州的支持，各地的政治机构都在反对他。在第一轮的投票中，克拉克获得440.5票，威尔逊只获得324票。其余的票数分散在次要的候选人身上。此后，克拉克的票数一直朝着多数方向稳步上升，尽管按照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规矩，他必须获得2/3的选票才能获胜，然而自从1844年以来，获得多数票的候选人从来就没有失败过。最糟糕的是，纽约州的90票有可能使克拉克获得多数，而这些必须作为一个单位集体投出的选票全部装在党魁墨菲的口袋里。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这位诡计多端的党魁，只是在等待一个最能产生心理效果的时刻到来，然后一下子投给克拉克，使党代表大会一边倒。

但是，罗斯福从不认为值得一战的事业会遭到失败，他力图打破墨菲对纽约州代表团的操纵。这一着失败后，他就率领一个由150名有名望的纽约州民主党人组成的非正式代表团，在各州代表们中间串联，向他们揭露事实真相——不管党魁们怎么说，纽约州人民支持威尔逊；假如威尔逊被提名，他会得到全州的赞同。就这样，罗斯福针锋相对地向墨菲提出了挑战。

一场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就要于1912年的7月在已尔的摩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人可以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既有官僚政客、党棍，也有小城市的雇员，满脸病容、营养不良的文书、录事，老态龙钟的陪审员，讼棍，地方小报的混事记者，还有掌管选民登记名册的神秘人物。这些人被巴尔的摩著名新闻记者门肯称为“低级的政治奴仆”。他们前来参加代表大会，有的是为了调剂一下庸庸碌碌的生活，寻求一点刺激；有的是为了借机狂欢痛饮一番，党代会期间照例是不吝惜花钱的。

代表大会既是力量的较量场，也是一场活报闹剧的舞台。当天晚上，为克拉克雇来的300名啦啦队员按照事先的安排吵吵嚷嚷地冲进了会场。紧接着，后面又涌来了100多名佩戴克拉克小圆徽章的人，他们是克拉克雇来的流氓、打手。约定的信号一发出，第一批人就开始喊叫：“我们要克拉克！”但是后面的对立面却吼叫着回答：“我们要威尔逊！”克拉克的雇佣军既惊又怒地转过身来，对反对派先是动口，接着双方打起来。

会议开始前，罗斯福早就考虑到会发生这种意外事故，因此事先他招募了一支对抗力量，他选的人个个都是惯于殴斗的彪形大汉，这一仗干得漂亮

极了！罗斯福一边观战，一边高兴得对克拉克的晕头转向的高级指挥官们大声喊叫。会议主席无法制止骚动，只得宣布休息，到星期一上午再开。尽管克拉克分子的气焰受挫，但对威尔逊来说，情势仍很险恶。为此，罗斯福和他的伙伴们，加紧向大会内外进行游说。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整个星期日那天，黄纸信封像雪片一样向代表们飘来，这是家乡人民打来的成千上万份电报，敦促自己的代表提名威尔逊。当星期一起来到后，一位代表跳上讲坛，用洪亮悦耳的声音说道：“一个进步的候选人决不能受纽约州投票的糟蹋！既然纽约州的 90 票已经投给了克拉克，我就不再投克拉克的票了。我要投威尔逊的票！”

接着，会场上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风向变了，在第四十六轮投票时，亚拉巴马州首先转过来，其他各州也纷纷跟上来。甚至连党魁墨菲也明白一切都已完蛋，急着寻找机会看风使舵，准备转向。最后投票结果：威尔逊得 990 票，克拉克得 84 票，长期的紧张情况终于过去；在越刮越猛的热情与轻松的飓风中，代表们吼叫着，表示一致通过。

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解决后，下一步就是竞选议员和准备大选了。但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罗斯福却被伤寒病击倒了。他躺在病床上，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辉煌前程”慢慢消失。如果他不能去竞选，就无法重新当选议员，更谈不上将来到政府中任职，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威尔逊的选票问题。罗斯福心急人燎，翻来覆去，毫无办法。这时他想到了路易斯·豪。当他在巴尔的摩获得成功，豪曾向他写信祝贺，并在信的开头称他为“亲爱的、尊敬的未来总统”。罗斯福为要获得这一闪光的称呼，现在首先得设法确保威尔逊获胜和使自己获得竞选参议员的提名并重新当选。他想，所有这一切，只有拜托善于搞宣传并富有竞选经验的路易斯·豪了。

有人曾把豪叫作“中世纪的守护神”，他身高不足 5 英尺，骨瘦如柴，满脸皱纹，其貌不扬。然而，就是他挽救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治生涯，豪匆忙赶到罗斯福的病榻旁，迫不及待地谈了在候选人不能露面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竞选活动的策略。像其他大多数政治记者那样，豪深信自己搞的竞选会比自己采访的那些竞选者搞得更好。许多年来，豪一直在寻找一位需要自己的经验和专长的人物。他与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初次见面后没多久，就感到这个仪表堂堂、雄心勃勃的年轻参议员就是自己要找的并予以终生支持的人物。豪当时 40 岁，大多数人到了这个年纪会在各自的事业上有所建树了，而豪却历尽了失败之苦。他经常失业，负债累累，因而梦想获得权势、地位，出人头地。他真想自己出面参加竞选，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个狠心的玩笑：他的外貌和寒酸的举止，使他的梦想无法实现。

据罗斯福的传记作者内森·米勒介绍，豪的祖辈原是新英格兰人。路易斯的父亲爱德华·波特。豪在南北战争之前就搬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战争结束时，他已在北方军队中当了上尉，与一个银行家的女儿、比自己年长 9 岁的寡妇结了婚。豪上尉搞地产投机发了财。到 1871 年夫妇俩的独生子路易斯·麦克亨利·豪出生时，他已拥有整整一条商业街区的地产了，并正准备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富人区修建一座府第。在 1873 年的大恐慌中，豪破了产，无数家产与社会地位全完了，还背了 1.6 万美元的债。豪一家人到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暂避，因为豪夫人的姐夫在那里经营一所疗养院。后来爱德华·豪为当地的一家共和党周刊《萨拉托加加入》当记者。豪上尉省吃俭用了 6 年，于 1881 年买下了《萨拉托加太阳》周刊，把它办成了萨拉托加县民主

党的喉舌。出版这个刊物实在不易，一直过了7年，当路易斯17岁那年，他的父亲才给家里买下这所房子。

路易斯自幼面色苍白，体态弱小，不愿远足，但喜欢看书。最初曾崇拜托马斯·卡莱尔，相信英雄人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路易斯四肢虽小，但脑袋却很大，为人机智聪明。豪上尉原打算让儿子上大学，最好是上耶鲁大学。但当他从萨拉托加学院毕业时，家里已负担不起继续学习的费用了。他到《萨拉托加太阳》周刊当了记者兼印刷推销员。他的父亲曾为纽约《论坛报》当过报道员，这个工作后来也传给了路易斯。

由于共和党人在纽约州牢牢掌权，民主党周刊《萨拉托加太阳》有如日薄西山，日子很不好过。为把刊物办下去，路易斯不得不把新居抵押出去。没过多久，他的债主们就夺了周刊的权，将路易斯从主编降到周薪10美元的记者。正当这时，他的妻子格雷斯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1901年9月，路易斯被解雇了，生活十分困难；有一段时间，路易斯曾以赌博为生。有一回在赌场赢了258美元，赌赛马时也赢了一点钱。后来，豪的生活主要靠给纽约《论坛报》当报道员，给它写赛马的文章和萨拉托加的轶事珍闻。此外，只要有报刊愿意要，他还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些特写和书评之类的文章。

1906年，路易斯被《论坛报》指定为该报驻奥尔巴尼记者的助手，每周可得40美元，这在当时已是个不小的数目。但这也只是在议会开会期间，会期短时一年只有两个月。豪很能挖掘新闻，为在议会的大量文件中寻找政治秘闻，常在议会地下室里消磨大量时间，因而奥尔巴尼的同事们称他为“水耗子”。豪笔锋锐利，喜欢挖苦人，讲话尖刻，但身体越来越坏，外表也令人鄙视。要不是他看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能成为美国政治领袖的话，那他就永远只能是默默无闻的人物。

为了帮助罗斯福竞选，他在波基普西的一家饭店里建立了竞选总部，以农业问题和“党魁专制”作为竞选的主要题目，在选区里散发了大量的罗斯福“亲笔”信，在报上登整版的广告宣传罗斯福的政绩，并许诺如再次当选将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还攻击了共和党的竞选对手。路易斯办事细心周到，为了鼓舞士气给每个竞选工作人员发了5美元。豪报告说：“我干得痛快极了，他们想打败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路易斯最得意的一手，是提出一项旨在保护农场主不受纽约市代理商们诈骗的法案。豪将这项法案的副本寄给农场主，并附上罗斯福的一封信，希望他们提出意见，并保证重新当选后一定努力通过这项法案。一同附去的还有已贴好邮票的信封，以便农场主回信使用。路易斯将这一套作法称之为“在农业问题上的一个绝招”。

在罗斯福卧床期间，竞选总统的活动已发展成为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和民主党的威尔逊之间的两人角逐。竞选开始后，除在个人作风方面外，西奥多·罗斯福与威尔逊在政策主张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们都保证执行进步主义的政策和致力于“社会主义”，尽管西奥多·罗斯福赞同加强政府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因而显得其政策更激进一些。但是，在一贯反对垄断的路易斯·布兰迪斯的劝说之下，威尔逊则同意将托拉斯的问题作为竞选中的关键问题。威尔逊将自己的政策纲领称为新自由，同时攻击西奥多·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容忍在政府略加调节下的垄断。威尔逊特别指出了大企业的掠夺性和垄断性，指出这种做法会阻碍小企业的发展。他说：“我坚决认为私人垄断是毫无道理的，不能容忍的，每个进步人士都应该这样看待这一问

题。”为此，威尔逊赢得了大量选票。

1912年选举结果，民主党的威尔逊获胜。他获得选票629.7万张，占总选票的42%；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获411.9万张，塔夫脱获348.7万张。如果把老罗斯福和塔夫脱的选票加在一起，就比威尔逊多130多万张。看来威尔逊就沾了共和党分裂之光。在路易斯·豪的帮助下，富兰克林·罗斯福也重新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并被任命为农业委员会主席，这使他有可能会为通过豪在竞选中代表他所承诺的那项农业法案而努力。

论功行赏，这是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负责威尔逊竞选班子中公共关系的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但他完全是个门外汉，需要找个内行当助理部长。这时，威尔逊想到在竞选时期表现不凡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且了解他对航海和海军十分有兴趣，收集这方面的书达一万册以上，又是阿尔弗雷德·马汉的大海军主义的支持者，随即任命他为海军助理部长。

1913年3月17日，刚好是罗斯福与埃莉诺结婚8周年纪念日，他进入了海军部，开始了新的历程。与此同时，为他竞选立了大功的新闻记者路易斯·豪，也成了他通向白宫的永不分离的忠实助手和顾问。正是：从政大门一打开，官运亨通喜气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四章 在海军任上

海军任上显才华，军备训练众惊讶；
雷厉风行浑身胆，邪气恶习被冲刷。

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海军助理部长，如鱼得水，情绪十分高涨。从此，这个 31 岁的年轻人，要肩负起整个美国海军的技术领导和业务建设的重任，加上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公务十分繁忙。他曾风趣地对记者说：“今天罗斯福很忙。你们记得上次另一位姓罗斯福的人，担任同一职务时的情况。”这无疑指的是西奥多·罗斯福。

1898 年西班牙——美国战争爆发前夕，西奥多·罗斯福在海军部长缺席的情况下秘密命令乔治·杜威准将在宣战后立刻袭击西班牙在马尼拉的舰队。

如今，这位年轻的罗斯福，像义勇骑兵团的骑手老罗斯福一样，从助理海军部长开始，然后担任纽约州长，最后登上总统宝座。纽约州议员桑德斯在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为你的好运而由衷地高兴，并希望你能沿着另一个罗斯福的道路坚决走下去，从目前的职务一直到总统。”

罗斯福担任助理海军部长 7 年半的经历，为他后来在战争中担任总统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置身于新的环境之中，罗斯福像一台涡轮机似地拼命于。当海军部长丹尼尔不在时，罗斯福代行部长职务，并参加内阁会议。罗斯福主持海军的日常事务，职责包括采购、文职人事、预算事务及船厂。船坞的管理和部队的装备等。这些工作为罗斯福提供了宝贵的行政管理经验。他学会在危机时如何管理一个大的联邦机构，总统在战时如何行动，如何与盟国制定共同的目标以及一个主权国家如何适应全球性战争中的军事需要。罗斯福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就像在死气沉沉、昏睡不醒的海军部的官僚机构当中爆炸了一颗重型炸弹。

罗斯福上任不久，就在他新的管辖领域里作了一次全面检查。情况正如他过去所听到的一模一样。太平盛世的虚假安全感冲刷着舰队，沉积了一层漠然置之、高枕无忧的淤泥。高级司令部犹如几百年前西班牙大帆船的船尾楼，里面充斥着废物；战斗人员的士气低得跟潜水艇的船底一样。军舰虽油漆一新，铜制器件在闪闪发亮，炮膛擦得一尘不染，但是人们的脑袋瓜却在发霉生锈。罗斯福把视察的情况，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过去对美国海军的估计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我们号称已经建造或正在建造的军舰有三十六七艘，放在第一线的只有 16 艘；我们的海岸线长达 2000 英里，其中只有 200 英里有海岸炮兵防守。”他越讲越激动，最后竟情不自禁他说：“如果我是日本人，在打垮舰队之后还不能在那 1800 英里的某一地段登陆，那么我宁可剖腹自杀。”

经过详细调查之后，罗斯福看到，由于海军缺额 1.8 万人，许多军舰都因人员不足而搁在那里。但那些现役军舰的效率却相当不错，最令人担忧的要数造船厂的情况了。所有的财力和人力大，都花到船上去了，但这些船厂多数技术陈旧，管理落后，生产出来的都是老的产品。罗斯福认为，“这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情况，因为舰队如果没有更新的设备，就好像一个长着‘玻璃下巴’的拳击师，只要受到一次打击就一败涂地了。”

同样，海军的管理机构自 1842 年起就基本上没有变化，陈规旧习严重，

官僚主义盛行，工作效率极低。由将军或上校领导的这些司局，只知道争夺优先地位和经费，而下考虑相互协作和通盘的政策。公文长期旅行，在部内转来转去，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好像事无巨细，都要由部长或助理部长审批。有一次罗斯福给部长丹尼尔·丹尼尔斯写了一封短笺，发泄了对官僚主义积郁多时的不满。“为购买8枚地毯钉，我已签署了正式申请（一式四份），谨此报上。”风趣幽默的丹尼尔·丹尼尔斯复信道：“为何如此铺张？两枚足矣。”

威尔逊挑选约瑟夫·丹尼尔斯来领导海军是出人意料的。他是促进农民利益的人民党人，又是和平主义者。他身穿皱皱巴巴的衣服，头戴毡帽，脖子上打个系绳的领带，使许多人误认为他是小镇上的乡巴佬。丹尼尔·丹尼尔斯与新任命的国务卿布赖恩，都被认为是威尔逊内阁中最激进的成员。丹尼尔·丹尼尔斯进入海军部时怀疑情绪很重，觉得高级将领们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一定正确。而罗斯福则与丹尼尔·丹尼尔斯截然不同。他长期以来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汉的信徒。马汉是极力鼓吹海军作用和主张建立强大海军的。罗斯福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美国必须“具有最高效能的战斗力量”。

罗斯福的呼吁和报告，在海军中引起震动。为了扭转海军落后的局面，他一面大声疾呼，一面脚踏实地地干起来。在以后的两年里，他走遍了东西海岸所有造船厂，决定对这些工厂进行改建、调整或者干脆撤销。为了使那些造船厂充分开工，并做到自力更生，他把那些具备条件的改为工业基地。这些措施使政府节省了大笔资金，造船厂成了自给自足、欣欣向荣的企业。由于这些工程效率高，计划周密，罗斯福赢得了“节约专家”的称号。

此外，罗斯福还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套采购供给品的有效办法；他把高级军官的提职晋级从论资排辈改为择优录用，从而提高了进港舰船的补给速度；他废止烦琐的公事程序；他声称要向外国购买装甲板，借此压低了美国企业家向政府开口的高昂价格；他发现溺水事故太多——不教海军士兵学会游泳显得荒唐可笑——因此在舰队中设立游泳竞赛杯，大力宣传补救措施；他撰写论文，分析海军今昔和国际形势；他保护海军汽油储备……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提高了海军素质和工作效率。

罗斯福在海军部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除了威尔逊总统的信任外，也和“亲信”们的鼎力协助分不开。罗斯福上任不久，就把他的竞选顾问路易斯·豪调来任海军部秘书。豪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资料，有时为罗斯福和丹尼尔·丹尼尔斯起草讲稿，处理海军人员的雇佣事务，督促落实建造舰只的重点项目，甚至调查海军所在城镇的卖淫及赌博问题。他还负责为罗斯福起草给选民的信，从政府那里为选区争几个邮政局长的职位，为报答一些民主党人而给他们安排在造船厂工作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罗斯福的形象，扩大政治影响，以便将来能向党魁墨菲和但慕尼厅挑战。路易斯一心一意致力于罗斯福的事业，努力维护和提高他的声望。路易斯做任何事情都考虑到罗斯福的利益，他不时地向罗斯福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正像丹尼尔·丹尼尔斯所说的：“他可以趴在地上让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身上踏过去。”

罗斯福在华盛顿期间，路易斯·豪住在宾街一个公寓里，几乎每天早上都来找罗斯福，和他一起沿着康涅狄格大道步行到海军部上班。他们边走边谈，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在步行上班的路上，豪在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上进一步向罗斯福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海军内文职人员的合同的谈判，罗斯福应亲自过问。豪觉得10万多名文职雇员可以成为有力的政治武器，因而一再建议罗斯福要亲自同工会领导人打交道，而不要将业余时间全

用在同阔朋友打高尔夫球上。后来罗斯福同劳工组织的接触，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弥补了一个很大的不足。到了他不再当海军助理部长时，他可以夸口说，在他主管海军内劳工关系的7年半里，没有发生罢工和严重的停工事件。

埃莉诺更是全力以赴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勇敢地担当起由于罗斯福的地位而带来的社交方面的重担。她说：“现在完全习惯了。我从没想过要问问我们该到什么地方去，该做什么，如何去做。我只知道，我们所要做的都是必需的，而我的任务就是把事情做好。”对罗斯福来说，埃莉诺既是夫人，又是秘书，而且还是顾问。她不时地提醒罗斯福需要处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据菲利普斯回忆，一天吃早饭时，埃莉诺问起罗斯福是否已收到了某人的信。罗斯福一边喝着咖啡、吃着烤面包片，一边说信已收到了。

“那么，你回信了吗？”

“还没有，但是要回的。”

“富兰克林，难道不应该立即回信吗？”

“对，要立即回信。”

这样，罗斯福立即写了一封回信。菲利普斯认为，要不是埃莉诺的催促，罗斯福准会把这事忘了。

埃莉诺随丈夫来到华盛顿后，还注意同各方人士广泛联系。为此，她经常举行午餐会、茶会、招待会和晚宴，同时挨家挨户送名片，拜访海军军官家属。仅一个星期就拜访了60家，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开始时，埃莉诺凡事尽量自己做而不请社交秘书；但由于事情实在太多，最后不得不雇了一位年轻姑娘每周来于三个上午。这个姑娘名叫露西·佩奇·默塞尔。后来，罗斯福同她发生了暧昧关系，并因此导致了家庭的不和。

露西当时23岁，像埃莉诺一样高，长得漂亮，性格活泼开朗。她出身于马里兰州卡罗尔家族的一支，后来败落了；但露西受过与罗斯福家一样的贵族教养。她小时候住在北街1761号，与她现在当社交秘书的罗斯福家隔不了几个门，在华盛顿和纽约社交界名单上也有她的名字。像露西这样家庭背景的年轻女子要想维持生活，办法不多，其中之一就是替别人当社交秘书。据罗斯福的传记作者内森·米勒介绍，露西很能干，做事利落，埃莉诺交办的事，总是很快就办得有条有理。她很得罗斯福夫妇的喜爱。就连罗斯福的母亲萨拉老夫人对露西也是称赞不止，在她写给儿媳妇的一封信里说：“默塞尔小姐到这儿来了，她真叫人喜爱，事事想得很周到，还挺崇拜你埃莉诺。”

正当罗斯福在海军部的工作通过各个渠道顺利展开的时候，突然欧洲战云密布，震惊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1914年夏天爆发了。这场战争是由于塞尔维亚两名爱国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皇储弗兰兹·斐迪南引起的。

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国家在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大大鼓舞和促进了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尤其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强烈要求摆脱奥匈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统一的国家。奥匈帝国为了摧毁塞尔维亚，便加紧对塞的作战准备。奥匈帝国的野心，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德国希望通过奥国打击塞尔维亚，以削弱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双方约定，一旦奥塞发生战争，如果俄国站在塞尔维亚方面进行干预，德国将支持奥国。

奥国为了对塞尔维亚炫耀武力，决定在邻近塞尔维亚边境的波斯尼亚举

行军事演习，把塞尔维亚作为假想敌。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弗兰兹·斐迪南决定亲自检阅这次演习，并选择在塞尔维亚每年都要纪念的“维多夫丹”国耻日，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去巡视。斐迪南的目的，不仅是要显示奥匈帝国在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来对这两地区的统治权力，而且更主要是向塞尔维亚示威，打击塞尔维亚人民的反奥情绪。奥国的蓄意挑衅引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极大的愤怒。一个定名为“不统一，毋宁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军人团体，决定刺杀斐迪南，以打击奥国侵略者的气焰。6月28日，斐迪南检阅完军事演习后，偕同妻子乘敞篷汽车，在总督和市长陪同下，傲然自得地前往萨拉热窝市政厅。当车队行驶到闹市中心时，事先埋伏在路旁的波斯尼亚青年查卜林诺维奇冲上前去，向斐迪南乘坐的汽车投掷了一枚炸弹，但没命中，车队继续开往市政厅。当斐迪南夫妇参加完市政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乘车返回，行驶到一个街口的转弯处时，隐蔽在路旁的塞尔维亚族爱国青年加弗利尔·普林西普，快步上前，用手枪对准斐迪南夫妇连发两枪。这个狂妄、傲慢的帝国主义分子连同他的妻子当场被击毙。

斐迪南是个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者，他的遇刺被人民群众视为对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的一个惩罚。奥国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侵吞塞尔维亚的好机会。从此，以英国、法国、俄国、塞尔维亚和意大利为一方，以德国、奥国和土耳其等国为另一方的世界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而且战争的规模愈来愈大，卷入的国家和地区也愈来愈多。

大战爆发后，美国没有马上参战。美国政府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采取了坐收渔利的政策。它指望交战列强在战争中相互削弱，最后由它来收拾残局，夺取世界霸权。威尔逊在1914年8月4日发表了美国“中立”的声明。8月19日，他又假惺惺地发表了告美国人民书，要美国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样做到不偏不倚”。美国用所谓“中立”的虚伪面纱巧妙地掩饰了它坐收渔人之利的政策。

罗斯福由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他认为德国对西半球怀有帝国主义野心，因而一直保持戒心，所以几乎从战争一开始他就采取了亲协约国的立场。他为英国部队登陆、阻止德国向比利时的挺进而兴高采烈。一天，罗斯福同英国大使塞西尔·赖斯爵士在大都会俱乐部共进午餐时，发现德国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夫坐在邻近的一张餐桌旁，试图偷听他们的谈话。罗斯福说：“我完全清楚，要按我的主张办事，我就不那么中立。”罗斯福的这番话与威尔逊总统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1915年5月7日，英国丘纳德轮船公司的“露西塔尼亚”号客轮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被德国鱼雷击沉，使1195人葬身海底，激起了美国人民对德国纳仇恨。但是，威尔逊为使美国不卷入战争，只发表了一个措词不太严厉的声明。为此，西奥多和富兰克林这两个罗斯福都十分不满，他们竭力主张要针锋相对。当时美国舆论分成两派，一派拥护西奥多·罗斯福，呼吁靠战争为美国的荣誉报仇雪恨，使世界免遭德国的主宰；另一派愿意为和平作出任何牺牲。站在中间的则是威尔逊总统，他好像被左右夹攻，无所适从，实际上在绞尽脑汁，寻找有利时机，为美国统治集团捞取最大的利益。

到了1916年冬天，协约国的处境正明显地变得岌岌可危，德国人的气焰则相应地变得越发嚣张。富兰克林·罗斯福前去拜见总统，请求他为了美国的安全，下令把舰队从关塔那摩调回，作好战争准备。威尔逊听完了他的意见，最后斩钉截铁他说：“很遗憾，罗斯福先生，我不允许这么做。”

“但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罗斯福喊了起来，“我们可等，不得啊！”

威尔逊的下巴伸得很长，他说：“不，我不愿意调舰队北上。我们必须让世界舆论说出，美国在被迫参战以前，没有做任何一件给战争火上加油的事情。”

当时，整个美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但绝大多数美国人主张有备无患。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他四处游说，再次要求增加三万名海军现役人员，并建立一支20万人的海军后备队和民兵。在群众舆论和形势的逼迫下，威尔逊向国会提出了扩军备战的计划，建议：增加陆军；扩大舰队和增加海军人员，建造商船、军舰；建立咨询委员会，以开发国内一切经济资源。根据威尔逊的建议，国会通过了1916年造舰计划，规定在三年内建造26艘各种不同类型军舰，总价值约5至6亿美元。1916年6月3日，国会批准了国防法，规定增加常备军和国民警卫队，在各大专院校内设立预备军官训练团。

美国政府在进行了系列参战准备工作之后，伺机直接参战。1917年初，在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之后，协约国与中立国的船只遭受惨重损失。

150艘德国潜艇，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月份击沉商船181艘，2月份259艘，3月份325艘，4月份达423艘。丘吉尔当时发出哀叹：“爱尔兰西南的巨大海运线，正变成英国船舶的真正葬身之所。”美国“孟菲斯市”号、“伊利诺斯”号和“维吉伦提斯”号等10多艘船只也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德国潜艇击沉。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又一次掀起了反德声浪。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根据威尔逊的提议，分别于4月4日和6日通过对德宣战决议。

12月7日，美国又对奥匈帝国宣战。

美国的参战，进一步打击了德奥集团，使整个军事形势向着有利于协约国方面转变。从美国向德国正式宣战之日起，罗斯福就立即着手执行动员海军的任务。他连续派出鱼雷艇前往英国，协同英国舰队在欧洲海面作战。1917年6月5日，34艘美国驱逐舰从昆斯敦出发，参与大西洋上的反潜艇战。稍后，又有6艘战斗舰加入北海方面的英国海军，另有3艘开赴爱尔兰沿海。美国在布加勒斯特、直布罗陀、亚速尔群岛等地，都建立了专用的海军基地，以供美国的巡洋舰，潜水艇及其它舰船使用。至于陆军，宣战时，美国只有30万人。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从1917年5月18日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逐步动员了275万人加入正规军。除义务兵外，在国民警卫队、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还有志愿人员。到大战结束时，美国陆军差不多达到475万人，海军达到50万人。

为了制止威胁最大的德国潜水艇，早在参战前，罗斯福就在酝酿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计划。为什么非要在行无踪迹的汪洋大海捕捉这些机械鲨鱼？难道就不能把它们阻拦在巢穴里吗？这个计划要求在从奥克尼岛到挪威的北海咽喉处布下一道水雷网。经过与海军官兵的精心研究，他们发明了一种“布朗潜水炮”，它使北海水雷网的计划变得切实可行，因为靠蛛网一样四面散开的致命的天线，每颗水雷的能爆区域就大得多了。只要船碰到一根铜丝，大炮就响了。布朗的这一发明，大大鼓舞了美国及其盟国海军的士气。北海水雷网于1918年春季布下，每颗水雷内装有300磅黄色炸药。这道用高能炸药建造的波动长城，可以把德国潜艇部队拒之于公海之外。这在摧毁德国

海军的士气方面起了有力的作用，使他们一蹶不振，从此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指挥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决非易事，为了增加实战经验，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心到前线作一番视察。他说：“在华盛顿的每个海军部的头头，都应该亲自去看一看战争的进程，不然的话，就像一个在黑暗中下棋的棋手。”1918年6月9日，罗斯福乘坐一艘新下水服役的驱逐舰“戴尔”号，横渡大西洋，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7月31日，罗斯福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敦刻尔克，在那里头一次见到了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这座小镇三年间几乎每夜都遭到轰炸，这里连一所完整的房屋也没有。在凡尔登要塞，罗斯福碰上了德军炮火的轰击。

1916年，这里有近50万人在战争恐怖中死亡。在已被夷为平地的弗勒希村，罗斯福一行停下来想拍张照片，结果遭到德军炮火的猛烈袭击。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最后，罗斯福到比利时的协约国占领区匆匆转了一趟，会见了比利时国王艾伯特，目睹了驱逐舰同一艘德国潜艇在沿海的一场战斗，并又一次遭到敌军炮火的轰击。尽管罗斯福精力充沛，但由于活动安排太紧、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发烧达华氏102度，后来又导致肺炎，9月8日只好乘船回国。病愈后即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建议对海军在国外的活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海军部长丹尼尔斯称罗斯福这一报告，“简明扼要，发人深思。”罗斯福再不能满足于办公室工作了，他要求总统接受自己的辞呈。但要实现他从军立战功的梦想已为时太晚了。威尔逊告诉罗斯福，战争即将结束。1918年11月11日，“结束战争的战争”打完了。

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巨额利润，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国外投资额达70亿美元。美国借战争机会，使世界上20个国家欠了美国的债，包括英国也欠它44亿美元的债款，从而使美国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同时，由于美国掌握了巨额世界黄金储备，因而加强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市场上的控制地位，成了首屈一指的暴发户。大战期间，美国商船吨位增加了10倍，不但满足了海上运输的需要，而且为海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战争也使罗斯福这样一位资产阶级领导人受到了锻炼，为他日后进入白宫、特别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三军总司令，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正当罗斯福准备在政坛的竞技场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厄运却接连向他袭来。正是：好事多磨不遂愿，厄运袭来受熬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五章 厄运袭来

竞选失败遭重挫，祸不单行又生厄：
下肢瘫痪难行走，意志坚强战病魔。

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又要来临。1919年从巴黎和会铩羽而归的威尔逊总统，已经没有力量再来领导民主党在1920年的竞选活动了。共和党挟参议院中新胜之余威，生气勃勃地投入了夺回失去快八年的总统宝座的斗争。他们趾高气扬地宣称：“威尔逊先生和他的王朝，他的继承人，或对他奴颜婢膝的人，都必须赶下台，清除他们对美国政府的一切影响。”

此时民主党已萎靡不振，有气无力，为了振奋士气而推出詹姆斯·考克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来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罗斯福明知毫无当选的可能，但为了扩大民主党的影响并使自己进一步在群众中亮相，仍接受提名，并全力以赴进行竞选。在92天中，有84个晚上是在竞选车上度过的。他作了800多次演说。尽管他演说的关于国际联盟的主题不受选民欢迎，但是他的口才和风度却赢得了好感。选举结果，民主党惨败。共和党的哈定——柯立芝搭档获得1600万张选民票和404张选举人票；考克斯——罗斯福搭档只得到900万张选民票和127张选举人票。

但是，对罗斯福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在全国选民面前亮了相，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了解了普通人民的情绪和要求，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为他日后的成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罗斯福意识到，成功的关键在于争取民心，为此必须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把内外政策置于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把梦想当作现实。同时，还必须重视舆论，不重蹈威尔逊对美国人心向背作出错误判断的覆辙。此外，还需重视与国会和在野党的关系。威尔逊组织的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排斥共和党的代表人物，几乎成了民主党一党代表团，招致了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共和党议员的强烈反对。

经过总结，罗斯福更加心明眼亮，对未来充满信心。为着团结伙伴，笼络人心，他定做了多副金质袖链扣，送给参加竞选班子的男人。链扣的一粒上刻着他的姓名缩写FDR，另一粒上刻着受赠人的缩写姓名，好事者称之为“链扣俱乐部”。后来罗斯福入主白宫后，白宫秘书处都是这帮得到金袖扣的人，被称为“白宫帮”，秘书处主任就是路易斯·豪。

1920年大选后，罗斯福暂时退出政坛，一面重新整顿力量，准备东山再起；一面想进入经济竞争领域，一显身手。正好巴尔的摩金融家和报纸发行人范·李尔·布莱克的信托储蓄公司需要一个有声望的人任纽约分公司的主任，他选中了罗斯福。罗斯福名声大，交际广，以下台官僚的身份担任此职，必有作为。他年薪高达2.5万元，等于当海军助理部长的五倍，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

就个人来说，罗斯福避开那个不伦不类的副总统办公室感到高兴，为能有一段时间的自由感到欣慰。另外，他的几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安娜已经15岁，成为聪明伶俐的小姐了；詹姆斯在格罗顿读二年级；埃利奥特任性倔强，正需要严加管教；还有两个最小的孩子也开始懂事，可以和他们作伴了。罗斯福认为，作为父亲，他需要有时间好好了解他们，教他们航海、打猎、

钓鱼，探索他们的思想，向他们传授知识，岂不快哉！

罗斯福所在的信托储蓄公司，业务开展得也很顺利，经过活动，一批工商资本家已经网罗在他们公司的名下。谁知正当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这家公司的证券和海外投资活动时，一场意外的大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

1921年8月10日，罗斯福携带全家乘着“维力奥”号从他们的海滨别墅出发了。这是他为了教孩子们航海特意买的一艘单桅小帆船。回家途中，孩子们发现从坎波贝洛旁边的一个小岛上冒出一缕细烟。当大家望去时，烟柱正在散开。“林火！”罗斯福说。“快准备好！”他们随即向林火扑去，手执扫帚、铁铲和船上的坐垫冲向火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终于扑灭了火灾。全家人弄得汗流浹背，浑身烟灰。罗斯福热得要命，想跳进水里洗个澡，不料芬迪湾的水冰凉刺骨，寒气似乎一下直钻入他的脏腑。他赶紧上岸，一边喊孩子们，一边跑回家。他觉得两腿的肌肉酸痛，浑身冷得发抖，牙齿在格格作响，夜里连续发高烧，体温升到华氏102度，暂时失去了对身体机能的控制。埃莉诺急忙从卢贝克请来了乡村医生贝内特大夫，他断定罗斯福得的是重感冒。可是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把医生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剧烈的疼痛扩散到他的背部和双腿，不久他胸部以下的肌肉都没法动了。

第三天，疼痛和麻木的感觉扩展到罗斯福的肩部、手臂，甚至到了手指。路易斯·豪从缅因州度假胜地请来了费城著名的诊断专家威廉·w·基恩。他开始断定是一种痲痺，后来又说也许是脊髓灰质炎。但如果真是这样，这对一个39岁的人来说是倒霉透顶了。他建议按摩和精心护理。有两个可怕的星期，埃莉诺就睡在她丈夫房里的帆布床上，不分昼夜地护理他。她给他洗澡，喂他吃饭，还要想法使他打起精神来。而她自己却因大夫们不能确诊出丈夫究竟得的什么病而日益焦急。她唯一能求助的人就是路易斯·豪。豪拒绝了好几个人要他去工作的要求，守在他朋友身旁。埃莉诺说：“豪从那个时候起，把整个身心都扑到我丈夫的未来上了。”

日子慢得像蜗牛在爬行。尽管他竭力让自己相信病在好转，但情况却在不断恶化。两条腿完全不顶用了，痲痺的症状在向上蔓延。他的脖子僵直，双臂也不好了。最糟的是膀胱也暂时失去了控制，一天导尿数次，每次痛苦异常。他的背和腿痛个不停，好像牙痛放射到全身，肌肉像剥去皮肤暴露在外的神经，只要轻轻一碰就受不了。

除了身体上的痛苦，罗斯福还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他从一个有着“光辉前程”的年轻力壮的硬汉子，一下子成了个卧床不起、什么事都需要别人帮助照料的残废人，真是痛苦极了。在他刚得病的几天里，他几乎绝望了，以为“上帝把他抛弃了”。但是，他的奋力向上的精神并没有使他放弃希望。不久，尽管他一直受着痛苦的熬煎，却又以平时那种轻松活泼的态度跟埃莉诺和路易斯开玩笑。他理智地控制自己，绝不把痛苦、忧愁传染给妻子和孩子们。他不准把他得病的消息传给正在欧洲的妈妈，但他终于让埃莉诺打电话通知他的舅舅弗雷德里克·德拉诺。

罗斯福病倒两个星期后，他的舅舅弗雷德里克按埃莉诺提供的情况，把波士顿小儿痲痺症专家罗伯特·w·洛维待大夫请到坎波贝洛。事实上，洛维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脊髓灰质炎专家。大夫检查时脸色阴沉，罗斯福焦虑地注视着他。还没等医生开口，他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说出来吧，”他说。

“毫无疑问是小儿痲痺症，”大夫宣布说。

罗斯福对这个打击是有思想准备的，他甚至苦笑了一下。

“我原来就这么想。”他说。

大夫的“判决”像一声霹雷把埃莉诺打昏了。“怎么，大夫！他会死吗？”她焦急地问。

“不会的。他的两肺没有受到影响，这确实是奇迹！”

“我就不相信这种娃娃病能整倒一个堂堂男子汉，我要战胜它！”罗斯福说。

罗斯福也知道这是说大话，但不停地说大话可以使他比较容易保持勇气。为了不想自己，他拼命地思考问题，回想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回想他所接触、认识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家，有的是令人可敬的导师，有的是卑鄙的政治骗子。有时他也想到人民，想到欧洲饱受战争创伤的人民，想到那些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人们。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到底应当怎样生活，怎样做人。他在思索，他在探求。为了总结经验，他不停地看书。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大量有关美国历史、政治的书籍，还阅读了许多世界名人传记。此外，他还阅读了大量医学书籍，几乎每一本有关小儿麻痹的书他都看了，并和他的大夫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这方面，他快成为一个权威了。

罗斯福又像以前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了。他虽然卧床不起，前途渺茫，但并没有失去进取心。他相信这场病过去之后，定能更加胜任他所要担当的角色。他决不承认永远不能重返政治舞台了。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在怀疑面前常常不得不干脆关上思想的闸门。和罗斯福一样采取乐观态度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路易斯·豪。他从到达坎波贝洛的第一天起，就着手修筑防线，竭力不让这个不幸发展成灾难。豪清楚地意识到，“小儿麻痹症”和“瘫痪”会对他的朋友的政治前程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想避免在罗斯福的病情好转以前，在报纸上提到罗斯福得病的事。他对外只是说罗斯福得了重感冒。

“为什么不说明事实真相？”埃莉诺问。

“这是因为，”路易斯解释说，“瘫痪这两个字太可怕了。人们会把它跟脑膜炎混淆起来，似乎罗斯福的脑子也不中用了。这是他不得不在今后与之斗上一辈子的疾病。在外人还没有看到他神志清醒、笑容满面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听到‘瘫痪’二字。”“你以为他还会有政治前途吗？”埃莉诺问。

“我相信他会成为总统。”路易斯满有信心地说。

遵照决不走漏半点风声的原则，路易斯·豪亲自去纽约码头迎接富兰克林的妈妈詹姆斯·罗斯福夫人，并向她说明她儿子的病情。老罗斯福夫人急坏了，和他一起匆匆赶到坎波贝洛。当她站到罗斯福床前时，她说：“好啊，孩子，这样迎接我可真不错！”

罗斯福咧开嘴朝她笑了。他回答说：“妈妈，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说真的，我实在想亲自到船上去接你哩。”

9月中旬，路易斯·豪巧妙地把罗斯福转到了纽约市的长老会医院，由乔治·德雷珀大夫负责治疗。这时，豪才第一次向报界承认罗斯福得了小儿麻痹症，两腿不能行走。但同时他又提供了德雷珀大夫的乐观的病情报告。大夫宣布：“他不会成为残废。谁都不必为他这次得病会留下永久性的伤残而担心。”其实，德雷珀担心，罗斯福永远坐不起来了，更不用说自己能站

立或行走了。但是，他知道病人的精神状态对其身体状况至关紧要，所以他没有把这种疑虑讲出来。

在治疗过程中，罗斯福紧密地和大夫配合。他坚毅勇敢，雄心勃勃，每天要按照医生的嘱咐进行艰苦的锻炼。为使两腿伸直，不得不上了石膏。每天罗斯福都好像在中世纪酷刑架上一样，要把两腿关节处的楔子打进去一点，以使肌腱放松些。但是，在这个曾被看成花花公子的人身上蕴藏着极大的勇气。不久，就出现了病情好转的几个迹象。他手臂和背部的肌肉强壮起来，最后终于能坐起来了。

为了重新学会走路，他叫人在草坪上架起了两根横杠，一条高些，一条低些。他接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在这两条杠子中间来回挪动身体。他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能走到离斯普林伍德四分之一英里远的邮政街。每天，他都拄着拐杖在汽车路上蹒跚着往前走，争取比前一天多走几步。另外，他还让人在床正上方的天花板上安了两个牢固的螺丝眼。两个眼之间装一根铁管，管子上套一只吊环，另一只吊环用宽阔的帆布带从上面那个吊环上挂下来。这样罗斯福就能把上面那只吊环沿着铁管甩动，再靠有力的双臂抓牢另一只吊环，把自己抬起来，从床上的一边移到另一边。

到开春，他已经大有好转，甚至能够到楼下在地板上逗孩子玩，或在图书馆的沙发上接待客人了。

1922年2月，医生第一次给他安上了用皮革和钢制成的架子，这副架子他以后一直戴着。这副架子每个重7磅，从臂部一直到脚腕。架子在膝部固定住，这样他的两条腿就成了两根棍似的。借助于这架子和拐棍，罗斯福不仅能凭身体和手臂的运动来“走路”，而且还能站立着讲话了。但一开始，他经常摔倒，夹着拐棍的两臂也经常累得发疼。即使如此，罗斯福仍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坚持锻炼。

由于生病，罗斯福辞去了一部分职务。路易斯认为，最困难又最重要的事是要让罗斯福在政治上保持与外界联系。为此，路易斯不辞劳苦，写了成千上万封信，接见了数以百计的人。他还给罗斯福打气，敦促他自己对外写信，会见客人，做出各种政治姿态。路易斯对埃莉诺说：“人们是很健忘的，我们得叫罗斯福的名字真正响下去。”他还建议埃莉诺加民主党的州委员会的妇女工作部。在那里她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和重要人物，最后当上了财务委员会主席。她还经常出入妇女选民协会和妇女工会协会，成了她们之中的知名人士。为了便于对外联系和开展社交活动，埃莉诺还在几乎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学会了开汽车和游泳，她要加强锻炼，适应政治生活上各方面的需要。

正当罗斯福为恢复两条腿的功能努力锻炼和准备重新走入社会时，他的妻子和他母亲之间，却在为他的前途进行激烈的斗争。萨拉老夫人，决心要打破路易斯·豪和埃莉诺之间的同盟，把她的儿子拉在自己身边。她特别讨厌路易斯一直在罗斯福身边，常常称他为“肮脏丑陋的小人”。她认为儿子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指责他们这样做是给他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是对一个残废人的折磨。她认为罗斯福最好的选择是退居海德公园，在她的爱抚和保护下，他可以在那儿过乡村绅士的平静生活，守着这份产业，干些自己喜欢干的事，甚至还可以写他经常说要写的书。

埃莉诺和路易斯的看法同萨拉老夫人正好相反，他们希望罗斯福仍和过去一样，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们觉得如果把他当成一个瘫子来对待，那他很快就会一蹶不振。因此，他们把一些人请到第六十五街他们的住处，

想以此来引起他的想象，以利于他的康复。他们知道，当罗斯福意识到自己一辈子残废时，政治就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政治上，需要的是头脑，而不是身体。

经过艰苦的锻炼，罗斯福的体力增强了。1922年秋天，他重新回到信托储蓄公司工作。开始，他每周工作两天，慢慢增加到3天，最后每周4天。他的日程排得很满，每天早上8点半在床上会见路易斯·豪和别的来访者，这样他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两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办公室，一直于到5点钟。午饭就在办公室里吃。上午他处理信托储蓄公司的事务，下午办些私事。回家后，喝点茶，活动一下身体，就又会见来访者。事情往往要到吃晚饭时才完。路易斯成了罗斯福的双腿；他代罗斯福参加政治的和慈善机构的会议；他替罗斯福在拍卖场上买书报、邮票；他还为罗斯福家里的事奔走。秘书利汉德小姐现在已成了罗斯福的贴心人，她帮助路易斯·豪一起保护他的利益。

如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又响起来了，在他的府第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人群。最先去罗斯福家那儿“登门求救”的人们中，有一批是纽约州北部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党的形势岌岌可危。共和党哈定获选使他们元气大伤。威尔逊点燃的烈火已烧得惨淡无光。随着宗教和种族偏见的恶性发作和党内的四分五裂，被人们理所当然地废弃了的三K党突然死灰复燃，杀气腾腾地充当了一股一意孤行的逆流的急先锋，他们反对犹太人，反对黑人，反对天主教徒，除了神话般的所谓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外，他们无所不反。面对这些，民主党束手无策，它简直成了一批只想当官，却从不认真考虑一下究竟为什么要选他们上台的乌合之众。

1924年又是总统选举年，民主党人希望罗斯福出来竞选，重振士气。他说：“在摔掉丁字形拐杖走路以前我不想竞选。”但是，罗斯福决定出席6月24日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艾尔·史密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更重要的是发出他本人重新返回政界的信息。罗斯福在儿子的协助下，撑着拐杖走上讲台。这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会场里闪光灯像雷电似地不停闪烁着。罗斯福巧妙地控制着讲演的节奏，完全把听众吸引住了。他呼吁大家团结起来，这时听众都站了起来。他说：“我们这些代表，有的来自东部的大城市，有的来自西部的平原、丘陵地带，有的来自太平洋沿岸，也有的来自南方家园，我真诚地请求大家克服分歧、加强团结。我们要牢记亚伯拉罕·林肯的话，‘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的人都充满友善’。”然后，他又转而赞扬艾尔·史密斯，称他“具有英勇善战的领袖品质”，是“驰骋于政治疆场的快乐勇士”。罗斯福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据《罗斯福正传》的作者内森·米勒说，“欢呼声持续了1小时又13分钟。”这是人们对他表示的一种少有的敬意。他的心好像长上了翅膀。他的腿被架子夹得麻木了，他的手由于把全身重量都撑在桌上而不停地痉挛，但他全然顾不上这些。他那浑厚有力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着。

罗斯福以他的政治家风度和在会上的精彩演说而闻名全国，这是他下肢瘫痪后三年来第一次在全国做的公开演说。人们的称赞，党内的支持，更加鼓舞了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勇气。人们都说，经过疾病的折磨，罗斯福变得比过去更加坚毅老练了；小儿麻痹症使他从一个轻浮的年轻贵族变为一个同情并能理解下层的人道主义者，而正是这一点，使他最终进入了白宫。罗斯福的朋友弗朗西斯·帕金斯说，“因为他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他变得能理

解苦难中的人，他相信神圣的上帝把他从彻底瘫痪、绝望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但是，罗斯福的儿子小詹姆斯·罗斯福却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尽管小儿麻痹症加深了他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但这并不能使他成为总统。“我确信，并不是小儿麻痹症造就了父亲的性格，而是父亲的性格使他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在美国，1924年还是共和党的年代，民主党的竞选又失败了。这种情况是罗斯福和路易斯早就预料到的。在此情况下，他一面密切注意着形势的变化，准备东山再起；一面继续抓紧治病。在柯立芝时代，罗斯福的主要注意力是集中于使自己能重新行走。那年夏天，他听说佐治亚西部有一处温泉疗养地。那儿的泉水曾治好了一位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下肢瘫痪的年轻人。罗斯福对此很感兴趣，决定前去试一试。当他一泡到池中充满矿物质的水里时，他马上被流经他瘫痪的双腿的泉水吸引住了。“多舒服啊！”他喊道。水温华氏80度，浮力不小，他能接连几个小时呆在池里而不感觉累。经过一周的水疗，他第一次觉到脚趾有活力了。他写信给他母亲说：“这温泉真好！”

1926年4月，罗斯福花了19.5万美元从乔治·皮博迪手中买下了这座温泉。他决定致力于使小儿麻痹症患者恢复健康，并成立了非盈利性的佐治亚温泉基金会，专门接收全国各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罗斯福亲任基金会主席。他还聘请著名矫形手术医生哈帕德博士进行医疗指导工作。不出几年，成效显著，温泉成了病残者的乐园，到那儿去的人都跟他一样，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心里充满了希望、欢乐和勇气。有人把它形容为“笑声震天的地方”。温泉成了研究小儿麻痹症及治疗此症患者的国际中心。罗斯福也以“慈善家”的美名深深地镌刻在美国人民心中。

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一面在温泉治病，一面深入研究美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此刻他的雄心还需耐心等待。他的顾问路易斯·豪根据从各个渠道获得的情报分析，预计共和党的胡佛能连任两届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应等到1932年再去竞选州长，并准备1936年参加总统选举。结果如何？还需拭目以待。正是：自古雄才磨难多，竞选时机须等待。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六章 竞选州长

竞选获胜任州长，风吹雨打经巨浪；
精心治理纽约州，决意改革费思量。

1928年又是美国总统选举年。两党的政客、党阀和谋求官职的野心家、市侩纷纷活动起来。民主党又推出连任4届的纽约州州长艾尔·史密斯与共和党的赫伯特·胡佛竞选。但是形势对史密斯很不利，共和党政府正处在“鼎盛时期”，而且共和党候选人胡佛又向群众许了愿：“今后保证让人们的日子过得更美好。”民主党内部意见分歧、组织混乱的现象仍很严重。在过去四年里，罗斯福一直致力于团结统一那些四分五裂的派系，从而使全党成为真正全国性的进步政党。但是裂痕太深了，罗斯福的努力所获得的唯一成果是他成了党内各派系的共同朋友和他们之间的联络员。

随着竞选运动的开展，民主党的前景越来越黯淡。非常明显，选民们认为放弃共和党的“繁荣方针”而去接受民主党那种毫无把握的依样画葫芦的许愿是没有好处的。不久，形势急转直下，看来史密斯连自己的纽约州也保不住了。因此，物色一名强有力的州长候选人至关重要。掌握住纽约州，就意味着手中有了45张选举人票。史密斯殷切希望罗斯福出马竞选州长，好助他一臂之力。

不过，罗斯福却有自己的考虑。一来医生告诉他，再坚持治疗两年，他就可能治好左腿，不用双拐，只用手杖就可以行走。他担心繁重的竞选活动会使治疗效果前功尽弃。另外，罗斯福已准确地感觉到公众的心理，他知道不管是否助以一臂之力，艾尔·史密斯总是要被击败的。说不定在一次总崩溃中他自己也会吃败仗。即使罗斯福在州长竞选中获胜，他的地位也会受到损害。现在他已经是民主党内一位没有陷入派系斗争的全国性人物了，如果当上纽约州州长，就会降为地方人士。他的顾问路易斯·豪也建议罗斯福不必急急忙忙竞选州长，待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时，再从容进入白宫。因此，罗斯福回绝史密斯说：“艾尔，我要为你在全国作巡回竞选演说。除了让我自己竞选公职之外，你要我干什么我都唯命是从。医生说我在温泉再呆上两年就可以扔掉支架了。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说罢，罗斯福就往佐治亚温泉疗养去了。

9月份，纽约州在罗彻斯特举行民主党全州大会，会议开得很不景气。不管头目们怎样鼓气，会议仍开得冷冷清清。他们的苦恼在于找不出一个值得热烈支持的人来，在可能被提名的人当中，没有一个看上去像个胜利者。为此，艾尔·史密斯十分焦急，特派人将罗斯福的妻子请来，向她进行劝说：“埃莉诺，你看富兰克林的身体情况参加竞选行不行？你认为这会不会有损他的健康？”

“我认为他行，”埃莉诺认真他说。“可能会使他复原得慢一些，但是我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真正的损害。”

“如果我们提他的名，你认为他会不会去竞选？”

“这我可说不准。富兰克林是个很固执的人。但是，我知道，既然他已经把那么多的信念和金钱都投入温泉基金会了，他就非把大部分时间献给它不可。”

“这项工作不应该妨碍他竞选。我要打电话给他。”艾尔叫嚷道。

这一着罗斯福早就预料到了，因此他计划以一次精美的野餐而逃避。当晚他回到旅馆时，一大叠电话便条在等着他，上面写着：“拉斯科布先生来电话。史密斯先生来电话。莱曼先生来电话。汤姆·林奇来电话。”还有他女儿安娜拍来的电报，要求她父亲：“前来接受吧。”罗斯福给安娜回了一个电报：“该打你的屁股。”然后把那些便条统统撕碎，动身前往曼彻斯特为史密斯发表竞选演说去了。

罗斯福走到哪里，电话就跟到哪里。在曼彻斯特，史密斯在电话上死死纠缠。为了使罗斯福不反对参加竞选，史密斯对他说：“银行家赫伯特·H·莱曼同意竞选副州长，并答应担负州政府的大部分工作。你只要用两三个月时间集中处理一下事务就行了。其他时间你可以过悠闲生活，到温泉或者其他你愿意去的地方去。”另外，他还告诉罗斯福，通用汽车公司经理约翰·拉斯科布愿承担温泉的财务开支，并答应首批捐款10万元。最后史密斯用恳求的语调说：“富兰克林，告诉你吧，我不想把这件事放在个人角度上去考虑，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做。”面对着友人的哀求和一封封要求他参加竞选的电报，罗斯福有些犹豫了，他苦笑了一下，对史密斯说：“艾尔，你是在暗算我啊！”第二天，罗斯福就在欢呼声中被提名为民主党参加纽约州州长竞选的候选人。

这是罗斯福身患重病后第一次参加重要公职的竞选。其实，罗斯福对于纽约州州长的职位是向往已久的。刚进入政界时他曾经说过：“谁能当上纽约州长，谁就有成为美国总统的大好机会。”现在罗斯福决心竭尽全力摘取这顶桂冠！

在这场竞选的第一天，罗斯福就碰到他从此以后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即他的政敌利用他的残废大做文章。共和党的报纸攻击艾尔·史密斯为了自己的野心，无情地让一个瘸子作出牺牲。他们这个提名对罗斯福和全州的人民都同样地不公正。他们的评论是：如果罗斯福的朋友想为他做点好事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投票反对他。针对这些攻击，史密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不是因为他能作后滚翻或前空翻。州长干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

罗斯福也郑重声明，他不是由于州长逼迫而参加竞选的。他说：“让我现在就把话说清楚，我之所以被选拔出来，那是因为党内的领袖和代表集会时，一致坚持认为我的提名对选民们来说，是史密斯州长的政策得以贯彻的最好保证。正因为他感到，我自己也感到史密斯州长所建立的州政府，以及他树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正处于危难之中，所以我才接受了提名。因为这事太重大了，决不能丝毫考虑个人得失。我一定要在这次斗争中获得胜利。”罗斯福宣布，他要在本州各个角落与选民们见面，通过直接对话粉碎造谣者的中伤。

罗斯福进行了为期4周的竞选活动。为了使自己能与更多的选民接触，他在竞选后期，改乘汽车而不乘火车。这使他能几十个村庄和路口向选民们讲演。罗斯福脸色健康，精神抖擞，与选民们握手、拍肩，谈笑风生；凡是候选人该表演的，他都表演了；甚至还有一般候选人所没有的条件，那就是伤残选民对他的敬佩和拥护。他每天平均要作近200英里的竞选旅行，发表12次演说。通过无线电广播，每次就有1500万名听众。罗斯福在竞选的最后三个星期中，总共行程1300英里，发表了50场演说。这使许多跟着他的人都感到疲惫不堪，也使人打消了对他的健康和精力的疑问。

选举日那天，他照例在海德公园村政府大厅投了票，然后到比特莫尔饭店静候结果。对民主党来说，这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初步结果一出来，就很清楚地看出史密斯是这次向胡佛一边倒的选举的牺牲者。内战以前就是民主党地盘的那些州也转向了共和党。史密斯叼着一支熄灭了的雪茄，闷闷不乐地看着宣布的选举结果：胡佛得了 2139.2 万张选票和 444 张选举人票，这是美国历史上候选人得到的空前未有的最大胜利。而史密斯得到的只有 1501.6 万张选票和 87 张选举人票。胡佛在全国除了 8 个州以外的其他各州取胜，打进了一贯投民主党的票的南方各州。使史密斯惊惶不安的是，胡佛甚至在纽约也以约 10 万票的多数赢得胜利。这次选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人们早就心中有数，但实际情况却比最悲观的民主党人所预料的还要凄惨。唯一使民主党得到安慰的是，罗斯福以多获 25564 票而当选为纽约州长。罗斯福诙谐地把自己称为“0.5%的州长”。然而下管这次胜利多么微小，却把他推到全国政界的注意点。

1928 年元旦，罗斯福在奥尔巴尼拥挤的议会大厅里，手按着家里那本荷兰版《圣经》宣誓就职。恰好 30 年前，西奥多·罗斯福也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宣誓就职的。几天前，罗斯福曾对弗朗西斯·帕金斯说过：“我一定要当纽约州州长，我一定要靠自己当上纽约州长。”首先，他得向大家证明，虽说他的两条腿瘸了，但他有毅力和精力自己来管理这个州，而且要努力把它管好。尽管罗斯福大事赞扬史密斯并保证新政府要以他的进步行动为基础，但是他很清楚地表明，他要去探索新的领域，采用新的方法，并组成新的班子。

罗斯福就任不久，他的政府体制就明朗化了，那是一个建立在改革基础之上具有明确目标的专家政府。他说，“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因此放手把专家招进来。他的方法是把自己准备遵循的路线方针告诉他们，听取他们如何具体贯彻的意见。这样的好处是拿得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长期规划，并且有向州议会提出实施这个规划的具体建议。

罗斯福挑选他的老友小亨利·摩根索担任他的农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此人曾潜心研究纽约州的农业并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遴选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为劳工部长，她自 1919 年以来一直任工业委员会主席。聘请了法律专家、著名大律师萨姆·罗森姆充当州长的司法改革顾问。对于复杂的公用事业，罗斯福想得到一位法学专家的协助，于是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从哈佛大学前来向罗斯福的计划贡献他的专门知识。后来哈里·霍普金斯，一位被称为“有创造性头脑”的卓越的社会工作者，担任临时紧急救济局的主席。罗斯福周围就这样逐渐组成了一个专家班子，担任政府技术方面的顾问。在政治问题上，他有另一个专家班子，主要由他的好朋友们组成。路易斯·豪是他理所当然的“参谋长”，埃德·弗林当他的“国务卿”，忠诚的汤姆·林奇主持州的税务委员会，罗斯福的“战地司令官”吉姆·法利担任民主党州委员会的主席。这两个专家班子成了他日后进入白宫的智囊团。

有了这两个专家班子，罗斯福就能自信地行使州长的职权。为了避免同议会的激烈争吵，争取广泛的合作，他在就职演说中就表示希望出现一个“良好感觉的时代”。但是，这个政治上的蜜月却不长久。几个星期后，这位民主党州长和共和党议员们之间就行政预算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争论的实质是由谁来控制这个州的钱包，是州长，还是议会。如果罗斯福能将他行使的第一个这样的预算顺利地由议会通过，那他的威望就会增加；如果不成功，那他的政治前途就毁了。在旧制度下，造预算几乎完全是由议会控制的，州

政府拿着开支计划直接到议会。这些计划在议员们为了保护政治分肥工程项目和付政治债务而进行的相互捧场中被通过或被否决。州长对拨款有否决权，但不能参与造预算。罗斯福决意改革这一不合理的制度。新的制度授权州长制定政府预算，议会只能就某些项目提出删改或增添的建议。这一改革，目的在使预算摆脱政治斗争，结束议会对州政府行政部门的间接控制，从而扩大了州长的权力。

罗斯福执政的第二年，提出了一份 2.56 亿美元的预算，这比前一年增加了 10%。大多数新增加的款项是为了改善医院、监狱的条件，救济农民，减少税收，要求改革养老金制度和增加对学校的财政开支。共和党领导人对这种预算制度感到不满，但又不能直接攻击这一被广泛欢呼为重要改革的步骤。他们错误地把罗斯福的“和解”当作软弱，抨击他的方案，谴责这是民主党官僚们分赃的借口，并指贵州长“贪婪、独断和巧取豪夺”。

针对共和党在议会发起的攻击，罗斯福发表了一系列的广播讲演，有效地运用这一宣传工具。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听众相信他所采取的立场是正当的。每次讲话后，因阻挠预算而冒犯了舆论的议员们都受到群众的谴责，电台成了州长武库中的有效武器。罗斯福虽然当时还没有像他以后那样熟练地掌握广播讲话艺术，但这些讲话却是后来白宫岁月中炉边谈话的演习。罗斯福在使议会处于守势以后，否决了议会向他提出的修正了的拨款法案。他说：“我决不同意接受一个剥夺现任州长和以后的州长们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大部分合法职权的先例。”法案又原封不动地被退回议会。

为了团结人数众多的农民，罗斯福制定了一个振兴农村经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加强民主党在本州的地位。计划强调对农业的救济、植树造林、由政府来开发电力资源等等。这个计划有助于消除农村和城市生活的巨大差别。在美国，农民抱怨没有分享 20 年代的经济繁荣的果实，而不断增加的税额和销售费用又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罗斯福把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振兴紧紧联在一起考虑。他强调说：“美国不能继续这种一半繁荣一半萧条的状况。如果农村人口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新鞋、新衣服、新汽车，那么工业中心也要受苦。”罗斯福还计划迅速扩大农村的电气化，加速农业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土地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他主张把多余的土地从种植农作物改为植树，这样来减少农产品的剩余，以及对其价格的不利影响。同时，林业得到了发展，洪水控制及水的供应问题也得到了缓和。共和党的议员们不敢反对这些建议。罗斯福甚至成了纽约州以外农民的代言人。不少农民给他写信说：“以前，我们还以为你只了解华尔街的大亨们！”

1929 年 3 月，罗斯福在议会上就水电开发问题发表了一个特别咨文。在圣·劳伦斯河上要建造大坝和电站来发电，只要私营电力公司索价合理，它们可以签订合同把电力输送给消费者。但是摩根集团正使北部三家最大的电力公司合并，对电业进行垄断。预料这种合并会使电费大大提高，因此，罗斯福给水电问题的争执增添了新的内容。他警告说，如果私营公司不愿意以低廉的价格把公有电厂发的电输送给消费者，那么，州政府就会架设自己的输电线。他表示担心长期以来受这些公司控制的公共服务委员会不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建议成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圣·劳伦斯电力开发委员会，就发电以及和私人公司签订输电合同起草一个计划。共和党人拒绝这一建议，但他们被罗斯福“为廉价电力而奋斗”的口号击得粉碎。他委派路易斯·豪把使用公营电力的加拿大消费者所付的电费与使用私营电力的纽约人所付的电

费加以比较。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加拿大的电费要低得多。这些公司的老板们担心，舆论现在是在州长这边，因此他可能会干预北方电力公司的合并，所以他们劝说共和党领导人让步，罗斯福建议的圣·劳伦斯电力开发计划就这样通过了。

罗斯福乘胜直追，接连对共和党统治下政治和经济权力日益集中进行了抨击。他说：“每过去一天，就有 100 家小商店停业，或者被称作联号的新的商业机构所吞并。这种倾向，在各种制造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银行业中都能看到。”作为一位州长，他坚决反对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他说：“如果某个州不能为本州的孩子们提供足够的教育设施，马上就会有人叫喊在华盛顿成立一个教育部。如果某个州不能提供现代医疗手段，马上就会有热心的人主张在华盛顿成立一个卫生部。”此外，他还对垄断资本兴风作浪、投机倒把所造成的恶果深表忧虑和愤慨。

1929 年夏天，当罗斯福和夫人埃莉诺在纽约州北部巡视时，股票行情涨得使人头晕目眩。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盯着看报价牌上的数字，一个又一个地到达创记录的水平。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上涨到 261 又 3/4，阿纳康达铜公司达 130，美国电话公司达 302，通用电气公司达 395。倒卖股票已成了最时兴的投机生意，股票的价格已不再受诸如消费要求、生产率的提高或实际利润等有形的东西的影响了。控股公司与投资信托公司互为依靠，整个经济结构建立于毫无节制的投机的泥潭之上。全国大约有价值 80 亿美元的贷款被股票市场所吸收，而没有用到产业上去，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929 年 10 月 24 日，金融界崩溃了，在美国历史上这是被称为“黑暗的星期四”的一天。前一天，人们大量抛售股票，那天开盘价格就低了许多。到星期四这天，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都跟不上了。经纪人不住地喊着：“保证金，再拿保证金来！”没有现款垫上保证金的只能忍痛卖出，把更多的股份抛进那无底深渊。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从 83 跌到 50，美国无线电公司从 68 跌到 40，美国钢铁公司从 205 跌到 193。全国到处是耸人听闻的谣言：股票马上要一钱不值了；芝加哥和波士顿的交易所已经关门了；至少有 11 个投机家自杀了。到了 10 月 29 日，一切变得不可收拾。大批大批的股份根本不讲价钱地抛出了。投资者颓然倒在经纪人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自己的投资化为乌有。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呆若木鸡。当华尔街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结束时，人们都离开了交易所。在发狂似的几小时内，股票价值猛跌了 100 亿美元，这等于当时流通的货币额的两倍。

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带来了大萧条。从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到工厂关门、商店倒闭、人们排起长队购买面包，这种可怖的情况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萧条的到来不是像汽车轮胎突然爆炸，而是像慢慢漏气那样。事实证明，共和党总统胡佛从柯立芝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看起来花花绿绿的礼品包，里面装的是易燃的花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火星溅燃了花炮，局势愈演愈烈。罗斯福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艰难时刻”的到来。他曾预言，这时刻一到来，共和党就不能稳坐在白宫了。

对罗斯福说来，1930 年的主要任务是要以很大的多数连任州长，这样两年后他就有了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资格。在他任职州长的第二年，就提出了一个对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吸引力的计划：改革刑事审判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变银行法，以防止利用小额存款者的钱去做投机生意；严格管

理公用事业，为人民提供廉价电力。到4月中旬，议会会议结束的时候，罗斯福已为竞选连任作好了准备，并从议会中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一切。他精明地利用向人民发表广播讲话的办法，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本届议会所有的成就都要归功于他，而所有的失败都是反对党搞的。因此，竞选形势总是朝着罗斯福一边倒的势头发展。

开始，罗斯福预计，在竞选州长连任中会获得43.7万票的多数。但是，当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他竟以75万零1票的多数取胜。这样，罗斯福不仅把两年前由于他以微弱的多数取胜而引起的怀疑一扫而光，还把艾尔·史密斯最好的得票数翻了一番。而且民主党还控制了众议院，在参院也赢得了足够的席位。看来，1932年举行总统选举时，罗斯福很有可能进入白宫。正是：静观局势寻时机，连任州长是阶梯。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七章 问鼎白宫

经济危机似瘟疫，入主白宫创时机；
失业大军过千万，群众渴望新药剂。

席卷全世界的这场经济危机，为罗斯福进入白宫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他取得 1930 年州长选举的全面胜利后，就立即开始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活动。在他进入奥尔巴尼州政府那天，受到 5000 名群众冒雨夹道欢迎，群众向他高呼：“我们的下一任总统！”

罗斯福为自己的竞选活动亲自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而日常工作则托付路易斯和法利去办。这两个人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路易斯形容枯槁，眼眶深陷，态度常常粗暴严厉；法利则是和蔼可亲的个子高大的爱尔兰人。路易斯·豪在暗里活动，充当竞选的“参谋长”；而法利则赋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和惊人的记忆力。遇到多年前偶尔见过面的某个政界小人物时，他不仅能记起他的名字，而且还能想起一些细节从而说些奉承话。由于他具有这套本事，他在政坛突击队中，即摇旗呐喊的群众中很得人心。在 1930 年的竞选以后，罗斯福给法利写信说：“你干得很漂亮，我用不着对你说，我是多么感激你！”

1931 年初，路易斯和法利创立了一个掩护竞选活动的组织“罗斯福之友”，向争取提名公开跨出了第一步。正当吉姆·法利周游全国争取民主党广大党员支持罗斯福做候选人时，经济形势意外地开始好转。生产、工资和股票价格开始回升，建设速度也加快了；但转眼之间，好像是离去的风暴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来，这次是从大西洋彼岸刮来的，它席卷了美国的银行界。

1930 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以邻为壑的霍利—斯穆特关税税率，使外国货物几乎完全不能进入美国，这更加破坏了欧洲经济。奥地利最大的信贷银行倒闭了，恐慌和失望的波澜所及，紧密相联的国际金融结构遂告分崩离析。照胡佛的说法，“一场恶梦”接踵而来。先是英国，接着是除了法国和美国以外的所有工业大国都放弃了金本位。美国的一些银行本已由于国内债券价格和抵押证券的疲软而摇摇欲坠，现在由于它们所投资的外国债券价格下跌而一一垮台。

1931 年 9 月，305 家银行关闭了；10 月份总数达到了 522 家，胡佛终于认识到“来自国外的打击”使他为结束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刚见成效就遭到彻底失败。统计表上的失业数字猛增到 1500 万，实际可能高达 1700 万，占了整个劳动大军的 1/4。农产品价格几乎降到最低点，在 1929 年的业已跌价的基础上又下跌了 60%。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由崩溃前的 87 亿美元暴跌到 1933 年的 19 亿美元。同一时期的国家收入，比以前大约减少了一半。在工业停滞的同时，大批银行倒闭，估计有多达 1 万家银行关了大门，吞掉了小额存户的存款，使千家万户濒于死亡的边缘。

面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胡佛总统辗转不眠，吃睡不宁，夜间只能睡上二三个小时，由于劳累和发愁眼睛熬红了，但他无法扭转这一严重的局面。他已意气消沉。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说，“如果你把一朵玫瑰花放在胡佛手里，花也会枯萎。”抱怨、咒骂、愤怒到处皆是，整个美国乱成一团。

胡佛的威望、信誉彻底垮台了。曾几何时，他身穿大礼服，乘坐新式福特车，驰向宾夕法尼亚大街白宫时，沿路看到的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广告牌，心头一阵高兴，玩味着他将在就职典礼上发表的宏论：美国到处是机会，只要你能抓住它！他竟敢许愿，在他领导下，美国每个家庭的“车库里将有一辆汽车，揭开锅就有一只鸡”。他大言不惭地吹嘘：“今天我们美国人比以往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困。”

在共和党政府的鼓励下，由金融巨头操纵的证券交易市场，吸引了各阶层人民。汽车司机、店员、主妇，小业主、学生，都成了证券市场的主顾。他们受到这样的宣传：买股票就能赚钱，早买早赚，不买就是让别人赚。有一位富豪向一心发财的人们献策，他说：“一个人一周储存 15 美元，用来购买好的股票，在 20 年内他就会拥有 8 万美元。”当时的报上刊登了许多这样的报道：一个理发师购买通用汽车股票赚了 5 万美元。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在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上赚得 10 万美元。其实他并没有得到现钞，只是手中的股票不断升值，几倍几十倍，越是上涨就越不肯抛出。市面上的股票不够应付了，工业、公用事业、铁路和银行就“像制造肥皂块那样”赶紧制造新股票上市。从 1925 年 1 月 1 日到 1929 年 10 月，列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价目表上的股票，从 4.434 亿股，增加到 10 亿股以上。甚至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大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当作现金发给工人，却大受欢迎。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许多新发行的面值较小的股票，都到了小投资者和小投机者手中。他们对这些股票所代表的厂家的情况毫无所知，一味等着股票涨价。一心想发财，一心想发大财，成了当时美国社会几乎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疯狂症”。

胡佛是美国白宫里最后一位“标准的自由派”，是政府不应干预市场学说的最后一位捍卫者。他认为，这次萧条是欧洲经济崩溃的产物，而“不是国内弊政的结果”。因此，胡佛主张采取自然调节的政策，让危机自然而然地过去。他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经济，以保持“美国个性”。对待经济危机，他有几个赞成和不赞成，即：赞成援助大企业、大银行，不赞成援助失业工人，以免培养“懒汉”；赞成举办联邦需要的公共工程，但不是以安排失业者为目的；赞成贷款，不赞成赠款；赞成以救济款买饲料喂牲口，不赞成把救济款用来救济农民；赞成由私人 and 当地办一些救济活动，不赞成联邦来办，以避免联邦“集权”。

有人问胡佛，为什么体面的人也在街头设摊卖苹果？他回答说：“种苹果不如卖苹果赚钱，所以大家都去卖苹果。”总统先生的妙答，被舆论称为对失业问题的“难以置信的反应”。在胡佛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受惠最多的是大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因此他所办的复兴金融公司得到了“富人救济所”的浑名。

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胡佛那样受到老百姓讽刺、憎恶的。仅在 1932 年一年间，被地方执法官从被抵押而逾期未赎的住宅中赶走的家庭达 27.3 万个，到 1933 年有 100 万个家庭无家可归。这些人住在大城市近郊的荒地上用破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窝棚中。窝棚称为“胡佛别墅”，窝棚区名为“胡佛村”；失业者手中拿的破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公园长凳上过夜的流浪者身上

盖的旧报纸叫做“胡佛毯”。当时美国需要救济的家庭和个人数以千万计，人民群众强烈不满。有的地方出现了有暴力色彩的抗议运动，首先发难

的是农业地区。衣阿华州的奶农，为反对州政府

对牲畜强迫进行结核菌检验而大动干戈的短促的“奶牛之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挥舞着棍棒的农民，把派去监督这次检验的政府代表打得抱头鼠窜，只是在动用了州国民警卫队并施放了催泪弹之后才被镇压下去。另外一些农民组成“农民休假联合会”，他们停止到城市出卖农产品，举行“农业罢工”以示抗议。他们唱道：

让我们来个“农民休假”，
让我们休息一下歇歇身！
我们品尝自己的火腿、鸡蛋和面粉，
让他们去啃他们的银和金。

1932年春夏之季，更有两万多名退伍军人和失业者从西海岸向华盛顿进军，要求立即取得原定1945年才发给的补偿金。因此，美国舆论惊呼：连农民、退伍军人这些保守的阶层都对国家的现状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国家的出路何在？

当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还没有力量领导革命斗争的形势下，人民只能在现行政治制度下，从共和党和民主党中选一个来领导联邦政府，并帮助人民渡过危机。在193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已经丧失了，在参议院的多数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1932年是总统选举年。共和党推不出新候选人，仍由胡佛应战。民主党在角逐提名的几个人中，罗斯福年资最浅，但他从1930年连任纽约州州长后，就着手拉拢民主党的代表，顺应民心，为问鼎白宫打基础。

针对经济危机给人民带来的灾难，1931年，罗斯福亲自向议会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新政基本概念的主题。他宣称政府的职责在于减轻公民的苦难，增进他们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相反。他说：“国家对公民所负的义务乃是仆人对其主人所负的义务。人民创立了国家；人民一致同意让国家继续生存下去。国家的义务之一就是照顾那些在逆境下如无别人帮助即难以为生的公民……政府必须给这些不幸的公民以援助，不是做为一桩慈善事业，而是做为一种社会义务。”

罗斯福指出，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无力承担加给它们的重荷，因此他建议由州拨给临时紧急救济署2000万美元，此款用增加州的所得税的办法筹集。但是这笔钱不用于发放救济品。这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给失业者提供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则应给穷困者提供衣食住。救济款的发放应由地方官员在州的三人委员会和一名执行主任的指导下进行。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对胡佛不重视救济难民提出批评。他说，“总统的政策似乎是借款10亿余美元支付当前的财政赤字，这使我不安。这样做只会把周期性失业的重担推到后代人身上。”这样一来，反对党不敢再反对他的建议，因此这一计划未作重大修改就通过了。罗斯福由于这件事而在全国声威大振，人人称赞这位州长在对付失业的后果方面出力最多，态度最积极。

在罗斯福的积极倡议下，1931年年底，纽约州在全美国48个州中，最早成立了临时紧急救济署。由协助罗斯福筹集竞选资金的杰西·斯特劳斯任署长，哈里·霍普金斯担任执行主任，具体负责这一计划的实施。他从私人福利机构招募了一批能干的工作人员，对最严重的灾难发起进攻。但是这个

任务非常艰巨。

1932年初，纽约州至少有150万失业者，而且人数还在逐日增加。不久，救济署就得向全州大约10%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月平均大致23元。救济金额虽说微不足道，但饥饿现象总算得到了控制，而且比起其他地区的标准来，这里的救济还算是慷慨大方的，人们很快就看到2000万美元的救济款太少；1932年3月，罗斯福要求增拨救济款项，他说，不应让任何人“无衣、无食、无住，不准饿死一个人”。并决定发行3000万美元的公债。形势的严重性迫使罗斯福放弃了自己过去像杰斐逊那样对赤字财政所抱的厌恶之感。他承认：“在此非常时期，我认为应当采取本来不应考虑的非常手段。”他还修正了自己对各州权利的信念，赞成瓦格纳参议员提出的，尚待国会批准的关于由联邦提供7.5亿美元失业救济金的建议。

在新的一年里开始时，罗斯福就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意图。在争取获得提名的斗争中，罗斯福遭到一些有力量、有影响的人物的反对。其中有民主党元老艾尔·史密斯，他曾是罗斯福在政界的提携人；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和曾在威尔逊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的牛顿·贝克。史密斯等人则得到在舆论界颇具声望的沃尔特·李普曼的支持。李普曼从罗斯福争取提名开始，就对他进行尖锐攻击。李普曼藐视他说，罗斯福不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童子军而已，充其量是个举止文雅的人。他不具备担任总统的任何重要品质，但却非常想当总统”。李普曼认为罗斯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试验者，一个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指路明灯的人。这一判断有重大失误，罗斯福在担任总统的12年中证明了他不愧为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总统。

面对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罗斯福必须用事实说明他不是个急功近利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他所关心的确偏重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看得更远，提出对付动乱的根源以及减轻动乱后果的对策和方针。他的智囊团的任务就是要为进行这种调整提供理论根据。他们的作用不是替州长思考，而是提供选择方案。照莫利的说法，罗斯福对于新的创见非常乐于接受，但有时他也觉得，这些教授们由于急于把国家做为试验自己理论的实验室而走得又快太远。罗斯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超越民意过远，确是一种鲁莽行动。比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用自己的主张和激情唤醒美国人，但从未当选为总统。聪明一点的做法，更有政治远见的做法，是先获得提名和当选，暂不宣布可能引起争议的主张，以便有时间对选民进行教育。

罗斯福智囊团的第一个成果是莫利草拟并由罗斯福在4月7日向全国广播的10分钟的讲话。虽然这次讲话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持下发表的，但这位候选人为了有利于自己，提出了一项积极计划，旨在消除自由派对其改革主张所抱有的疑虑。他以具有预兆性的语言，驳斥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提出的“涓涓细流”建议，而要求采取一种“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做起的，把信心再次放在经济金字塔底层那些被忘却的人们身上的复兴计划”。他呼吁把复兴金融公司的一部分资金借给面临破产的小商人、农民和房主，这一切都将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关于“被忘却的人们”的讲话，不仅刻划了由于萧条而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千百万人的生动形象，而且是在竞选运动中争取代表的关键时刻发表的。讲话对中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农民起着激烈作用，那里正在召开代表大会和举行预选。纽约州长成了受苦者和被剥夺者的众望所归的人物，并获得了南部和西部各州未曾宣誓效忠本州候选人的

大部分代表的支持。

1932年6月的最后几天，民主党人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云集芝加哥，他们确信下一届美国总统将由民主党人来担任。在同一个城市里，共和党人召开了给人以凄惨之感的全国代表大会，快快乐然再次提名胡佛为候选人，这就打消了民主党人的一切疑虑和担心。但在民主党内部，为总统候选人问题，各派之间却进行着明争暗斗。“无冕之王”李普曼千方百计地拆罗斯福的台，大力支持贝克。李普曼在专栏文章中攻击罗斯福“头脑不清醒，目标很不明确，采取的方法不是开门见山”。艾尔·史密斯则声嘶力竭地宣称：“对于坚持煽动国内劳动民众以阶级对抗和贫富冲突来自我毁灭的任何候选人，我将决心与之斗争到底。”与这些人的作法相反，罗斯福却采取了高姿态，他没有亲赴芝加哥出席代表大会，却稳坐纽约静观局势。只有他的竞选班子在会上四处活动。经过激烈的角逐和几个回合的战斗，罗斯福终于以2/3的多数票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李普曼只得正视既成事实，他不得不改口说：“我确信，这位州长的能力或许是被低估了，或许更可能是他还很年轻。他是可以令人惊奇地发展和成熟的。”他宣布他将“愉快地投罗斯福州长的票”。

按照传统的做法，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要等待几个星期，听候党的委员会给他送来得到提名的正式通知书；但是，罗斯福决心吹掉政府屋檐下“愚蠢传统的蜘蛛网”。他打算戏剧性地实现他的意图，办法是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由奥尔巴尼飞往党代表大会会场去发表他接受提名的演说，而不是坐等隆重的通知仪式的到来。

罗斯福来到芝加哥，就径直地走上大会讲台，向与会代表，同时也向全国大约有1000万簇拥在收音机旁的听众，发表了字斟句酌的“充满希望”的讲话。“我在履行今后任务之初就打破了一个荒谬的传统，那就是，一个候选人要在几个星期里对所发生的事假装一无所知，一直等到好几个星期后才有人正式通知他这件事，”罗斯福说。“你们已经提名我，而我也知道这件事，我现在到这里来就是感谢你们给予我的荣誉。让这件事也作为一种象征，表明我这样做就是打破传统。让打破愚蠢的传统成为我们党今后的任务。”但是，有一个传统他希望能得到保持，那就是民主党要成为“自由与进步的旗手”，成为“使国家不断走向真正希望、真正正义和全体公民真正平等之途”的先锋。

“美国人最需要的是什么？”罗斯福问道。“我认为他们需要两样东西：包含一切道德和精神价值在内的工作；与工作一起的还有适度的安全，这包括自身的安全、妻子的安全和儿女的安全。工作和安全，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更不能就事论事。它们是一种精神价值，是我们的一切重建工作所要达到的真正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罗斯福提出了类似他作为纽约州州长所提出的那些计划：为穷苦者提供联邦救济；兴办自给的公共工程项目，以提供职业；废除禁酒法；造林，以便更好地使用土地；降低对房屋和农场抵押品的利息；调节证券交易；自愿执行农作物控制计划，以减少剩余农产品；以及降低关税税率。当他把这些建议传达给听众时，语调里充满了信心。代表们认为，这不是通常那种有意引得代表们拍手叫好的鼓动性的演说，而是“对形势的明晰分析”和对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所作的概述。

直到讲演的结尾，罗斯福才加进一些充满激情的话语。他说：“人类从每一次危机、每一次劫难、每一次灾祸中获得新生时，他们的知识变得更加

广泛，道德更加高尚，目标更加纯洁。而今天这是一个思想涣散、道德堕落的时代，一个自私自利的时代……我们不要只责备政府，也要责备我们自己。要相信，我们的几千万公民希望他们传统的生活准则和思想准则，并没有一去不复返，他们的这一希望不会落空，也不应该落空。”

“我向你们宣誓，我为自己宣誓，”罗斯福说，“要执行有利于美国人民的新政。让我们全体在场的人都成为未来那种富有成效和勇气的新秩序的预言者。这不单是政治竞选，这是战斗号令。请你们帮助我，不光是为了赢得选票，而是要在恢复美国固有的这一伟大进军中取胜。”最后罗斯福宣布：“竞选于今晚 10 时开始！”

当欢呼声还在芝加哥体育场里回荡时，罗斯福立即开始了竞选总统的战斗。在竞选期间，他发表了 16 次长篇的演讲和 67 次较短的演讲，而且在火车后部的讲台上发表了无数次不拘形式的谈话。沿途他所看到的经济危机后的景象使他大为震惊，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到处是失业的人群，到处是等待救济的饥民。他说：“我观察过千千万万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露出了迷路儿童似的惊惶之色。”罗斯福因此忆起了停战后的欧洲，像是又看见了饱受战争灾难奴役的人们。从而更加激起了他对共和党政府的不满。他曾用四句话概括了他对胡佛政府的批评。

第一，它通过错误的经济政策鼓励了投机活动和过剩生产。

第二，它企图尽量缩小大崩溃的含义，使人民认识不到其严重性。

第三，它把大崩溃的根源错误地归罪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最后，它拒绝承认和改正自己给国内带来的不幸，它迟迟不进行救济；它忘记了进行改革。

罗斯福一再提出这类指控，直到竞选将近结束时，他才在巴尔的摩宣布，要“对共和党现领导的‘四骑士’：破坏、延误、欺骗、失望”进行一场战争。

投票前，罗斯福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胜利已成定局。尽管胡佛本人也知道没有连任的希望，然而这位以兴办“慈善事业”闻名的人，却采取“吓唬选民，让他们担心罗斯福会做坏事”的策略来低毁罗斯福。但是，胡佛所到之处，听到的尽是“绞死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的喊声，选民用鸡蛋和西红柿投掷胡佛的竞选专车。一个在任内使全国 1/7 的人不得不靠施舍度日的总统，赖在白宫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11 月 8 日一早，罗斯福在海德公园村投票后回到了纽约市，在家人和朋友围绕下在民主党总部听取选举结果。他兴高采烈地亲自接听现场指挥人员打来的电话。罗斯福节节胜利。当他得知宾夕法尼亚这个“基石州”60 年来第一次投了民主党的票时，他哈哈大笑起来。随后有两个穿黑衣裤的人溜进了房间，整个晚上都在州长左右值勤。他们是特工人员，罗斯福今后终生都要在他们的监护下生活了。最后路易斯·豪从“第一线”打来电话，向罗斯福表示祝贺。“你好，富兰克林，”他说。“看来我现在总算大功告成了。”罗斯福请他过来，以便当众宣告：“为取得这次伟大胜利，在美国有两个人功劳比谁都大。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和同事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上校，另一个是好样的美国人吉姆·法利。”

罗斯福以 2280 万票对 1575 万票获胜，他在 48 个州中赢得了 42 个州，共得 472 张选举人票，胡佛只得到 6 个州的 59 张选举人票。自 72 年前林肯以 212 票对 21 票的 10 与 1 之比击败麦克莱伦以来，这是美国两党竞选史上

第二个悬殊的比率。从此，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入主白宫，于 1933 年 3 月 4 日起成为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正是：入主白宫遂心愿，励精图治绘新篇。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八章 “百日新政”

一石激起千重浪，“百日新政”兴新章；
多数拥护少数骂，我行我素有主张。

“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这是罗斯福在1932年7月2日获得民主党提名后提出的口号。在竞选过程中，“新政”（New Deal）这个词，打动了选民的心，使他们燃烧起摆脱危机的希望。但是，他本人思想中并没有一幅“新政”的清晰蓝图，也没有什么理论根据。能够肯定的就是要改变胡佛的“自然调节”的放任政策，进行美国历届政府都没有进行过的某种经济实验。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危机能比胡佛政府卸任与当选总统罗斯福就职之间这四个月的“政府过渡”时期的危机更加惹人注目，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对美国人民来说，这四个月真是最难熬的漫长时期，正逢银行破产和濒临恐慌的混乱局面。

1932年10月，内华达州州长为了防止一家重要银行系统的破产，下令该州所有银行在“银行假日”的名义下停业，显出了恐慌的初步迹象。

1933年2月，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也采取了同样措施。不过，最明显的危机征兆是发生在2月份的稍后几天，在这个富裕而又高度工业化的密执安州，一家举足轻重的银行系统面临破产而倒闭的第七天，为了防止争提银行存款现象扩大化，以致所有的银行一齐垮台，邻州州长们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到3月3日总统就职前一天，全国已有23个州都处在“银行假日”之中。结果，黄金储备从联邦储备系统和世界银行中心的纽约市流到了摇摇欲坠的国内银行系统和外国存户手中，致使国家黄金储备从1933年1月的13亿多美元猛降到3月初的4亿美元。纽约州这个国家最大银行中心的州长、著名银行家赫伯特·莱曼，在总统就职日被迫关闭了纽约州的全部银行。从此，美国银行金融界陷于瘫痪状态。黄金储备已低于支持通货所需的数量，财政部已发不出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从法律上说，美国已经破产。当罗斯福抵达华盛顿时，天刚刚破晓，世界上这个天字第一号的金元大帝国的金融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宾夕法尼亚大街刮来一股寒风，愤怒地吹动着庆祝宣誓就职的游行队伍经过的马路两侧的国旗和彩旗。

在罗斯福宣誓就职那天，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内森·米勒对首都和全国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天气像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阴郁。

“1933年3月4日总统就职日在黎明时就阴沉沉，华盛顿的天空灰蒙蒙的，就像宾夕法尼亚大街两侧建筑物正面的大理石墙面。雨时下时歇，树上粘附着雨雪。冷风吹动着悬挂在建筑物和路灯柱上的旗帜和条幅。从大清早就聚集到这里来观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仪式的观众，在冷风中哆嗦。一些人在跺脚取暖；另外一些人则踩在撕破的粘满污泥的报纸上以抵御冻脚的严寒，这些报纸告诉人们，全国正处在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之中。它似乎是人力无法控制的一支破坏力量。

“1500多万美国人——占全部劳动大军的1/4强——绝望地从一家工厂的大门踉跄到另一家工厂的大门，去寻求已不复存在的工作。统计数字不灵了；失业人数可能已高达1700万。

“惊恐的储户包围着银行，徒劳地试图在银行关闭或破产前提取一生的储蓄。

“在边远高原上，一群群脸色忧郁、缄默不语的人们持枪保护着自己的农场和家园，以免被受押人没收或被地方司法长官卖掉。

“失业的匹兹堡钢铁工人，打发自己的孩子到面包店里去乞讨陈面包；在纽约市的血汗工厂里，女孩子们为每天挣 20 美分而工作。‘找到一种工作，任何一种工作，似乎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名叫罗纳德·里根的中西部青年后来回忆说。

“衣阿华州的农场主把卖不出去的牛奶倾倒在公路上，把玉米和小麦当燃料烧掉；而在芝加哥，饥饿的人群在垃圾堆里觅食。一个寡妇在拾取臭肉时特意取下眼镜，以免看到蛆虫。

“到处可见到美国的极度痛苦。它显示在妇女忧愁的目光中。因为爱和笑已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它显示在巴尔的摩食品商的脸上，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店里的设备由于付不起租金而被搬走。它也显示在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绝望中，他们沿着铁路和公路游荡，因为他们的家庭已无法照料他们。

“自从 1861 年亚伯拉罕·林肯在不平静的托马克河彼岸出现一支叛军之际出任国家领袖以来，还没有一个新任总统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危机……”

阴暗的天气，冷漠的群众，这正好集中体现了举国上下此时此刻的凄惨情绪。可是罗斯福却表现出一种压倒一切的自信。他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下肢瘫痪的人。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休斯宣读总统誓词之后，罗斯福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富有战斗性的演说。

“值此我就职之际，同胞们肯定期望我以我国当前情势所要求的坦率和果断来发表演说。现在确实尤其有必要坦白而果敢地谈一谈真实情况，全部的真实情况。”罗斯福开门见山他说。“我们的国家过去经得起考验，今后还会经得起考验，复兴起来，繁荣下去。因此，首先允许我申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害怕的东西就是害怕本身，它会使我们由后退转而前进所需的努力陷于瘫痪的那种无名的、没有道理的、毫无根据的害怕。在我们国家生活中每一个黑暗的时刻，直言不讳、坚强有力的领导，都曾经得到人民的谅解和支持，从而保证了胜利。”

接着，罗斯福对危机和困难进行了分析。他说：“我们手头并不匮乏，然而丰足却激发不起来慷慨的用途。这首先是因为掌握人类物品交换的统治者们的顽固和无能，他们承认失败而自动退位。贪得无厌的钱商们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为人类思想感情上所厌弃的。”

“他们也的确作了努力，”罗斯福进一步指出，“但是，他们的努力脱不开过时传统的窠臼。面对着信用的失败，他们的建议却仅是借贷更多的钱。他们失去了利润的吸引力，无法再使人民遵从他们的虚伪领导，于是他们就不惜进行敲诈，痛哭流涕地要求恢复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没有预见，而缺乏预见就要使人民遭殃。”

“钱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我们现在可以使那庙堂恢复传统的信念。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则看我们对于比金钱利润更高贵的价值观念予以运用的情况。”

最后，罗斯福要求国会授予他像遭受外敌入侵时所应授予他的权力来对付危机。他说：“我准备根据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提出灾难深重的我国在当前灾难深重的世界中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以及国会根据其本身经验和明智所决定的措施，我都将竭尽宪法所赋予我的权力迅即予以采纳。然而，万一国会竟不能接受两类中之任一方式，万一全国紧急状况仍然严重，

我也将决下回避职责明确向我提出的抉择。我会要求国会准许我使用应付危机的唯一剩余的手段——向非常状况开战的广泛行政权力，就像在实际遭受外部敌人入侵时所应授予我的大权。”

罗斯福的讲话，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罗斯福的一位传记作者说，在美国“还很少有一位政治领导人，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月一个阴冷的星期六下午，如此完全地表达了民众的情绪。这位新总统作出的实行大胆领导的保证，他的决心，他的轻松愉快的乐观态度，点燃了举国同心同德的新精神之火。”观察家们指出，他作出的要以战争时期的精力战胜萧条的决心，在听他演说的人群中引起了最热情的反响。

罗斯福宣誓就职后，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旋风式”的“新政”运动。为了使他的政府行动起来，罗斯福要求参议院立即批准他的内阁。他的内阁没有经过举行听证会的程序就匆匆被批准了。在夜幕降临华盛顿的时候，内阁成员们都集中到白宫楼上的椭圆形大厅，在罗斯福的带领下举行宣誓就职。从此，一场震撼美国的改革，就在阁员和智囊团的参与下开始了。

美国史学家拉尔夫·德·贝茨说，罗斯福内阁人选是个“大杂烩”。有按正统原则遴选出来的人，也有按试验原则进选出来的人，有进步的新政人士，也有通常因照顾其对党的贡献而给予官职的人。国务卿一职由田纳西州科德尔·赫尔担任。此人虽是一个南方国际派，以税务专家和坚决主张低关税政策闻名，但在参议院中颇有影响。赫尔时年61岁，性格倔强，彬彬有礼，受人敬重。虽然罗斯福有时让赫尔坐冷板凳，但他还是使自己逐渐适应于新政的许多主张，供职国务卿的年限在美国历史上为最长。财政部长威廉·伍丁，名义上是共和党人，实际上长期支持罗斯福，与罗斯福过往甚密。伍丁身材瘦小，但为人颇有魅力，也很机灵，爱拉小提琴。这位曾任美国汽车和铸造业公司总经理的伍丁，对解决银行危机很有一套切合实际的办法。1933年底，他因健康不佳而辞职，由罗斯福的朋友小亨利·摩根索继任。摩根索当过《美国农业家》发行人，此前曾在纽约州政府罗斯福任内担负过几项行政职务，多半是在农业和资源保护方面，成了罗斯福政府中比较有影响的要员之一。

每届政府都会因受到过某些集团或地区势力的支持而欠下一笔笔政治债，罗斯福政府当然也不例外。商务部长一职就这样奖给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丹尼尔·罗珀。民主党的老古董，十分热心海军事业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克劳德·斯旺森担任海军部长，犹他州州长乔治·德恩荣任陆军部长，霍默·卡明斯任司法部长。邮政总局局长一职，传统上是用来酬劳党的赞助人，这次赏给了神通广大的政治组织家詹姆斯·法利。最引人注目的是任命纽约州的弗朗西丝·帕金斯女士当劳工部长，芝加哥的哈罗德·伊克斯当内政部长，衣阿华州的亨利·华莱士当农业部长。后三人由于贯彻了无数突出的新政计划，以及他们为新政出谋划策，因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一般都认为是新政的化身。华莱士于1940年离职，但帕金斯女士和伊克斯的任期却与4届罗斯福政府相始终。弗朗西丝·帕金斯是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部长，她的入阁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有一个记者问她身为女性当了部长是否感到不便时，她刻薄地回答：“除非是爬树。”

亨利·华莱士是哈定与柯立芝任内担任过农业部长的衣阿华州亨利·华莱士之子。亨利·华莱士与其父一样，也曾是一家著名的有影响的农业期刊的编辑。然而，儿子却摈弃了共和党而于1928年转而支持艾尔·史密斯，1932

年支持罗斯福竞选。华莱士是个怪杰，是一个神秘的计算机似的统计家，对 30 年代的一些农业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大胆的解决办法。哈罗德·伊克斯和华莱士一样，也是一个由共和党转变过来的民主党人。他是芝加哥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著名律师，办事谨慎，但脾气暴躁，对贪污受贿嫉恶如仇，必除之而后快。

在罗斯福政府的班子中，还有不少职位比内阁部长低，但在影响和制定政策方面作用却更大的人。其中有几位是最早一批的智囊团成员，他们是对新政起了重大作用的高参。罗斯福在 1932 年竞选总统时，因出于博采众议和起草演说稿之需而请教知识分子，开创了使用智囊的先声，但作为总统的一个顾问班子，其人选、数目和作用在整个罗斯福几届政府中，前后则发生过不少重大变化。

第一批智囊团的成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德·莫利、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小阿道夫·伯利，以及休·约翰逊将军等，他们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政府公职。公法学教授莫利是在 1931 年被罗斯福正式延揽负责主管竞选材料的准备工作。捷足先登的莫利随着智囊团的扩大而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因而初期新政的许多政策和立法草案都是由他负责审定或由他指派别人负责搞的。莫利早先是进步党人，在新政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阶段时，他就与新政格格不入了，后来就接受了新杂志《今日》主编的工作，离开了政府。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是一位英俊的经济学教授，与罗斯福一样，强烈地主张保护资源。他在农业部工作了几年，还在几个委员会里担任过职务，他常以经济哲理家和排难解纷的行家身分而被其他部门召请。哥伦比亚法学院才思敏捷的阿道夫·伯利教授，在新政初期未接受政府职务，然而在财政、经济分析与国际关系等问题上却不时提出可贵的咨询意见。休·约翰逊将军，是得到法学学位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他早期为罗斯福撰写发言稿，并帮助起草农业与企业方面的立法，还负责过全国复兴总署，但最后却成为时常抨击新政的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

在罗斯福周围，还有一些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担任过不同职务的总统顾问，他们任职时间长短不一。其中托马斯·科科伦与杰明·科恩，就是两位典型的致力于新政事业的精明强干、热情洋溢的青年律师。他们两个都是哈佛大学法律教授弗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高足。科科伦与科恩合伙草拟了 1934 年证券交易法和 1935 年控股公司法一类出色的“在法律上过得硬”的立法杰作。科科伦担任总统助理的时间比科恩长，一直干到他的职位由哈里·霍普金斯替代为止。应聘来华盛顿担任联邦紧急救济署署长的霍普金斯，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工作者，曾在纽约州的救济事业中于得很出色。他后来又担任了工程兴办署署长、商务部长等职，协助总统制订国防、外交政策，直到罗斯福去世，他一直是总统最亲密的顾问。

罗斯福的新政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观点，大部分来自他那乐于兼收并蓄三教九流的人才的胸怀。这些人才不少出身于学术界。

他们能在一般的事务中发挥他们的合理思维与分析才能，并在特定的领域里施展他们的专门知识。自认为是新政派的学者，通常是倾向于改革的。他们深信借助于计划，应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造就一个“良好的社会”。为此目的，他们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影响，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计划经验，20 世纪初期的都市改革目标，以及 19 世纪平民党的农业和财政改革的主张等。他们共同信仰：合理的思想是解决一切难题的最重要的钥

匙。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总统助理都对几届罗斯福政府的政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斯福网罗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办事机构和参谋班子，随即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他所推行的新政运动。大危机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的新政处方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占1/3。罗斯福就任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3月4日，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就职后的第三天，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发布全国银行“休假”的命令。这是他采取的重建金融和经济结构的第一步。接着又采取第二步行动，召开国会紧急会议，要求国会立即采取立法措施，认可总统采取的行动，扩大总统权力，授权总统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整顿措施。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淘汰一部分经营不善和基础薄弱的银行，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政府赢得时间，筹集应付储户提存所必需的货币。根据这一法令，总统得到了管制信贷、通货、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的紧急权力。政府禁止输出黄金，违者最高可罚款1万美元和判10年徒刑。银行的整顿是在几天内集中全力进行的。从3月13日到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局面、稳定人心起了不小的作用。公众舆论说，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

在银行重新开业的前一天，1933年3月12日，罗斯福发表了上台后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全国大约有6000万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了他的报告。他说，“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向全国人民谈谈银行问题。”他用普通公民很容易听懂的话就银行危机谈了20分钟，他的语调是热情而又使人放心的。罗斯福敦促听众把他们节余的钱存回银行，他说：“把钱存入重新开业的银行比放在床垫下更保险。”最后，他又回到就职演说时的话题。“让我们团结起来消除恐惧。我们已经成立了恢复我们的金融体制的机构；现在要由你们支持这个机构使其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既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我们团结起来就不会失败。”罗斯福以巧妙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新政思想。

为了使储蓄户放心，在罗斯福的倡议下，国会又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建立由联邦承担责任的联邦储备系统，成立联邦储蓄保证公司，对5000美元以下存款（后逐步增加为两万美元），由政府保证其安全；规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家；参加联邦储备系统的各银行不得从事支持股票市场投机的信贷业务；联邦储备局有更大权力控制全国信贷系统；私人银行接受联邦储备局监督。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银行信用很快恢复，银行存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增加了10亿到20亿美元。银行信用初步恢复后，国会在1933年5月和1934年6月先后制订监督和管理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法律。

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

罗斯福在白宫的12年，成功地利用了广播这个媒介。他以在炉火旁边同朋友和家人聊天的形式，每次都从“我的朋友们”开始，用亲切轻松的语调，及时把大政方针告诉人民。后来人们就称他这种广播讲话为“炉边谈话”。

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贬值是美国进行贸易战经常使用的武器。可是在30年代，一些把金本位看作是强国象征的拜金主义者，把放弃金本位和美元贬值看作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罗斯福的预算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认为，罗斯福的做法是“西方文明的终结”。可是大资本家们从切身利益关系中体会到罗斯福这一手确实厉害，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又有了强大的竞争力。金融巨头老摩根公开发表声明，赞成放弃金本位和美元贬值。罗斯福采取的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国民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系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成了整个新政的左右臂膀。

《农业调整法》是在罗斯福的授意下，由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助理部长特格韦尔根据许多农业专家提出的相互冲突的建议，仓促起草的。其目的是恢复农业收入，减少剩余农产品，企图把农业生产纳入某种计划轨道的一个尝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的规律的作用，调整农业是通过大规模破坏生产力来进行的，这就是所谓“减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产品价格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农产品滞销，农民负债累累。罗斯福上台后，成立了一些贷款机构，帮助农民还债。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罗斯福就打算用“计划种植”来改变“自由种植”。根据这个计划，由农场主、农业部和地方农业机构共同商定每种农作物应该种植多少才能保持供求平衡，然后通过农业调整署地方委员会，告知每个农场主的耕作份额。譬如，一个棉农，本来耕种300英亩棉花，现在分到200英亩份额，减少的部分由农业部给以补偿，1934年，全国减耕4000万英亩，杀掉幼畜600多万头。这种由政府来控制生产，用补贴和重税来进行调节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尽管农民的经济状况在实施农业调整后得到某些改善，农产品价格有所回升，但在新政计划中，罗斯福的农业政策受到了最广泛的批评。当千百万人正忍饥挨饿的时候，却要求以减少粮食生产和毁灭牲畜的方法来保证收入和利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用大规模破坏生产力来应付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突出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荒谬。

“蓝鹰”是《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标志。凡是接受《全国工业复兴法》各项规定的企业，一律发给“蓝鹰”，悬挂在显眼处。

1933年5月上旬，罗斯福在全国商会发表演说，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几天后，5月15日，有关法案提交国会，规定企业界可以在政府同意下建立同业公会，订立本企业的公平竞争守则，对违反守则的给予处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雇员有权组织起来集体谈判合同”。这一款体现了罗斯福致力于使劳资在他的领导下“合作”，减少和缓和阶级矛盾的设想。

这项法律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罗斯福遂竭力争取小企业的支持。他指出，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

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各种压力下，90%的企业自愿地或是被迫地加入“蓝鹰”运动，不同行业制订了多达750种的本行业公平竞争法规。在当时的局面下，大企业还没有从大危机的剧烈震动中复苏，他们不得不接受罗斯福在签署《全国工业复兴法》时的保证：“使人们能重返工作，使他们能买更多的工农业产品，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

《全国工业复兴法》虽然没有达到罗斯福所期望的复兴工商业的目标，但是美国工人运动的某些斗争成果通过这个法律得到了反映。例如，根据复兴法，与南方工厂达成的协议是走向废止童工劳动的一个开端；就工资工时进行集体谈判的规定，对改善工人的经济条件是一个有意义的进展；对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的血汗工厂进行整顿和制裁。此外，工人还利用第七条第一款趋势扩大了工会组织，增进了工人的合法权益。

在新政中，救济是一个主要方面；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还实行以工代赈。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时，在全国大约5000万的劳动力中，竟有1500万人失业。在胡佛政府时期，这些不幸者的生存全靠州政府、市政府以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州、市政府及私人慈善机构谁也没有这样的财源来接济如此庞大的失业队伍，何况在整个萧条期间每年还有150多万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分崩离析的社会和美国的经济结构，使得这一问题只有联邦政府直接挑起重担才能得到解决。这种和传统习惯永久决裂的做法，不单标志着罗斯福政府已经认识到，它必须使其失业公民免受饥寒，而且也促使旧的清教徒伦理观念的土崩瓦解。

为了试图逐步解决就业问题，罗斯福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是在1933年3月31日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计划。它吸收18岁至25岁的青年，从事造林、森林防火、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等方面的劳动。由陆军部、内政部、劳工部和农业部共同管理。每月工资30美元，其中25美元作赡家费。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由2.5万名退伍军人和2.5万名有经验的林业工人管理和指导，管区达1400多个，遍及各州。这是“美国和平时期规模最大和最迅速的动员”。这个组织在美国参战前，先后吸收了150万青年，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近20万英亩国有公园，兴建了大量游览设施。罗斯福曾经洋洋自得地宣称：“我对我执政时的成就，没有比这件事更使我感到自豪的了。”

整个新政期间，工赈机关名目繁多。综合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系统：一是由内政部长伊克斯领导的公共工程署，它主要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政府共先后拨款40多亿美元。另一个系统是由罗斯福的主要顾问霍普金斯主持，包括前期的民用工程署花费近10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兴建的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参加工作。它的特点是工程比较简单，交工快，适宜于吸收广大非熟练或半熟练失业工人。工人工资每月大约50美元，相当于失业救济金的两倍。

罗斯福还从提高失业者的自尊心的角度来说明以工代赈的特殊意义。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能够理解那些身居温暖舒适、酒食充足的俱乐部里的先生们，会议论政府的开支，议论由于政府实行以工代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如果这些比较幸运的美国公民愿意跟我来，我不仅会向他们证明政府开支的必要，而且同时还会请他们看看我们通过这些开支所取得的具体的效益。这些先生们中有人对我说，发放救济要比以工代赈更为经济。这话不

假。但是，不幸得很，说这种话的人对美国的真实情况实在接触太少；他们不理解，在救济工作中，我们是同有正当自尊心的美国人打交道。对他们来说，单纯的施舍会伤害要求保持个人独立的一切本能。大多数美国人都想为他们所得到的东西付出点什么。这里所说的付出一点什么，指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工作，而这种工作正是防止他们精神上颓废的屏障。”

从 1933 年 1 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各项工程费用以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共达 178.68 亿美元。这一大笔钱经过工人的手，通过不同的渠道，以消费的形式，交回到资本家那里，这就是以政府投资作为刺激私人投资的“唧筒引动水”。有人认为罗斯福引动水挹注得还太少；有人却认为罗斯福简直是离经叛道无法无天。得克萨斯州参议员乔治·特雷尔对罗斯福大把花钱的做法大张挞伐：“宪法天天遭到违反，宪法并没有授权把联邦的经费用于不是联邦的目标”，他甚至说霍普金斯干的事“将是要发动内战和革命”。

转眼，第一个“百日”过去了。15 篇咨文已提交国会，要求对全国的问题立即采取行动；15 项重要法案已得到通过；罗斯福发表了 10 次重要讲话。这些法律绝大多数是有争议的，但是罗斯福无意发动一场革命，也无意为美国创建一种新的体制结构，更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要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相反，他只是代表资产阶级中自由主义者的一部分，提出一系列“新政”措施，企图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他是希望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他是在设法医治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力图通过护理使它恢复健康。只是因为常规疗法再也不能奏效，他才试用了试验性的疗法。罗斯福在竞选中曾指责说，胡佛未能使经济复兴是因为他在使用现有的疗法方面过于胆怯。罗斯福在奥格尔索普大学讲演时许下的诺言是，“要进行大胆、持久的试验”，现在他正在履行这种诺言。

然而，正当他推行新政时，酝酿风暴的乌云却继续在远方集结。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往华北地区挺进；在德国，由德国国会授予绝对权力的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开始执行一项重整军备的计划，并把德国犹太人赶进犹太人聚居区。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几乎没有谈到国际问题；他同莫利和特格韦尔一样，认为萧条是美国经济的崩溃造成的，最好的对策是在国内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他还希望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重新发挥领导作用。新政初期的对外政策，同许多其他政策一样，反映了罗斯福本人观点自相矛盾。诸如旨在刺激国内经济的农业调整法之类的措施，暂时禁止了从国外的进口，而国务卿赫尔阐明的政策则是在互惠关税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经济合作体系，以便为美国农产品打开新的国外市场。

为了试图改变美国在世界人民眼里的形象，为国内经济改革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罗斯福上台伊始就积极谋求同苏联和拉丁美洲国家改善关系。众所周知，自从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美国政府一直拒绝承认这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国，但是由于经济萧条，保守分子们改变了观点，希望同苏联做生意。企业家们确信，苏联是美国出口商品的一个庞大的新市场。罗斯福认为，拒不承认苏联，硬把它置于“非法国家”之列的做法是愚蠢的，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他说：“仅仅由于我们不喜欢他们的政治制度，一个拥有 1.25 亿人口的国家就和另一个拥有 1.6 亿人口的国家连话都不讲，是十分荒唐的。”甚至在就职之前，他就决定要在这些方面作些努力。1933 年 10

月 10 日，罗斯福写信给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建议会谈，经过接触，终于在 1933 年 11 月 16 日正式承认苏联，恢复了长期中断的外交关系。这是罗斯福在美苏关系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上，他强调“美国致力于平等、合作和不干涉他国事务”。此外，罗斯福还决定给菲律宾以自由，1934 年 3 月国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 10 年过渡时期之后，让菲律宾人享受“彻底的独立”。

在国际事务上，罗斯福首先作出的主动表示是，想使由于与会国不能找到共同点而濒临失败的日内瓦裁军会议恢复活力。法国要求得到防止复活的德国进攻的安全保证；希特勒要求取消凡尔赛和约所强加给德国的种种限制；英国人和美国人谋求限制进攻性武器。罗斯福担心，会议失败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并会增加国内经济改革的困难。因此，他谋求休会五六个星期，在此期间新任命的美国代表团团长诺曼·戴维斯可以在会议的范围之外，同其他代表进行非正式磋商。作为美国对裁军的诚意的证据，他提议削减正规陆军 14 万。同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罗斯福认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是海军，而不是陆军。他指定从全国工业复兴法提供的紧急救济资金中拿出 2.38 亿美元用于建造军舰。随着 32 艘新军舰开始建造，其中包括“约克城”号和“企业”号两艘航空母舰，以前几乎弃之不用的海军和私人的造船厂又恢复了生产。

虽然罗斯福在忙于国内事务，但来华盛顿访问的外国人却络绎不绝。他们前来是为了寻求新任总统的帮助和保证。第一个是从工党转到保守党的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头脑里正为不列颠帝国复杂经济的实力与难题犯愁。接着来的是法国的前总理爱德华·赫里欧，他为了老是不稳定的法郎而来。后来又来了加拿大的贝内特，墨索里尼的吉多·荣格，以及那位正在教希特勒如何把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武装起来的德国货币魔术师沙赫特博士。其他国家派来了特别代表，那些不派特别代表的国家则由它们的大使充当代言人。一共有 48 个国家要求帮助医治它们的“经济病症”。

在英美两国领导人会谈时，麦克唐纳提出了一项旨在发生侵略时进行国际磋商以及削减武器和人员的计划。罗斯福认为，削减武器和军队是向世界性裁军迈出的一大步。在麦克唐纳和赫里欧离开华盛顿之前，罗斯福向他们保证，如果就武器削减和监督问题达成了协议，美国将放弃中立国的权利，并拒绝向被称为侵略者的任何国家提供补给品。这一表示使法国感到放心，同时也使德国坚持重整军备的立场成了阻挠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唯一障碍。

罗斯福由于担心希特勒可能会破坏他一直努力建立的微妙的均势，遂于 5 月 16 日呼吁 54 位国家首脑支持“以裁军实现和平”和“结束经济混乱”。第二天，希特勒就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作了答复。希特勒拒不承认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罪责，他宣布德国不愿签署一项互不侵犯协定，而且诡称也愿解散他的整个军队，如果别国也这样做的话。法国人对希特勒的“诚意”表示怀疑，他们不愿意用他们的军队换取所谓集体安全的纸上保证。这次会议陷入僵局，希特勒退出国联，并放手扩军备战，罗斯福对此十分懊丧。

到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开幕的时候，罗斯福对它的热情大部分已消失。经过许多天的争吵，代表们始终在稳定货币汇率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项协议。自从美元不含黄金之后，世界各地对美元的旋转感到不胜惊恐。罗斯福并不希望稳定，因为他怕汇率稳定之后，美国的物价会停止上升，这对复兴来说，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此时罗斯福正在海上巡视，他立即写了一份咨

文，并通过“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无线电发给会议，发给全世界：“为了促成更为真实、更为永久的财政稳定并给各国民众带来更大繁荣而召开的这个国际大会，如果由于有人建议进行纯粹人为的、暂时的、只影响少数几个国家的货币兑换的试验而背离正道，我将把它视为一场大灾难……”召开这次会议，目的是要改善或者治愈根本的经济毛病。它决不能背离这种努力。”

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高高的桅杆上的天线发出的电波，像宙斯的雷霆一样震撼着会议。英国代表团苦恼不堪，法国代表团火冒三丈，意大利代表团呆若木鸡，德国代表团吃吃暗笑。世界经济合作完蛋了。从此，让各个国家自顾自吧！在罗斯福看来，钱币不过是一种交换手段，是写在纸上可以任意抹去的一组数字。他简直不能明白，对于某些人来说，钱币居然还有感情价值，他们竟会真心实意地维护钱币的完整性。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吃过通货无限膨胀的苦头，害怕它就像那不勒斯人害怕维苏威火山爆发。

事实证明，世界经济会议是世界各国的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但是，如果以为会议能够成功的话，就会使德国狮子心满意足地同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羔羊偎依在一起，那就愚蠢透顶了。希特勒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可怕的计划已经作出，《我的奋斗》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发表了。奇怪的是：短视的西方政治家们却视而不见！

世界经济会议散伙之后，罗斯福来到坎波贝洛岛上他的家园。

自从他在这里患小儿麻痹症后，已经12年不曾来这里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海水太冷、道路太陡、难以攀登外，拖住他的还有另外的什么东西，那是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原因，一个令人不敢正视的痛苦回忆。但是，现在他敢正视了。带着海水咸味的强劲冷风，松林郁郁葱葱的悬崖和奇形怪状的岩石，以及这个岛屿上的迅猛潮汐，这一切使他重又感到欣喜激动。因为他已经战胜了在这里所遭到的打击。他当上了美国总统，到达了雄心壮志的巅峰。他现在明白，他一辈子也离不开支架了，永远需要别人的帮助与搀扶了。但是与世界提供给他的东西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过去的12年是斗争的12年，也就像他现在所明白的那样，是作准备工作的12年。下一个12年将是成绩斐然的12年。但他一想到国内的危机，世界的风云，又犯愁了。他决心回到华盛顿后，加快改革，大力推行新政，争取国内经济早日复苏，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风暴。正是：五洲震荡风雷激，加速改革为社稷。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维苏威火山，是欧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东南10公里处，海拔1280米。公元79年的一次大爆发，把附近的庞贝、赫库兰尼姆、斯塔比奥城全部淹没。以后仍不断爆发。本世纪的几次爆发是在1906年、1926年、1944年。那不勒斯人一听说维苏威火山爆发，就惊恐万状，变脸变色。

第九章 总统新风

善于思考是特征，果断雷厉兴新风；
推陈出新有胆识，社会改革载史中。

坚决果断、雷厉风行而且善于思考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性格的特征。他一进入白宫，就破除俗规，开创了一代总统的新风。

在他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他就召见了白宫首席守门人帕特里克·麦克纳。麦克纳刚一进门，总统就前去迎接，亲切地称他为“帕特”。麦克纳几乎昏了过去。他在白宫工作大约30年了，一位总统称他为“帕特”还是第一次。在一个星期内，罗斯福对白宫所有工作人员，如秘书、办事员和服务员，都亲切地称呼他们的教名或绰号。总统在工作之余，还经常同他们聊家常、讲故事，或开玩笑。罗斯福听说他贴身男仆黑人欧文·麦克达菲的妻子利齐·麦克达菲，相信人死后会再生的说法时，感到很好奇。利齐体重将近200磅。她告诉总统，她想死后作为一个女歌手再回到世间。罗斯福笑着说：“好极了！好极了！我愿你进入极乐世界！”

罗斯福给他的工作人员下达的头一个命令是，如果遇到有困难的人给白宫打电话请求帮助，不要置之不理。罗斯福说，要是有人陷于绝望而给总统打电话，那就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想办法给予帮助。白宫多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有的是土地赎回眼看要被取消的农民打来的，有的是即将失去住宅的住户打来的，罗斯福夫人亲自接过一些这样的电话。通常总是能想出办法减少在某个联邦机构的繁琐手续，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白宫长期居住的人，除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外，还有顾问路易斯·豪和秘书利汉德小姐。几十年来，白宫没有进行过认真的修缮，房屋严重失修，破落不堪。在罗斯福搬进去以前，白宫没有图书馆。一名守门人兼任总统的理发师。罗斯福夫妇在那里居住的12年中，二楼居住区看上去同海德公园的房子一样，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墙上挂着全家合影、孩子们和孙儿孙女的照片和海军的图片，此外还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和军舰的模型。房间里到处堆的是书籍和杂志。家具虽不精致，但用起来舒适，有些是从罗斯福家运来的。有几件家具，其中有总统的床，是在维尔一基尔家具店定做的。埃莉诺把她祖父老西奥多·罗斯福的画像留在第六十五街的风子里，由于那所房子将租出去，罗斯福对妻子坚持说：“你不能把祖父也租出去。让我们把他带走吧。”

罗斯福的书房设在二楼椭圆形大厅。墙上挂满了他个人收藏的海景画和海军图片，壁炉台上放着一个驱逐舰模型。其中一幅画的题目是《五月花号归来》，描绘了1917年第一批美国军舰到达欧洲水域的情景，它使人们想起他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日子。门上挂着埃莉诺小时候的一幅画像，她披着一头自然卷曲的明亮淡发，长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有一天罗斯福看见劳工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女士在仔细地观看那幅画像。他对女部长说：“我始终喜欢埃莉诺这幅画像，这才是埃莉诺的真实写照，你看她那头发多么漂亮！眼睛多么有神！”书房里放着两张写字台，一张是按杰斐逊的旋转写字台复制的，另一张是用“决心”号的橡木做的，上面有精致的雕刻。“决心”号是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用过的一艘船。罗斯福对航海、对海军、对军舰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

总统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每天早晨7点钟起床。他一边在床上吃

早饭，一边阅读《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先驱报》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另外还订着几十份刊物。他特别注意具有广泛影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和弗兰克·肯的文章。路易斯·豪还给总统提供全国各地报纸评论摘要和每日要闻，后来被称为《每日号声》。多年来，罗斯福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开始工作前，必须把全国的主要报纸浏览一遍。他说：“不这样我就没法工作，对国内外大事心里就没有底。”

平时，罗斯福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断他早晨的活动。一天早晨，埃莉诺听到丈夫的卧室里传来喊叫声和呼救声，过去一看，两个小孙女正在床上搂着罗斯福的脖子蹦蹦跳跳，叫喊着：“他是我爷爷！”“不，他不是你爷爷。他是我爷爷！”受到骚扰的总统正在设法用一只手保护他的早餐托盘，一只手拿着电话。“哈基，请等一等，”他绝望地告诉电话员，“我现在受到‘进攻’，眼下还不能同巴黎讲话。”

罗斯福看完报纸之后，接着就是审阅文件，一直到大约10点半。然后乘电梯下楼前往西厅的办公室。下楼前他总是先按一下蜂音器，让工作人员知道他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用一个没有扶手的小轮椅，这样就能转身坐到办公桌后的转椅上。一坐在那里就是一整天。他几乎每隔15分钟就接待一批来访者。前来造访的有内阁部长，专家学者，还有平民代表。所谈问题天南海北，无所不有。但罗斯福头脑清醒，精力过人，谈笑风生，应付自如。陆军部长史汀生对他不怕打扰，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感到惊讶。他对一位朋友说，“即便在非常杂乱的情况下，总统也能够迅速、清楚地抓住实质，作出决定和完成工作。”罗斯福不喜欢长的备忘录，对那些可以简化的冗长备忘录，他要求“把它压缩为一页”。尽管他下肢瘫痪，公事繁忙，但他仍同很多人保持信件来往，有时他在信的末尾亲自潦草地写上几句话。在圣诞节，他一面打开别人送来的礼品，一面口述感谢信。在人们的眼里，罗斯福“既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又是一位热情的朋友”。

下午1点，总统在办公桌上吃午饭，通常同客人或同事们一起共进午餐。他的午饭可能有清汤、一块排骨，或他喜欢吃的烤鳟鱼。罗斯福很注意自己的体重，定量定质，午饭不吃最后一道甜食。他吃饭时仍然滔滔不绝地讲话，和人们聊天，讲故事。有人说，罗斯福的健谈也是一种政治优势，特别是当他想避免表态或对将要采取的行动方针没有把握的时候。讲述一个令人发笑的长故事，常常使他有时间先考虑各种抉择，然后再作出决定。

罗斯福特别不喜欢当面同客人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有时他使客人觉得他支持他们的建议，而其实他却根本没有支持的意图。点头和低声说“是的，是的”，不一定是同意的表示，而只是表示他听懂了对方说的话。这种习惯使一些人指责他口是心非，指责他不光明正大。有人说，罗斯福的心情和动机错综复杂，令人迷惑不解，难以揣摩。

在罗斯福身上，绝大多数人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魅力。他总是希望讨人喜欢，并通过深入的交谈，使人不知不觉地改变原来的立场，而接受他的主张。例如，1936年夏天，一位年轻的妇女应罗斯福一个儿子的邀请来到海德公园，她无意中说出她在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工作。总统大笑起来，然后同那位妇女进行了长谈。到她离开海德公园时，她已经成为一个心悦诚服的民主党人，罗斯福的忠实支持者了。

有人说，把罗斯福放在棱镜面前，从不同的角度可折射出不同的颜色。的确，他既大胆，又慎重，能够抓住有利机会，以惊人的速度作出决定；然

而，在某种情况下，又善于拖延时间，直到几乎最后一刻才作出明确的表态。他处理问题有时极为灵活，有时又具有顽固到底的基本性格。他喜欢打破先例，但又像美国女儿会的绝大多数保守成员一样，珍视传统。他可能残酷无情，然而又不愿意将任何人解职。他既有卑鄙的报复性，又有基督教的博爱。他老于世故，具有一种秘密的宗教信仰，由于一场险些丢掉性命的遭遇，他更坚定了这种信仰。罗斯福对于自己那不可思议的性格，对别人起的作用感到非常满意。可能除了他亲密的顾问路易斯·豪外，他不准任何人穿透他那贵族气派的冷漠的盔甲。

有一次他告诉摩根索：“永远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干什么。”

政治斗争增强了罗斯福在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内养成的含蓄习惯。在那些年代里，他养成了敏感的头脑，使他能够对美国人民的想法作出敏锐的估计。虽然他由于身体残废和所处的地位而不能同美国人民同甘共苦，但是他具有能想象人们的兴奋、挫折和需要的天资。他善于观察风向。罗斯福认为，政治手腕的高明是打着遵守不可改变的原则的幌子来掩盖政策的变化。

罗斯福虽然遭到国内不少政敌和报业托拉斯的反对，但他同经常在白宫采访的大多数记者的关系却十分融洽。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些记者每星期有两次随便地围坐在他的办公桌边。总统就坐在椅子上，身体后仰，靠着轮椅，嘴角上叼着烟嘴，机智地对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满意的答复。罗斯福在任总统的12年中，共会见新闻界998次。他把这些会见看成与他的炉边谈话和较为正式的演说一样，是对全国人民进行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罗斯福进入白宫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就宣布要改变过去订下的只能书面提问的规矩。但是，非经他特别许可，不能直接引用他的话。在1933年3月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同记者们作了如下的谈话。

总统：很高兴见到各位。我希望这里的记者招待会成为过去四年我在奥尔巴尼当纽约州长时举行的那种快乐的家庭会议，只是规模大一些而已。

有人对我说，我所要做的将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我还是要试试看。我们不再搞什么书面提问了；当然，我不可能一次回答75个或100个问题，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但是，我完全可以像最近在奥尔巴尼和过去在这里的海军部那样，同各位女士和先生们非正式地谈一谈。我高兴地看到，各位中间有相当不少是我过去在华盛顿供职时就认识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停止必须在会前提交书面问题才能得到回答的作法。当然会有许多问题是我准备不回答的，或者因为它们属于“如果”一类的问题——这是我从来不回答的——斯蒂芬森老弟可以对各位说明一下什么叫“如果”问题。

斯蒂芬森先生（记者）：我一天问40个这类问题。

总统：另一类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我不想谈，或者还不适宜谈，或者我毫无了解。还会有许多问题是我了解不够无法回答的。至于新闻发布，总统秘书助理史蒂夫和我都觉得由这里得到的纯粹新闻最好都不直接引用原话。换句话说，我不希望引用我的原话，除非是由史蒂夫用书面提供我的原话。这一点完全明确吧！

我还想谈两件事：第一是“背景情况”，指的是你们各位自己作主、自己负责加以使用，而不提来自白宫的材料。因为我不愿意不得已再去恢复“谎

言俱乐部”（笑声）。第二件事是“不供发表”的情况，指的是只供出席招待会的人参考的机密情况。现在我要声明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同意。我请各位既不要把“不供发表”的机密情况转告各位的总编辑，也不要转告没有出席的同事；因为，总有这样的危险，各位自己不违背规则，有人却可能忘记提到“这是不供发表的和机密的”，于是别人就可能写进文章。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既不能发表，也不能转告给恰好没有来参加招待会的人。换句话说，只供出席的人参考。至于新闻，我想今天一点也没有（笑声）。

史蒂夫提醒我，我刚刚在要求加入新闻俱乐部作为准会员的申请书上签了字。此事我很乐意告诉各位。

随后，罗斯福就紧急立法计划、金本位、充分而有偿付能力的货币以及银行存款的担保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这样，罗斯福同新闻界的关系与胡佛同新闻界的关系就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萧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胡佛对日益增长的批评的反应是不愿向新闻界人士提供消息的，这使得被指定来对他进行采访的记者们的工作更加困难。罗斯福却由于他容易接近，有问必答，以及对记者的问题和心理的了解而很快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钦佩。就像他和白宫工作人员的关系那样，他很快就和经常采访白宫消息的记者们以教名相称，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甚至还喜欢和他们打打嘴仗。海伍德·布龙说，罗斯福是“当上美国总统的最好的报人”。

经过罗斯福巧妙地劝导和宣传，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团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情新政和罗斯福的目标；但是促成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因却是互利。总统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这对记者们说来就是保证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权威消息来源。如果关系良好，他们就处于值得羡慕的地位，能够在政府的政策在别的地方讨论之前，在提供背景情况的基础上了解这些政策。而对罗斯福说来，经常与新闻界保持接触，这使他能控制新闻，左右新闻报道，还能使他挫败社论撰写人对他的反对。记者招待会经常是发表新的见解的场所，也是动员舆论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巧妙地利用背景材料和不供发表的讨论，让聚集在一起的记者知道他的意图。这样，记者不仅心中有数，而且以同情的态度报道政府即将采取的政策。

在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有时兴高采烈，有时慷慨激昂，忽儿表示好奇或惊恐，忽儿哄堂大笑，他总是能主宰会场。在遇到不好对付的问题时，他经常能巧妙地回避这些问题，办法就是在会议开始时宣布一些极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使记者在整个会议期间转到注意这些消息上来。专栏作家马克·沙利文说，罗斯福具有极大的魅力和说服力，因此采访白宫的记者，甚至包括反对党的记者，往往都成了他的俘虏。

罗斯福总是牢牢地控制着记者团。确实，在对待他的瘫痪问题上，新闻界与白宫之间有那么一种默契。很少有人提到他的瘫痪，没有几个美国人意识到总统赖以活动的主要工具是他的轮椅。当总统被人抬着上下台阶时，从来没有人对此拍照而出他的洋相。罗斯福通常是诙谐幽默的，但他喜欢用锐利的语言对付批评他的人。有时，他也说些刻薄的话，特别是在记者想要从他嘴里得到消息时。他会说：“这是一个未经确定的问题。”或者说“请不

原文为 AnaniasClub。根据基督教《圣经》故事，早期基督徒阿纳尼亚斯就他向教会的奉献撒谎，天打雷劈而死。见《旧约·使徒行传》第五章。

要盘问”。对那些举止超出他可以接受的范围的人，他会说“戴上你的笨蛋纸帽，到墙角去”。

罗斯福的时间是安排得很满的。自从他进入白宫以来，他就很少到温泉去度假，或者乘坐海军巡洋舰作一次长途航海旅行。但他总不时地回到海德公园。那是他的家，他向往的地方。他一直对这个地方抱着一种乡恋的感情。特别是在圣诞节，总统经常在炉火边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夹杂着夸张的动作，读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他喜欢让来访的朋友们乘坐他的用手操纵的福特车去看看他的庄园。他会轻声说：“多美啊，你看这里有多美！”

罗斯福每天睡得较晚，通常在午夜前后上床。但在熄灯前，他常常要花个把小时同埃莉诺聊聊天，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在某个重大问题上听取她的意见。自罗斯福力主白宫以来，埃莉诺就兢兢业业，对丈夫的事业鼎力协助。埃莉诺是很勉强地担任第一夫人的角色的。如今，她已经是一个深孚众望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作家了。她害怕成为礼仪和传统的俘虏。她对一位朋友说：“我从来不想当总统夫人。”尽管如此，她把疑虑置于一边，在白宫里表现得精力充沛、热情而又仁慈，同她丈夫的非凡的活力一样，吸引着公众。以前所有的总统夫人都是谨小慎微，避免抛头露面，但埃莉诺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总统会见新闻界之前，她就举行了她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她说：“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协助他，干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1933年春天，退伍军人示威队伍来到华盛顿。罗斯福并没有派军队用催泪弹对付他们，而是命令退伍军人局为示威者准备宿营地并提供食物。为了缓和这一危险形势，埃莉诺受丈夫之托，冒雨踏着齐踝深的泥浆来到营地。退伍军人们对第一夫人的来访非常惊讶。他们欢迎她的到来，她则倾听他们的问题和诉怨。他们谈起战争，唱起古老的歌曲。埃莉诺协助把一些人安排到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为其他人准备了回家的车票。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退伍军人们说：“胡佛派来的是军队；罗斯福派来的是他的夫人。”

埃莉诺对新政的社会福利方面特别感兴趣，她不愿关在白宫里，经常到处走走，看看取得什么进展。在第一年里，她行程约4万英里。她向总统汇报自己所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埃莉诺的下访很快成为美国人谈论的话题之一。《纽约人》杂志发表了一幅漫画。在这幅漫画里，一个又惊又喜的矿工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啊，罗斯福夫人来了！”人们的笑声未绝，埃莉诺真的去访问了一个煤矿。不久罗斯福的母亲萨拉老夫人给他儿子送来了带刺的话：“我希望今天上午埃莉诺是和你在一起……我看见她却从矿井里钻了出来。”有一次，埃莉诺一早就离开白宫到巴尔的摩访问一所监狱，走时没有向总统道别。总统向埃莉诺的秘书马尔维娜·汤普森打听他妻子到哪儿去了，秘书告诉他：“总统先生，她在监狱里。”罗斯福回答说：“我真奇怪，她为了什么事进了监狱呢？”

尽管罗斯福夫妇性格不同，爱好各异，但是他们互相尊重，真诚相爱。在1933年3月17日罗斯福夫妇结婚28周年那天，总统给埃莉诺寄去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最亲爱的宝贝：

一周来苦思冥想，夜不能寐；

不知你需要内衣还是

外套、鞋帽、床单，还是毛巾、胭脂，还是托盘、糖果、
鲜花、台灯，还是
泻药、威士忌、啤酒，还是蚀刻画或鱼子酱，
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可知你需要某些生活必需品
去吧，带上我的爱。愿我们年年庆祝，
永远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罗斯福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感到“十分自豪”，尽管有时他拿她的乐善好施的声誉取笑她。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知道，埃莉诺真能干，她很会待人接物。”他对她的报告非常相信，还根据她的观察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在第一夫人中，她对政策和舆论的影响最大。但她注意向丈夫学习，在他的指导下成为全国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然而，罗斯福夫妇也有冲突的时候。在支持黑人民权和给妇女以平等权利方面，埃莉诺走在她丈夫前面，也走在全国的前面。当总统在民权方面的政绩不佳时，她劝他和吉姆·法利任命黑人和妇女担任政府中的高级职务，劝他们支持反对私刑、禁止种族歧视的其它法律。1939年，当“美国革命女儿会”下让黑人女低音歌唱家玛丽亚·安德逊在宪法大厅举行音乐会时，她辞职以示抗议。在此以前，当纽约市的侨民俱乐部因为亨利·摩根索夫人是犹太人而不肯吸收她入会时，她也曾以辞职而表示反对。伊克斯曾当过全国争取黑人进步协会芝加哥分会主席，在埃莉诺的劝导和鼓励下，他安排黑人女歌唱家安德逊小姐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演唱，到场的听众多达7.5万人。大煞了种族主义者的威风！

在对待种族问题上，罗斯福不如他妻子大胆和开明。为了保住选票，他迁就了南方的种族隔离行为。总统认为，新政给全体美国人民带来的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也会改善黑人的处境。比如，为救济工程项目工作的白人和黑人拿同样数目的工资，这在南方还是没有听说过的事。但是，他担心失去南方强有力的一些委员会的南方主席对他的立法计划的支持，因而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即便如此，他并不反对埃莉诺在种族问题上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我总可以这么讲，‘嗨，那是我妻子，我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在重大问题上，总统夫妇总是缓急相助，配合默契。在某些棘手的问题上总统不便出面时，罗斯福就打出“夫人外交”这张王牌，这也是总统新风的一个侧面吧！正是：推行新政阻力多，夫人协助度险坡。欲知罗斯福的“新政”前景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章 赞誉与攻击

新政招来恶攻击，官场自此风雷激；
决心采取强措施，挫败政敌不迟疑。

在第一个新政期间，罗斯福为了医治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他把抚慰企业界的工业复兴法，搞成了当时的关键措施。但到了 1935 年，罗斯福对赢得企业界的支持丧失了信心，因而改弦更张，对它发起了全力进攻。一些旨在惩罚企业界和帮助劳动人民的议案，例如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和公用事业法案，就是第二个新政时期立法方面的标志。施莱辛格说：“第一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必须做什么，第二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决不能做什么。”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1935 年的社会保险法，分成三大部分：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对无依无靠者提供救济。罗斯福解释说：“建立养老金制度是为了促使已到退休年龄的人放弃自己的工作，从而给年轻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使大家在展望老年的前景时都能有一种安全感。”根据法律规定，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 1% 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

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但保守派却企图在国会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指责社会保险违反美国一向珍视的“节俭精神、首创精神和自助精神”，声称所有的美国人不得不忍辱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一个印着社会保险号码的铜牌，就像挂块狗牌一样，他们指责说，实行社会保险，就等于把节衣缩食的彼得的钱抢过来，送给不事积蓄的保罗。新泽西州参议员哈里·穆尔指责说：“我们也可以从育婴堂抱个孩子，给他雇个保姆，使他不尝受生活的艰辛。”

国会期间，关于社会保险法的辩论十分激烈，共和党认为它是鼓励懒汉的法案。在听证会上，甚至有人叫喊社会保险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上逐字逐句抄来的。反对势力虽然穷凶极恶，但人数并不多，而广大人民则坚决支持，因此在最后表决时，众议院以 372 票比 33 票、参议院以 76 票比 6 票获得通过。

高举“新政”旗帜的民主党获得了对共和党的绝对优势，一大批刚刚踏入国会的新议员，对本选区选民对社会保险和救济的强烈要求，当然不能漠视；一些共和党议员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不愿留下反对社会保险的投票记录。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社会保险立法成了新政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新政时期，劳工关系是罗斯福特别关注的领域。他懂得，如果得不到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社会的动荡局面就无法稳定，更谈不上刺激私人投资的计划，而且在支持他的选民中，有组织的劳工是特别有力的集团。当《全

国工业复兴法》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连带使该法第七条第一款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根据。这对罗斯福鼓吹的“社会改革”和“劳资合作”无疑是个打击。新政处在成败的关头。许多大企业家度过危急时刻后，从支持新政变为反对新政，右翼报刊更大为鼓噪。因此，在罗斯福的坚决要求下，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国会很快采取行动。

就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取消不到40天后，国会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康纳利法》）。该法律规定：禁止雇主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局，处理劳工对雇主的申诉。它有权对雇主发出强制性的命令。雇主们重演反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故伎，向法院控告《瓦格纳法》违宪。可是工人阶级对最高法院的强大压力，以及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提出的挑战，迫使最高法院在1937年4月12日作出“符合宪法”的判决。

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罗斯福认为，“一个自给自足并有自尊心的民主国家，竟存在着童工制是说过不去的，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去克扣工资或延长工时”。第七十五届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州际工商业也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其中还有一条规定是禁止资方派遣密探打入劳工队伍。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

30年代，在号称进步的康涅狄格州，年轻女工在血汗工厂每周只能挣得1美元10美分，而在锯木厂劳动的男工，每小时工资只有5美分。因此，罗斯福从法律上规定工资工时标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罗斯福的这些社会改革，引起了新政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当经济危机的风暴席卷而来时，罗斯福的一切反对者被迫收敛他们的敌意。当最危急的局面有所缓和后，一个反罗斯福和新政的联盟开始形成。站在最前列的是反对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的报阀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和他的报系。赫斯特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罗斯福及其一切政策，支持一切反对新政的团体，甚至公开支持法西斯分子。他扬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他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在大危机期间冒出来的野心勃勃的煽动家查尔斯·库格林神父。

库格林是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神父。他利用广播布道的机会，放肆地进行反犹、反共、反工会、反罗斯福的宣传。在大危机期间，他利用美国社会充满愤懑不平和惶恐惧的情绪，疯狂散布蛊惑人心的言论。他要求大铸银币，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没收全部私人银行，等等，1934年，他组织了一个散发法西斯气味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拥有750万盟员，并按照纳粹冲锋队的模式组织许多打手队，上街找犹太人寻衅。库格林对信徒们说，美国所有的工会都是“受莫斯科操纵的”，因此他要求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用强硬手段解决劳资纠纷。他攻击新政是“犹太人的政纲”，罗斯福是“叛徒”、是“卑鄙的总统”，他甚至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

同库格林结成反动联盟的是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现任参议院议员、绰号叫“王鱼”的休伊·朗，他是比库格林更加蛊惑人心的政客。他有选民、政纲，既有煽动群众的本领，又有干成几件事的魄力。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来到白宫，要挟罗斯福，喋喋不休地抱怨政府在分配路易斯安那州的官职时撇开了他，而把所有的职务分配给了他的政敌。当罗斯福说明他的人事政策是遴选好人当官时，“王鱼”把脚一跺就走了。他后来用粗野的乡下话骂罗斯福像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而不像个“唬唬鸣叫的猫头鹰”。他解释说，唬唬鸣叫的猫头鹰敢闯进鸡棚，把一只母鸡打下栖木，不等落地就一把擒住她。“但是缩头缩脑的猫头鹰只会偷偷溜进鸡棚，蜷缩着身子移到母鸡跟前，柔声细语地跟她说话，引她落入他的情网。”

到白宫会见总统后不久，路易斯安那州这位参议员就同罗斯福公开翻脸了。“王鱼”提出了他的富于煽动性而又蛊惑人心的名曰“分享财富”的复兴计划，许诺要让“人人都成为国王”。他主张通过征税将全国的巨大财富没收充公，然后分给每户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一台收音机。他许诺向老人发放养老金，向退伍军人发放退役金；许诺保证让工人的年薪达到3000美元左右。经济学家们对休伊·朗的建议嗤之以鼻，但千百万穷人在他的蛊惑下，信以为真，纷纷参加他创办的“分享财富”俱乐部。“王鱼”由于自己的追随者增多，对罗斯福愈益藐视。他说罗斯福卖身投靠华尔街，并把全国复兴总署的蓝鹰标志比作纳粹党的卐字党徽。他嘲笑罗斯福，给他起了个“诺尔马哈尔号的富兰克林亲王”的绰号。休伊·朗对农业部长“玉米大王华莱士”和“芝加哥虱伊克斯”也进行了同样狂热的诋毁。法利告诫罗斯福说，“王鱼”想当总统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他在1936年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可能会给富兰克林·罗斯福造成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给塔夫脱总统造成的那种不利影响。人们认为，如果休伊·朗实现了当总统的野心，他会把美国转向公开的法西斯国家。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朗曾经向传记作家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党和共和党，自己出任“美国独裁者”。1935年，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写了一本书，书名竟是《我在白宫的头几天》。

正当休伊·朗的眼睛紧盯着白宫时，1935年9月8日，一个名叫卡尔·奥斯汀·韦斯的青年医生，在巴吞鲁日乌烟瘴气的州议会大厅，一枪把这条“王鱼”打成重伤，“王鱼”两天后就死了。韦斯刺杀朗，是因为他的家族的名誉遭到朗的侮辱。罗斯福和他的内阁，对朗之死“有如释重负之感”。休伊·朗虽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反对罗斯福的政治势力并没有消失。相反，联盟党在朗的副手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库格林神父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内科医生弗朗西斯·汤森的支持下成立了，并且推出北达科他州众议员威

廉·莱姆基当总统候选人。汤森医生是业余经济学家，他利用古老的宗教，一下子就把老年人动员起来支持他提出的“绝妙”的计划。他主张，凡是年满60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每月可获得200美元，条件是必须在30天内花完，不得储蓄。汤森认为这样既达到社会保障的目的，又能增加社会购买力。他赢得不少追随者，在全国组织了二三千个“汤森俱乐部”。他们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开会，接二连三地给报社和国会议员邮寄宣言，极力向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陈述自己的主张。

当1935年1月召开第七十四届国会时，罗斯福念念不忘这三个“激进”人物对亿万人的诱惑。罗斯福希望1936年能避开朗、库格林和汤森的威胁，通过鼓励工商界加快投资以扩大就业。他说：“救济是一种麻醉剂，会给人的精神造成一种不可名状的破坏。”他主张制订一项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认为这不仅能使失业者避免贫困潦倒，而且能使他们不丧失“自尊心、自力更生精神，勇气和决心”。

在新政的第一年，美国大企业和它们的代言人，被迫暂时接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药丸，尽管很苦，也得咽下去。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忘记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深深刺痛他们的话：“贪得无厌的钱商们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为人类思想感情上所厌弃的。……钱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逃走，只是暂时收敛一下。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向罗斯福宣战，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等。罗斯福忿然地说：“这些人确实忘了他们的病情是多么严重。我是知道的。我有他们的发烧记录。我知道所有那些度日艰难的个人主义者双膝颤抖不已，他们的心绪是多么不宁。他们成群结队到华盛顿来。那么，在他们眼中，华盛顿不是一个危险的官僚机构。啊，不是的！它像一个急诊医院。所有高贵的病人都要求两件事——要求迅速进行皮下注射止痛，对疾病进行有效治疗。他们急不可待。我们满足了他们这两个要求。现在大多数病人看来都情况良好。他们中有些人身体好到这种程度，能够把双拐对着医生扔过去了。”

对罗斯福来说，来自左翼的攻击和不满倒没有什么，有时他还利用左翼的反对来证明新政并不激进，更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从而安抚一些中产阶级。他感到吃惊和愤懑的是来自右翼的攻击。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他们。

在自由联盟的花名册上，充斥着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头的名字，他们提供巨额款项，掀起一股宣传浪潮，指责新政既带共产主义色彩，又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在南方，自由联盟散发一种传单，上面印有一张罗斯福夫人同两个黑人在一起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罗斯福欢迎黑人到白宫去就餐和睡觉。到竞选末期，有些工厂发薪时，在工人的工资袋里塞进纸条，指责说，要从1937年1月开始实行的为社会保险出资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产生了反效果，因为有组织的劳工反而加倍努力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的新政除了遭到左右两方面、以右为主的攻击外，还面临来自政府内部三大职能部门之一的最高法院的严重威胁。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是一个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分相互制约、维持平衡的结构，最高法院为右倾保守势力所操纵，他们对立法享有最高的权威。在新政开始时，最高法院无法用它的权威来维护旧秩序，只得忍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令他们头晕目眩的立法。当经济局势趋于稳定，老法官们和极右势力站在一起，

开始向新政宣战。

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九条第三节违宪，这一节授权总统为了保护资源和稳定石油价格，可以禁止把超过各州限额生产的石油运出州外。从此，利令智昏的老法官们，抡起大斧接连向罗斯福砍来。

5月27日，最高法院以9票对零票一致裁定全国复兴法和另外两项法案不符合宪法。新政派把这一天称为“黑暗的星期一”。这一天，最高法院一口气作出三件不利于行政当局的一致同意的裁决：宣布总统无权更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该机构不是行政部门的一个机构，不受总统管辖；宣布帮助农村抵押者的《农场抵押延期偿付法》无效，因为它侵犯州的权力；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因为它超出联邦关于州际贸易的权力，侵犯了州权。当复兴法被宣布违宪后，最高法院法官布兰戴斯趾高气扬地对罗斯福智囊团的科科兰说：“这是中央集权这一套的终结，我要你回去告诉总统，我们是不会让这个政府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现在到了尽头。”罗斯福的主要竞争对手参议员休伊·朗公开宣称：“我举手向最高法院致敬，它把我国从法西斯主义下挽救了出来。”

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这两项最重要的法案，经过两年才获得最高法院审议；在此期间，新政派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最高法院作出这种裁决。对此，政府陷入混乱，大家都等待总统作出反应。在那项裁决宣布四天后，罗斯福打破沉默，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华丽的词藻对最高法院大加讽刺挖苦。他说，自促使引起内战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以来，哪一项裁决都没有这一项这么重要。他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使宪法重新回到了“马车时代”。

由于新政在那个“黑暗的星期一”在最高法院遭到了挫折，由于谋求合作的表示遭到了工商界的拒绝，由于支持新政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发出了不祥的威胁，罗斯福终于结束了他五个月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他把国会领导人召集到白宫，交给他们一份“必须”通过的法案的清单。他用拳头砰砰地敲着桌子，斩钉截铁地说，国会必要时得开一夏季会，直到把社会保险法案、银行法案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通过为止。罗斯福向最高法院开始了反击。

为了改革目前的司法制度，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他考虑已久的计划。规定联邦法院法官年满70岁如果在六个月内不自动退休，则由总统另外增派一名新法官进入法院。这不是代替老法官，而是增加法官名额。按照这个计划，整个联邦司法机构将指派额外的大约50名联邦法官，最高法院将增派6名，连原来的9名一共是15名，原来9名法官中有3至4人对新政还不是坚决敌视的，加上新增派的6人，就可以基本扭转最高法院唱反调的局面。罗斯福的政敌、前总统胡佛把罗斯福的司法改革计划叫做“囊括法院”计划。堪萨斯州众议员尤利塞斯·盖那模仿莎士比亚的悲恸腔调喊道：“我们这个皇帝吃的是什么肉长得这么高大？”沃尔特·李普曼一本正经地说，这项计划是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德雷德·斯科特是南方的黑奴，他被带到伊利诺斯州住了几年。该州没有黑奴制度，因此他向法院起诉，说自己应该是自由人了。但是1856—1857年最高法院判决他仍是奴隶。原因是法官中有5个人是南方人，他们要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

罗斯福捅了马蜂窝。多年来，在公众的心目中，最高法院已经成了保护宪法的堡垒。改革最高法院的任何企图，都会被认为是攻击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互相制约的三权鼎立体制。后来，罗斯福以“炉边谈话”的方式，直接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对最高法院的擅专独断的强烈不满。他指责最高法院“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立法机构”，而且“硬塞进宪法所不包含的字眼和含义”。他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均衡，由于最高法院直接违背宪法制定者的高尚目标而倾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平衡”。罗斯福郑重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在宪法之下公正行事的最高法院，而不是高踞宪法之上；我们需要我们的法院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他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和新政其他法案都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因此都是有效的。

就在国内对新政的赞誉和攻击声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

1936年1月3日，罗斯福以发表国情咨文的形式开始了竞选连任的活动。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宣传，他在国会的一次晚间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这是自1917年4月以来的头一次——伍德罗·威尔逊当时曾在国会晚间联席会议上要求对德国宣战。现在罗斯福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不是要对付外敌，而是要对付本国“势力雄厚的一小撮人”和“声誉扫地的特殊利益集团”。他宣布：“我们已经引起斗争，我们已经招致盘根错节的贪婪势力的憎恨。”

罗斯福希望赫伯特·胡佛成为他的竞选对手，因为这样选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选择对象。共和党人6月初在克利夫兰开代表大会时以渴望的目光盯着这位前总统，但沮丧地认识到他的名字同灾难联系得太紧，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选出堪萨斯州州长艾尔弗雷德·蓝登为总统候选人。蓝登是中西部人，共和党提名他当总统候选人是希望他对农民具有感召力，能调动保守派日益增长的反对罗斯福的情绪。然而，蓝登的竞选演说呆板乏味，举止平淡无奇，他个人没有什么魅力。但是，共和党领袖认为，这会成为可贵之处，只要选民们对罗斯福始终笑容可掬的模样和明显的狡黠态度感到厌烦。有一次，在听了共和党的这位旗手讲演后，伊克斯刻薄地挖苦说：“如果这是蓝登所能发表的最好的演讲，民主党的竞选委员会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经费全部供给他到各地去演讲。”

两周后，民主党在费城召开代表大会，这与其说是一次代表大会，不如说是个加冕仪式。尽管艾尔·史密斯力图劝说代表们撇开罗斯福，另推选“某个真正的民主党人”，但是罗斯福和加纳仍被全体代表经口头表决再次提名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6月27日晚上，罗斯福到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演说。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在儿子吉米的搀扶下，拖着僵直的腿，蹒跚地从聚集在讲台后面的人群中间挤过。他从攒动的人头中认出了埃德温·马卡姆。他伸出手臂，想同这位老诗人握握手，但被人群一挤，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右腿的支架突然松了，他一个趔趄，手中的发言稿撒落在人群中。周围发出低声惊叫，几乎引起恐慌。特工人员赖利手疾眼快，一把扶住罗斯福，左右急忙把支架重新安装好。赖利唯恐混乱中有人把马卡姆误认为刺客，发狂似地朝这位目瞪口呆的诗人高喊：“别动！别动！”罗斯福脸色煞白，浑身哆嗦，急促地喊：“快把我身上掸干净！快把发言稿捡起来！”一切恢复正常后，他说：“好吧，我们走吧。”他朝讲台

走去，但目光落在马卡姆挂着泪珠的脸上，立刻又止步，同这位老人握了握手。

在运动场上，罗斯福受到 10 万名群众雷鸣般的欢呼。他讲了几句客套话后，就马上给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定了调子，痛斥“经济守旧派”和“享有特权的亲王们”给美国的经济民主构成威胁。罗斯福说：“经济秩序的守旧派承认政治自由是政府的事情，但他们坚持认为经济奴役不关任何人的事情。他们承认政府能够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公民的投票权，但不承认政府能够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公民工作和生活的权利……这些经济守旧派抱怨我们想推翻美国的制度。他们其实抱怨的是我们想剥夺他们的不合法权力。”

“政府可能会犯错误，总统确实也会犯错误”，罗斯福接着说，“但是，流芳百世的但丁告诉我们，神圣的司法会用不同的天平衡量冷酷的人的罪孽和热心肠的人的过失。一个慈悲为怀的政府纵使偶然失误，也比一个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的政府长期啥事不干要好……世道循环，奥妙莫测。对于某几代的人，可谓得天独厚；对于另几代的人，会要求很高。这一代的美国人则应运而生。”

在竞选期间，罗斯福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人民的欢迎。在芝加哥，约 15 万男女群众临时自发地组成欢迎队伍，把他从火车站一直送到运动场；在波士顿，市议会大厅挤得水泄不通，连附近的街巷都人山人海；在纽约，曼哈顿区万人空巷，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来欢迎他。在俄亥俄州和衣阿华州，甚至在阿尔夫·兰登的堪萨斯州，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兴高采烈的群众的欢迎。群众伸出手臂同他握手，朝他招手欢迎，有的是为了感谢他拯救了一座农场或住宅，有的是为了感谢他使一座工厂重新开工，有的是为了感谢他成立工程兴办局，提供了就业机会。有人说，就连老天爷也站在罗斯福一边，因为就在他到田地龟裂的中西部旱区的时候，天上凑巧下起雨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对兰登置之不理，绝口不提兰登的名字，一味猛烈指责赫伯特·胡佛和自由联盟的“经济守旧派”，说他们是新政的敌人，因此也是人民的敌人。他经常向群众讲的一句话是：“你们看上去比四年前愉快啦！”

每到一处，他总是要把 1936 年的情况同 1932 年的情况对比一番。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住宅获得拯救，没有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创造了就业机会。经济开始回升。失业人数比经济萧条最严重时期减少了约 600 万人。汽车厂商预言，1936 年将自 1929 年以来最景气的一年。公司利润是 1929 年股票价格猛跌以来最高的，道一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数比 1932 年增长 80%。罗斯福咧嘴大笑，轻蔑地奚落说：“1933 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浪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10 月 31 日晚，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后，结束了他的竞选活动。他的讲话使听众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鼓掌欢呼。他说：“全国因政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所事事而吃了 12 年苦头。全国人民看着政府，可政府转过脸去。9 年受金钱愚弄，3 年遭遇祸患！9 年发疯般地厮守在行情自动显示器旁，3 年在领取救济的队伍中苦挨日月！9 年愚蠢地想入非非，3 年灰心绝望！今天，某些强大势力企图恢复那样的政府以及它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论。”

“在大约4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府不是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而是卷起袖子大干。我们将继续大干下去。”

罗斯福越说越激动。他指出他的“宿敌”就是“企业界和金融界垄断集团、投机倒把的奸商、鲁莽的银行老板、地方主义以及靠战争牟取暴利的投机商”，并说这些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把美国政府看成他们的封地。这几股势力像今天这样紧紧地抱成一团，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想说，”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在我领导的首届政府执政期间，这些自私自利、权欲熏心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听众纷纷站起来，整个公园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还想说——”这时又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铃铛号角声，他的声音被淹没。“请静一静！”总统高喊，“我还想说：到我领导第二届政府的时候，这些势力将会遇到强手！”

1936年大选，罗斯福大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和佛蒙特两州以外的全部选举人票。直接选票也比共和党候选人兰登多900万张。在国会两院，民主党掌握了绝对优势，参院是76比16，众院是332比89。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114年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当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海德公园欢庆胜利的时候，他才开始注意到他的参谋班子里失去了几位知己。这使他痛苦地回忆到这几年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以及他的智囊团中所发生的变化。首先离去的是蒙德·莫利教授，他是因为与国务卿赫尔意见不合而主动辞职的。他在后来一段长时间内仍充当总统的心腹，并且是总统讲演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但是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最后终于和那些年轻的新政人物的激进政策彻底决裂。

在第一套班子里面，罗斯福失去的第二名成员是威尔·伍丁。这位体弱多病然而生性欢乐的小个子财政部长，在银行危机期间为了国家的需要操劳过度，第二年就与世长辞了。小亨利·摩根索接替他，成为国家财政的头头。国家复兴总署垮台以后，休·约翰逊像一股愤怒的彩色飞旋焰火，冲出了政府的轨道，从此他在一家报纸的专栏里，将自己卓越的骂人本领用来攻击他以前的同事。

正如威尔·伍丁为国捐躯那样，路易斯·豪为朋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在1932年竞选运动中曾作过杰出的努力；在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的最初日子里，他又没命地工作，此后他就从来没有完全恢复健康。

1935年4月里，他得了支气管肺炎，从此卧床不起。路易斯长期不肯搬出白宫，总统几乎每天都要叫人送他到路易斯躺着的房间去。路易斯的身体已单薄得像个小孩子，蜷缩在被单里面；然而他的头脑却像蒸汽机那样在运转，即使在路易斯住进海军医院之后，罗斯福也要每星期去探望老朋友一次，并且专门从那里拉了一条电话线直通白宫，让路易斯便于给总统源源不绝地提供各种忠告和意见。随着他行将谢世，他的意见已经变得不那么中肯贴切了，但是罗斯福决不让他察觉出这些意见已经不太引人入胜。

1936年4月18日，路易斯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临终前数日，他讲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对罗斯福的兄弟般的情谊，他半幽默半伤感地说：“富兰克林现在自立了。”

在以前的顾问中，剩下来的有以狂飙式的才智受到罗斯福喜爱的萨姆·罗森曼，罗斯福亲热地称作“唐纳德·宝贝”的哈罗德·伊克斯，以及哈里·霍普金斯。由社会工作者变成为政治家的哈里成了总统最信赖的顾问和最知心

的朋友。他们俩思想完全一致。霍普金斯的天性以及他在下层社会中的经历，使他像罗斯福一样，对贫困感到无比义愤。霍普金斯对自己的领袖怀有一种崇拜和忠诚，但他并不盲目；罗斯福则对他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因为霍普金斯有充满知识的头脑，并有火焰般的工作热情。

但就在罗斯福当选第二届总统时，由于德意日法西斯横行，战争风云正从大西洋和太平洋那边刮过来，罗斯福已不再全神贯注于国内事务了，他越来越关心外来的危险和美国的防务。正是：四处起狼烟，难民苦伶伶；若不早防备，势必遭祸患。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一章 隔岸观火

侵略升级更张狂，亿万人民遭祸殃；
无数财产毁于旦，隔岸观火心亦慌。

就在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第一、二届期间，世界局势骤变，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战争风云正从大西洋和太平洋刮过来，引起了这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大国的严重不安。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英国和法国的力量进一步衰退。德、意、日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在政治上日益法西斯化，终于成为亚洲和欧洲的战争策源地。

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化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加速了军事化的步伐。从1931年起，日本的军事预算年年上升，1936年达到10.78亿日元，占财政支出的47.2%。日本政府还颁布和修订了许多法令，加强了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逐步将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日本的军事工业急剧膨胀，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畸形上升。构成军事工业基础的化学和钢铁工业，在1931年至1936年间，增长约2.5倍。生铁产量，1931年不足16万吨，1936年增至200万吨以上。

1934年初，日本统治集团以国家垄断企业八幡钢铁厂为中心，把属于三井等五大财阀的钢铁公司合并，组成庞大的日本钢铁公司。

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也是垄断资本扩大的过程。到1936年，大垄断企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一般都控制了各该部门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从1932年至1936年，财阀控制的企业接受政府军事订货达55亿日元之巨。经济军事化促进了财阀同军部的勾结，为扩军备战创造了条件。日本军队得到大力扩充，装备有了很大改善。

1930年，日军人数为23万，到1936年达到38万。海军总吨位超过150万吨。

日本强化法西斯统治和实行经济军事化的目的，是为了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它的侵略目标首先是中国。早在20年代后期，日本为了称霸东方，便加紧推行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向整个亚洲大陆实行武力扩张的“大陆政策”。

1927年，主张强硬外交的大军阀田中义一当了首相。同年6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陆军、海军、外务三省以及驻中国的外交官、军事首脑和行政长官参加的“东方会议”，就侵略中国的问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在会议闭幕时，田中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把中国东北划为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并说，如果这个特殊地区受到损害，“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抱定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这是赤裸裸地把中国东北地区置于日本“保护”之下，亦即视为日本的殖民地。田中还声称，日本对这个特殊地区负有稳定政局和维持治安的责任。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就搞了个武力霸占中国东北的秘密方案。

1928年6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沈阳皇姑屯车站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流血事件，妄图制造借口，一举吞并中国东北。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这个阴谋才未能得逞。从这时起，日本帝国主义已把侵略中国的政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沟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袭击”日军，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日军进攻面前，蒋介石密令不准抵抗，30万东北军不战自退。在事变后四个月里，日军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白山黑水间的大好河山全部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

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国第十九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起抵抗，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史称“淞沪之战”。同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洲国”，并要国际联盟承认。翌年，日本以国际联盟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借口，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后，逐步向热河省（今内蒙古、河北省之一部分）和华北蚕食。

1933年1月初，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3月又侵占热河省，并逐步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活动。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

1937年7月7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首先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日军不仅在华北展开大规模攻势，而且从上海向中国横插一刀，扩大侵略战火。8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四相会议，根据陆海军的协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在“大陆主要使用武力的地区应为河北——察哈尔地区和上海”。根据这一决定，日本军事当局便于8月9日在上海发难。当天，日寇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官兵二人，驾驶军用卡车企图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机场卫兵拦阻无效，不得不开枪制止，两个日本侵略兵中弹毙命。日寇便以此为借口，对上海发动进攻。大批日本海军陆战队纷纷登陆。日本飞机也在京沪杭铁路线上空频频侦察。

12日傍晚，停泊在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司令官电告海相：上海战事已处在爆发前夕。当天夜里，日本政府召开四相紧急会议，决定火速派两个师团开赴上海。13日，日寇即凭借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炮轰闸北一带，日军飞机也对闸北狂轰滥炸。驻守上海的张治中将军指挥的中国第九集团军和上海人民奋力应战，中日双方在上海爆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上海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奋勇杀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进！

日军进攻上海，动摇了蒋介石在中国东南地区的统治，英美在华利益也受到严重威胁，于是蒋介石被迫在8月14日发表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声明，表示要“实行自卫权”，以对抗日本的侵略。8月15日，日寇正式组成“上海

派遣军”，派出两个师团到上海，随着军事行动不断扩大，又陆续增派 3 个师团。到 9 月底，上海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已达 15 万人，还有 38 艘军舰协同陆军作战。

但是，闯入上海的日寇尽管拥有优势兵力和现代化武器装备，却遇到了中国爱国军民的迎头痛击。在 3 个多月的战斗中，仅据日方的统计，日本侵略军就被击毙 9115 人，伤 31257 人。上海爱国军民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打得英勇顽强，可歌可泣。只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仍幻想“和谈”，在军事上采取被动挨打的单纯防御战略，使上海爱国军民的困难日趋严重。日寇在 11 月上旬派一个兵团在中国军队设防不严的杭州湾强行登陆，乘虚而入。结果在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不得不在付出惨重的牺牲后撤出上海，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接着日军又进犯南京、汉口、广州等要地。然而，同日寇的预期相反，中国人民不仅没有被日寇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反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燃起全国抗战的烈火，使日寇变成一头陷入火网的蠢驴。

法西斯德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要元凶，是欧洲战争的策源地。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和限制，但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却根本未触动。统治阶级又将《凡尔赛和约》强加于德国的种种经济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和约的苛刻限制，容易伤害民族感情，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容易借此煽起民族复仇主义。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正是利用这种民族情绪，为其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

1933 年 1 月，希特勒被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捧上台，当上了德国总理。这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重新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德国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希特勒一上台，立即实行法西斯的极权政治，血腥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大力扩军备战，制造舆论，准备冒险发动战争。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的第二十八天，即 1933 年 2 月 7 日，精心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德国共产党。6 周之内，逮捕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积极分子 1.8 万人，取缔了德共在议会中的 31 个议席。随后，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相继被迫解散。希特勒还禁止在德国成立新的政党。

1933 年底，希特勒宣布“党和国家合一”，使国家政权完全成为纳粹党的权力机构。

1934 年 8 月，德国总统兴登堡病死，希特勒兼任总统，自称元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后，立即把国民经济纳入战争的轨道，提出“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军费迅速上升。从 1933 年开始的 6 年半时间内，德国军费支出高达 900 亿马克，占同期国家预算支出的 3/5。

德国为了扩军备战，必须逐步和最终完全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

1933 年 10 月，希特勒以要求“军备平等”为理由，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1934 年 8 月，希特勒秘密下令把陆军限额从 10 万人扩充到 30 万人。1935 年 3 月，正式宣布建立德国空军，德国飞机的产量迅速增加，1934 年生产飞机约 2000 架，1938 年增至 5200 架。

1935 年 3 月，德国还正式发表了重振军备的宣言。他们一方面制造苏联赤色“威胁”的谎言，表示德国重振军备是为了反对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宣称，德国增加军备是为了“维持和平”，并表示德国的军

事力量“绝不愿为战争攻击之用”，以取得英法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宣布实行国防军法，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将军队和军队中的警察扩编为 12 个军，36 个师，约 50 万人。

希特勒为发动侵略战争大造舆论。他有一套极端反动的种族理论，说日耳曼民族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应当统治其他民族。希特勒叫嚣：“我们要精选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不知温和为何物；这个阶层将认识到自己属于优良种族，因而有权统治别人；这个阶层将能毫不动摇地夺得并坚守它的统治权。”他还伪造德国“人口过剩”的理论，说消除“人口过剩”的唯一办法就是夺取“生存空间”，要集结全民族政治力量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怎样夺取“生存空间”呢？希特勒说，“要解决德国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动武。要动武而又想一点风险都不冒是不可能的。”希特勒扬言要用刀剑去征服土地。“任何人要是胆敢对我们的这一行动加以阻挠，我们就要把他撕成碎片。只有当德国重新用它自己的刺刀来保卫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权利才能获得保护。”同希特勒一道参加 1923 年慕尼黑暴动的法西斯头目、前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写了一本名曰《总体战》的书，竭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他主张在和平时期就要把整个经济、整个国家都转入战争轨道，鼓吹以突然袭击、闪电战、总体战来进行侵略战争。希特勒全面接受了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他采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种种手段来准备战争。

1936 年 3 月，希特勒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这是希特勒采取的第一个带有很大风险的行动，如果当时法国人向莱茵区进军，德国只好忍辱撤退。

然而，法国对德军进驻非军事区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而英国则采取纵容的态度。就这样，希特勒以区区四个旅的兵力探明了英、法的虚实，摸到了底细。德军进占了莱茵非军事区，《凡尔赛和约》所给予德国的限制和束缚也就荡然无存了。同年 7 月，德国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至此，地处欧洲心脏地区的法西斯德国就变成了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

希特勒把莱茵地区抢到手后，胆子越来越大，他的第二个猎取目标就是他的祖国奥地利了。他首先谋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策动了数起暴乱事件；1938 年 2 月 12 日晨，德军又以保护日耳曼人的名义越过边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希特勒也随军到达维也纳。在刺刀逼迫下，3 月 13 日，奥地利当局签署了“德奥合并”的法律。法西斯德国以此扩大了 17% 的领土，增加了 670 万人口，5 万奥军并入德国国防军，从而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

德国吞并奥地利，英、法两国政府完全听之任之。法国政府对此无所表示。英国则认为所发生的事“只不过是两位政治家商定改善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措施而已。”只是为了装装样子，才由其驻德国大使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抗议”照会。希特勒对此心领神会，随即加快了侵吞捷克斯洛伐克的步伐。他首先把英法领导人叫到慕尼黑，召开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内容的慕尼黑会议，其后又以和侵吞奥地利同样的“理由”，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获得了 12.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000 多万人口，而且从那里掠夺了 95 亿马克的金钱和 100 多万支步枪，4.3 万多

挺机枪，1500多架飞机，2900多门各种大炮，10亿发子弹和400多辆坦克。占领了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斯科达。并把大批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男女掳去当兵和服劳役。由此大大加强了希特勒德国的战略地位，增强了他的战争实力。正如纳粹二号头目戈林一个月后对墨索里尼所讲的：“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巨大的生产能力转归德国而产生的经济因素，它显著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能力。不仅如此，如果发生更大的冲突，德国现在毋需保留一个师的兵力去防御那个国家了。”

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用武力向外进行侵略的欧洲国家，又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帮凶。意大利经济基础薄弱，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预算出现巨大赤字，全国失业人口大增。为了摆脱危机，墨索里尼极力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通过武力进行扩张，掠夺市场和原料产地，进一步同英法抗衡。

意大利为了重新分配东非与北非的殖民地，独霸地中海，控制红海通向印度洋的航路，以削弱英法与亚洲殖民地的联系，发动了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出动30万大军，从北、东、南三路侵入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奋起反抗。

1936年5月，意大利占领了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流亡英国。意大利侵略军以历时7个月，死伤14万人的代价占领了阿比西尼亚，并将其与意属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合并，组成意属东非帝国。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过程中，由英国控制的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了有名无实的“经济制裁”，也没有进行石油禁运和封锁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之后，国联迅速撤消了对意大利的所谓“经济制裁”，实际上是对侵略的承认。对此，阿比西尼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

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全境后不久，又伙同德国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了公开的武装干涉。本来德、意之间存在矛盾。1934年希特勒企图染指奥地利，遭到英、法的反对，意大利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一度陈兵意奥边境，使希特勒不得不知难而退。事后，意大利感到在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斗争中，主要对手是英国和法国，需要有德国支持，以对付英、法。而德国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时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希特勒还曾访问罗马，当面吹捧过墨索里尼，两国关系已有重大改善。在武装干涉西班牙时，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并在1936年10月签订了共同协定，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

德、意与英、法、美争夺的重点是在欧洲及其侧翼——非洲地区，但是它们需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一个同伙，使英、法、美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而日本帝国主义凭借迅速增长的实力，正企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独占中国，称霸亚洲，因此也希望在欧洲能找到盟友。经过密谋磋商，德国与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至此，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侵略轴心。

面对着法西斯强盗肆无忌惮的侵略，罗斯福忧愁满腹，他已经意识到希特勒及其盟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扩张，会对美国带来严重后果。当初，他把这些国家视为“土匪国家”。但是在新政初期，对外政策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事实上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曾邀请过《纽约时报》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吃晚饭，并且说：“不知道你能不能设法使总统比较关心对外事务。”

罗斯福曾试图使美国加入世界法庭，对侵略者进行制裁，但是没有成功。

此外,他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向 30 年代中期美国普遍存在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进行挑战,而是采取了随波逐流的消极态度。罗斯福在回顾伍德罗·威尔逊未能说服美国人民支持国际联盟的情况时认识到,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在国内形成可靠的一致意见。他主张对人民要引导,要教育,对不同的意见要等待,要迁就。有时他能在同一个法案中机敏地把不介入战争的孤立主义思想和防止战争的干涉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前后矛盾,模棱两可。因此,国际主义者指责他摇摆不定,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孤立主义者指责他玩世不恭,口是心非。说话尖刻的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每一位大人物都有典型的手势。”

希特勒是举臂;丘吉尔是 V 型手势。那么罗斯福有什么手势呢?他把食指弄湿,往空中一举。”

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时,罗斯福正与最高法院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翌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他头脑里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经济衰退;慕尼黑危机结束时,他正在进行着“清洗”。当罗斯福确实就国际局势的严重性发出警告和谋求加强美国的防务能力时,提出批评的人指责说,他试图以诉诸于必定使美国卷入战争的国外冒险来掩盖在国内的失败。

在通常情况下,罗斯福执行对外政策的方式同他处理国内问题一样,主要不是从官方途径了解情况。他花相当多的时间同有见识的来访者谈话,并且拥有从伯纳德·巴鲁克到埃文斯·卡尔森上尉这样的一伙人向他通风报信。总统不相信国务院,认为它保守、固执,容易泄露情报。他认为,外交机构里有很多累赘无用的人,这些人被任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本能地反对他的国内外政策;罗斯福曾经对马里纳·埃克尔斯说过:“你不妨试试改变一个职业外交官的思想、政策和行动,然后你就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了。”他经常把本来属于国务院的任务交给财政部或者海军部,或者交给他认为可能更有效率地完成任何部门的任何部门,国务卿赫尔对此感到沮丧。后来他完全越过了国务院,任命哈里·霍普金斯为他解决外交上的问题,只向他本人负责。

为了有效地掌握第一线的情况,正确地判断国际形势,罗斯福亲自遴选外交官,特别是派驻重要国家的全权大使。他派威廉·多德去柏林担任大使,这反映他对希特勒侵略扩张的关注,同时也表明他对纳粹主义的反感。他派同情苏联的威廉·布利特去莫斯科任职,这表明美国想同苏联改善关系,并谋求日后建立美苏同盟。布利特在 1919 年就断言过,布尔什维克政府决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一定会在俄国土地上长期存在下去的,然而他的上级却倾向于认为这个政府是短命的,为此他被逐出国务院。他是一个浪漫的自由主义分子,容易感情冲动,然而非常精明。

美国同英国历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斯福对英国政府的动向尤为注意。他派乔·肯尼迪去伦敦是期望一位眼光冷静的企业家,能够就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提出公正的报告。肯尼迪是一位有爱尔兰血统的波士顿人,罗斯福考虑到,由他担任驻伦敦大使可能有助于消除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因美国在发生战争时同英国合作的抵触情绪。于是在 1937 年秋季的一天,他把肯尼迪邀请到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先是向他致意表示欢迎,然后又请他往后站一站,以便仔细观看他。肯尼迪感到迷惑不解,往后退了两步。

“乔,”过了一会儿,罗斯福说,“对不起,请你把裤子脱下来好吗?”

肯尼迪感到非常意外,问罗斯福是否听清了他的话,总统点头示意,一

点也没有错。肯尼迪解开了吊带，裤子掉下去了，穿着裤衩傻呆呆地站在壁炉前，显得很不自在。

“有人看见你穿浴衣，他们告诉过我这件事，现在果真如此。”罗斯福说，“乔，就看看你这两条腿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严重的弓形腿。你知道不知道驻英国的大使必须穿着短裤和丝织筒袜出席就职仪式？你能不能想象你将是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新大使的照片在世界各地出现时，将成为一个笑料。乔，你根本不适合担任这项职务。”

“总统先生，”肯尼迪恳求说，“如果英国政府能允许我穿燕尾服和条纹裤子出席仪式，你能同意任命我吗？”

“这个，乔，你可知道英国人多么讲究传统。你无法得到允许。我得很快任命一名新大使。”

乔要求给两周的宽限，罗斯福同意了。肯尼迪提起裤子，恢复了尊严，离开了白宫。总统自鸣得意，暗自笑了起来。过了两周，肯尼迪手持一份允许他穿条纹裤子和燕尾服出席就职仪式的公函来到白宫，结果他得到了任命。后来，有人就此事向罗斯福提过意见，但是他把头往后一仰，一笑了之。他说：“选派大使不仅从政治上考虑，而且还要注意风度，不时地纠正他们的坏毛病，因为他们出去，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呀！”

在美国，虽然没有几个人对希特勒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赞同，但是他们不肯介入欧洲和亚洲的问题。尽管他们非常同情被侵略的受害者，他们也不愿让1917年的经历重演。奈伊委员会指责说，“由于盟国的宣传以及贪得无厌的银行家和军火商人的共同影响，美国被哄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在“修订论”历史学家和奈伊委员会这种指责的影响下，强烈要求：“再也不打仗了！”大学生信仰和平主义，校园里发生罢课，要求取消后备军官训练团。许多美国人坚决主张美国避免加入所有“纠缠性联盟”，其中包括为通过集体安全确保国际安宁所承担的义务。人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可能再次把美国拖入一场国外战争。“美国的政策是保持不被纠缠和无拘无束，”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1936年1月宣称，“让我们奉行这项政策。让我们保持不被纠缠和无拘无束。让我们不加入任何联盟。让我们不承担任何义务。”

罗斯福在白宫执政的头几年，奉行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潮。罗斯福虽然反对对他的行动自由施加限制，但他接受了孤立主义者授意通过的一系列中立法律。他默许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日本侵略中国和希特勒无视凡尔赛条约重新占领莱茵区，并且步英国和法国的后尘，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态度。毫无疑问，美国的孤立主义鼓励了独裁者，但是法国和英国的绥靖政策并没有激励罗斯福采取反对侵略者的立场，由于这些国家没有作出一些积极的表示，因此很难指望这位总统会单方面采取行动。1938年，他曾试图取消武器禁运，因为武器禁运对忠于西班牙共和政府者的危害大于对叛乱分子的危害。但是，国会领导人告诫罗斯福，这将意味

美国著名孤立派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要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大公司与英法的军火交易的内幕进行调查。1934年4月，参院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这是国会孤立派对罗斯福一次旁敲侧击式的警告。奈伊委员会主张美国奉行绝对的孤立主义政策，不参加任何联盟，不承担任何义务。在这个背景下，国会制定了对文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1935年的中立法。在德、意、日侵略扩张的形势下，孤立主义只能是纵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主义的变种。

着“失去所有天主教徒的选票”。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内计划而附和了孤立主义的潮流，因此未能履行领导的义务，伯恩斯说：“作为对外政策的决策者，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与其说是政治领导人，还不如说是持骑墙态度的政客。”他往往在私下是国际主义者，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使他不能表明自己的真正信念。他在讲演和书信中经常重申，他坚信美国应该避免被拖入另一场国外战争。难怪人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罗斯福采取的是典型的“隔岸观火”的态度。正是：战火四起顾虑多，力图避免陷漩涡。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真荒唐，不管他人瓦上霜；
貌似公正守中立，纵虎伤人说风凉。

1936年，罗斯福虽然以压倒多数赢得了第二任总统选举的胜利，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受到孤立主义的束缚和制约。

1937年至1939年间，正当德意日法西斯着手掠夺更多的领土并使世界更加濒临战争边缘时，美国内部却在怎样才能最好地确保自己“不卷入”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而无休止的辩论。孤立主义者坚持认为，美国应当避免杰斐逊当年所感叹的那种“纠缠不清的同盟”，甚至包括避免对世界的安定作出集体保证的任何承诺。孤立主义者尤其认为，美国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去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他们还否认美国有任何值得予以援助以代替美国可能介入世界性冲突的潜在盟国。

造成30年代后期的孤立主义政策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土壤。它在美国历史上是一股顽强的传统势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生活达150年之久。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几乎贯穿12年总统任内的头9年，并且异常曲折，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他才嘘了一口长气，感到如释重负。

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以“中立主义”的形式诞生的。

1793年1月英法战争爆发，尽管美法早在1778年订了同盟条约，可是美国总统华盛顿于1793年4月22日发布《中立宣言》，宣布对交战双方“诚心诚意地”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严禁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帮助或支持交战双方的活动。

三年后，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又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人：“我们对待外国的重大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务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他反对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认为美国的“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他还认为，美国“可以稳妥地信托暂时的联盟来应付非常紧急事件”。可是最后这一点，从来不被孤立主义者所引用。

这篇并非完全出自华盛顿手笔的《告别演说》，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从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是否卷入问题上，华盛顿的遗训起着他本人万万没有料到的作用。国会在任何时候辩论外交政策时，华盛顿的幽灵就出来主宰辩论。参众两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60年中，每逢华盛顿诞辰日（2月22日）或在此日前夕，都要诵读《告别演说》。因此，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宣布的“门罗主义”原则，实质上是华盛顿宣布的原则的发展。它提出了华盛顿没有用明确的语言阐述的原则：不允许欧洲任何国家在西半球殖民或进行任何干涉。门罗总统提出此项咨文以前，向当时已有80高龄的杰斐逊征询意见。杰斐逊在复信中简要地把日后门罗所宣布的政策归纳成两句话：“我们首要的基本的箴言应当是：决不使我们卷入欧洲的纠纷中，其次是决不许欧洲来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情。”

从1793年至1941年的近150年期间，美国孤立主义的含义已有所变化。

最初的孤立主义有着地理的因素，美国有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地理条件，而且当时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使它与大国抗衡。在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时，美国还只是人口不到 500 万的小国；“门罗主义”宣布时，美国人口也只有 1000 万多一点，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弱。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卫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它当时没有必要也没有力量插手欧洲事务。另一方面，它也要竭尽全力反对欧洲列强插手西半球。

可是到了 19 世纪末期，美国感到划地为牢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它迫切需要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1898 年的美西战争，美国把西班牙逐出西半球，并在亚洲占有了菲律宾这块地盘，从而开始了跨洋过海、脱出原始的孤立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对外活动中，美国仍谨慎地坚持不与欧洲发生过分密切的政治关系。

美国介入 20 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说鼓励了“国际主义”，远不如说更加刺激了孤立主义情绪。一种企求确保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和欧洲战争的心愿，开始在公众和国会舆论中高涨起来。历史学家们在一些著作中尖锐地指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承担重大责任的不仅仅是德国，而且还有美国的盟国。一些有声望的著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同美国军火商和国际金融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残酷无情地追逐利润，这就引导他们去煽动和延长世界各地的冲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恩格尔·布雷希特的《贩卖死亡的商人》，该书的书名不久就成为军备工业的同义语。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参议院一个调查这种现象的委员会应运而生了。

1934 年 2 月由共和党人、北达科他州议员杰拉尔德·奈伊所提出的一项决议案，得到了参议院的普遍赞同。奈伊要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大公司与英法的军人交易的内幕进行调查。1934 年 4 月，参院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由奈伊担任主席。这是国会孤立派对罗斯福一次旁敲侧击式的警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是威尔逊政府的高级官员，并且是威尔逊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孤立派旧事重提，多少有点“项庄舞剑”的味道。可是罗斯福容忍了这次行动。

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报告，共达数千页，富有煽动性的报纸马上把这些报告压缩为阴森可怖的头条新闻刊登出来。在委员会活动的后一阶段，调查越出了军火商的范围，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国际银行家身上。华尔街的银行家大力资助军火商制造军备工业，谋取巨额利润。人们发现，他们的代理人正在国会活动，或者在诱使哪怕是最小的国家购置更多的军事装备。奈伊公开声称，经济利益集团对美国 1917 年参加协约国一方施加了巨大影响。报告点了摩根和杜邦四兄弟的名，指出他们充当协约国代理人谋取巨额利润。

奈伊委员会的结论是，美国参战既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业”，也不是“为了保卫美国利益”，而是利润攫取者的阴谋。报告从政治上对威尔逊大肆抨击，并提供了许多材料，以使人们相信，美国参战只是替“死亡商人”发财。沃尔特·米利斯的笔调生动活泼的新闻体著作《通向战争之路》，对经济因素加以渲染，来解释 1917 年至 1918 年的美国外交活动，证明他在《美国走向战争》一书里关于美国抛弃中立而致力于帮助协约国的政策。法西斯独裁者在欧洲的活动，加强了决心阻止美国对国外纠纷进行干涉的那些人的力量。调查报告提出：“假如欧洲非要打仗不可，让他们为自己的战争出钱；假如摩根和其他银行家硬要参加到另一次战争中去，那就让他们应募

参加外籍军团去打仗。”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奈伊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一部分真相，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错误的；但是 30 年代的国际环境与威尔逊时代大不相同，罗斯福踏进白宫之日正是希特勒攫取权力之时。在这种形势下，孤立主义只能是纵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主义变种。

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及其纳粹死党，早已摸透了西方国家害怕又一场战争的心理。他们肆无忌惮地扩军备战，断然采取进一步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动，把德国军队增加到条约限额的五倍，恢复了强迫集训。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赤裸裸地宣布他谋求帝国的锋芒所向，将遵循古代罗马囊括地中海沿岸的路线。他进一步昭示全世界，意大利应当拥有更多的非洲殖民地。1934 年，意大利军队制造了一起与埃塞俄比亚士兵发生冲突的边界事件。1935 年，意大利陆军、坦克和飞机对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全面进攻。除了这些事件对美国舆论有着明显的影响外，欧洲的新闻评论家和观察家还经常发出警告和预言：另一次大屠杀正在逼近。

面对这样一种暴风雨般的事变和态势，国会内外许多美国人企图作出种种孤立主义的努力，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不干涉政策。据民意测验所称，孤立主义在 1937 年拥有 70% 以上美国人的支持，但是，无论就地区或政治派别而言，还是就经济地位或种族根源而言，孤立主义都没有显而易见的固定栖身之所。它得到得克萨斯州莫里·马弗里克众议员一类民主党人和诸如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一类的共和党人的赞助。亲罗斯福的《新共和》周刊，和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同样怀有孤立主义情绪。工业富豪们支持各种孤立主义的宣传组织，小农场主怀着同样的信念投票支持孤立主义的候选人。在许多人看来，中西部是孤立主义的中心，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共和党政治和种族成分，必然使它具有这种形象，大部分讲德语的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同情希特勒。斯堪的纳维亚族系出身的美国人，则坚持他们的彻底中立的传统观念。但是，东部也存在类似的情绪，那里许多爱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在反对英国的态度上信奉原始的种族观念：“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纽约市的意大利裔人，对墨索里尼的种种姿态和侵略行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地感到洋洋自得；他们在曼哈顿区同那些把备受意大利军团蹂躏的埃塞俄比亚人视为同宗的黑人，展开了激烈的街垒战。

在奈伊委员会报告的刺激和希特勒重整军备的威胁下，国会孤立派急于制定束缚罗斯福手脚的立法，规定欧洲发生战争时总统所能采取行动的限度。在这个背景下，国会制定了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 1935 年中立法，参议院通过该法案时仅仅花了 25 分钟。这个法律期满之后，又制定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的 1936 年中立法。

1937 年中立法则规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战区，不准武装美国商船，对交战国实行非军火贸易的现购自运原则。为了抚慰孤立派，罗斯福在 1935 年 10 月的一次演说中，郑重其事地宣布：“不管海外的各个大陆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仍将而且必须不卷入其中，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很久以前我们的国

罗斯福于 1933 年 3 月 4 日出任美国总统，希特勒于 1933 年 1 月 30 日出任德国总理。

从中立法案的文字规定来看，似乎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同样实行了禁运，但在实际上这个法案完全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被侵略者，因为中立法案并未禁止输出原料物资，也未禁止把武器输往其他不作战国。当时，德意日法西斯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得到经济、军火和原料物资的大量供应。——编者

父所祝愿我们保持的。”

一条条的中立法，像一道道的绳索，捆住了总统的手足。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不但不能采取反对中立法的行为，而且还表明自己与普遍的情绪是一致的。

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1936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罗斯福说只能对局势“警惕地等着瞧”。这反映出罗斯福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对欧洲局势发展难以采取坚定行动的境况。1936年8月，他在纽约肖特夸夏季讲学中心，发表了一通博得喝彩声的《我憎恨战争》的演说。他向人民保证他殚精竭智地“思考和计划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免于战争”。可是，当他听说张伯伦打算以承认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来换取一项友好条约的交易时，则认为张伯伦是在进行一次极大的投机。他打比喻说：“如果一个警察局长同匪帮谈条件，谈的结果是匪帮不再作案，这位局长就成了个英雄；可是如果匪帮食言，这个局长就要进监狱！”

1937年，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投射在地球上。在东方，日本法西斯大举侵华；在西方，德意法西斯则在欧洲和非洲进行侵略。

20年前使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过程和教训，像梦魇一样压在美国人心头。在新的一代美国人中，和平主义情绪尤其强烈。这就是本世纪30年代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上举足轻重的国会孤立派的群众基础。

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纲领，概括起来就是反对与欧洲结盟，反对于预其他大陆的战争。孤立主义在各地都有强大势力，尤其是在中西部、西北部和落基山地区更为强大，而芝加哥则是孤立派的中心。这些地区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罗斯福的国内政策。例如有死硬孤立派之称的共和党参议员海拉姆·约翰逊，从1917年进入参议院直到他1945年死去，一直是威尔逊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坚决反对者，可是这位参议员却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被称为“孤立主义之狮”的威廉·波拉在内政上也是支持罗斯福的，这就更增加了罗斯福的困境。当广大群众没有作好精神准备，没有从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没有正确权衡与自己攸关的利害时，而去采取某种重大的行动，那么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罗斯福从威尔逊1919年的失败中看到了这一点。

18年后他又亲身体会了一次。罗斯福决定要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

为了用事实教育群众，逐步克服孤立主义思想，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他指出：“世界的政治情势近来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引起了那些希望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和平友好相处的一切民族和国家的严重关切和焦虑。

“大约15年前，人类对于持久国际和平的希望十分强烈，当时60多个国家庄严保证在促进其国家目标和政策时不使用武力。在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中所表达的高超抱负以及由此引起的和平希望，最近已为一种对灾难的习惯性恐惧所替代。几年以前开始了恐怖盛行和国际上无法无天的情况。

“它开始于对别国内部事务的非法干预或者违反条约规定去侵入外国领土；现在它已达到严重威胁文明社会本身的基础的地步。标志着文明社会走向正义、法律和秩序的各个里程碑和传统，正在被完全抛弃。

“未经宣战，没有预警或任何正当理由，包括大批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正在空袭中遭到残酷的屠杀。在所谓和平的状况下，船只无缘无故和未经预先通知就遭到潜艇攻击并被击沉。有的国家在从未危害过它们的国家中煽

动内战，并在内战中支持一方……

“无辜的人们、无辜的国家，正在因为一种对势力范围和霸权的贪婪而被残忍地当作牺牲品，这种贪婪是缺乏任何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的考虑的。”

“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不要设想美洲将会逃脱，美洲可能幸免，西半球将不会遭受攻击，并将继续安宁地、和平地维持文明社会的道德和学术。”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如果那样的时代到来，武装将提供不了安全，权威将提供不了助力，科学将提供不了答案。狂飙猛扫，混沌重现，一切文化花朵尽遭蹂躏，全体人类均皆夷灭。”

罗斯福强调说：“要使那样的时代不致发生——为了获得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友好相处、无所畏惧的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维护法律和原则。只有如此，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今天正在产生一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状态，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脱不掉的。”

罗斯福最后用他惯用的比喻辞令向听众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疾病蔓延。”这就是被称为有重要意义的“防疫演说”。这是罗斯福在经历了四年多的迎合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要求之后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想探探舆论的新风向。

在这次广播讲话中，罗斯福还暗示美国不能排除卷入战争的可能。他说：“我们决心置身战争之外，可是我们不能保证美国不受战争的灾难性的影响和免于卷入战争的危险。我们正采取使我们卷入的危险减至最小限度的一些措施，但是在一个信任和安全已经遭到破坏的骚乱的世界里，我们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演说一发表，国会中孤立派大力恼火，竟以提出弹劾相威胁。罗斯福发现美国人民还不愿接受以集体行动来反对侵略者的概念，也就不再提“隔离”主张了。后来他对一位朋友说：“真难啊，你一心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你，这真可怕！”

虽然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行动步步加紧，但是孤立主义者似乎并没有什么觉悟，反而在“魔鬼”面前更加畏首畏尾了。

1937年12月12日，日军向南京发动了进攻，吃水不深的美国炮舰“帕奈”号停泊在长江位于南京西南大约27英里的地方。一些美国商人、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正在炮舰上避难。“帕奈”号的天篷上刚涂好两幅巨大的美国国旗，在它附近美孚公司的三艘油轮上也都飘扬着星条旗。下午一点半刚过，一群日本轰炸机从空中俯冲下来，对“帕奈”号进行了轮番轰炸。当乘客和船员们坐木筏和小船上岸的时候，日本飞机又来扫射。两名美国水兵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中弹身亡，还有40人受伤。三艘油轮也受到轰炸和扫射，在下沉之前冲到了浅滩，油轮上的中国船员逃到岸上，同一天在长江上的几艘英国船也受到了袭击。

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日本法西斯军队肆意击沉“帕奈”号的行为义愤填膺。他们向东京发了一个愤怒的电报，要求对击沉这艘炮舰并造成美国人伤亡的事件进行道歉和赔偿。然而，这一事件却助长了孤立主义情绪，他们深恐此事将导致美日对抗。当一项被搁置很久的决议案又拿到众议院投票表决时，孤立主义者们进行了种种抵制。这项决议案要求修改宪法，规定在总

统宣战之前进行公民投票。而使这项决议案不能通过的唯一障碍是总统的那封措词强烈的抗议电报。罗斯福说，这项决议案使他“不能”执行对外政策。即使这样，表决结果仍然是 209 票对 188 票，这显然表明了孤立主义的实力。

鉴于国内的情况，罗斯福没有就此事大作文章。但在 1938 年 1 月召开国会时，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要求增加国防开支的特别咨文。“作为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罗斯福说，“根据宪法赋予我的责任，我应该向国会报告，鉴于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我们的国防力量不足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因此需要加强。”总统要求国会拨款 10.4 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加强海军力量，因为海军被视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提出美国必须准备两洋作战，要建立两洋标准的海军，即建立等于德意日三国海军力量总和的两洋舰队。当时日本海军已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68200 吨的“大和”号和“武藏”号，它们配备的火炮口径是 18.1 英寸，而美国海军按照条约规定的限制配备的火炮口径是 16 英寸。

罗斯福的提案，遭到孤立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怀疑罗斯福要与英国联合起来玩弄“欧洲强权政治”把戏。国会要求总统表明，不使用美国海军来保护在作战区域做生意的美国人，也不用来“巡弋世界各地”和“强迫实施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反对与英国取得任何谅解和协议，并要求美国从远东撤出军队和商务代表、承认“满洲国”，主张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经过长期激烈的辩论，才通过罗斯福扩大海军装备的法案。

1938 年 8 月，英法屈从希特勒的压力，听任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在当时的条件下，罗斯福难以对慕尼黑悲剧作出强烈反应，但是他对局势的发展感到震惊。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的一幅世界图景：奥地利被希特勒兼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肢解了，柏林——罗马轴心更加肆无忌惮，中欧和东欧实际上已经成了法西斯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正进行着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并在太平洋上蠢蠢欲动，同西方的德国、意大利遥相呼应。美国在东西方的利益都受到严重挑战。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取消中立法案的禁运条款。他认为中立法不利于受害者，实际上是帮助了侵略者。在此后的 300 天中，罗斯福为修改中立法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参议员们在会见时对罗斯福施加压力说，全体共和党议员和 25% 的民主党议员都反对废除武器禁运条款。在这次不愉快的会晤后不到两个月，欧洲战争爆发了。可是孤立派不服输，组织了一次广播运动，大造舆论反对修改中立法。其中，著名孤立派代表人物林白上校做了令人发呕的表演。他在世界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光彩的形象。正是：总统修改中立法，右派狂吠来挡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三章 孤鹰哀鸣

昔日英雄今狗熊，美国内部大蛀虫；
四处游说张敌目，吹捧纳粹“无敌鹰”。

在反对罗斯福修改中立法斗争中，闻名世界的飞行英雄查尔斯·奥古斯塔·林白上校和孤立主义者沆瀣一气，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他大长法西斯德国的威风，大灭被侵略人民的意志，是一条危害极大的思想蛀虫。

林白于1927年5月，驾飞机从纽约一直飞到巴黎，创造了划时代的单人飞行记录，赢得了“孤鹰”的绰号。在这次飞行之前，林白是表演特技飞行的驾驶员和跳伞员，是陆军航空学校的学员，后来当了陆军后勤预备队的低级军官。

“孤鹰”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在密执安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并且成为明尼苏达州政界的重要人物：担任了五届国会议员，1918年是超党派联盟州长的候选人。他的母亲分别在密执安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一所中学任理科教师。他的父母意志坚强，受人尊重。但是儿子对父母所从事的学术、法律或政治问题的研究不感兴趣。林白从年轻时起就专心致志地搞高速运输和培养自己的耐力和强健的体格。他早期就在驾驶摩托车和飞机方面经常在极危险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成绩。林白勤奋好学，对科学，特别是对新技术发明，有着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精神使他能够单独驾驶着“圣路易精神”号单引擎小飞机经受住自然界的风雨，安全地抵达布尔歇机场。加上他英俊的外貌、迷人的笑容和潇洒的风度，他便立刻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航空冒险家，变为一个举世崇敬的英雄。

林白能够以泰然自若的态度接受赞扬，但是不愿在人多的场合出现，并且越来越对报界不耐烦。当新闻记者要求他讲话的时候，他就谈自己对发展美国航空业看法。后来，由于他和富人结成了伙伴，出版了一本叙述他的飞行情况的畅销书，向大飞机公司提供赚钱的咨询，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向德怀特·莫罗的女儿安妮·莫罗求婚，并且获得成功。德怀特·莫罗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以前曾是摩根公司的合股人。在他被提升为空军后备队的上校后，他很少把时间用在军事问题上；他继续驾着飞机到处飞行，但这种飞行通常是为了勘查新航线和为商业公司试验新型号的飞机。

随着林白的生活和地位的变化，他的自我感觉在逐步增强，他不再认为他自己仅是个航空专家。他于1930年会见了法国著名的医学家亚历克西·卡雷尔。这位科学家是个古怪的、浮夸的天才，他的哲学观点是：人们生来就不平等，通过有选择地培养杰出人物和对罪犯及精神病人进行“人道主义的控制”，可能会取得很多成就。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林白还到卡雷尔研制“机械心脏”的实验室工作过。

为了挤进权贵的行列，林白对政治越来越关心了。

1928年10月，他公开表示支持赫伯特·胡佛当总统候选人。这是他在政治问题上最早的表态，以后就同政界人物来往密切了。五年后，参议员雨果·布莱克揭发他在同大航空公司签订航空邮政合同方面弄虚作假、狼狈为奸的情况。于是，罗斯福便命令取消全部合同，并且指示陆军航空兵来执行航空邮政的任务。林白即刻发表了一封给总统的公开电报。电报说，罗斯福

的行动严重地影响了他过去 12 年所献身的工业，“没有经过公正的审判”就谴责了美国“商业航空业最大的一部分”，这“对美国整个航空业会造成严重损害”。从此，他和罗斯福就结下了不解之仇。

1936 年 5 月，纳粹德国以戈林将军和德国空军的名义邀请林白访问德国，并且参观德国新的民用和军用航空设施。林白欣然接受邀请。他在回信中说，希望避免“我们过去经常见到的那种引起轰动的愚蠢宣传，我坚决反对举行正式的盛大宴会，我已经多年没出席过这种宴会了”。他和夫人于 7 月 22 日飞往柏林，德国空军和美国驻柏林使馆的高级人物接见了他们，使馆空军武官杜鲁门·史密斯夫妇宴请了他们。

林白夫妇在德国呆了 10 天。他们出席了在航空俱乐部举行的午宴和晚宴，参加了在美国大使馆和前王储在克西利恩霍夫举行的茶话会，出席了柏林市长举行的招待会，参加了戈林在空军部举行的大型午宴。8 月 1 日他们出席了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这些社交活动并不是没有专业上的价值，因为这使林白有机会同戈林，米尔契、乌德特、包登夏茨和德国空军的其他高级军官进行交谈。但对他真正有用的是对德国空军基地和飞机工厂的参观。林白接连访问了在邓伯立兹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基地，在阿德勒斯霍夫的德国空军研究所，在瓦尔明德和罗斯托克的亨克尔工厂和在德绍的容克式飞机工厂。林白在邓伯立兹只看到陈旧的双翼飞机，在亨克尔工厂看到了亨 型轰炸机以及尚未服役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的原型机。在德绍看到了容 87 式俯冲轰炸机，这就是在二次大战发生后头几年中令人可怕的施图卡式轰炸机。

林白是个美国英雄，纳粹德国对他如此热情接待，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德国东道主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认真把他当作一个人而不是当作一件展品。当然他的情况逃脱不了神通广大的贝拉·弗罗姆的敏锐耳朵和她那支犀利的笔。这位专栏作家曾对他作过如下的描述：林白（对德国）似乎很有好感。当米尔契拍他的肩膀的时候，他看来是高兴的。米尔契是个无耻之徒，他编造了一套谎话来败坏他母亲的名誉。他说，他是她的雅利安人母亲与一个雅利安情人生的儿子，而不是他母亲与他的犹太人父亲生的儿子。当路易·费迪南德王子与林白挽起手臂来的时候，林白脸上显出高兴的神色。他说：“德国的空军比其它任何国家的空军都强。它是无敌的。”

陆军部长的儿子阿克塞尔·冯·勃洛姆堡和冯·汉内泽上校对我说，他们认为林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里的政府正在努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勃洛姆堡说：“他将会起到我们通过花钱才能达到的最佳宣传作用。”

一天清早，勒尔策像往常一样已稍有醉意。他说：“你想知道这个美国人到底怎样吗？他说德国空军天下无敌，这会把美国佬吓死的。这恰恰是这里的一些家伙要他做的事情。他说，俄国的空军是不值得担心的，英国人的飞机很少，而且质量低劣。然而我听说，英国人对他很友好。”

航空俱乐部主任沃尔夫冈·冯·格罗对我说：“林白在这个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令人感到诧异。他先提到发生现代空战的严重和可怕的危险，后又赞扬德国空军的强大。”

以上就是德国具有反纳粹思想的著名女专栏作家弗罗姆对林白访问活动的报道。

林白的妻子由柏林来到伦敦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德国有力量，是团结的，并且有决心，这是毫无疑问的。真是了不起。我在一生中还从来

没有见过这样一种目标一致的力量。看到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显示出来的精力、自豪和士气，使人感到心情激动。”

林白本人以同样的语调给美国朋友写了信，说他发现德国“在很多方面是今天世界上最有趣味的国家”，并且是欧洲值得注意的一种“稳定因素”。9月初林白夫妇去看望哈罗德·尼科尔森夫妇，林白根据自己在德国的参观印象，对主人谈了他的看法，主人对此作了如下记录：“林白刚从柏林回国，他在柏林看到了德国的很多飞机。纳粹德国显然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钦佩他们的活力、充沛的精力、精神、组织性、结构、计划和体格。他认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他们用这支空军能够对任何其它国家造成可怕的破坏，并且能够炸沉我们的由军舰护航的船只，从而切断我们的食品供应。他承认，他们是一种很严重的威胁，但是并不认为是对我们（美国）的威胁。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将来会完全脱离关系。他还认为，如果英国支持颓废的法国人和红色的俄国人反对德国的话，欧洲文明就将遭到毁灭。他不认为我们真正有可能在右派和左派之间维持中间立场。”

这样，林白就在美国和西方政界高级人士中，广泛宣传他的观点，散布悲观失望情绪。他大讲德国空军的威力，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对付空袭的众所周知的有效防御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所有的防御工事都没有用”，马奇诺防线和没有完成的西部防线的防御工事也同样是无济于事的。

从军事观点看，对德国的第二次访问是林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进行的五次访问中最重要的一次。利连撒尔大会结束后，林白夫妇又去了柏林。纳粹空军军官乌德特于10月16日带林白到了波美拉尼亚的雷希林的德国空军试验基地，那里的机场上停着7架飞机供他参观：亨式轰炸机和德17式轰炸机，容87式俯冲轰炸机和亨舍—123式俯冲轰炸机，麦—109式战斗机，菲斯勒—施托希式联络飞机和一架福克—乌尔夫式训练机。这样，除了后来研制的容88式轰炸机、麦—110式战斗机和福乌190式战斗机外，林白看到了德国空军在二次大战中所使用的螺旋桨推进的全部主要飞机。他被允许坐进机舱，并驾驶施托希式飞机飞行。他发现这种飞机比美国类似的飞机性能好。德17式飞机，特别是麦—109式飞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月18日和19日，德方又带林白先后参观了福克—乌尔夫飞机工厂、亨舍尔飞机工厂和戴姆勒—本茨飞机工厂。后来林白与使馆空军武官杖鲁门·史密斯上校用几天的时间准备了一个报告交给华盛顿。这个由史密斯签名的报告，主要是林白写的，材料全部是由他提供的。报告大肆鼓吹德国在空军方面成了“世界强国”，这是当代“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报告说：“很难用几句话说明德国航空工业非常令人吃惊的规模。

23家著名的飞机公司和它们的46个已查明的制造飞机的工厂，有每年大概生产6000架飞机的潜力。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已查明的飞机工厂只是反映了部分情况，真实情况——如果能公诸于众的话——将表明还有更大的生产潜力。德国飞机发动机工业的规模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一工业的规模经常迫使外国人——甚至迫使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美国人——对前途踌躇不安，再三思之……”

这个报告的文风显然是十分夸张的，并且荒谬地说戈林·米尔契和乌德特之流领导的德国空军具有“谦虚的品质”。同时还有意地隐瞒了或者说是“遗漏”了极为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德国几乎没有装有四个发动机的飞机，甚至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没有真正的重型轰炸机。没有报告德国空军的这

一基本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林白对德国空军的破坏力作了夸大的估计。随后，他就将这种估计传播得很广泛，不仅在美国，而且传播到整个西方世界。

1938年5月22日，林白对哈罗德·尼科尔森进行了也许是最强有力的鼓吹。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

林白非常悲观。他说，由于我们必定会被打败，所以我们不可能去打仗。德国空军比俄国、法国和英国三国的空军合起来的力量还要强10倍。我们的防务简直没有什么用，防御敌机空袭用的阻塞气球只是浪费钱。他认为，我们只能屈服，然后与德国结盟。

林白像一个报丧的幽灵，在欧洲，在美国，到处进行瓦解士气、蛊惑人心的游说。在1938年8月份的最后两周期间，显然是通过美国驻伦敦武官雷蒙德·李上校的安排，林白夫妇对苏联进行了一次访问。林白观看了苏联许多种类的飞机，参观了很多空军基地和飞机工厂。他认为，这些飞机“不如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同类飞机好”。从莫斯科返回的时候，他们夫妇在捷克斯洛伐克度过了9月份的第一周。捷克斯洛伐克的将军们给林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空防力量不强”，因为他们的飞机——驱逐机和轰炸机都一样——“对于进行现代战争来说速度太慢”。

林白夫妇于9月8日来到巴黎。这只“孤鹰”在欧洲危机问题上的观点与美国驻巴黎大使布拉特的观点很相似。布拉特对法国人的真诚热爱从政治上来说变成了对他们的命运的担心，如果他们与德国产生军事上的纠纷的话。现在可悲的前景迫在眉睫。在林白夫妇抵达布尔歇机场的那一天，法国总理达拉第对布拉特说，“如果德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话”，法国将对德国发动袭击，尽管“他完全清楚，法国对德国防线进行袭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且不会取得很大成果。”

布拉特大使于9日在这种悲观的气氛中邀请林白夫妇和美国武官霍勒斯·富勒上校与法国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尔出席宴会。林白以“专家”的身份对欧洲形势作了悲观的分析和说教：

“法国的形势极为险恶。它在几年之内赶不上德国，如果它要赶的话。法国每月能造大约45架到50架战斗机。根据最好的估计，德国每月能造500架到800架战斗机。英国每月能造70架左右。法国希望到1940年4月拥有2600架第一线飞机。德国大概每三四个月就能造这么多飞机。人们被迫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机群比欧洲其它所有国家的空军合起来的力量还要强大。法国的高射炮也不够用，巴黎的人民没有装备防毒面具。如果法国军队要趁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机袭击德国的话，这只能是等于白杀。”

林白还以“消息灵通人士”的身份相告，德国有8000架军用飞机，每月能造1500架军用飞机。如果打仗，法国和英国的城镇将被夷为平地，它们极少可能或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击。林白确实起到了“元首”巡回大使的作用，经过他的“说教”，达拉第内阁更加动摇，不准备再战。庞纳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

后来林白又由法国来到伦敦，企图对英国上层人物施加影响。

他首先会见了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双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林白发现，这位大使“不是一般类型的政治家或外交官”，他对于欧洲形势的看法是“明智的和有趣的”。事实上这位大使的观点有点反复无常，

他的报告和外交活动都是相当浮浅的。

但是总起来说，他和林白在主要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约瑟夫·肯尼迪走上外交舞台之前，只能在他的财富和爱尔兰天主教门第的基础上，推断他对于国际问题的看法。从这两个特点来看，他在政治上本应该是保守的，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被推行新政的罗斯福挑选来担任驻英国大使。一位了解这位总统的美国作家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时是孩子气地喜欢采取使人意想不到的行动。毫无疑问，他对于英国故乡的一个儿子在英王陛下的疆域内神气十足这个前景感到开心。

从表面上看，肯尼迪新官上任，十分活跃。但是，他却适应不了充当别人决定的政策的发言人的角色。他讲话随便，并且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态度不慎重。他不把自己视为国务院的代表，而是视为专门向总统负责的独立自主的美国外交官。

人们很快看出，在林白的煽动和影响下，肯尼迪的孤立主义态度比国务院的某些官员都严重得多。肯尼迪定于3月17日首次以大使身份发表公开讲话。他提交给华盛顿一个讲话稿，其中包括这样的词句：“我们的人民看不出我们参与调整国际关系会有什么用处，美国人民的大多数现在并不认为他们和任何其它国家之间存在着什么共同利益。”国务卿赫尔在罗斯福的赞同下，对肯尼迪的话作了很大的修改，其理由是，这是“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但是肯尼迪能够保留讲话的主题：美国的政策将由国家的自身利益来决定，只有当它直接受到威胁的时候，它才会作出军事上的反应。几周后，他在给持孤立主义主张的参议员威廉·博拉的信中写道：“我对这里的情况了解越多就越认为，我们必须竭尽全部才智和努力来避免任何一种卷入。只要我担任目前的职务，我就不能放弃这个指导原则。”

肯尼迪认为，战争不仅破坏生命和财产，破坏繁荣，并且会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他十分担心美国卷入一场欧洲战争的可能性。由于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热情地赞同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他钦佩张伯伦，特别钦佩哈利法克斯。

肯尼迪的最天真的行动是，他也像林白上校一样，极力和纳粹德国拉关系，要充当“元首”的说客。特别是他要努力在他的国家和纳粹德国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为此，纳粹驻英国大使冯·狄克森于5月31日向柏林写过这样的报告：

“美国驻这里的大使肯尼迪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一位私营企业家；他很富，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在许多社交场合，他经常是把话题转到这样一点：他愿意尽全力改善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他想对德国进行一次考察旅行；他还希望下次在华盛顿逗留期间与罗斯福总统讨论欧洲的复杂问题。他将不仅仅把他的活动局限在英国，而是将报告整个欧洲形势。”

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吃紧时，肯尼迪大概因为能够接触到各方面的显赫人物而感到陶醉，他随后通过电话专门与波士顿的赫斯特报系《美国人晚报》记者进行了谈话。他说，他刚会见了哈利法克斯，美国人应该“保持冷静”，“不要失去理智”，因为“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英国公众“很坚决地支持内阁”，“在1938年剩下的时间里”不会爆发战争。

同一天，8月31日，肯尼迪大使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个他不久将在苏格兰发表的讲话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想问你们大家，你们是否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值得你们的儿子或任何

其他人的儿子去牺牲生命的分歧和争议？我也许不很了解作为世界上所有这些动乱的基础的那种极为重要的力量的情况，但是我无论如何看不出所涉及的任何事情值得人们为之流血牺牲。”

由于肯尼迪大力贩卖孤立主义的货色，因此很快就失去了罗斯福的宠信。总统看到他这篇讲话稿后十分生气，他对国务卿赫尔说：“谁会想到英国人会使一个长着红头发的爱尔兰人站到他们一边？需要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严厉的批评！”

正当肯尼迪在国外步林自上校的后尘、大肆宣传“绥靖政策”的时候，“孤鹰”林白却在美国为修改中立法问题而大造舆论反对罗斯福；他竭力主张美国不干涉国际事务，力求同纳粹德国保持友好关系。由于他的调门最响，态度最亲法西斯，因此很快就成了众人皆知的顽固的孤立派人物。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却对他的谬论嗤之以鼻，并给他编造了一首讽刺诗：

林白，林白，
你真是个蠢材。
你驾着飞机飘洋过海，
一旦获得荣誉，
就把心计变坏。
你仰慕大坏蛋希特勒，
吹捧德国空军威力无比、神奇厉害。
你大长法西斯的威风，
大灭反侵略人民的志气，
居心叵测，良心安在？
让你的孤立主义见鬼去吧！
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真理法轮岂容歪曲颠倒！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哪能任意受人愚弄，甘当法西斯的奴才！

在德意日法西斯肆意侵略和美国孤立主义十分猖獗的情况下，欲知罗斯福下一步如何行动，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四章 幻想破灭

委屈忍让盼和平，严酷事实不留情；
战火愈燃愈炽热，美洲安全无保证。

随着希特勒的侵略进一步加紧，罗斯福对欧洲走向战争的趋势越来越关注，他脑子里的和平幻想破灭了。他很后悔当初不该决定跟着法国和英国默许法西斯在西班牙上台，现在他希望它们能采取反希特勒的立场，并决定务使德国人理解美国的意图。

“我们美洲国家再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大陆了，”罗斯福在跨过边界访问加拿大时对加拿大听众说，“我们的雄厚资源，我们商业的活力和我们的兵员力量，使我们在世界和平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我向你们保证，如果加拿大国土的控制权受到任何其他帝国的威胁，美国人民决不会袖手旁观。”

罗斯福总统除了发出一系列警告外，还请摩根索制定一项计划，允许英国和法国把黄金存放在美国，以便用于购买军事装备。总统看到这位财政部长提出的一项建议很高兴，他打电话告诉赫尔。“我孵出了一只小鸡，”他说，“你想过来看看吗？”国务卿到了白宫以后，罗斯福对赫尔说，他打算让德国大使看看这项计划。他想告诉德国人，“如果你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十之八九会这样做的。”赫尔制止了这项计划。赫尔认为，由于总统在加拿大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又即将同英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那就“很容易使美国人民过于注意欧洲局势了”。这样更易刺激孤立主义，从而增加对政府的压力。

不久，事实证明，罗斯福为加强法国和英国的力量而愿意作出的任何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9月15日，张伯伦飞到希特勒的山间别墅伯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他抱着希特勒同他一样渴望和平这种可疑的设想出卖了苏台德。罗斯福愤怒地对内阁说，张伯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并说，这种投降行为是“一种国际暴行”。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人拒不接受这种“背叛行为”，他们就会被英国和法国抛弃，而这两个国家就会“像犹大一样洗去手上的血迹”。他在给驻罗马的大使威廉·菲利普斯写信时说，希特勒和张伯伦的会谈，至多只能暂时推迟“一场在我看来今后五年内必然发生的冲突。在这场危机发生时，也许美国能够收拾欧洲文明的残局，帮助他们挽救在浩劫中剩下的东西——这不是一种可喜的前景”。

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于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同意肢解他们的国家，但是希特勒又提出新的条件，从而挑起一场新的危机。罗斯福担心爆发战争，于9月26日呼吁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继续谈判。他说：“要是爆发战争，每一个交战国肯定都会有数百万男女老幼在无法形容的恐怖情况下丧生。”为了防止孤立主义者嚎叫，他强调指出，美国将不直接参加谈判。翌日，罗斯福要求墨索里尼利用他的影响促使有关各方进行谈判。他还以个人名义给希特勒发了一份电报。他说，战争“既不正当，也毫无必要”，并再次呼吁继续谈判，以便结束这场危机。

基督教圣经故事中出卖耶稣的人。《圣经》福音书载，犹大原为耶稣12门徒之一，后以30块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权者，为拘捕耶稣的人带路。西方常用犹大作为叛徒的代休。

希特勒在加剧紧张局势之后，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以及墨索里尼于9月29日在慕尼黑开会。然而，罗斯福的呼吁对希特勒的决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举行这次会议一方面是由于墨索里尼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希特勒确信英国人和法国人准备屈服。他对他的对手估计得很准，因为张伯伦和达拉第慑于纳粹德国的武力，没有同捷克斯洛伐克人磋商就同意了德国的所有要求。希特勒对张伯伦说：“这是我不得不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于是，四国头目就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文书上签了字。

在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签字立后，张伯伦又奴颜婢膝地找希特勒会谈所谓世界和平问题。他说，“相信元首会在实施慕尼黑协定方面采取宽容大度的态度”，并且再次表示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人不会“不讲理到制造什么困难”的程度，而如果他们造成什么困难的话。希望希特勒不要轰炸布拉格，以免“在平民中造成可怕的损失”。这些话还只是张伯伦所要说的杂乱无章的长篇大论的开端。

这位大英帝国的首相还向希特勒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建议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苏联问题。然后，首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英德关系的问题对两国对欧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定和英德海军的协定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

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使张伯伦大为满意。这位蒙在鼓里的英国首相当然不知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已经商量好，时候一到他们就对英国并肩作战，共同收拾这个大英帝国。

张伯伦“胜利”地回到了伦敦，达拉第也同样地回到了巴黎。得意洋洋的张伯伦挥舞着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来迎接拥到唐宁街来的人群。“我的好朋友们，”他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他挥舞着《英德宣言》在阳台上高呼：“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然睡觉去吧！”

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罗斯福也因紧张局势的“缓和”松了一口气，认为全世界暂时逃脱了战争的恐怖。但是，他也有所警觉：慕尼黑只不过是战争道路上的一个小站而已。果然没有过一个星期，布利特大使就从巴黎报告说，达拉第预料德国会在6个月内提出新的领土要求。罗斯福为此忧愁满腹，在他眼前出现的仿佛是一片黑暗，他不知道未来带给他的是什么。就是在休假期间，他也一直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他字斟句酌地审阅着将在1939年1月4日在国会发表的一系列国情咨文。

罗斯福在国会讲话中警告说，中立和绥靖不能防止侵略。他强调指出，虽然战争已经避免，但是和平还没有保证，美国必须着眼于自己的防务。他一方面要求废除中立法中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条款，另一方面要求拨出20亿美元的防务经费，其中大部分用于加强美国的空中力量。为减少孤立主义的反

对，罗斯福邀请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向他们秘密介绍情况。他直率地表示，他担心希特勒一心想称霸欧洲，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有人告诉一位记者，总统说过莱茵河是美国的疆界，孤立主义者纷纷对他进行攻击。罗斯福义愤填膺，把这种说法斥之为谎言，说是出自“一个笨蛋”之口。

当罗斯福为修正中立法所作的努力在国会搁浅时，希特勒再次发动了攻势。

1939年3月15日，他撕毁了在慕尼黑签订的协议，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德军在使人目眩的暴风雪中开进布拉格，从家里出来观看的几个居民在震惊的状态中凝视他们。希特勒站在雄伟的赫拉德曼尼古堡上，透过朦胧的天色俯视着展现在他面前的这个城市，他宣告说：“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复存在了，它从地图上消失了！”过了几天，德军占领了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移交给立陶宛的德国城市梅梅尔。一个月以后，墨索里尼横渡亚德里亚海，占领了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佛朗哥攻占了马德里，结束了西班牙内战。在东方，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侵占了中国华中、华南的主要城市之后，进而占领了南沙群岛，以便就近向菲律宾、香港和新加坡发动进攻。

希特勒又取得了一次没有流血的胜利。但是，他低估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引起的震动。希特勒的每一个行动都被说成是为了消除《凡尔赛和约》引起的不满。但是，就捷克斯洛伐克而言，德国不仅吞并该国的少数民族日耳曼人，而且征服了一个斯拉夫国家。英国人和法国人终于认识到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诺言，他们决心保卫波兰，因为波兰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下一个猎取目标。发动这场神经战的借口是夺回1919年从德国领土分割出去的“波兰走廊”，收复已经成为“自由城”的波罗的海港口但泽。

美国公众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同伦敦和巴黎一样强烈。总统顾问伊克斯说，罗斯福对希特勒“越来越恼火了”。他还想同德国断绝关系。国务院发表了一项措词强烈的声明，谴责德国毁灭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并宣布美国将不承认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美国海关对德国政府补贴的出口商品提高了关税，并督促国会修改中立法。

罗斯福对参议员汤姆·康纳利说：“我们要是继续执行这项法律，那就是站在了希特勒一边。如果我们能取消武器禁运，那对民主国家就是一个支持。”但是他的话无济于事，这项建议仍然受到了像参议员博拉这样的孤立主义者的坚决抵制。总统把博拉和其他国会领袖邀请到白宫，亲自发出呼吁，但是博拉丝毫没有改弦更张之意。博拉宣称：“我们不去打仗，我们反对打仗，反对结盟！”副总统加纳问其他国会领袖，修改中立法计划是否有可能通过，他们都回答说没有可能。

然而，罗斯福在寻求和平的问题上还不肯就此作罢。4月15日，他采取了“星期六突然行动”，呼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一再谈论的和平愿望。他在电报中列举了31个独立国家，建议这两个独裁者保证至少在10年里不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发动进攻。他许诺说，如果他们作出这样的保证，美国将支持促进世界贸易和裁军的努力。这项令人吃惊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公众、伦敦和巴黎的支持，但是轴心国却嗤之以鼻。

墨索里尼收到罗斯福的电报时，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戈林正在对他进行拜访。据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说，领袖开头连看都不屑一看，戈林说根本不值得给予答复。墨索里尼认为这是“小儿麻痹症的结果”，而戈林的印

象是“罗斯福害了初期神经病”。美国总统在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里，提出了一个直率的使他们难于回答的问题：

“你们是否愿意作出保证，声明你们的武装部队不会进攻或者侵入下列独立国家的领土？”

下面开列了 31 个国家的名单，其中包括波兰、波罗的海诸国、苏联、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总统希望这种不侵略的担保有效期“至少应有 10 年”，或者“1/4 世纪，如果我们敢于看得那么远的话”。罗斯福提醒希特勒说：“你曾一再声明，你和德国人民并不想再战争。如果这是真的话，世界上就不需要战争了。”

现在看起来，这似乎像一个天真的呼吁，但是“元首”却感到颇为狼狈，因而不得不表示他要答复，要在德国国会 4 月 28 日专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公开演说，逐条予以“驳斥”。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在 4 月 17 日一份电报中，向除了波兰、苏联、英国和法国四个国家而外所有罗斯福曾提到的国家，提出了两个问题：它们是否感到自己受到德国的任何威胁？它们曾否授权罗斯福作这一呼吁？

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发给驻在上述各国的使节的电报中说，“我们毫不怀疑，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将是否定的。但是，虽然如此，为了特殊的理由，我们想要立即得到确凿的证实。”所谓“特殊的理由”，到希特勒 4 月 28 日演说的时候就完全清楚了。4 月 22 日，德国外交部向“元首”提出报告说，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南斯拉夫、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和卢森堡在内，都“已经对两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实际上这些答复都是违心的，都是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波罗的海边上的小小的拉脱维亚，开头不知道到底要它作出什么样的答复，德国外交部马上就给它驻在里加的公使说，“要是门特斯先生不能对我们的问题干脆答‘不’的话，我们就要把拉脱维亚算在那些甘愿做罗斯福先生的同党的国家里面去了。”“今后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拉脱维亚政府承担责任”。

这些“答复”都是给希特勒的“弹药”。在 1939 年 4 月 28 日这个宜人的春日里，当他口若悬河地在国会演说的时候，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材料。他雄辩滔滔，机锋横溢，极尽尖酸刻薄、虚伪狡诈之能事，这种本领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演说不仅在全德国电台上广播，而且在全世界几百家电台上广播，在美国也由各大广播公司转播。在此以前和以后，都不曾有过他那天那么遍及全世界的听众。

在通常一上来先诉说一通凡尔赛和约的罪恶以及它所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种种不平和长期痛苦的开场白以后，这篇演说首先对英国和波兰作了答复，这个答复震动了忧心忡忡的欧洲。希特勒先表示了一下他对英国的钦佩和友谊，然后就攻击英国对他不信任，攻击英国对德国实行新的“包围政策”，他宣布废除 1935 年的英德海军条约。他说，“它的基础已经消失了”。对波兰也是一样，“元首”公开了一直保守秘密的、他关于但泽和走廊地带向波兰提出的建议，把这个建议称做“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而可能想象得出的最大的让步”，并且告诉德国国会，波兰政府已经拒绝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建议”。

希特勒接着指出，说德国打算进攻波兰的消息“不过是国际新闻界的捏造”。他说，新闻界的这种“捏造”，已使得波兰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这种协定“在某种条件下会强迫波兰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因此，波兰已

经背弃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我认为这一协议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从而已经不再有效。”

希特勒下面就转向罗斯福总统，德国独裁者的辩才在这里发挥到了顶点。当他嬉笑怒骂，几乎无休无止地取笑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些脑满肠肥的议员们不断地哄堂大笑。他先把罗斯福来电中的论点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就一脸奸笑地予以讥讽和诡辩。

罗斯福总统在给希特勒的电报中说，他认为一切国际问题都可以在会议桌上解决。希特勒就此回答说，“要是这些问题果真能在会议桌上得到解决的话，我将不胜高兴。然而我的怀疑是有事实做根据的，那就是，最明显地表示不信任会议有用处的国家正是美国自己。因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会议就是国际联盟。”希特勒提醒美国总统，德国曾参加过在凡尔赛召开的一次会议，它不是去参加讨论，而是去听别人捉弄。它的代表“受到的屈辱甚至比苏安族的酋长所受到的屈辱还要大”。

希特勒对罗斯福总统要求他保证不进攻 31 国中任何一国所作的答复最后接触到了核心。希特勒反问：“罗斯福先生怎么知道哪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德国政策的威胁，而哪一个国家又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这种威胁呢？”

他说，“我曾经不厌其烦地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国家做过调查。第一，它们是否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第二，美国总统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应它们的请求提出来的呢，还是至少在它们的同意下提出来的？所有的答复都是否定的……诚然，我并没有对某些国家提出询问，因为这些国家，例如，叙利亚，目前还没有取得自由，而是在民主国家的军队占领之下，因而被剥夺了它们的权利。”

然后，希特勒抓住爱尔兰和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攻击说：“我必须请罗斯福先生注意一两个历史的错误。他提到了，举例来说，爱尔兰，并且要求我声明德国不会进攻爱尔兰。我刚读到爱尔兰总理德·瓦勒拉的一篇演说，奇怪的是，他在这篇演说里，同罗斯福先生的意见相反，并没有非难德国压迫爱尔兰，而是谴责英国不断侵略爱尔兰……”

“同样，罗斯福先生也没有注意下面的事实：巴勒斯坦目前并不是在德国军队占领下，而是在英国军队占领下，这个国家的自由受到了最残暴的武力手段的压制。”

德国国会的议员们笑得声震屋瓦，然而希特勒却一丝笑容不露，保持着他那一本正经的神态，以期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

狂热的孤立主义者幸灾乐祸，确信罗斯福由于“进行干涉”受到嘲笑和侮辱。参议员奈伊说：“这是自找苦吃。”但是罗斯福本来就预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个独裁者不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他对亨利·华莱士说：“这两个疯子尊重的是武力，只是武力。”赫尔说，罗斯福的意图是“揭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本来面目。”“星期六突然行动”有助于唤醒美国人民看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罗斯福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指责为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就使自己站到了反法西斯运动的前列。面对着国内外的挑战，他将奋起斗争。

1939 年圣诞节前不久，有个人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约瑟夫·沃伦在 1775 年牺牲前写的一首诗寄给罗斯福，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

苏安族 (Sioux) 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

英雄们，举起你们的手，
发出自豪而轻蔑的诅咒；
坏蛋布下陷阱要把你们置之死地，
这不过是枉费心机。
哪怕欧洲倾巢出动，
我们也要严阵以待，
为自由的美利坚而战斗，呐喊，战斗！

罗斯福总统把这首诗抄了一份给霍普金斯，并附了下面一段话，以表明当时他对反法西斯斗争的态度：

“约瑟夫·沃伦在1775年的这首诗很有意思，它表明，大约400万人民，资源有限，哪怕在当时也敢认为，他们能对整个世界战而胜之。我看，今天的美利坚恐怕也同当年一样，有许许多多的人要求‘战斗，呐喊，战斗’！”
正是：丢掉幻想精神壮，鹰击长空看胆量。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五章 迎击风暴

二战爆发美受惊，深更半夜鸣警钟；
苟且偷安是幻梦，加强战备观动静。

欧洲战争不依孤立派的意志而爆发了。1939年9月1日破晓，也就是在希特勒“白色方案”的第一号指令中规定的拂晓4点45分，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天空中，德国的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在此后六年间，欧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这种恐怖中。

就在同一天夜里，美国时间凌晨三点刚过，总统床边的电话铃响了。罗斯福马上醒来，拿起电话，急忙问道：

“你是谁？”

“我是比尔·布利特，总统先生。”美国驻巴黎大使说。

“托尼·比德尔 刚从华沙给我打来电话。德军几个师已经深入波兰领土，战斗很激烈。托尼说，在华沙上空有轰炸机飞行。”

“还有进一步的消息吗？”

“没有了。通讯联络糟糕极了。不过这是官方消息。”

“谢谢你比尔。战争终于爆发了，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

总统挂断电话，普雷蒂曼帮他穿上毛线衫。他感到肚子里有一阵说不出的难受，好像有人用钩子钩住他的太阳神经穴。终于发生了！他那历史学家的头脑里记下了这个日子：

1939年9月1日。尽管罗斯福预见到这一点，并且为了防止它发生，曾经作过长期努力；尽管他也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当事件发生之后，他一时仍然感到震动。德国炮声一响，就像脱缰的野马，现在已经制止不住了，它将带着越烧越旺的烈火滚滚而去，直到把整个欧洲大陆吞噬掉为止。

“阿瑟，叫哈西特先生马上到这儿来，”总统说。他拿起话筒，给在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打电话。

电话尚未接通，比尔·哈西特已经赤着脚穿着睡衣冲进房间。罗斯福把消息告诉他，命令说：“通知报界。”

接着，还没有睡醒的赫尔接了电话。

“科德尔，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德军已经侵入波兰了。”总统转述了他跟布利特大使的通话。

“是吗？”国务卿说。接着他又补充道：“我原来估计会在本周末发生。”

接着，罗斯福又迅速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海军部长查尔斯·爱迪生以及陆军部长哈里·伍德林通了电话。他命令潜艇和水面进攻军舰进入横跨主要海上通道的阵地。白宫开始进入长期紧急状态，在整个非常时期内将始终保持这种状态，陆军和海军的情报官员开始在每天下午两点45分向总统汇报情况。

打完电话，布置了急需要做的事情，余下的时间，罗斯福全部用来收听

美国驻波兰大使，全名为托尼·德雷克塞尔·比德尔。

广播。播音员用紧张的声音发布官方反应，传布流言，但是，除了严酷的战争事实而外，其实没有播送其它内容。广播里充满着恐怖气氛，人们的惊恐慌乱在电波传送的播音声中得到了反映。

照往常一样，总统的早餐盘在9点钟端了进来，跟着进来的还有国务卿赫尔、总统军事助理沃森、顾问霍普金斯和麦金太尔。此时，国务院派往欧洲各国的大使发回的电报已经成堆，并且每分钟还有更多的送来。总统接受了驻德大使休·威尔逊送来的辞呈。凶讯纷至沓来。现在那里正是下午，德国人已在迅速行动。他们的军队蜂拥越过“走廊”，从东普鲁士出击，采用大规模的钳形运动夹击波兰军队。他们的飞机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飞越华沙上空，没有遭遇任何阻击。波兰空军早已名存实亡了。

罗斯福在与国务卿和顾问们商量之后，于当天9月1日，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发出紧急照会，照会说：

“对平民的残忍空袭……极大地震惊了人类的良心。

“为此，我紧急呼吁：凡是有可能参与敌对行动的各国政府公开表明他们的决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让自己的武装部队空袭和平居民……我请求立即作出答复。”

但是，罗斯福知道这是无济干事的。战争遵循自己的轨道发展，就像巨大的天灾那样具有可怕的不可避免性。

欧战爆发的第三天，英国首相张伯伦，这个曾经冒丧失政治生命的危险，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的政治家，向下院发表了沉痛的演说，宣布英国现在已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他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张伯伦命中注定不能看到这一天，1940年11月9日，他怀着绝望的心情与世长辞了。

9月3日，英法根据法波盟约和英波互助条约，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匆忙对德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欧战的爆发，犹如一声惊雷，给沉睡的美国人民送来了一副清醒剂。在回答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人当中，有82%的人希望盟国胜利；只有2%的人赞同纳粹德国。但是，美国人唯恐再被拖进一场欧洲战争。9月3日晚上，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欧战后的第一次炉边谈话。为了安抚群众，他首先在广播中说：“我希望美国将不会介入这场战争。我认为它不会介入。我向你们保证，并再次保证，你们的政府将为实现这个目的作出一切努力。只要我有权力防止，和平就不会在美国覆灭。”

罗斯福要求美国人民对今后事态的发展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他说：“我国的安全现在和将来都是同西半球及其邻近海域的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空中传来的每一句话，大洋中航行的每一条船，互相争夺的每一个战役都会影响到美国的未来。”

“我还理应指出，”总统继续说，“最近这些年来的不幸事件都是毫无疑问地基于武力和武力威胁的。甚至在这场大战的爆发伊始，在我看来就很明确，美国的力量应该始终运用在为人类争取到一个会尽可能消除在国家间继续使用武力的最后和平。”“总有一天，虽然可能是遥远的一天，我们可

能为受到创伤的人类提供甚或更大的帮助。”

最后，罗斯福要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他说，“在这个时刻，请允许我提出直率的请求：暂时停止派性和自私；把国家统一的念头作为一切其他想法的基础。”

希特勒闪电战速度之快，势头之凶猛，使美国人大为震惊。总共才不到三个星期，波兰已成为一片焦土。在那狂轰滥炸的日子里，美国驻波兰大使托尼·比德尔，一步也没有离开华沙。为了减轻侨民的苦难，他全力以赴，不仅给美国侨民，而且给其他各国侨民提供援助。直到波兰政府自己跑掉，首都快要陷落之时，他才离开。

当炮声在波兰沉寂下来之后，整个欧洲大陆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但是，罗斯福却没有上当受骗。他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德国重新出击的时刻，并且已作了种种准备。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宣布全国处于“有限紧急状态”，这使他得以增强陆、海军的力量。他命令海军作战部长威廉·D·莱希海军上将从缅因州的东港直至巴拿马运河区进行中立巡逻——至少不能让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域得到安宁。为了有效地对盟国提供援助，总统敦促国会于9月21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中立法的问题。

罗斯福对国会说：“我坚定不移地深信，如果取消武器禁运，美国保持和平的可能性会比维持现在这项法律时要大。我感到遗憾的是，国会通过了这项中立法。我同样感到遗憾的是，我签署了这项法律。”总统在致词中回顾了18世纪末美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所持的立场。“为了避免卷入，”他说，“美国许多年来是根据所谓‘禁运和不交往法’行动的。可是，这一政策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使美国接近毁灭。它成了美国在1812年的反英战争中积极卷入欧洲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回忆往事，“只不过是引用历史来提醒诸位，禁运和不交往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在此集会的首都在1814年时遭到部分焚毁。”罗斯福告诉国会，把军用物资送过大西洋，可以给美国成千上万的人以就业机会，而且有利于美国本身的国防建设。他明确提出：“援助英国就是帮助自己”。

尽管罗斯福晓以利害，为修改中立法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是孤立主义者拒不接受以禁止美国船只在战区航行换取取消武器禁运的做法。总统离开国会不久，保卫宪法权利委员会的一伙示威者涌进了国会大厦，喊着“反对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口号。参议员博拉说，废除禁运的要求不是来自美国人民，而是来自“欧洲战争狂热分子”。现金购货、运输自理会再次诱使美国在血腥的战争道路上走下去。这个口子一开，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贷款、彻头彻尾的礼物、秘密协议和派美国部队。参议员奈伊、拉福莱特和海勒姆·约翰逊都同意这种看法。库格林神父强烈反对进行干涉，在他的唆使下，信件的洪流汹涌地冲向国会。林白上校建议美国没收偿还战争债务的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财产。这只孤鹰宣称：“只要欧洲国家还在我们半球保持它们的影响，我们就很有可能被卷入它们的麻烦。”

为了战胜这股来势凶猛的反动逆流，罗斯福鼓励威廉·艾伦·怀特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通过修正中立法、争取和平的无党派委员会”，同孤立主义的论点作斗争，并削弱库格林的吸引力。他还亲自敦促天主教会和劳工的领导人支持废除禁运。六个星期的辩论以总统的显著胜利而宣告结束。投票结果，参议院在10月27日以63票比30票、众议院在11月2日以243票比181票通过了废除武器禁运条款。中立法的修正，给了希特勒一个警告。德

国驻华盛顿代办汉斯·托姆森电告柏林：“目前，罗斯福认为，他能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通过无限制地输出武器、军事装备和基本物资，加强同盟国以赢得战争。但是同盟国如有失败的危险，即使面对他本国的抗拒，罗斯福也决心要与德国一战。”

中文法问题解决后，罗斯福致力于谋求扩大国防拨款，使陆海军在法律以及处于特殊状态的民族意识所许可的范围内，有了最雄厚的基础。其中一项最重大的建设是在毫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开始的。

1939年10月11日，总统任命了一批专家，其中包括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一位爱好物理学的非军事人员，又是著名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朋友。

一天，萨克斯来访总统，带来了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和另一位难民科学家利奥·西拉德的一份备忘录。这封信和备忘录警告说，德国在核裂变方面取得了进展。开始，总统对这个神秘的领域一无所知，而且有别的心思，所以对此漠不关心。萨克斯担心，罗斯福可能把这些信件扔在一边，不加以仔细研究，因此坚持大声朗读一遍。爱因斯坦在信中说：“这种新的现象还可能导致制造炸弹，可以想象，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可能会制造出来。”这引起了罗斯福的好奇心。他说：“萨克斯，那么你们追求的就是保证纳粹不把我们炸毁呀！”

“正是这样。”亚历山大·萨克斯随即向总统介绍了如下的情况：今年1月，哈恩和迈特纳在柏林德皇威廉学院实现了铀235的核裂变。此后，在哥本哈根、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的其他许多大学也进行了这种试验。释放出来的能量大得惊人，达到1亿至2亿电子伏特。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现在已进展到不久可望实现连锁反应的地步。这意味着他们将能搞出一种释的能量，其威力几百万倍于当前所知道的一切东西。

“你说有多大？”总统问道。

“1公斤纯铀235的威力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

罗斯福在脑海里急速探索这几句话的无穷含义。他按了一下电铃，总统军事助理沃森将军急忙进来。罗斯福说：“老爹，这儿有一项任务需立即采取行动。”于是萨克斯同国家标准局局长布里格斯博士之间建立了联系，一个协调核研究的委员会很快成立起来，由著名的军事和科学家组成。罗斯福聘请他的老友、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担任主席。在总统的直接关怀过问下，美国终于最早地生产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

1939年冬天，在西线经过一个短暂的“沉寂”之后，希特勒就着手进攻北欧了。从而使罗斯福更加关心保卫美国的问题了。他在1940年1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表达了他的焦虑心情。他说：“不介入战争，与佯称战争与己无关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世界上所有小国都丧失独立，这会给我们自己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美国鸵鸟会少些；鸵鸟把头埋在沙里是危险的！”

同时，总统在给他的共和党支持者威廉·怀特的信中说：“这些日子，事情以可怕的速度在发展，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要警告美国人民，应该想到欧洲和远东可能出现的最后结局，……而又不要吓坏他们，以为他们正在被拖入战争。”在当时孤立主义和各种类型的和平主义十分猖狂的情况下，罗斯福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1940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罗斯福的第二届任期将在这一年终了后不久

期满。他是否要打破传统，争取第三次连任，这不但成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热烈讨论的大事，也是世界各方瞩目的重大事件，由于7月15日即将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日益临近，设法了解罗斯福的计划已成为全国最关心的事情。内阁成员们和白宫助手们同一般公众一样迷惑不解。甚至连总统夫人直到1940年春天还认为他不会再参加竞选。

1940年1月30日，在罗斯福生日的庆祝晚会上，在总统身边工作的格雷斯·塔利宣读了这样一段念珠祈祷：

我的念珠祈祷，
我同你度过的时间，亲爱的上司，
对我犹如一串珍珠。
我把每个小时都看作收获，而无损失，
一个忠实的姑娘，那就是我！
我每工作一个小时，就做一次祈祷，
我祈求你会认为我的工作干得好，
哦，请告诉我，是到此为止呢？
还是到1941年再说？
我不知道投奔何方。
我再不能忍受这种苦恼，
我将摆脱苦恼，如果我不能知道
明年谁是我的领导，
谁是我的领导！

有一次总统秘书利汉德小姐问他，谁将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总统回答说，上帝会指定的。她回答道，上帝最好马上就决定。罗斯福所以不肯正式表态是有种种原因的。如果他宣布他将不谋求连任，他马上就会成为“跛鸭”，失去在国会和本党政界人士当中的大部分影响。然而，如果他宣布争取连任，那就会引起强烈反对连任三届的情绪，从而在他执行对外政策方面束缚他的手脚。如果他想援助盟国同希特勒作战，他就必须得到舆论的支持。他不想给批评他的人提供新的弹药。

当时的舆情对罗斯福来说确实是不轻松的。美国舆论专家哈德利·坎特里尔在1940年9月作的舆情分析中指出：“整个人口的1/4认为，美国置身战争之外比帮助英国重要，同时认为，对英国的帮助应该比现在给予的要少，或至少不比现在给予的还多。尽管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德国将获得胜利，可是他们认为德国的胜利不会打乱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危及美国的安全。”这种情绪被孤立派政治组织“美国第一委员会”利用来作为反对罗斯福的一个有力武器。罗斯福的敌人总是从最坏处去看他，确信他一心想连任三届，但又用沉默来掩盖自己的独裁野心。

对罗斯福来说，是否继续竞选，内心的确矛盾重重。一方面，八年的总

“美国第一委员会”于1940年7月成立于号称孤立派堡垒的芝加哥，主要支持者是中西部的企业家，同美国极右组织如库格林神父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威廉·佩利的“银衫团”、衣阿华州的新闻记者维恩·马歇尔的“不参加国外战争公民委员会”等结成联盟，攻击指责“犹太人——英国人——资本家——罗斯福”四位一体要把美国拖入战争。

统重荷确实使他疲倦了，他盼望着退隐到海德公园继续过乡绅的安逸生活，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事实上他已在 1940 年 1 月签订了一项合同，担任《科里尔》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每年酬金 7.5 万美元，相当于总统的薪金；另一方面，罗斯福想巩固新政的成就，把民主党改造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党。他对保守派感到失望，因此不想把领导职位拱手让给哈里·伯德或者沃尔特·乔治，他们不关心占全国 1/3 的那些“住得差、穿得差、吃得差的人”。罗斯福设想，民主党将成为自由派的安息所，不管他们以前忠于哪一方。

1940 年 1 月和 2 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8% 的民主党人赞成重新提名总统为候选人，而他的主要对手加纳的支持者只占 10%。

事实证明，希特勒的疯狂侵略，对说服罗斯福再次竞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 月 9 日，德军占领丹麦，并且没有正式宣战就向挪威发动进攻。四个星期后，西线突然开火。德军坦克由尖啸着的俯冲轰炸机开路，穿过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向马其诺防线包抄过去。荷兰、比利时的军队几乎立即被击溃。纳粹军队像暴风席卷纸兵一样，把它们那些小小的自行车队打得落花流水。法国陆军的快速后备部队和英国远征军也节节败退。张伯伦终于辞职，英国请出丘吉尔来领导对付这场危机。

五天之后，5 月 14 日，“色当”这个历史上像丧钟一样的倒楣名字，成了头条新闻。在那里，德国人打穿了法国国防线的薄壳。前线的新闻电讯对落在甘米林将军指挥下的法军头上的灾难作了这样的描写：“德军密集的坦克和机动大炮把工事炸成一座活火山；步兵乘着飞驰的卡车以压倒的优势倾注而入；伞兵在战线后面降落下来破坏交通联络；第五纵队纷纷从地下冒出来；更加糟糕的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呼啸而下，以致命的准确性投下了一颗颗炸弹。”唯一使人感到宽慰的是，大约 30 万英国士兵已从敦刻尔克的海滩撤走。

盟军在德军闪电战的迅速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因此纷纷要求美国提供飞机、军舰、大炮和弹药。德军的猛烈攻势，使美国人民目瞪口呆。以前，他们由于同欧洲的危险隔离而产生的舒适感如今已经成为泡影。虽然在政策问题上的辩论仍在继续进行；但是，人人都认识到，希特勒的胜利危及美国的安全。人民等待罗斯福来指引道路。

罗斯福登上议会讲坛，大家都在翘首期望，气氛一片静寂。他建议大规模加强陆军和海军的力量，其中包括实现每年制造五万架飞机的前所未有的目标。5 月 16 日，他对议员们说，由于敌人有了远程轰炸机、机械化军队、伞兵部队和利用叛国的“第五纵队分子”，美国人民必须“重新考虑如何保卫祖国的问题”。

罗斯福并不想缩小危险。“让我们衡量一下我们的力量 and 我们的防御，”他说，“不要自我蒙蔽。”“我们在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过这样的教训——没有准备或者无法作准备的国家终遭敌人的蹂躏。所谓攻不破的防御工事不复存在。容许敌人不受阻挠地巩固其向前接近的道路，那样的防务是必败的。不作出有效的努力去破坏敌人的供给线和通讯网，那样的防务是必败的。”

总统要求国会立即为了四个基本目的拨出巨额款项。

第一，为了使更为强大和完全满员的陆军采购各种必要的装备。

第二，为了以最新式装备替换和更新一切旧有的陆海军装备。

第三，为了扩大陆海军保卫国防所需一切物资的生产设施，迅速提供更

多物资的能力。

第四，为了把现有的一切陆海军订货合同和一切新订的合同都加速到 24 小时连续生产的基础上。

在随后几个月里，国会拨出 17 亿美元来加强军事力量，这是一笔前所未有的款项。这时欧洲形势越来越糟了。罗斯福一边看着最新的电讯，一边喃喃地说：“都是坏消息，都是坏消息。”法国军队已经土崩瓦解，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后，如今只剩下一个旅是装备完好的，大炮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仅有 100 辆轻型坦克，如果德国人能渡过海峡，只需一个装甲师就可以把英国征服。如今，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德国取胜，英、法的舰队将会如何？罗斯福发出焦虑的询问；布利特大使在紧张地进行活动。法国新总理保罗·雷诺回答说，法国决不会拱手交出它的舰队，法国海军总司令达尔朗上将发誓说，他将把舰队全部凿沉，不让落入德国人之手。与此同时，罗斯福还考虑给这些国家运送武器的问题，他是极想这么干的，但目前阻力仍很大。

1940 年 6 月 4 日，丘吉尔对英国和全世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那天午餐以后，罗斯福特地到椭圆形办公室收听了英国首相的讲话。丘吉尔声音洪亮，他的语调中充满着力量，振奋人心。他在讲述敦刻尔克撤退时，既不缩小惨败中的损失，也不掩饰错误。但是，当他讲到那次难以置信的成就以及在创造这种成就的过程中表现的英雄行为时，他的声音充满着自豪，盖过了短波中天电干扰的噪音。接着，他表示要以坚定的目光注视未来。在这极端危急的时刻，他不乞求，也不自夸。他是在代表一个临危不惧的民族讲话，他的声音就是处于最伟大时刻的英国的声音。

“不论代价多大，我们都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里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林中战斗。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者它的一大部分土地已被征服，或者挨冻挨饿——我一点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那个由英国舰队所武装和保卫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刻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旧世界援助和解放出来为止。”

罗斯福听着这位首相的英雄誓言，心潮起伏，深为这篇伟大的演说所打动。他下定决心，要冲破重重阻力，为正在受难的国家和人民提供军火，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1940 年 5 月，他绕开国会，以行政命令恢复威尔逊为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 1916 年成立的国防咨询委员会。

1940 年 6 月 19 日，法国投降前夕，他撤掉了本党有孤立派观点的陆军部长伍德林，任命了积极主张援英抗德的共和党人史汀生任陆军部长，诺克斯任海军部长。

正当英法盟军节节败退，希特勒行将囊括整个法兰西时，垂涎死兽残骸的猎狗恶犬墨索里尼，突然于 6 月 10 日向受了致命创伤的法国宣战。从这个时刻起，墨索里尼已横下一条心，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希特勒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一起了。他向三军参谋长们发出命令：“我们将与德国和日耳曼人民，以及他们攻无不克的常胜大军一起前进！”“向法兰西进军！”消息传来，罗斯福怒火中烧。他认为人间的羞耻事莫过于此了。那天，他要去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讲演。尽管讲稿早已拟好，可是当天早晨他又重新改写了一遍。在夏洛茨维尔，罗斯福宣告：美国的制度正在世界舞台上面临危险；我

们决不可变成“武力哲学统治着的世界上一个孤岛”。总统说，对于他，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那是一场噩梦，“是丧失自由的人民的绝望噩梦，是身陷囹圄、戴着手铐、食不果腹，每天靠那些傲慢冷酷的外国主于从铁窗外丢进来的食物度日的人民的噩梦。”

接着，罗斯福叙述了他为劝使意大利保持和平而亲自与墨索里尼进行的谈判，以及这些谈判的失败。他以如下尖锐的话来表达他对这种行为的震惊：“就在1940年6月的第十天里，抓在手里的匕首扎进了邻居的背部。”最后，罗斯福说出了最近几天以来在头脑里酝酿形成的意图：“我们要给反对暴力的人们提供我们这个国家的物质资源。”他以宣布自己的最高信念来结束讲演：“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对自由的热爱仍然是炽烈而坚定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午夜在海军部作战室同一伙军官收听了总统的讲话，他对罗斯福说，人们对这篇讲话感到非常满意。

6月22日，法国投降，希特勒用六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德皇四年都没有完成的任务。为了满足“元首”胜利后报复的狂欲，他命令投降仪式在1918年德国战败签订停战协定的同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德军开进巴黎三天之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R·斯塔克上将前往国会山，要求为建立一支在“两个大洋”作战的海军拨款40亿美元。根据他的这项要求，海军的规模将扩大70%，即增加257艘军舰，其中包括几艘战列舰和27艘“埃塞克斯”的航空母舰。但是，建造这些军舰需要时间——正如斯塔克将军说的，“金钱买不回昨天”。罗斯福决心秣马厉兵，加快战备步伐。

面对着风云骤变的国际形势，罗斯福思绪万千，为了美国的前途，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战胜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的逆流，他决定打破常规，争取连任总统。正是：人类灾难岂言休，不惧病残再奋斗。欲知下届大选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六章 荣获三连任

打破常规三连任，人民重托系一身；
战争病缠无所惧，不辞辛苦为国民。

罗斯福决定竞选连任总统的主意传出后，在民主党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多数人支持，少数人反对。

为防止在连任三届时的争论影响提名，罗斯福的支持者们打算指定他为总统候选人，而不采取点名投票的方式。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些问题：一来违反常规，在美国，自华盛顿以来，总统不得连任三届已成了不成文的法律；二来，还必须征得现任副总统加纳和民主党主席吉姆·法利的同意。因为他们两人一直坚持出任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

7月7日，即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幕前一个星期，法利驱车前往海德公园会见罗斯福。最近几年，由于他认为罗斯福的激进思想日益严重，他和总统不知不觉地疏远了。他已不再被邀请到白宫参加清晨的床边会议，他为此感到痛苦，因为他怀疑罗斯福在社交方面并不一视同仁。开始，两人对坐，气氛有些紧张，后来还是罗斯福打破了僵局。他首先向法利解释了他以前表示的不争取第三个任期的打算不能兑现的原因是国际危机。“要是那样做，我就不能在我国设法应付在欧洲蔓延的严重灾难的时刻，有效地领导全国人民。”罗斯福点了一支香烟，仔细地权衡了这番话对客人所起的作用。

打破沉默之后，法利直率地对总统说，他反对连任三届，一来是出于个人的考虑，二来也是因为民主党是始终反对这样做的。在11月份的选举中还有别人可能当选，如果与会代表们能够自行决定的话，这些人就会被提名。罗斯福的笑容消失了。显然，法利不愿退出竞选，那只能让代表大会以鼓掌的方式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了。

关于竞选伙伴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他们提到的加纳、麦克纳特、萨姆等人，都被一一拒绝了。在交谈中没有提到法利本人的名字，当罗斯福提出亨利·华莱士时，法利却骂这位农业部长是个“激进的家伙”，不会在党的代表会上获得通过。在他们之间的交往中，罗斯福第一次提到他的身体残废问题。他说：“同我一道竞选的人必须身体健康，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吉姆，你可知道，一个身体瘫痪的人随时都可能垮下来。人的一生中任何事情都不是肯定的。”说着，他站起来，解开衣扣，让法利看看他左肩下的肿块和肌肉。他说，这是由于整天不得不坐着造成的。“十分重要的是，同我一道竞选的人应该随时准备接受我的职务。”罗斯福进一步解释道。

在民主党举行代表大会期间，罗斯福没有去芝加哥。他认为，他出席会议将被人们视为试图迫使代表们表态；而且人们会要他作出他不应该作出的承诺。罗斯福说：“如果不作出承诺，我就会树立新的敌人。如果我真的作出承诺，那会铸成大错。我就会被束缚在我现在不想被束缚在上面的问题上。”为了便于代表们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罗斯福特为大会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不想再当总统候选人，代表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选举任何人”。

大会主席将这一声明宣读后，会场立即大哗。首先是芝加哥选区的代表立即在走廊里喊起来：“我们要罗斯福！我们要罗斯福！”参议员艾尔本·巴

克利接过一幅总统的巨幅画像，在主席台上挥舞起来。从会场里面又传出一阵又一阵的吼声：“芝加哥要罗斯福！”“伊利诺斯要罗斯福！”“纽约要罗斯福！”“美国要罗斯福！”

投票结果，罗斯福以 946 票的压倒多数获得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但是，会议却在罗斯福选定亨利·华莱士为竞选伙伴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特别是在法利等人的鼓噪下，会议气氛相当紧张。按照罗斯福的解释，现任副总统加纳所以没有被选中，是因为他思想保守，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斗争中没有帮忙，并反对他连任三届。罗斯福首先挑选的副总统候选人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但赫尔断然拒绝。华莱士工作刻苦，致力于新政的理想，支持对英国的援助，并且有农场主和工会的支持。然而，民主党领袖们抱怨说，华莱士不可思议，政治上无知，以前曾是共和党人，而且现在变得越来越激进。罗斯福把反对华莱士一事归咎于保守分子，并且坚决强迫代表大会接受他挑选的候选人。“让保守分子见鬼去吧！”他咆哮道，“他们要么提名华莱士，要么我就不参加竞选！”

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为解决会议的分歧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的讲话受到代表们的喝彩和鼓掌欢迎。她强调指出，这次大选是在国际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身为在职总统的候选人，不能像通常那样进行竞选。“因此，你们当中赋予富兰克林·罗斯福这种责任的每一个人，在把这种责任交给他时就等于亲自承担着一种非常重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将为他进行竞选。你们得摆脱种种狭隘的党派考虑。这是我们为美国而奋斗的时刻。”在法利看来，埃莉诺的直率而又雄辩的讲话，帮助华莱士过了难关。到她讲话结束时，骚乱已经平息下来，可以严肃地进行点名投票了。投票结果，华莱士以 626 票获胜。过了午夜，罗斯福才开始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

在总统登上主席台时，一盏强烈的聚光灯照射着悬挂在体育场钢梁上的一张巨幅画像。烟雾和灰尘在不断变化的灯光中回旋。罗斯福讲话的语气既平和又有说服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与会代表。他对为什么认为有必要违背不准连任三届的悠久传统作了解释：

“在许多不眠之夜，我曾经反问过自己，作为海陆军总司令，我是否有权号召男男女女为国效劳，或者接受训练准备为国效劳，而同时我却不肯以自己个人的地位为国效劳，如果我国人民请求我这样做的话。

“如今，由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国际危险，所有的私人计划，所有的私人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已经被置之度外。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所有能够为共和国效劳的人都没有别的抉择，只能为国尽力而为。

“我为自己作过计划，为私人生活作过计划，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拒绝我为国效劳的请求。”

罗斯福虽然获得了民主党竞选连任总统的提名，但是在前进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阻力和斗争。温德尔·L·威尔基已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公用事业的巨头，势力很大，能言善辩，几乎同罗斯福一样是一位惹人注目、富有吸引力的人物。威尔基身材魁梧，面目清秀，和蔼可亲，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人。他穿着起皱的西装，讲演时一团蓬乱的头发披落在前额上，就好像从他的原籍印第安纳来的一个乡下人。但是，他一直是巨大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联邦和南方公司”的总经理，在华尔街深受尊重，被视为精明的经营者。他是在带头反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的斗争中第一次引起全国注

意的，这项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拆散这种联合企业。作为老民主党人，威尔基曾在 1932 年投票支持过罗斯福。他不打算废除新政，但是指责新政未能结束经济萧条，并且认为各项新政计划本可以在减少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得到执行。

威尔基活动能量很大，他的竞选速度使人头晕目眩，有时一天发表演讲多达 15 次，他的声音很快就变得嘶哑了。而罗斯福却巧妙地置身于竞选之外。他无视他的对手的挑战，照常行使总统的职能。他的行动和关于世界情况的评论使威尔基的竞选黯然失色。总统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即将爆发的不列颠战役上。英国人正在遭受轰炸和围困，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德国潜艇四处活动，正在消灭作为英国生命线的运输船队的主要力量。早在 5 月 15 日，丘吉尔就要求借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正在重新装备的四五十艘驱逐舰，但罗斯福鉴于国内的反对，没有立即答应。他不愿为那些指责他有独裁野心的孤立主义者提供新的弹药。他确信，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国会也不会批准这样的非中立行动。然而到了 7 月份，英国首相进一步提出了这一要求。

丘吉尔建议，美国用这些驱逐舰换取租借从加拿大到加勒比海的一连串 8 个空军和海军基地的为期 90 年的权利，以便使美国公众容易接受这项交易。到了 9 月 2 日，罗斯福终于以非凡的勇气，冲破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重重限制，靠行政命令将这些驱逐舰转让给英国人。总统对国会的反对派说，“哪怕再推迟一天，都可能意味着文明的消灭。”孤立主义者们指责他“采取了战争行动”，但是他辩解说，采取这样一种明显的非中立行动是进行自卫，也是对希特勒一再违反国际法进行的报复。经过广泛的宣传和解释，驱逐舰交易得到了公众的赞成和谅解，特别得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两位共和党元老坚决支持，罗斯福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根据美国人民怕打仗的心理，极力在政治上诋毁罗斯福。他指责说，投票选举罗斯福，等于投票派美国青年到欧洲战场上送死。如果罗斯福重新当选总统，美国部队将在 4 月份以前被派到海外。在大选之后，威尔基承认，他的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只不过是“竞选言词”而已。但是这些言论，却提高了他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煽动了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和极右势力对罗斯福的围攻。

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罗斯福认为该是“提醒全国人民注意有意或无意歪曲事实的行为”的时候了。10 月份，他开始了一次竞选巡回旅行，走遍所有的工业州，往西远至克利夫兰。罗斯福在讲演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1940 年对美国男女劳动人民假装慈悲的共和党人，在 1932 年却愿意让他们挨饿；第二，同共和党的说法相反，在重新武装美国方面正在取得进展；第三，共和党人反对加强美国防务的一切努力。罗斯福始终是在政治活动中奚落对方的老手，他指责共和党头目口是心非，置群众利益于不顾，当欧洲人民遭受法西斯蹂躏时，他们却见死不救。

在竞选活动后期，罗斯福已经看出舆情的变化。随之，他讲话的调子也就逐步升高了。在 1940 年 10 月 12 日以西半球防务问题为主旨的一次演说中，他说：“我们的方针是明确的。我们的决心已经下定。我们将继续增强防务和军备。我们将继续援助那些抵抗侵略的人们，继续援助离我们海岸很远的抑制侵略者的人们。”“美国人民，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绥靖主义。他们认识到绥靖主义是怎么回事——是侵略国的主要武器。”这是罗斯福对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公约的答复。在演说中罗斯福还对保卫西半球的概念作出新的解释：不仅包括北美、中美和南美的领土及其邻近的岛屿，而且还包括“和平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权利”。

两星期后，也就是投票前一星期，罗斯福对共和党孤立派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由于美国公众舆论倾向于加强军事准备以应付法西斯国家对西半球的威胁，国会中的共和党孤立派领袖为了哗众取宠，转而指责罗斯福忽视国防建设。罗斯福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国会记录，白纸黑字，既改不掉，也禁不了。”接着他点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纳里和范登堡、奈伊、约翰逊等人的名，揭露他们反对加强军备，反对废除禁运条款的一贯言行。

罗斯福在投票前夕采取的进攻姿态，说明他摸准了舆论的脉搏。投票那天，罗斯福照例来到海德公园同家庭成员和亲朋挚友们一起等待大选的结果。罗斯福的母亲和几位老太太在靠近房子前门的一间小客厅里，一边织毛衣，一边聊天，几乎没有注意电台广播的投票结果；总统穿着衬衫，在餐厅里准备好了计票单和新闻自动收报机。埃莉诺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照看着所有的客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电台的广播。最初的结果表明，威尔基的票数出乎人们的预料，但到10点钟，结果清楚了，罗斯福在30个州获胜，获得选举人票449张；威尔基在10个州获胜，获得选举人票82张。在选民投票中，罗斯福领先500万张。在庆祝胜利时，总统对朋友们说：“我们似乎防止了一场暴动。”要是他落选，那就可能被视为绥靖政策的胜利。

1940年的大选结果，不仅打破了美国100多年来的政治传统，而且成了第二次大战期间的一次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搏斗。罗斯福第三次受任，比他在大危机年代临危受命，担当起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免于崩溃的任务来，有着更重大的意义。

罗斯福理所当然地把他第三次当选作为美国人民对他的政策的认可。如今，总统可以比较放手地执行他的外交政策了。

1941年11月中旬的民意测验表明，70%的人支持援助英国，哪怕冒险战争危险也好。实际上，从1941年1月29日开始，到3月29日，英美参谋人员在华盛顿进行秘密会商，制订美国日后参战的蓝图——《ABC—1》，计划集中力量于大西洋打击德国，在太平洋方面采取守势。这一战略原则的出发点是：打垮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则无法坚持下去；打垮日本和意大利，德国仍能打下去。

如果说，一年前，罗斯福正在为废除中立法中武器禁运条款而苦战，那么，1940年12月29日发表炉边谈话时，他已能提出“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的口号了。

在这次谈话中，罗斯福首先将目前这场危机同八年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了回忆对比。他说：“今天晚上，面对着一场世界性危机，我脑中回想到八年前的一场国内危机中的一个晚上。那时，美国工业的轮子正在戛然而止，我国整个银行体系已经停止活动。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白宫的书房里，准备对合众国人民讲话时，我眼前出现了听我讲话的那所有美国人的形象。我看到工厂矿山里的工人，柜台后边的女售货员，小店主，正在进行春耕的农

美、英、加三国陆军和海军的参谋人员，1941年3月秘密制定的《ABC—1》号计划，确定了“欧洲优先”的战略。如果美国被卷入一场两大洋的战争，它将通过防御性行动对日本进行牵制，直到希特勒被打败，盟国准备对付它为止。

场主，寡妇和为自己一生积蓄发愁的老头。我试图向广大的美国人民群众说明银行危机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

“今天晚上，在美国面临这一新的危机时，我还是要对广大的美国人民群众说明这次危机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罗斯福指出，“自从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礁石一直到现在，我们美国文明还从来没有遭逢过这样的危险。因为，1940年9月27日，三个强国——两个欧洲的和——在柏林签订协定，联合起来发出威胁说，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干预或阻挠它们三国的扩张计划——旨在统治世界的计划——它们就要联合起来对合众国采取最后的行动。”

总统说：“由于这一无可否认的威胁的性质，我们可以有理由明确断言：合众国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鼓励谈论和平，除非有一天侵略国一方清楚地表明打算放弃支配或征服世界的一切想法。”

“过去两年的经验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姑息纳粹。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对于燃烧弹是不能讲道理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只有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才能同纳粹有和平。”罗斯福进一步强调说。

总统对国内的孤立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美国爱姑息的人不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法国的命运所提供的警告。他们对你们说，轴心国家反正是要打胜的；世界原可以避免这一场流血牺牲；合众国还不如施加自己的影响去促进强制的和平，来争取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他们把这叫‘谈判和平’，完全是胡说！如果一伙亡命徒把你们的居民点包围起来，以杀光相威胁，迫使你们交纳钱物以赎一死，这算得上谈判和平吗？！”

“考虑到今天和明天，我向美国人民直截了当地声明，”罗斯福说，“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支援保卫自己反对轴心国进攻的国家，或者默认他们失败、驯服地屈从于轴心国的胜利，等待在以后另一次战争中自己挨打，两相对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合众国卷入战争的机会要少得多。”因此，总统呼吁工厂的老板、经理和工人们，政府的职员们，都要急速地、毫不吝惜地把每一份力量投入生产这些军火上。“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对我们来讲，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状况。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致力于我们的任务就好像我们处在战争中会表现的那样。”

作为合众国的总统，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作出这种努力。他说：“我们以我们热爱和引以为荣的、为之服务而感到光荣自豪的国家的名义发出这个号召。我带着我们共同事业必将大获全胜的绝对信心向我们的人民发出这个号召。”

随着战争和军火生产的加紧进行，“新政”面临的许多难题都开始解决。工厂不再担心开工不足，就业也不再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整个美国的工业实际上已向“兵工厂”过渡。罗斯福及其政府的注意力已由国内问题转到国际事务上去了。后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新政大夫”用特别的药方来医治内部的严重无秩序的失调状态。当它复原以后，病人遭到一次很糟糕

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礁石均为地名，前者在弗吉尼亚州，是英格兰人在北美殖民地的第一个永久性新拓居地（1607年），也是新大陆第一个立法议会开会（1619年）的地点；后者在马萨诸塞州，是1620年英国清教徒在北美殖民地登陆的地点，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个新拓居地。

的意外事件——珍珠港事件，遭受很严重的打击，“新政大夫”对此就无能为力了。他不擅长于治腿、臂的毛病，他就请他的同伴来治，这是一名外科矫形大夫——“打胜战争大夫”。新政从此宣布“光荣退役”。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支援战争，打败法西斯已成为当务之急了。正是，孤立主义受猛攻，总统大棒不留情。为了有效地贯彻他的政策，白宫的班子重新进行了调整。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七章 白宫新班底

政策策略是生命，好事多磨费精神；
选拔干部尤重要，白宫班子重调整。

罗斯福连任第三届总统后，即对白宫班子重新进行了调整。原副总统加纳和民主党主席、邮电总局局长吉姆·法利，因反对总统的“激进政策”而离开了。原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担任副总统，国务卿一职继续由科德尔·赫尔担任，小亨利·摩根索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女士继续担任劳工部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两个重要职位则分别由对法西斯德国持强硬态度的共和党人史汀生和诺克斯担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斯福的战时内阁带有联合政府的性质。

在新政初期，有一次霍普金斯说：“如果你要在华盛顿取得成就，你不必浪费时间去巴结那些有好听头衔的人。去跟那儿的打杂人员交朋友吧。他们是真正的大人物。如果你要办的事跟某个部有关，你就集中精力往那个部的打杂人员身上下功夫。你得到了他的欢心，他就会指点你直接去找你需要找的人。要是他不喜欢你，他就会把你打发到另一个人那里去，那个人又要你去找另一个人，这样一直下去，直到把你弄得筋疲力尽，昏昏沉沉，终于忘记你起先要办的什么事。”

“打杂人员”是白宫参谋班子的代号。在战争年代，霍普金斯一直住在白宫，他已成为所有“打杂人员”中最高级的一位，代替了路易斯·豪曾经担任过的“参谋长”的位置。在总统与政府各部门，尤其是与陆军部之间，他有效地起着沟通作用。他也是总统与外国高级官员作正式接触的方便途径，一位英国外交官员把霍普金斯看作是罗斯福的私人外交部。

霍普金斯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缓冲国”那样的机能。有些带着一大堆问题来找罗斯福的官员，往往被他挡驾。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我要是想得出办法，就不让这一类毫无意义、微不足道的事去打扰总统！”正是这种作用，使罗斯福许多最忠实的朋友，也像他的最恶劣的敌人一样，都认为霍普金斯对他们是一个最头痛的威胁。霍普金斯对自己扮演这种不得人心的角色，似乎也不在意。在大战期间，他对罗斯福的忠诚是他得以继续呆下去的最大理由，他获得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的忠诚。

美国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曾这么写道：

“要是有一天罗斯福闷闷不乐，随后对他的朋友和心腹哈里·霍普金斯这样说：如果霍普金斯先生从华盛顿纪念碑顶上跳下去，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那么，到了指定的时刻，我们就会看到霍普金斯先生站在碑上，准备往下跳。至于拿不拿降落伞，那得看总统的意思了。”

“关于这一点，霍普金斯先生总是能领会的，因为他的专业就是理解、捉摸，估计和猜测——而且往往猜对了——罗斯福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个专业使他离开了单调刻板的社会救济工作，跻身于上层外交活动；在那里，他对事态的发展表现了一种令人折服的预见。更重要的是，历史将表明，他也是这些事态的塑造者之一。”

霍普金斯在白宫住了很长一个时期，他的住房在二楼的东南角，包括大

小两间寝室和一个盥洗间，大寝室里放着一张有四根帐柱的大双人床，小寝室起先是霍普金斯的秘书办公用的。整套房间有三扇长窗，朝着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馆和弗吉尼亚的丘陵，中间则是一片狭长的草坪。这里曾经作过亚伯拉罕·林肯的办公室，壁炉上面有一块匾，说明《解放宣言》就是在这里签署的。这里被认为是最好的客房，1939年英王乔治六世访问美国时即在这里下榻。

二楼每一角的房屋构造大致差不多。西南角上，大间是罗斯福夫人的起居室，小间是她的卧室。西北角上的一套是客房，放着原来是林肯寝室中使用的笨重的家具。东北角的一套也是客房。伊丽莎白王后在这里住过，因此室内特地挂了几幅维多利亚女王宫廷的美丽图片。大战期间，丘吉尔访问美国时，以此作为卧室。这对丘吉尔是方便的，因为正对面就是霍普金斯的房间，只隔着一个大厅。

三楼是最高一层，客房较多，主要是供总统儿孙们来度圣诞节，或其他家人来团聚时住的。白宫充满友好的气氛，那是住在那里的人共同创造的。总统顾问舍伍德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的几年，由于他的感召，那里普遍存在着一种无限忠诚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你可以亲身体会到这些感情的深厚，因为你也被当作自己人一样，受到亲如一家的接待。”

罗斯福每天的生活是从在床上用早餐开始的。这时他通常在睡衣外加一件蓝披风，上面有用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F·D·R组成的红色交织字母。他穿披风，是因为穿浴衣太困难；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冬天出门也不穿外套，只穿斗篷。这时值班传事官把早晨的公文、报纸和社交活动时间表送来。总统一边用早餐，一边批阅公文和看报，速度很快，但相当仔细，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很少有漏掉的。

等总统用完早餐，他的私人工作人员便来了，它通常包括埃德温·沃森将军、斯蒂芬·厄尔利、马文·麦金太尔、威廉·哈西特、罗森曼和霍普金斯，大家一起讨论当天的工作安排——约会和记者招待会等等。罗斯福的医师罗斯·H·麦金太尔海军将军，也在这时前来，仔细诊察他的身体有没有出现什么症状。早晨这段时间要做的事范围很广，但占的时间很短，因为所有办事的人对罗斯福了如指掌，罗斯福也充分信任他们，一切不必转弯抹角。他们可以揣摩到他的心情，以及这一天里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群参谋离开卧室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他们在嘀咕：“愿上帝保佑今天来找他帮忙的人吧！”

沃森将军是参谋班子中受人尊敬的人物，人们通常称他为“老爹”。沃森是个高个子、红脸皮、性情开朗的弗吉尼亚人。在他那种军人的粗犷作风与温和的个性后面，隐藏着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力，足以识破别人的各种伪装。从罗斯福开始执政的时候起，他就担任总统的军事助理。在通常情况下，他应该早被调往军队担任其他职务，但罗斯福少不了他，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是总统的左右手。

斯蒂芬·厄尔利，早在1912年就是罗斯福的亲密朋友。当他最后在1945年6月退休的时候，社鲁门总统授予他荣誉功勋勋章。厄尔利与沃森一样，是弗吉尼亚人，也无限忠于他的首脑，但除此而外，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厄尔利性子急躁，不耐烦外交手腕，他经常对总统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厄尔利原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因此能非常得体地调整总统与报界不时发生的龃龉。在这方面，他那无可置疑的坦率，是他最大的可贵之处。他严格约束自己，不打听白宫的机密；他不指望知道军事计划，也避免事先看到演说稿，

唯恐其中涉及要宣布某项重大政策。因此，他可以开诚布公地对那些经常恭候在他门口的记者说：“这件事，你们知道的与我一样多。”他完全理解，任何为罗斯福工作的人，都应避免参与新闻记者编造新闻或制作标语口号的活动。不过，当他有消息发表的时候，他懂得怎样“对待”它，使它作为头版消息的价值减少到最低限度。

马文·麦金太尔是另一个华盛顿记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海军部新闻处长，开始同罗斯福有了接触。

1932年，他作为新闻发布官随罗斯福周游全国，后来成为白宫负责接见工作的秘书。在罗斯福连任总统期间，麦金太尔因病未能继续这项繁忙的任务，才由沃森“老爹”接替，但麦金太尔依旧为总统办事，直至1943年去世为止。他的特殊功绩在于为白宫和国会作了桥梁，这两个机构虽然同在一个城市的同一条大街上，然而有时却似乎是处在不同的星球上。

罗斯·麦金太尔，大家只知道他是白宫的医生，而对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军医局长所取得的成就，却没有足够的认识。由于战时这项工作十分繁重，因此他不得不把白宫的大部分日常医疗事务，委托给他的助手，才能卓越的海军少校乔治·福克斯，这个人在海军是行伍出身，靠自己的努力升上去的。

除了这些秘书，总统还有许多行政助理。这些人都是无名英雄，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搜集材料，加以压缩，写成摘要，供总统参考。他们无权支配任何部、局的任何人”，而且明确规定不得在总统与政府任何其他官员之间进行干预。这些助理人员以“甘当无名英雄”著称，他们中的一个人，丹尼尔斯，在他的《波托马克河上的边境线》中，对他们的活动描写得最出色。白宫最重要的常任官员是执行书记鲁道夫·福斯特，他与他的助手们负责处理日常公文函件。福斯特早在麦金利当总统时就已进入白宫。对于他们来说，尽管一个总统来了又去，他们的工作却永远不会中断，每一个工作日，总有数十件以至数百件公文——法案、命令、委任状等——得按规定手续签署、记录和分发。有一件事被罗斯福认为是他一生中的光荣。这就是在1944年10月，当他出发去作竞选旅行的时候，福斯特破例到门口来送他并与总统热烈握手，祝他一切顺利。对此，罗斯福饱含感情地说：“所有这些年来，鲁道夫像这样违反他的性格，把我当作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对待一个总统那样与我讲话，这确实还是第一次。”

白宫工作班子的所有助理人员，实际只是总统的“私人”办事人员，不是政府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官员。可以说，在1939年以前，总统并没有自己真正的行政机构，在他与内阁官员之间，他不能通过任何人来行使权力。因此，政府的无数条线汇集到白宫时，不是通向总统的工作班子，而是通向总统本人。宪法没有在他与10位内阁阁员，以及数十名代理机构和使团首脑之间，提供任何“中间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向他报告工作，而且往往没有他的书面指示，便不愿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当一个部与另一个部发生冲突并由总统来着手解决的时候，他所依据的只能是争执当事人向他正式提出的汇报，然后经过调查弄清是非曲直，作出公正判断。

1939年9月8日，即欧洲战争爆发后，罗斯福颁布他的“全国有限紧急状态”宣言的那一天，他还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要对总统所属的行政机构进行改组，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局改为总统直属机构。预算局长直接受命于总统，他领导着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在全面执行总统的各项方针政策时，

只向总统一人负责。局长哈罗德·史密斯的职责，远远超出了财务工作的范围，他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向总统汇报政府各机构活动的进展，包括拟办的工作、实际开始的工作和工作的完成情况”。预算可以而且必须派遣代表，前往政府各部、美国各驻外使团和各个战场，为总统本人搜集准确的材料，使他知道，那些经费是怎样使用的，谁用的，使用后的结果如何。因此，该局确实是总统的私人情报机关，或者如某些心怀不满的官员所说，是“他自己的私人盖世太保”。

哈罗德·史密斯曾经说过：“预算局划归总统府之前，在我的思想中，往往认为总统府只是一幢庄严堂皇的美国初期的官邸，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最有力的人物，便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庄严堂皇的官邸旁边，有一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这就是行政办事机构，是那位最有力的人物唯一可资运用的工作间。在预算局划归总统府之后，我们至少使它有了一个新翅膀，这翅膀有现代化的装备，也有胜任一部分工作的班子。”在史密斯的比喻中，庄严堂皇的官邸是表示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而那所“老房子”则是表示，这权力的行使总是受到国会的限制，因为国会一直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罗斯福改组政府的提议遭到反对，被指责为意在实行“独裁制”。这与当年反对批准宪法的人所发出的叫嚣，几乎如出一辙。舍伍德说，唯一不同的只是那时使用的恐吓话是“君主专制”而已。

史密斯和霍普金斯成了战时总统的左右臂。所不同的是，史密斯锱铢必较，负责协助总统管理财政经济，以及战时物资的调配和使用；霍普金斯则是总统政策的总顾问，或是白宫的不管部长；但他与在政府工作中对某一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的任何官员不影同，他可以超然于这些官员所受到的特殊利益偏见的响之外。霍普金斯在没有任何法定地位的情况下，尽可能完成他的任务。难怪有人俏皮地说：“美国政府中的第二号重要人物，在世界最大一次战争的最紧要时刻，却没有一个合法的正式职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桌，而只是在卧室中有一张牌桌，这实在是咄咄怪事；但他的卧室终究还是在白宫里边呢。”

霍普金斯为人谨慎，善于思考，但他从不擅自提出政策，他十分了解、也十分尊重他的首长，因此没有奢望要成为出谋划策的人。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充当“共鸣板”，为实现总统本人规定的目标，商讨最好的方法。罗斯福喜欢边想边说，他最大的困难是要物色一位既有了解能力又完全可靠的人来听他讲。这人便是霍普金斯。

每逢罗斯福要发表重要演说之前，总要把霍普金斯、罗森曼和舍伍德叫在一起进行研究讨论。花在这些演说上的劳动是惊人的，因为罗斯福凭他敏锐的历史观念，知道所有这些话都将构成他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的一部分，同时对他的最后评价也将取决于他所说和他所做的是否一致。因此，他对自己的公开讲话极端重视，准备工作也十分谨慎。据参谋班子的人说，重要的演说有时需要一个星期，或一个星期以上的辛勤劳动，而且在紧张的工作开始以前，还要花相当多的时间进行酝酿。罗斯福不只依靠他的顾问为他搜集材料，他自己也有专用的“演说文件库”，包括总统收集的剪报，剪报上有他作的记号，表示有些意见是他赞成的，有些是他反对的，他觉得后者不应该出现在报纸上。此外，还有各种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写来的各种信件，这对罗斯福应该讲什么是有启发作用的。还有他口授的各种零星记录，这是他在前几天或前几周中临时想到的一些意见，供日后作参考用的。所有这些材

料经过挑选后，在剪刀和浆糊的帮助下插入新纪录的材料中，再加上一些句子，使之前后衔接，这样便构成了一篇大体上连贯的演说初稿。这一般总比预定的篇幅长两三倍。当顾问们请总统审阅时，罗斯福马上翻到最后一页，看一下页码便说，至少得砍三分之二。然后他才一页一页地往下看。他常常停下来向“秀才们”口授“插入A段”，“插入C段”等等。每逢他要秘书们记录他的话时，便说：“格雷斯！把法令记下来！”这句话出自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歌剧《我宁可办事正确》，著名演员乔治·科汉曾在剧中扮演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出戏对当时反对罗斯福的国会议员和其他政界头面人物，作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挖苦。

罗斯福对文字要求十分严格，字斟句酌。他研究每一句话的含意，对全国各色各样的人，对他的朋友、敌人和中立分子所产生的效果。他十分注意标点符号，这倒不是看它们是否用得正确，而是看它们是否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他的朗读。格雷斯·塔利喜欢使用大量的逗号，总统却喜欢把它们划掉。他有一次对这位女秘书说：“格雷斯！请你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逗号，这还要我告诉你多少次呢？”在演说定稿时，每个字都得计算清楚，罗斯福最后得决定，他能把多少字压进30分钟里。他有很准确的时间观念。他的正常标准是每分钟100个字，但有时他会说：“在这篇演说中，有几段我可以讲得快一些，因此我总共可讲3150个字。”

罗斯福不仅有着纯熟的讲演艺术，而且使用文字十分准确。虽然在非正式谈话中纵谈天南地北，妙趣横生，但他知道，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他是美国的声音。在珍珠港事件前后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里，他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希望。丘吉尔发出的是不可征服的战士的豪言壮语，而罗斯福发出的则是反击的声音，解放的声音，是对人的尊严的保证。他的风趣，他的勇气，他的信心，使那些担心不再存有希望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罗斯福对他的演说，仿佛满不在乎，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知道，每当他站在麦克风跟前的时候，他讲的话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正如桑德伯格所说的，罗斯福的话“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正是：一字值千金，句句得费神。欲知他的顾问霍普金斯如何发挥作用，且看下章分解。

罗斯福在这里用的是双关语。在数字上每隔3位一般得用一个逗号分开，逗号越多，数字越大，金额也越高。此外，书面上的逗号，在口语中就是一种停顿，逗号多，停顿的时间也多，这就意味着要浪费听众更多的时间。

第十八章 总统特使

总统外交开新风，白宫特使穿梭行；
若问外交新功力，霍普金斯第一名。

圣诞节前后，罗斯福一直在琢磨丘吉尔来信中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关于爱尔兰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以及美国在德瓦莱拉总理谈判中可能起的作用。罗斯福虽然已经下了援助英国抗战的决心，但至今他对那里的舆情、民气和领导集团的态度，还不大摸底。一天晚餐后，他对顾问霍普金斯说：“倘若我和丘吉尔能坐在一起谈谈，这方面的好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什么东西阻止你呢？”霍普金斯问道。

“咳，此事还不能马上商妥，双方还没有大使相互传递信息。”

“总统先生，我到那儿走一趟怎么样？”霍普金斯锐利的目光闪耀出强烈冒险的表情。

总统完全拒绝了这个建议。他指出他眼前有许多工作要办，如国情咨文，庞大的预算，第三任就职演说，以及关于进一步修改中立法的斗争。

“在那场搏斗中，我对你不会起什么作用吧，”霍普金斯说。“他们决不会注意我的意见，除非投我的反对票。可是，假如我去英国一趟，亲眼观察一下，那么，也许会有所裨益。”

但是，罗斯福仍然不愿意听取这样的建议。谁知元旦过后，霍普金斯突然接到史蒂夫·厄尔利从西翼打来的电话。

“哈里，祝贺你的行程！”

“什么行程？”霍普金斯猜测，无疑是罗斯福本人心血来潮所搞的某种不适宜时宜的玩笑罢了。

“你的英国之行，”厄尔利说，“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宣布过。”

两天之后，霍普金斯动身了。原来，罗斯福告诉报界，霍普金斯是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的，行程甚短，大约两三周时间，只是为了保持我和英国政府的私人关系。”

接着敏感的记者们就提出了一些问题。

记者：总统先生，霍普金斯先生负有任何特殊使命吗？

总统：没有，没有任何特殊使命！

记者：有什么头衔吗？

总统：没有，没有任何头衔！

记者：将有人陪同霍普金斯先生吗？

总统：没有人作陪。他也没有任何权限。

记者：他将要执行什么使命？

总统：没有，没有什么刺激性的东西给你们（笑声）。他只是到那里对我的许多朋友说声“你好！”如此而已（笑声）！

霍普金斯动身之前，接到一封由总统签名的授权公函：

基于对你的特别信赖，我打算请你方便之际，尽速前往大不列颠一趟，到那里作为我的私人代表。我也请你本着同样的精神，给英王陛下乔治六世传达信息。

你在执行你可能认为最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的使命过程中，当然应把引起你注意的任何问题向本政府报告。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出色地完成使命。

你最诚挚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签名）

随函附上一封总统给英王乔治六世的信。信中说：“我选派尊敬的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大不列颠执行一项特别使命。霍普金斯先生是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对此人寄以最大的信赖。我请他向你及王后陛下转达我的亲切问候以及我关于他的使命会促进我们两国共同的理想的诚挚希望。”

霍普金斯是英国的老朋友，英国人尤其是丘吉尔喜欢他那不修边幅的仪容，洒脱从容的风度，以及对他们的问题敏锐而富有同情的理解。霍普金斯对执行总统特使的使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认为通过直接和政府首脑的接触，可以消除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久已存在的症结和误会。

霍普金斯启程不久，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就给总统打来电话，说他想到英国去考察，以便为他的援助英国的运动搜寻更多的弹药。

“好啊，请来这里谈吧。”罗斯福说。显然他是热诚地赞同他这样做的。威尔基的新闻价值要比霍普金斯大得多；而且随着租借法案辩论的开始，这种两党外交政策的巩固的迹象就显得特别重要。

高大结实、头发蓬松的威尔基在总统办公室内，和罗斯福面对面坐在一堆堆文件的办公桌两边。当年他为了联邦南方公司和其他被遗忘的小投资者与总统交锋时，也曾在这里这样坐过。威尔基没精打采地坐到那张显得太小、容纳不了他那魁梧躯体的扶手椅里，很像一个比赛后的拳击师。他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带着挑战的神情向前直视。

“温德尔，”总统说，“我认为你的主意很好。”

“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总统先生，”威尔基说，“我很想去。”

“你不但应该去，”罗斯福说，“而且我要你在那里当我的代表——某种意义上的代表。”

威尔基虽然感到震惊，但他控制了自己，几乎丝毫未动声色，只是他的目光变得警惕起来。

“你在那里已经有了很好的代表嘛，”他说，“怀南特和霍普金斯都在那里。”

“是这样，”罗斯福表示同意，“但是共和党却没有。英国人认为美国人不团结——孤立主义者虽然人数越来越少，闹得倒比以往更凶了。我想把这种印象扭转一下。你是共和党的首脑，也可以说是与英王陛下相对立的反对派领袖。如果你去代表我行事，就可以使英国人相信美国在提供援助方面是团结一致的。”

“我明白了，”威尔基说。他仰靠到椅背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你知道吗？我为你去出差，可不会给自己和共和党带来任何好处。”他补充说。总统眼里闪烁着疑惑的目光，他的烟嘴向上翘得直竖起来了。

“但是，你这样做，国家对公众事业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你愿意接受吗，温德尔？”

威尔基的脚砰的一下踩到地板上，“当然愿意啦，”他说，“只是对我的言行不要有任何限制。”

“毫无限制，”罗斯福表示同意，“你看，我是信任你的。”

“谢谢你，总统先生，”威尔基讥讽地说。接着两人都笑了。

“那就这样决定了。”罗斯福说，“我们得想个办法，使你的访问带有半官方的性质。我打算让你带一封信给丘吉尔。”

“我可以知道信的内容吗？”威尔基问道。

“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总统说。

他抽出一张信纸，急速地写起来。并且不假思索地引用朗费罗的诗句，给英国首相传递了重要信息。然后隔着桌子递给威尔基。

“大声念一下。”他说。

威尔基开始念了，接着他放下信纸，根据记忆背诵起来。房间里回荡着他嘶哑的声音，充满了奔放的激情。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患中的人类，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未来希望，寄托在你的命运之上！”

他读完后，两眼直视总统。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但这一次不是作为政敌，而是在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的两个美国政党领导人。

威尔基到达英国后，发现丘吉尔对罗斯福相当不信任。首相是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罗斯福的自由倾向使他害怕。威尔基感到自己的处境很奇特，因为他在替自己的伟大政敌游说。但是，他干得很出色，丘吉尔为罗斯福的信深深感动，正是从此时此地开始，首相逐渐转变了对美国总统的看法。威尔基在英国虽然说了一些过头话，但他对鼓舞英国人民抗战，起了一定的影响。

再说霍普金斯，他在旅途中跋涉了五天，才从里斯本到达英格兰南海岸的普尔。丘吉尔接到通知后，特派他的挚友布伦丹·布雷肯作为首相私人代表前去迎接。可是乘客都下机了还没有见到霍普金斯。于是，布雷肯登上飞机，才发现这位总统特使仍然在机舱里坐着，好像生了病，愁眉苦脸，累得连身上的安全带都解不开了。他不得不休息好长一段时间，才感觉恢复过来，然后乘火车前往伦敦。接着他又开始活跃起来。他兴致勃勃地注视南部沿岸经过轰炸所遭受的破坏。他正像在当时凄凉的日子里到过英国的其他美国人一样，觉得是来到了月球的另一面。当火车经过乡间时，那里似乎跟往常一样平静，没有受到战争影响，霍普金斯对布雷肯说：“你打算让希特勒抢走这些田地吗？”这就是他对英国的意向所提出的头一个主要问题。布雷肯带着权威而又不寻常的简洁语气回答说：“不”。他表示了英国人坚决抗战的决心和勇气。这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霍普金斯来到美国大使馆同代办赫谢尔·约翰逊进行了深谈，他发现这位美国外交官对形势抱有极为悲观的态度。他接到国内发来的所有正式文件，差不多都是连篇累牍地告诫要严格遵守中立法，不说或不做任何可能招致孤立主义者对国务院批评的事。约翰逊已经亲身经历了几乎六个月的剧烈的闪电战，在格罗夫纳广场及其周围遭到轰炸时，他又何止一次死里逃生。他已经开始有了某种灰心丧气与无法可想的感觉。霍普金斯的到来，又给他重新燃起了工作的激情。他认为美国政府对英国的抗战应当给予坚决的支持，他并向总统特使提供了有关英国局势的大量情况。

在访问伦敦初期，霍普金斯想见而且见到的另一位美国人，就是哥伦比亚广播网的爱德华·默罗。战争爆发时，霍普金斯已卧病梅奥医院，以为不久就要与世长辞了，那时他从无线电中不断听到默罗坚定的声音：“——这

是伦敦。”他的语调似乎叫人想到德国炸弹的砰击声，给人一种亲临现场的勇于战斗的气氛。当默罗应邀到克拉里奇斯饭店去会见霍普金斯时，他以为是得到了一次采访的机会。的确是一次采访，不过被访问的正是他默罗本人。霍普金斯不断地向他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涉及各种人物和民气。至于他自己的使命，霍普金斯告诉这位记者的全部内容不外是：“我想，你可以说，我来此地是为了设法充当两位主要歌星之间的拉线人。”但这句话不准引用。霍普金斯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个极端自负的人物注定要冲突，为未雨绸缪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丘吉尔本人以及他午夜之后所接见的那些人物。”默罗根据他在战时的实地观察，向他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情况。

丘吉尔获悉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忠心，也知道他可能怀疑有人也许胆敢对罗斯福在世界政治家中的杰出地位进行挑战。在霍普金斯到达的那一天，首相在招待英国即将赴任的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午餐会上发表了讲话。这番讲话与其说是让英国人听的，还不如说是让霍普金斯听的。他说：

“正当国际事务发展到令人最为惶恐的时刻，幸而有一位通晓政府和行政工作而又具有长期经验的著名政治家，成为那个美洲的共和国的首脑。他的内心深处燃烧着抵抗侵略和压迫的怒火，他的同情心和性格使得他成为正义与自由，成为任何地方不法行为的受害者的正直而又毋庸置疑的维护者。我把这一切都作为幸运的事情而加以欢呼。

“而且我同样——我现在可以这样说，因为美国党派的竞争业已过去——为之高兴的是，这位杰出的人物新近获得了第三次当选，从而享有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领导那个美洲民主国家的空前的荣誉。”

在访问英国首相之前，霍普金斯首先拜访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这位出身于伦敦贵族区梅费尔的年轻绅士，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和胆略，战前他甘冒葬送自己政治前途的危险，坚决拒绝同张伯伦的姑息政策妥协。经过交谈，霍普金斯对这位大臣的抗战决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在写给罗斯福的访英第一次报告中说：艾登认为希特勒想在英国“试”一下，然而绝不会成功，英国人将坚决抵抗到底。如今“英国在埃及的陆军正在沙漠上成功地使用一些巨型坦克”。

会见艾登之后，霍普金斯又在约翰逊的陪同下去见即将赴任的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然后回到克拉里奇斯饭店，本想整洁一下服装，但也没有如愿，接着就驱车经过伯克利广场和特拉法加广场，前往唐宁街参加盛会。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同丘吉尔首相会见的情况；他说：

“唐宁街十号有点褴褛的样子，因为隔壁的财政部被炸得不轻。不再允许首相睡在此地。据我知道他是在马路对面的一个地方过夜。所有的人都告诉过我，他每天工作达15个小时之久，我完全相信这种说法。他的忠仆——布伦丹·布雷肯带我观看这幢两百年来一直用作帝国首府古老而又可爱的房屋。大部分窗户损坏殆尽，工人到处在进行修补。丘吉尔告诉我，这房屋经不起一颗重型炸弹。”

“我告诉首相，总统迫切地想在4月份会见他。他将随带少数工作人员乘巡洋舰出发，不拘议程地在约定地点同总统会面，有空就讨论我们的问题。他非常渴望同总统面对面晤谈。”

“我告诉他某些方面的人士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丘吉尔不喜欢美国、美

国人或罗斯福。他一听就对肯尼迪大使作了一番厉害的但颇为克制的攻击，因为他认为，肯尼迪大使要对这个印象的由来负责任。他极力否认此事，派人叫一位秘书取一份电报给我看，它就是在总统当选之后立刻发出的。他在电报中对总统再度当选表示十分高兴。”

“我谈到我的使命，他好像很高兴，多次向我保证，他将向我提供一切有用的详细情报和意见，希望我对英国所需要的东西的确切情况，以及英国要赢得这场战争所需要的那些援助物资的迫切程度，完全弄清楚之后，才离开英国。”

“首相显然自豪地回顾了到目前为止他自己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他不晓得英国在法国陷落之后能否经得起疯狂的袭击，但是他感觉英国一定经得起——英国真地顶住了——而且还将顶住下一次的疯狂袭击。他认为不会有德国人的入侵。即使他们用 10 万人在英国找到一个据点的话，‘我们也将把他们赶出去’”。

“丘吉尔认为意大利在非洲肯定无疑会遭到失败，这可以部分地挽回希腊这次的崩溃。他认为英国能够对意大利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英国将控制住地中海和苏伊士，以防德国的进攻。……他认为希特勒现在虽然强横，但他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他所控制的地方居住着的尽是垂头丧气和绝望的人民。”

第二天是星期六，霍普金斯随丘吉尔一同到迪奇利度周末。霍普金斯在迪奇利逗留的两天中，唯一的消息就是德国俯冲轰炸机首次在地中海出现，他们袭击英国海军舰只，造成严重损失。霍普金斯看到丘吉尔及其参谋人员镇静自若，大为惊异。由于没有直接的实际战争经验，他听到舰只被击沉，英国水兵遭到杀戮和受到伤残这种赤裸裸的消息，感到万分震惊。然而他又无可奈何地看到，在这种残酷的事情中作出重大决策的那些人，却腾不出时间去哀悼或忏悔。这里的原由，从丘吉尔这个丝毫不顾个人安危的领导人身上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了。“斯图卡”式轰炸机在地中海出现的重要意义，在当时是不明显的。德国的记载最后证明，希特勒就是选择这个周末要去占领直布罗陀的。

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在处理内务上截然不同的作风，给霍普金斯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尽管罗斯福周围可能闹得翻天覆地，然而在他的近旁，这种喧闹很少听得见，那里平静占上风。可是，丘吉尔好像总是身处发岌可危的滩头堡的指挥岗位上，在他谈话中，四周仍然炮声隆隆；他到哪里，哪里就是战场。他不仅专心研究当前战争的多次战役，而且也注意从卡尼到加利波利历史上所有的战役。

这两位领导人的生活习惯也完全不同。罗斯福只有遇到珍珠港事变，全国竞选，或打扑克打得十分起劲时，才会熬到深更半夜；而丘吉尔大约要到夜间 10 点以后才开始全力以赴地工作，他的筋疲力尽的参谋人员熬到凌晨两三点，好容易才上床，常常不到一个多小时又被叫醒。他交下一个崭新方案，叫他们必须立即拟出一份计划来。就丘吉尔的工作量来说，确是一位超人。他的几个主要助手陆军将军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林德曼教授、汤普森海军中校和布雷肯都被他搞得筋疲力尽，而他们只有努力发掘潜力，才能在工作方面跟上他。

星期日凌晨两点，霍普金斯和丘吉尔在一起。首相接到消息说，“索斯安普敦”号被击沉，新航空母舰“灿烂”号遭到严重损坏，另一艘巡洋舰遭

到打击。可是丘吉尔从没有半点犹豫或是表现出一点点沮丧的样子。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一边把他的进攻和防卫计划告诉霍普金斯，一直到4点钟才停止。他对这位总统特使表示，局势虽然险恶，但英国人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后来，霍普金斯乘丘吉尔的专车同丘吉尔一起前往苏格兰，他向哈利法克斯勋爵告别，并祝他一路平安。霍普金斯在以后的四年中与哈利法克斯建立了密切而又诚挚的关系。哈利法克斯一抵达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附近的海面，罗斯福总统就根据霍普金斯的通报亲自乘船出海迎接这位大使，表示美国政府对英国斗争事业的坚决支持，从而进一步增进了美英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密切合作。

在离开苏格兰的回程中，丘吉尔在各地停留时，总要跟霍普金斯在一起，总要不辞辛苦他说明这位样子古怪、头发蓬乱的人物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有意地想依靠他来提高本国人民的士气。首相在格拉斯哥对防空人员作了一次大检阅。他们是一排排地列队站着，丘吉尔要霍普金斯和他一道步行巡视全场，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介绍给大家。那天晚上，丘吉尔和霍普金斯出席格拉斯哥市长举行的宴会，丘吉尔讲了话，雅致地提到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以及“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政体”。霍普金斯应邀作了即席讲话，他引用《旧约全书》中的《路得记》里的话：“不管你往何方，我一定要去……即使天涯海角。”这篇讲话传遍整个英国，其影响远远超过霍普金斯所敢希望的程度：人们把这篇讲话看作是“美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保证。公众认为，霍普金斯在这个时候暖人心坎的同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坚强信念，对英国来说，是提供了比先前已送去的驱逐舰、枪炮和弹药等都还更有实在内容的援助。

在这次旅途中霍普金斯注意到，丘吉尔在英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实实在在都想碰一碰他外衣的边缘。以示爱戴。战前30年内，他一直是大不列颠群岛的著名人物，可是直到他们处于垂危时刻，才把英王的首相职务委托给他。总之，这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刻”，丘吉尔是他们公认的领袖和发言人，也是他们作为自由民族，决心要生存下去的活生生的象征。正如霍普金斯所看到的那样，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两个人性格迥异，但是他们都具有激起人民的忠诚、热忱、献身精神的高超本领。

霍普金斯一回到伦敦，就拜访了新闻出版大王兼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这位大臣不仅掌握着英国的飞机生产大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操纵着英国的舆论。关于这位显赫人物，丘吉尔曾对他作过这样的介绍：“人家曾把飞机生产大臣描绘为‘老牌海上袭击者’，这是形容海盗的一种委婉手法。我看他是一位具有绝对超等才华的人物。局势最糟糕的时候，正是他干得最出色的时候。”经过多方面的观察和了解，霍普金斯认为，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都是综观大英帝国全局的最优秀的爱国者，都是不知疲倦、不知险阻的顽强人物。会见之后，比弗布鲁克在克拉里奇斯饭店举行宴会招待霍普金斯，应邀的有比弗布鲁克的同僚和伦敦报界的竞争对手。这是比弗布鲁克在战时举行的最隆重的一次集会。出席的报界人士中，不仅有编辑和最主要的作家，而且还有老板和经理，不仅有伦敦报界人士，而且还有地方报界的代表。这是霍普金斯访英期间富有意义的一次同舆论界的聚会。一位出席宴会的编辑记下了当时的经过：

“在一连串的长夜里，我们在伦敦受尽了炸弹和烧夷弹的折磨，报纸的

发行感到极端困难，我们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可是在第一轮的闪电战达到高峰的那个仲冬晚上，我们又成了高度好奇的人——这是一个记者不论处在什么环境或气候里感到最愉快而又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当我们驱车小心地在灯火管制中向克拉里奇斯饭店前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知道霍普金斯将会给我们说些什么。”

霍普金斯自1月9日在高射炮声中抵达伦敦以来，在公众场合谈得很少，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仅是“滑稽地笑笑”。而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才说，这次到英国来是要“讨论我们两国彼此有益的事情。”不过，为了报答一位特别坚决的提问者的热情，他确曾回答说：“是的，我想你们可以说是紧急问题。”

宴会开始后，东道主比弗布鲁克微笑着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说，连日来，霍普金斯一直跟政府的成员交谈。不过今晚是个更重要的场合，因为出席聚会的这些人都是“左右政府的人士”——英国报界的领袖们。于是他邀请霍普金斯给大家讲话。

霍普金斯站起来，抓住椅背，形容消瘦，腴腆而又懒散。这位总统特使，首先向报界讲述了罗斯福及其周围那些人是怎样确信美国只有与英国合作，才能成功地履行对世界的职责。他说，白宫怀着焦急而又钦佩的心情，注视着英国单独作战的每一个阶段；也吐露了自己在巡视英国受到闪电战袭击的国土时的一些感受。他的讲话给报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美国至今虽然还没有参战，然而正在和英国并肩前进；万一大下列颠绊了一脚，美国会拉朋友一把，不使它跌倒。最重要的是，他使报界相信，罗斯福和他周围的那些人，对英国，对整个反法西斯事业，充满信心。霍普金斯除了对与会全体谈话之外，还在比弗布鲁克鼓励之下，慢慢地绕桌一周，向大家致意，并顺手拖张椅子，在各报编辑和经理旁边坐下，逐一同他们私下交谈。他对各家报纸不同的方针和问题了如指掌，使他们左中右三方面都感到满意。

出席聚会的一家报纸的编辑，记述了他的英国报界同仁同白宫这位特使会见的感受：“在我们的祷告灵验之前，在我们的努力得到报偿之前，我们国家的历史还要增添很多悲惨而又恐怖的篇章。”这位编辑继续写道：“我们这些一直在聆听这位白宫人物讲话的英国新闻记者们，没有一个人对于包围我们岛屿的这场危险存在任何幻想。不过，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愉快：我们的信心与勇气，经过这番接触之后，得到了增强。可以用莎士比亚在他《亨利第五》这部作品的一句话来形容这种接触：‘夜间稍许体会到了哈里的为人’。”

几天之后，霍普金斯通过电报向罗斯福提出全面报告。这20多天来，他和丘吉尔一起度过了12个夜晚，并同朝野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讨论，其中有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第一海务大臣庞得海军上将，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爵士，以及战斗机和轰炸机司令部的长官们。霍普金斯还参观过斯卡佛洛、多佛沿岸防御工事以及一些城镇和机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参观访问，他获得了有关英国防务的“清晰的感性认识”，而且对指挥国家战斗的核心人物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特使在电报中写道：“你的‘前海军人员’，现在不仅是首相，而且也是战略方面以及作战中一切带有根本性问题上的指挥者。”

他令人惊异地控制着英国各阶层人士和各派别集团。他对军事机构和劳动人民都有特别的影响。据我观察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印象，就是内阁大

多数成员和这里的所有军事要员都认为入侵逼在眼前。他们正在夜以继日竭尽全力对付这场入侵。”“这个民族的士气和他们抵抗入侵的决心是无与伦比的。不管这次进攻怎么凶猛，你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抵抗而且会有效地顶住。德国人光靠在这里屠杀数十万人是不能征服英国的。”接着，霍普金斯在电报里说明英国的特殊需要，并提出满足这些需要的建议。特使开列了一个长达 14 页的军援货单。霍普金斯的英国之行，增进了美英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对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月 9 日，星期日，就在霍普金斯离开英国的前夕，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广播演说。他说道：“似乎现在可以肯定，美国政府和人民打算给我们提供夺取胜利所必须的一切。上次战争美国派遣 200 万士兵远渡大西洋而来。这次……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利坚联邦到处成长中的军队”，“只要给我们武器，我们将会完成这项任务”。随后，丘吉尔又重申了发誓战斗到底的决心。

霍普金斯从伦敦回来之后，立即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他的英国之行。他对英国抗战形势的前景，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霍普金斯认为，从目前看，希特勒似乎不可一世，他可供调动的部队数量过于庞大，以致无法立刻加以堵截。但他深信，正像火山熔岩一样，随着它们弥漫而远离火山口时，就会冷却放慢下来。与其说这种“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个巨人的影响。他说：“谁只要同他们两人中任何一个长久相处，便不可能看不见他们两人心中如此炽烈、如此稳定地燃烧着信心之火的光，不可能感觉不到它的热。”事后证明，形势的发展，正像霍普金斯所预见的那样：孤立罗网被冲破，想方设法去救火。欲知罗斯福如何对英国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援助，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九章 “租借法案”

租借法案办法鲜，水龙救火作军援；
甘当抗敌军火库，只求务实不宣传。

从罗斯福当选第三届总统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为止的这一年内，美国的中立已经名存实亡，美国处于愈陷愈深的非交战状态。

罗斯福不只一次他说过，“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巨大军火库。对我们来说，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情况。我们必须以我们将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和献身精神，致力于完成我们的任务。”

“租借法案”一事就在实际上表达了罗斯福的这种信念，大选之后，他登上“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动身前往加勒比海度假。12月9日，海军的一架水上飞机在这艘巡洋舰旁降落，带来了丘吉尔的一封紧急信。这位首相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写的最重要的书信之一。他在信中透露，英国的财政资源眼看就要枯竭。丘吉尔声称：“我们不能再用现款支付运费和购买其他供给品的时刻即将到来。”根据美国中立法和其他立法的条款，交战国必须用现款购买武器，并且不准向没有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而英国用于现购自运的基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首相未便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要求，然而他紧急请求美国拨出几千架飞机、几百万吨船只。他请求美国作出史无前例的努力。丘吉尔说，毋需美国出一兵一卒，“只要给我们武器，我们会做好这件事。”

丘吉尔在这封4000多字的长信里，还谈到了从北海到直布罗陀，到苏伊士，到新加坡的战争的总形势以及具体的细节。他详细讲到生产和运输这两方面的火急问题，说明德国轰炸机和潜艇的不断袭击给英国本上和地中海地区所造成的严重危险。首相在这篇难忘的文件的结尾表示相信，国会支持英国事业，会满足他的迫切需要，但是关于总统究竟怎样设法去同国会和人民一道来完成这一切，他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首相这封信给罗斯福以深刻影响。英国的形势的确是严峻的。

11月中旬，在不列颠之战中遭到败北的德国空军，对考文垂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造成1000多人的死伤，令人惊骇地显示了它的力量。这种饱和式轰炸，从英国一个城镇扩大到两个城镇，柏林的宣传员吹嘘说，要有计划地把全岛加以“考文垂化”。同时，敌人以非常凶猛的方式，对伦敦继续进行闪电战袭击。再加上希腊、北非战局吃紧，这的确对丘吉尔增加了难以估量的压力。

在罗斯福收到丘吉尔那封信的第三天，他又接到国务卿赫尔的一封电报，告诉他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去世的消息。罗斯福立即通过国务院给英王乔治六世发出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听到老朋友去世的消息极为震惊，罗斯福确信洛西恩勋爵临死前希望向全世界发表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次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这决不是马马虎虎地表达例行哀悼。总统认为洛西恩勋爵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大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自由党党员，并且是劳埃德·乔治的密友；对于罗斯福的语言可以说深有体会，因此能把罗斯福的意图解释给丘吉尔听。他一直能够理解充塞在罗斯福前进道路上的国内五花八门的障碍，因此能以小心谨慎地避免提出过分过急的要求，免得给总统

增加困难。他在这个异常的时刻逝世，是一种重大的损失，因为看来几乎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第二天在回国途中，罗斯福闷闷不乐，一直在苦思如何解决对外援助的法律程序问题。人们只能说，罗斯福这位在政治上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在这次航行之中花了一些时间，去形成他杰作的格局，一旦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看清它的轮廓时，他就要所有的人理解得既快又透彻。

12月16日，罗斯福回到华盛顿。他皮肤晒得泛黑，精力充沛而又洋洋得意。第二天罗斯福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无可置疑，在压倒多数的美国人的脑海里都认为，保卫美国的最好的直接办法就是英国能够保卫其本身。”然后，他突然离开这个话题，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情景。他说：“历史上还没有一次重要战争是因缺钱而被打败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给英国贷款以便购买美国物资，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干脆把物资全部赠送出去。”罗斯福把这种想法描绘为“陈词滥调”。实际上真正提出这两种建议的人为数极少，不论哪一种，在国会里都没有被采纳的希望，可是罗斯福却把这两种建议都提到了，以说明他真正是一个怎样通情达理的走中间道路的人。

他说：“现在我正想要做的就是取消美元的标记。这在在座的各位心目中是一件崭新的东西。我认为——要把这无聊的、荒谬的以及老牌的美元标记取消。”

在这之前，罗斯福早就非正式地向他的顾问们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什么不对英国需要的物资和装备实行出租或出借呢？他用一个朴素的比喻透露了租借法的大概轮廓。他说：“假如我的邻居夫人，在四五百英尺以外，我有一截浇园的水龙带，要是让邻居拿去接上水龙头，我就可能帮他把火灭掉。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在救火之前就对他说，‘朋友，这条管子我花了15元，你得照价付钱。’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要15元，我要他在灭火之后还我水龙带；要是火灭了，水龙带还是好好的，没有损坏，那他就会连声道谢，原物奉还。但是，假设它被弄坏了——搞了些窟窿；我们也不必讲客套，就对他说‘我很高兴地借给你这水龙带，现在它被弄坏了，不能再用。’他说：‘一共多少英尺？’我告诉他：‘150英尺。’他说，‘好，我照赔无误。’现在如果我拿回来的是一条可用的浇园水管，我就不吃亏。”接着罗斯福言归正传：“换句话说，如果你借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在战后得到归还，如果军火完好如初，没有损坏，你就不吃亏；如果它们损坏了，或者陈旧了，或者干脆丢失了，只要借的人认赔，在我看来，你就没有吃亏。”这一番浅显易懂的话，却使四座皆惊，支持罗斯福的人听后击节赞赏，认为是个高招；孤立派则目瞪口呆，满腹狐疑。曾经表示要与孤立主义告别而实际上还紧紧拥抱着孤立主义舍不得松手的范登堡嘟嘟囔囔地说：“出借武器就像借出口香糖一样，你就甭想再收回来！”

记者招待会之后，为说明战争局势的严重性，罗斯福决定通过广播发表炉边谈话。他在这次讲话中，一反常态，对鼓吹姑息的人痛骂一番，对纳粹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他说：“我们不能用缩进被窝、蒙头大睡的办法去回避危险或对危险的害怕。任何想通过谈判来取得和平的尝试都是极其愚蠢的。”

“一个国家要想同纳粹和平相处，只能以全面投降作为代价。”罗斯福进一步指出，“这种受人支配的和平，决不是什么和平。它只能是又一次休

战，会导致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军备竞赛，最富有破坏性的贸易战争。”“我们南北美洲各国所有的人，可能就要在纳粹的枪杆子威胁下过日子——这支枪装着爆炸性子弹，不但是军事方面的子弹，而且还有经济方面的子弹。”

这就是罗斯福深刻的信念。这就是他制定的全部战时政策中的精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精髓。但是，当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里，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英国还是向纳粹投降的好，中国还是向日本投降的好。

1941年1月6日，在对这项建议进行最后润色的时候，总统出席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罗斯福说，美国不会由于轴心国叫喊我们向盟国提供援助，违反了国际法，是战争行动，而不敢提供援助。“提供援助并不是战争行动，即使独裁者单方面宣布它是战争行动也没有用，当那些独裁者准备向我们发动战争时，他们不会等待我们采取战争行动。他们没有等待挪威、比利时或者荷兰采取战争行动。”

罗斯福宣布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是：

第一，根据充分表达出来的公众意志，而不去考虑党派偏见，我们保证全面加强国防。

第二，根据充分表达出来的公众意志，而不去考虑党派偏见，我们保证全面支援抵抗侵略从而使战争保持在本半球之外的各地一切坚定的民族。通过这种支援，我们表达着我们务必要使民主事业取得优胜的决心；我们也要加强我们自己国家的防务和安全。

第三，根据充分表达出来的公众意志，而不去考虑党派偏见，我们保证贯彻这样的主张，即从道德原则和对我们自身安全的考虑，决不允许我们默然同意由侵略者颐指气使和由绥靖主义者发起的和平，我们知道，持久的和平是不能以别人的自由为代价买得来的。

在国情咨文中，总统还提请本届国会授权并拨给充分的款项，去制造更多的军火和多种军用物资，以供移交现在同侵略国家进行实际战斗的国家。

四天以后，罗斯福总统把决定实行的代号为“H·R·1776的租借法案”提交国会，标题是《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案》。就这项法案展开的辩论非常激烈，远远超出了国会的范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第一主义者”和主张援助盟国的保卫美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利用电台、广告、传单和报纸上的声明来制造声势。国会收到了成吨的信件，好斗分子还在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里静坐。双方都认识到，租借法案标志着一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局面；如果批准这项法案，那就意味着美国已经从一个慎重的中立国变成了一个活跃的非交战国。

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威尔基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露面，对这项法案表示支持。一些心怀敌意的参议员则援引他在竞选中对罗斯福的指责来回敬他。他反驳说：“我曾想竭尽全力击败富兰克林·罗斯福。我也曾设法不手软。结果他却当选了总统。现在他是我的总统了。”在座的人都为他鼓掌。林自上校是反对派的主要作证人。他说，英国的抗战毫无希望，美国应该用它的武器进行自卫。参议员惠勒把租借比作1933年毁坏农作物的做法。他宣称：“新政的三国联盟对外政策将毁掉1/4的美国青年。”尽管国会内孤立派用各种方式进行阻挠，国会外“美国第一委员会”这类组织大叫大嚷进行煽动性宣传，但是英国处境确是岌岌可危，西半球已难隔岸观火，罗斯福一

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在1776年颁布的。现在用“HR—1776”来称租借法案，以表示重视之意。

再警告，重洋已非美国的可靠屏障。总统的警告使美国人民得到深刻印象。民意测验表明，72%的人支持这个法案。

形势逼人，大势所趋。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租借法案。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将它签署为法律。欣喜若狂的丘吉尔为租借法欢呼，说“这是任何国家历史上最好的行为”，《租借法》不仅支持了英国抗德战争，而且在以后，还支持了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斯大林在1945年6月13日对《租借法》作了很高的评价：“根据这一协定，美国在整个欧战期间作为租借向苏联提供了武器、战略物资和粮食。这一协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大大促进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的战争顺利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向盟国提供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

罗斯福在取得《租借法》的重大胜利后，抓住时机，趁热打铁，保持前进的势头。3月30日，总统命令将停泊在美国港口的84艘德国及其附属国的船只予以没收。在5月15日通过相应法律时，民主党议员支持率达92%，共和党议员也有40%表示支持。

为了保证《租借法》的实施，为了确保运输物资送到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手里，罗斯福宣布采取海军护航措施。海军作战部长史塔生透露，在罗斯福作此宣布之前，美国海军已经在远达2000英里的海洋上游戈。华盛顿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和金特纳认为，护航决定势必增加美国海军与德国潜水艇冲突的机会，因此他们断言罗斯福此举是用来制造美国采取强硬行动的借口。

罗斯福的护航决定是根据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作出的。

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后，希特勒称霸西欧的敌人只剩下一个英国了。而英国在西欧战争中已遭受严重的损失，陆军正在整编，国民警卫军还在受训，武器弹药奇缺，只剩下500门炮、200辆坦克。西欧战争时，英国硬着头皮保留下来的700架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要保护数千里长的海岸线，简直是顾此失彼。希特勒诱降失败后，决心用武力摧毁这个国家。他调动数千架飞机对英国的港口和城市轮番进行狂轰滥炸，但都被英雄的英国人民粉碎了。尽管林白声称德国空军不可战胜，希特勒还是不能夺取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于是他放弃对英国的入侵，转而设法切断它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线。

1941年上半年，德国潜艇击沉了756艘驶向英国港口的商船，还打坏了1450艘。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损失的吨位不久就会超过英美两国造船厂的补充能力的两倍。史汀生和诺克斯敦促罗斯福命令美国海军开始护送船队，以保证安全运送美国补给品。陆军部长说，派船出去让潜艇击沉，就好像把水倒进有漏洞的浴缸里一样。他主张必须采取相应的强硬行动。

1941年的整个夏季，罗斯福在船队问题上一直曲折地前进。5月27日，他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向美国人民公布了德国潜艇击沉的

据美国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向苏联提供了价值为108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几乎占合众国一切租借援助总额的1/4。其中大约一半是飞机、坦克、军用汽车和其他军火——包括大约1.5万架飞机，7000辆坦克，5.2万辆吉普车，38.5万辆卡车。运去的还有机车、货车和其他铁路车辆。此外，还让苏联租借了大量通讯器材。

商船数目。总统根据大多数人怕卷入、怕打仗的思想，发表了长篇广播讲话。他说：“我们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陆地和海上的军事问题。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不能从一厢情愿或感伤主义出发。我们面临的乃是铁一般的冷酷现实。”

“谁也不能在今天晚上预言，独裁者们的行为什么时候将会发展成为对于本半球和我们自己的进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静候他们进入我们的前院就等于自杀。”总统进一步指出：“在你的敌人乘坐一辆坦克或一架轰炸机来向你袭击时，如果你等到看得见他的白眼珠时才开枪，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罗斯福说：“对于现代战争的突然打击力量有一定了解的人，等待敌人去取得进攻的立足点是愚蠢的。采取一种战略，首先防止这种敌人取得立足点乃是人之常情。据此，我们已经在南北大西洋水域扩大了巡逻范围。我们在稳步地增加执行这项巡逻的舰艇和飞机。大家都知道，大西洋舰队的实力在过去一年里有很大的增强，现在还在不断地充实。”总统强调关系生死存亡的战争现实，正迫使各国从单纯自保出发，作出严峻的抉择。

罗斯福重申美国关于海洋上自由航行的传统主张。他说，“我们正在把我们的武装力量置于战略性军事地位；我们不会对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去打退进攻有所迟疑。”总统宣布全国处于非常状态，并且要求“竭尽国力和授权的最大限度去增强我们的防务”。罗斯福这篇讲话发表在珍珠港事变前的半年多。它受到了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人们纷纷给白宫打电报，表示支持这种强硬立场。总统惊讶地对舍伍德说：

“95%的电报表示支持！我估计，对我这次讲话要是支持和反对的人各占一半，我就够走运的了。”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强盗惯伎，突然对苏联发动进攻。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法西斯侵略军的来势异常凶猛，总共出动了19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53个德国师、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万多门大炮和193艘舰艇。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希特勒吹牛皮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

苏德战争爆发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美国有些内阁部长和高级将领，力主乘机向法西斯展开进攻。陆军部长史汀生说：“直接率领大家去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然而，罗斯福仍然希望保持一种半交战状态，不想同纳粹德国发生公开冲突。这位总统本能地认识到，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进程，并认为这是在美国不直接卷入的情况下促进他抵抗希特勒的政策的一个机会。他对陆军部长说：“我认为，向俄国提供各种合理的弹药援助，对美国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虽然密锣紧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是他仍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强大压力：参战派的有力人士如伊克斯、史汀生、诺克斯、摩根索等都认为如解救被希特勒奴役的国家，美国非参战不可，越快越好。孤立派则大声喊叫，对英国只能采取除战争以外的援助方式，绝对避免投入战争。罗斯福本人的态度是，一方面对德国保持强大压力，同时却谨慎从事，走一步看

一步，既注意德国可能采取的反应，又十分注重公众舆论的动向。罗斯福曾对急不可耐的参战派谈了自己的心事：“我从伍德罗·威尔逊那里得到了经验，以巨大的分裂使国家投入战争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如果我们要投入战争的话，我要使大家团结一致。”他还引用威尔逊的话说：“当我们要同德国打仗时，我们必须弄清楚，全国不仅同我们一起打，而且还愿意同我们一起打到底。”

希特勒进攻苏联，使世界战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罗斯福在密切地注视着苏德战场的形势。正是：侵苏狼烟起，纳粹陷龙潭；速夺终成梦，闪电遭破产。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章 探访苏京

总统特使访苏联，苏美关系大改观；
合作抗敌结盟友，二战史上绘新篇。

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短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幸灾乐祸，他们狂叫：“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厮杀吧！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只有紧密地和苏联联合，才能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德苏战争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英王陛下政府已决定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他说：“在过去 25 年中，没有谁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要收回我说过话。但是，面对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种情景，这一切都已黯然失色了。”提到希特勒时，他使用他具有特征的措词说：

“这个嗜血成性的街头流浪汉，非得把他的机械化部队开进新的屠杀、掠夺和蹂躏的战场不可。俄国农民、工人和士兵，虽然那么穷，他还是一定要他们那里偷走每天吃的面包，一定要吞没他们的收成，一定要抢走他们犁田机用的石油，这就要造成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大饥荒。如果他胜利了——他还没有得到——那就要给俄国人民带来大屠杀和毁灭；即使如此，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垫脚石，踩过它，然后就企图把住在中国的 4 亿或 5 亿人以及住在印度的 3.5 亿人，投入人类堕落的无底洞，而在那上面飘扬着恶魔般的字标帜。在这里，在这夏天的晚上，说另外还有亿万人民的生命和幸福，正受着野蛮的纳粹暴力的威胁，这绝不是言过其实的。”

在丘吉尔的这次演说之后，人们敦促罗斯福加快步伐并踵行仿效。关于总统应该向美国人民讲些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向白宫送来。其中最明智的则是由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交给霍普金斯的一份简要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

“现在我们看出，纳粹的和约是个多么冷酷无情的悲剧。现在我们还看到突然降临到 15 个国家的命运，它们信赖纳粹的许诺，却一个接一个被毁灭。

“我们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我们反对希特勒所代表的一切。他和他的邪恶的纳粹分子，是对一个和平、正义和安全世界的紧迫威胁。我们的安全系于他们的失败。

“在这个时候，像任何时候一样，我们要记住；我们最大的力量是团结；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不和。”“自从俄国成为共产主义以来的 27 年中，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受到布尔什维克的严重威胁。但在希特勒疯狂地要奴役世界的两年中，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的生存本身，却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这关键时刻，罗斯福相信要慢慢加快步伐的方针。丘吉尔已讲了话，无疑罗斯福为他撑腰。但在采取援助苏联的公开行动以前，他想弄清苏联的实力，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他们到底能支持多久。关于这一问题，西方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无疑，希特勒进攻苏联，他入侵英国的打算现在可以认为

是暂时推迟了，因为这么多的德国空军和这么多的德国陆军兵团，都投到东线去了。但是，希特勒对苏联的闪电战役到底能进行多久，一些短视的政治家们认为，少则三四周，多则七八周。据齐亚诺说，德国法西斯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估计是，“斯大林俄国定将在8周以内从地图上抹掉”。当然，罗斯福对法西斯的宣传是不予置信的。但是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苏联的实力和决心，其次才是他们需要什么和如何运交的问题。

7月11日（星期五）晚上，霍普金斯同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作了一次长谈，总统在从《全国地理》杂志上撕下的一幅大西洋的小地图上划了一条线。罗斯福潦草地写了一份海底电报，指示怀南特大使通知“前海军人员”——丘吉尔，霍普金斯很快就要再同他在一起。第二天早晨，霍普金斯约定同西德尼·希尔曼共进早餐时商谈生产问题，午餐后同维克里海军将军商谈海运事宜，又跟伯恩斯将军商谈供应问题。星期天清早，他飞往蒙特利尔，随后到纽芬兰的甘德，然后再从那里乘一架租借法提供的B—24轰炸机前往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到达时尽管身体很不好，他还是马上到丘吉尔那里，讨论自从他们上次会晤以来出现的崭新局面。

当霍普金斯同丘吉尔会面时，在苏联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周，这显然已超过悲观主义者的最低期限。于是开始出现“极其微弱”的一线希望，苏联人也许会一直坚持到冬天。而丘吉尔正是从不放过一线希望的人。他主要关注的是，这么多的德国步兵师，如今正在得到实战经验，这又将使得他们日后变得更加难以对付。霍普金斯得出这样的推论，英国建议援助这件事，斯大林不十分在乎，从一开始他所关心的倒是同盟中的政治方面。尽管这样，在霍普金斯抵达伦敦的前几天，英苏两国已经签订了“联合行动协定”，该协定包含两项条款：

“第一，两国政府保证，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期间，互相给予一切援助和支持；第二，互相保证，在这次战争中，除非经过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既不得谈判也不得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两国政府取得谅解，日后还得用更明细的政治与军事协定来补充本协定。”

在伦敦期间，霍普金斯同丘吉尔详细讨论了召开大西洋会议的问题。这位总统特使认为，由于对苏联战场的情况和前景没有真正地有所了解，大西洋会议的讨论，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将要陷于真空状态。十分明显，英国人和美国人双方当时所有的主要估计，都是以不充分的情报和推测作为根据的。既然当时对于战争各阶段的种种考虑，包括美国的生产和租借法在内，都取决于苏联能支持多久的问题，霍普金斯于是决定，他应当去一趟莫斯科，快去快回，设法从斯大林本人那里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答复。

霍普金斯问丘吉尔首相，有没有可能在一周内乘飞机往返莫斯科一趟。丘吉尔告诉他，皇家空军海防指挥部最近为PBY（卡塔利纳型）飞机开辟了从苏格兰的因弗戈登，绕过挪威的北角，到达阿尔汉格尔的一条新的空中航线；在这条异常艰苦的航线上，已经作了几次飞行。丘吉尔也认为了解东线的真相很有价值，他还觉得斯大林可能赞成向美国总统的个人代表透露其中的某些部分，但他对于霍普金斯打算作这样长途冒险的旅行并不热心。可是霍普金斯对这个主意感到兴奋，7月25日星期五晚上，他给罗斯福发了个电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我有一种感觉，应当竭尽全力保证俄国人能保持一个持久的战线，哪怕他们将在最近的战役中遭到失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如有可以多少影响斯大林之处，我认为便值得由你通过一个私人代

表去同他发生直接的联系。我想利害关系如此重大，这是应该做的。”

这位总统特使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罗斯福的同意。在这次奇特的突如其来的旅行中，霍普金斯所具有的权力，除了一本护照以外，就是当天接到的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发来的一份电报：

“总统请你于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即交给他以总统名义发出的如下信息：

“霍普金斯先生应我的请求，前来莫斯科，跟你个人并跟你可能指定的其他官员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最迅速有效地使美国向正在对希特勒德国的背信弃义的侵略进行伟大抵抗的贵国所提供的援助，可以得到使用。我已经告诉你的大使乌曼斯基先生，美国政府将给你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你们得到自己最急需的军火、军械及其他物资，这些在今后两个月内可以运到贵国，以供实际使用。我们即可与现在华盛顿的以戈利科夫将军为首的代表团，共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细节。我觉得，霍普金斯先生现在对莫斯科的访问，对于我们美国这里弄清你们的最迫切的需要，以便能就简化交货手续，加快速度方面达成最切实可行的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今年冬季，我们将有可能完成你们政府想要从我国得到的大量军事物资。因此，我认为两国政府当前应特别关注的，是今后三个月内可以达到俄国的物资这个问题。

“请给予霍普金斯先生以那种就像你亲自同我当面交谈时所感到的信任。你对他表示的意见，他会直接向我转达，他还会告诉我，你认为哪些是最紧迫的、我们可以给予帮助的各个问题。

“在结束之际，请允许我对俄国人民为捍卫其自由和俄国独立所表现的非凡的英雄气概，表达我们美国所有人的巨大钦佩。你们的人民和所有其他各国的人民反对希特勒侵略及其征服世界计划的胜利，对美国人民一直都是不断的鼓舞。”

霍普金斯的穿梭秘密外交，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注意。英国广播公司在向欧洲一切被占领国家，以及向德国和意大利的广播中，经常为霍普金斯的旅行大事宣传。他的无线电广播讲话被译成多种文字，除广播外还被印成千百万份小册子，由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予以散发。英国宣传专家煞费苦心来解释霍普金斯究竟是谁，并想方设法向人们传播他是庞大的美国远征军的先锋这一涵义。德国人在其对美国的宣传中充分利用霍普金斯，扬言他为了捍卫英国帝国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正在使他的国家陷于介入战争的处境，这种指责当然为孤立主义者所鼓噪响应。而戈培尔博士却把霍普金斯描绘为西方野蛮主义的工具，处心积虑要由华尔街来奴役欧洲，把欧洲古老的文化降低到好莱坞的水平。由于纳粹宣传中这样起劲地咒骂霍普金斯，结果更引起了莫斯科对他的重视。

果然，霍普金斯一抵达莫斯科就受到苏方的热烈欢迎。他写道：“我在俄国跟这么多人握手，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好几次，我自己咧开嘴笑，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在竞选？”劳伦斯·斯坦哈特大使把他接到美国大使馆，催他上床歇息，以解这几天在旅途跋涉之苦。但他身临莫斯科，兴奋得不能睡很久。他不愿浪费片刻时间，他要尽可能地把全部时间花在观察、谛听和吸收上。他现在处于海底电报的另一头，美国和英国政府都依靠这种电报来取得关于俄国这个大的未知数的报道。

霍普金斯来到莫斯科后，首先跟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哈特进行了长谈。他

谈到，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要确定俄国的情况到底是否像美国陆军部所描绘的那样多灾多难，特别是像大使馆陆军武官伊凡·那顿少校在海底电报中所表明的那样。斯坦哈特说，任何人哪怕稍有俄国历史知识，几乎都不会匆匆下这样的结论：“德国人会轻而易举地取胜。当敌人突然对它采取攻势时，俄国军队可能显得无能，他们在拿破仑战争时也是如此；但是，当他们被号召去捍卫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却是极为出色的战士。”在莫斯科，任何局外人要想清楚地了解事情进展的真正情形，则是极端困难的。”这位美国大使说，他曾尝试同苏联当局打交道，都不断受到阻挠，因为普遍存在着对一切外国人的怀疑和由此造成的守口如瓶的状态。

然而，霍普金斯决心要多少打破一下这道怀疑的墙。当晚，他得到充分时间的休息，第二天同斯坦哈特乘车游览观光。下午6时半，大使带他到克里姆林宫去会见斯大林。苏联统帅热情地接见了这位美国特使，在谈完他对德国的一般看法之后说，在对希特勒的认识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随后，斯大林就向霍普金斯全面地介绍了苏联战场的情况。

斯大林说，战争爆发时德国在苏联西线的军队共有175个师，自那时到现在已增加到232个师。他相信德国能够动员300个师。

苏联首脑说，战争爆发时，苏联有180个师，不过其中许多师远在作战前线的后方，不能迅速予以动员，因此当德国人打来时，未能充分进行抵抗。现在苏联在前线师的数目已达240个，另有20个作为后备。至今约有1/3的部队还没有处于炮火之下。

斯大林说，他能够动员350个师，到1942年5月春季战役开始时，他就将有许多师处于武装备战的状态。他渴望有尽可能多的师同敌人交锋，因为这样的部队将懂得德国人是可以被消灭的，并不是什么超人。这将给他的师以信心，如同飞行员在第一次空中战斗后所得到的那样。斯大林强调，“在战争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实地作战”，而且他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经过锻炼的部队，以便参加明年春季到来的大战役。他说，德国部队似乎感到疲劳，他们俘虏到的德国军官和士兵曾表示，他们“对战争感到厌恶”。

苏联首脑相信，德国低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而且他们现在在整个战线上没有足够的部队既能进行成功的进攻战，又能同时守卫他们漫长的交通线。他反复强调德国人为了这种目的势必需要大量的兵员，并且相信德国人终于不得不转入守势。在过去10天里，他的军队所受的压力已经缓和了许多，他所能举出的唯一理由是，他认为德国人已不能为他们的机械化师和空军提供充足的燃料。他强调德国军队把大量燃料运往前方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并且相信这些困难还将与日俱增。他不认为这是由于德国的燃料有任何缺乏，而是由于运输困难，没有好的道路，特别是由于苏联人给德国人的交通线以有效的干扰。

斯大林说，战争不过刚刚进行了六周，他的部队在前线已经逐步展开，在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苏联军队面临的是突然袭击，他自己原以为希特勒不会这样快动手，但他还是采取种种可能的预防措施动员他的军队。由于希特勒没有向苏联提出任何要求，所以他们被迫组织一个防御的战线。现在苏联正在许多地点进行反攻，明年春天将有更大的战斗。

关于德苏双方坦克和空军力量的对比，斯大林说，战争爆发时德国有3万辆坦克，苏联有2.4万辆坦克和60个坦克师，每师约有350辆至400辆坦克。苏联的每一个步兵师还拥有50辆坦克。他相信他的最大的坦克比德国的

要好，其优越性在迄今为止的战争中已不断显示出来。坦克消耗很大，现在正加紧生产，估计每月能生产 1000 多辆，其中大中型和轻型的备占一半。

德国在前线的飞机比苏联的多，但德国许多飞机的质量并不是第一流的，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苏联现在能使用的飞机约有 1 万架。目前它的飞机生产量每月总共 1800 架，到元旦时每月可增加到 2500 架，其中 60% 为战斗机，40% 为轰炸机。斯大林说，德国人所扬言的苏联空战损失等等都是荒唐的。起先，苏联人损失的飞机多于德国，他认为，目前优势已颠倒过来。

斯大林一再说，他并不低估德国的军队。他说，他们的组织极好。而且他相信，他们储备有大量的粮食、士兵、物资和燃料。他认为英国人有一个弱点，便是低估了他们的敌人；他无意重蹈覆辙。因此，斯大林认为，就兵员、物资、粮食和燃料来说，德国军队有能力在苏联进行冬季战役。不过他认为，到 9 月 1 日以后，德国人要想发动许多进攻性的战役将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就要开始下大雨，而到 10 月 1 日以后，由于地面很坏，他们将不得不转入守势。他表示有很大信心，在冬季月份里，战线将停留在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的前面，或许不会离开现在战线 100 公里以外。他认为此刻对苏联军队十分有利的一点是，德国人“十分疲劳”，而且无心发动一次攻势。他认识到德国仍然能够再调来 40 个师，从而使整个苏联战线的德军兵力达到 275 个师，不过在严冬来临以前，那些师大概还不能到达目的地。

斯大林谈完军事形势之后，向霍普金斯表示说，他非常感谢罗斯福总统对他们同希特勒作战所表示的关怀。他说，他愿意给总统如下的个人信息；这一讯息他本想用书面发出，但认为还是由特使向总统传达更好。

斯大林说，广大被压迫人民痛恨希特勒及其政府的不道德手段，从这里就看出了希特勒最大的弱点之所在。他相信，这些人民以及其他迄今未被征服的民族中的无数人民，唯有从美国那里才能够得到他们为抵抗希特勒所需要的鼓舞与道义力量。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与此相反，他认为，德国军队和德国人民的士气已很低沉，而且如果宣告美国即将参加反希特勒战争，他们的士气就会低落不堪。

斯大林说，他相信苏美终归难免在某一战场上同希特勒搏斗一番。不过他认为，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大概也是长期的。最后，他要求霍普金斯告诉罗斯福总统，尽管他有信心，苏联军队能够顶得住德国军队，但到来年春天，供应问题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他需要朋友的帮助。

这是霍普金斯在这次短暂旅行中同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的情形。在两天里，他所获得的关于苏联实力和前途的情报，比他们准许给予任何外人的都多得多。斯大林的确把总统的要求放在心上，因而给霍普金斯以完全的信任。霍普金斯在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就他这一方面来说，也是怀有这样深刻信心的，即斯大林自己或通过任何别人都不是说话不负责任的。这确实是英美和苏联战时关系的转折点。英美所有的估计不再以“俄国大概快要一蹶不振”作为依据了，他们不再作悲观预测，而树立了对苏联的信心。尤其是对特使本人，斯大林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美利坚杂志》上，霍普金斯谈到斯大林时，这样写道：

“他说话绝不重复，他开口说话，因为他知道他的部队正在开枪射击——打得准，打得狠。他用几句讲得很快的俄国话来欢迎我。他同我握手时，短促、坚定而有礼貌。他热情地微笑着。没有一句话、一种姿势、一种格调

是多余的。真像是在对着一个完全协调的机器——部有才智的机器——说话。约瑟夫·斯大林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知道俄国要的是什么，而且他假定你也一样知道。在第二次会见时，我们几乎谈了4个钟头。斯大林间的问题明确、简要、直率。……他的答复是现成的，不含糊的，好像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许多年，一下子便脱口而出。”

“如果他始终像我所听到的那样说话，那么他一个音节也不浪费。倘若他想要把一个出其不意的回答或突如其来的问题变得温和一些，他设法来一个迅速的、临机应变的微笑——这种微笑可以是冷漠的但又是友好的，严肃的但又是热情的。他不奉承你。他似乎没有任何疑问。他向你保证，俄国肯定能够顶住德国军队的猛攻。”

“当他站起来望着我离开时，谁也忘不了这个俄国独裁者的形象——严肃、坚决、满脸皱纹的容貌，他穿着紧贴合身的短外衣和结实而宽松下垂的裤子，脚穿一双镜子一般闪亮发光的靴子。他没有佩带文武官员的任何勋章。他身躯硕大，墩墩实实在在地站稳脚根，大有橄榄球教练员所一心向往的擒抱手的模样。他身高约5英尺6英寸，体重约190磅。他双手巨大，像他的意志一样坚定有力。”

为了能同斯大林几次会晤，霍普金斯十分高兴。他对于苏联人抵抗力量的信心，主要是从斯大林提出要求的性质本身得来的。他的要求证明，他是从长期的基础来考虑这场战争的。假使一个人担心失败迫在眉睫，他决不会在要求清单中把铝摆在这么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每当驻莫斯科的军事观察员们用海底电报发来悲观的报告时，霍普金斯便表现出极端的恼怒，因为他们的依据只能是受偏见影响而歪曲了的瞎猜罢了。在随后的几个年头，霍普金斯是一个真诚的甚至无所忌惮的苏联的朋友，他对苏联为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十分佩服。对那些“时常在床底下寻找有没有共产党人的疑神疑鬼的美国人”，他除了轻视而外，没有别的。

霍普金斯在莫斯科紧张奔波一周后，于8月1日乘军用飞机转道伦敦回国。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差错，他随身所带的一种救急药品丢在莫斯科，在返航飞行中，他病得很厉害。由于顶头风，飞行十分艰难，霍普金斯忍受了难以言状的痛苦。机组负责人麦金利空军上尉在关于执行这次任务报告的最后提到：

“当霍普金斯挥手道别时，我们不禁感到，很少有人能够受得了他自7月28日因弗科登同我们相见以来所忍受的一切。在向奥班返航以前，我们在上空盘旋一阵，瞧见一只汽艇笨重地在港口蜿蜒前进，我们不知道那个病得够呛的人，可曾获得一些休息。他对于别人的服务能够给予正确的评价，自己又是表现得难以置信的勇敢和坚定。他是无比忠于自己职务的典范。”

8月2日，这离霍普金斯请求准许他去莫斯科的那一天，正好是一周时间，而一周后，他又和罗斯福在大西洋会议上重逢了。正是：一只雄鹰，探访苏京；克服万险，荣立特功。欲知大西洋会议情况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一章 大西洋会议

两双巨手紧相握，远渡重洋逐碧波；
激情电流传全身，双方会谈结硕果。

1941年8月9日至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乘军舰秘密地在纽芬兰的阿金夏半岛洋面上举行了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是在美国还没有卷入战争的情况下，罗斯福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远离本土，与正在进行生死搏斗的英国领导人，就战争问题进行商量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到达，随行的有他的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和迪尔上将。丘吉尔把伊斯梅上将留在国内主持军务。随首相来的还有外交部长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空军副参谋长威尔弗雷德·弗里曼中将、彻韦尔教授，以及秘书和三军的许多参谋人员。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也搭乘此船，陪同英国首相前去赴会。

在离开联合王国之前，丘吉尔曾通知所有自治领的总理说，他即将前往会晤美国总统。这种通报不仅仅是例行礼节的事。丘吉尔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有可能达成某种重大的协议，而这将需要各自自治领的批准。丘吉尔所希望的协议并不是大西洋宪章，而是制定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共同政策。丘吉尔告诉这些总理，在这些战争年头，他同罗斯福有亲密的信札往来，也跟他通过电话中谈过话，但还未会过面。当时罗斯福在英国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对于瓦砾遍地的街衢上的老百姓来说，他被简单地和亲热地称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丘吉尔比他的同僚和大多数同胞更清楚地知道和了解美国，对于罗斯福战胜孤立主义和打破不许连任第三届总统这种神圣传统的成就，更是不胜钦佩。

当“威尔士亲王”号驶近纽芬兰的会晤地点时，船上顿时忙碌起来，对预期要举行的礼仪反复进行排练，弥漫着一种节日前夕的欢乐气氛。霍普金斯穿着睡衣走到舰桥，望一下纽芬兰，差不多四周以前，他曾在那里搭乘一架轰炸机起飞，而此时夏天白茫茫的雾遮住了视野。太阳正挣扎着要穿出海面。片刻，在浓雾中涌现出几艘壮观的新型美国驱逐舰的轮廓，然后就是“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了。原来是罗斯福总统率领军政要员迎接丘吉尔首相来了。

美国总统站在舰桥上，极目遥望弯向海湾出口处的岬尖，英国舰船仍然没有进入视野。他转过身来和背后的随员闲谈。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是唯一不穿军服的人。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大西洋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也在场。阿诺德空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正在跟总统军事助理沃森将军亲切交谈，埃利奥特·罗斯福穿着簇新的空军上尉制服，充当他爸爸的随从军官。

“啊，船！”船头上一位年轻的海军战士高喊起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看到一艘驱逐舰的黑色尖形船头经过岬尖，后面跟着另外五艘驱逐舰，有的挂着星条旗，有的则是加拿大军旗。然后出现了一个更笨重的庞然大物，那是一艘涂着锯齿形杂色伪装的巨型军舰，船尾上飘扬着一面眩目的军旗——英国皇家海军旗。

“把双筒望远镜递给我，埃利奥特。”总统说。然后，他把望远镜对准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的舰桥，几乎就立刻认出那熟悉的笨大体形，除

了丘吉尔之外不可能是别人。站在他旁边的是身材瘦弱的哈里·霍普金斯。

英国军舰缓慢地从美国舰只列队中穿过。“奥古斯塔”号的后甲板上，军乐队指挥举起了指挥棒。

“扶我起来！”总统命令说。

埃利奥特扶他站起身来。麦金太尔医生俯身为他扣紧支架。当“威尔士亲王”号驶来时，总统脱下帽子，立正致敬。他清楚地看到丘吉尔在英国军舰的舰桥上行礼。“奥古斯塔”号的乐队奏着《上帝保佑吾王》，随风飘过来的是《星条旗》的乐声。接着英国船行驶过去，转向一个没有旗子标志的浮标。它到达那里后，寂静的海面上响起了下锚时链条的隆隆响声。

11时正，海军上将的汽艇驶离“威尔士亲王”号，总统站在“奥古斯塔”号的舷梯上等候着。汽艇到达船边。在汽笛的尖鸣声和海军仪仗队举枪致敬的碰击声中，穿着褐色海军制服的丘吉尔走上船梯。

首相显得古板、粗率而有力。他停下脚步，礼貌地朝后甲板致敬。然后像一个逗人喜爱的“如来佛”一样，笑咪咪地伸出双手走上前去。

“终于见到您了，总统先生！”

“在船上和您相会，我很高兴，丘吉尔先生。”罗斯福回答。

他们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激情犹如强大电流传遍了他们的身体。对他们两人来说，这次会晤象征着他们梦寐以求、努力争取并最终实现的目标。他们的相见，体现着英国和美国携起手来了。

霍普金斯从“威尔士亲王”号被转移到了“奥古斯塔”号。总统的海军侍从副官约翰·比尔德尔上校上了“威尔士亲王”号，转达了总统关于正式会议和社交活动的初步考虑。总统将在当晚设宴款待首相及其一行。霍普金斯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

“我刚同总统谈过，他很想在今天晚餐后邀请其余的人员留下，请你非正式地对他们谈谈你对于这场战争的总的评价，同时对那些在场的人，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总共会有25人。”

霍普金斯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他想让总统及其一行听听丘吉尔茶余酒后对战争形势作一分析。出席这次晚宴的，美国方面有罗斯福、韦尔斯、斯塔克、马歇尔、金·阿诺德、霍普金斯和哈里曼；英国方面有丘吉尔、卡多根、庞德、迪尔、弗里曼和彻韦尔。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宾主边吃边谈。谈话的两个主题是：日益增长的日本侵略威胁，这是英国人尤为关注的；拟议中的五点联合宣言，后来成为八点的大西洋宪章。当然，霍普金斯所谈的苏联情况，引起与会者巨大兴趣。他们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对抗德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但这样二来日本在满洲侧翼所受的威胁就减少了，而日本在其他方向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危险更增多了。

在当天晚上的讨论中，双方严重地关注到日本以及它向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进逼的形势。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决不能让日本人越过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以南，但仍得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你说我们能争取到多长时间？”丘吉尔问。

“我想还能把日本拖上几个月。”罗斯福回答说。接着丘吉尔强烈要求美国立即对德宣战，罗斯福认为美国人民思想准备还不足。

翌日是星期日，再次举行盛大的象征性仪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一起作礼拜。罗斯福总统乘美国驱逐舰“麦克杜格尔”号前来参加。他念的经文是从《约书亚记》第一章里摘下来的：“你平生的日子必

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去弃你。你当刚强胆壮。”总统坐在英国军舰洒满阳光的后甲板上，发现自己的头脑在不停地思索这一场面的重大意义——两个以航海为业的伟大民族在这里融为一体；这些对上帝和人类自由权利怀有共同信念的人们，在宗教信仰和战斗中表现出这样的同心同德。

“啊，上帝，愿你在战争的日子里坚定我们的意志，”牧师祈祷说，“增强我们的决心：我们不是和人们为敌，而是反对奴役人们灵魂的黑暗势力，我们将战斗不息，直到一切敌对行为和压迫都被消灭干净，世界各国人民从恐惧中获得解放，作为上帝的孩子互相服务。”

祈祷首先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其次为他们的大臣们、海军将领们、陆军将领们和空军将领们，然后为被侵略各国、伤病员们、俘虏们、被迫离乡背井与无家可归的人们、焦虑悬盼和丧失亲人的人们。而且还祷告：“但愿我们能从仇恨、痛苦和各种复仇精神中保存下来！”

祈祷之后，接着响起了千百个青年人的歌声，他们百感交集地唱着罗斯福亲自为这一天选定的一首水兵赞美诗：

永恒的上帝，万能的救世主，
汹涌的波涛已被你制服。
你挥动巨臂，力挽狂澜，
深邃的大海被迫就范。
啊，人们在海上遇难，
请倾听我们的呼唤。

总统心潮起伏，竭力抑制住刺眼的泪水。他情不自禁地向丘吉尔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这位坚强的英国捍卫者正在偷偷地擦眼泪。

霍普金斯从苏联带来的是好消息。斯大林向西方盟国打开了他的“神秘帐本”，把坦克、枪炮、飞机和兵员的数字交了底。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任何人的猜测。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德国人今年拿不下莫斯科，我们有信心坚持到最后胜利！”

“我相信他的话。”霍普金斯说。

参谋人员的会议在继续进行。韦尔斯和卡多根，正在该舰的另一处，就英国政府所起草的文件《致日本政府的平行的信件》进行会谈。准备从华盛顿、伦敦、阿姆斯特丹分别发往东京的文电如下：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都将造成迫使美国——英国——荷兰政府采取反措施的一种局势，即使这些反措施可能导致美国——英国——荷兰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倘若任何第三国由于这些反措施或对这些反措施给以支持而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美国政府——英国政府——荷兰政府，将给予该第三国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这次会谈的正式记录中，韦尔斯写道：“正当我陪同总统离开该舰口到他的旗舰时，丘吉尔先生对我说，他同样把这些文件的副本给了总统。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相信，由他起草的关于日本的这一宣言，据他看来，有着无比的重要性，而且他认为，除非美国发出这样毫不含糊的防止日本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宣言，不然就没有多少希望可言；如果日本进一步扩张，要想避免不列颠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看来是毫无希望的。他特别强调指出，如果大

不列颠和日本竟然爆发战争，除非美国自己参战，不然日本马上就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的巡洋舰来俘获或摧毁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英国所有的商船，并切断不列颠自治领和不列颠诸岛之间的生命线。他向我呼吁说，由美国、大不列颠、各自治领、荷兰，还可能有苏联参加的这种性质的宣言，肯定会遏制日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给英国政府的打击，可能是决定性的。”这就是英国丘吉尔政府的观点的最明白的一种陈述。

罗斯福作出的唯一许诺是，他回到华盛顿时将与日本大使野村见面；并已向国务卿赫尔发出电报，让他安排这一会见。8月17日美国政府对野村发出如下的警告：

“本政府现在感到有必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政府如果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以武力推行其对邻国的军事统治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或计划，美国政府势将被迫立即采取它所认为的任何和一切必要的步骤，以保障美国和美国侨民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与安宁。”

这除了表明美国决意重申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将照顾自己的利益以外，确实并不说明其他问题。丘吉尔无疑希望能有比这远为强有力的东西。萨姆纳·韦尔斯的记录表明，罗斯福一度考虑过采取一种更坚决的立场，但结果却是，他很快让步，采取了介乎强硬路线和温和路线之间的稳妥的中间道路。拟议中的英——美——荷对日本的平行警告，从未见诸实行，而自那以后，丘吉尔采取的立场是，一旦日本采取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罗斯福又公布了他的政策之后，英国将紧步美国的后尘。

在美国新闻界和罗斯福的全体阁僚中，有很多拥护强硬政策的人。当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副总统华莱士曾致函总统，要求采取坚决立场。他说：“姑息或部分姑息的立场，肯定会带来恶果，这不仅从长远看对日本是这样，就是对欧洲局势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的立场，整个轴心国家将会予以注意，而且美国人民在心理上也将大为振奋。”他深信，“采取这样的政策，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而任何软弱、退让或姑息的表示，都将为日本和轴心国家所误解，都将使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付出千百万个小时的劳力，忍受巨大的痛苦。”

在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其中有一次特别机密。

“你们的人在核裂变方面，干了些什么没有？”罗斯福见只有丘吉尔和霍普金斯两人在场，便问道。

“干了不少，”丘吉尔回答。“把彻韦尔教授请来！”

彻韦尔教授叙述了英国科学家们在约翰·安德森爵士领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和美国科学家所获得的结果极为相似。在某些方面，英国人已走在美国的前头。

“这东西可能厉害得不得了。”罗斯福指出，“我们最好联合起来于，抢在纳粹分子的前面。”

“非常正确。”丘吉尔说。于是立即达成一项互通一切情报的协议。

在最后一天，8月12日，他们在“奥古斯塔”号正方形大船舱内起草大西洋宪章。船舱的墙壁和舷窗都沉浸在大西洋的浓雾之中。在场的除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之外，还有具体草拟初稿的韦尔斯和卡多根、哈里·霍普金斯以及刚从英国飞来的比弗布鲁克勋爵。

总统用洪亮动听的声音慢条斯理地朗读着：“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王

陛下政府的首相丘吉尔先生，认为有必要……”

“总统先生，”丘吉尔插话说，“我们是否应该说：‘会晤之后认为有必要’？”

“温斯顿，很好。”罗斯福大声说，“就这么说……‘会晤之后认为有必要，宣布两国的若干共同原则，他们希望根据这些原则改善世界的未来局势。’”

他们就这样逐字逐句地写着，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激烈地争辩，好似一个雕塑家费力地把粗糙的花岗石雕琢成一块纪念碑那样，一点一点地使这个伟大的文件成形。它的精髓就是确保世界各国人民的四大自由。

会议行将结束时，美英两国领导人发表了共同起草的联合宣言——《大西洋宪章》。声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大西洋宪章》包括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美、英两国希冀世界各国对其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享有经济上的平等待遇，并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实现公平的劳动标准、社会保障和公海航行自由，废止使用武力，裁减侵略国家的军备等。

这个宣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发展，对反抗纳粹暴政斗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8月12日，英美两国领导人分手时，在“奥古斯培”号的甲板上，丘吉尔热烈地握着罗斯福的手，然后匆忙走下舷梯，上了汽艇。在他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夹杂着一阵惜别的隐痛。当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离开阿金夏的时候，美国驱逐舰把他和他的舰只一直护送到冰岛。他在冰岛稍事逗留，进行了视察。驱逐舰中，有一艘是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正在服役的舰只，他是海军少尉。后来丘吉尔在一次广播中谈到：“就这样，我们乘风破浪，越洋返航，精神为之振奋，决心为之增强。正在给冰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送文件的几艘美国驱逐舰，恰好与我们走的是同一航线，因此我们在海上成为旅行良伴。”丘吉尔意味深长地提到美国驱逐舰“恰好与我们走的是同一航线”这句话，是包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的。

大西洋会议之后，护航行动进一步扩大，大西洋上的射击战连续发生。

1941年9月4日，德国潜艇攻击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那天，这艘驱逐舰尾随一艘德国潜艇达数小时之久，同时将该艇所在的方位电告英国护航队，潜艇终于掉头对准来舰，发射了两枚鱼雷，均未命中。鉴于这次袭击以及其他袭击事件，罗斯福乃下令“遇敌即歼”。他谴责前几周中两艘美国商船被击沉，并说对“格里尔”号的袭击是“海盗行为”。

为了抓住这一事件，在国民中深入进行思想发动，罗斯福特意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用打比喻的方式说：“如果不理会这种攻击，就如同一个当父亲的，当他的孩子在去上学的路上，遭到埋伏在树丛中歹徒的射击，尽管没有打中，他却不闻不问一样。”他说应该去“搜寻这些树丛，抓住歹徒，把他消灭掉”。9月11日，总统下令对“大西洋上的响尾蛇”“看见了就打”。他说，“在响尾蛇摆开架势要咬你的时候，你不会等它咬了你才把它踩死。”“是时候了，全体美国人，整个南北美洲的美洲人，都应该丢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南北美洲竟能够在纳粹支配的世界之中幸福而和平地生存下去！”

从此，美国与纳粹德国双方斗争的弓弦愈拉愈紧，几乎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

1941年9月19日，在巴拿马注册的美国商船“平克斯塔”号在冰岛西南被击沉，罗斯福就在10月9日向国会要求修改1939年的中立法，要求武装商船，恢复美船开赴作战区域的贸易权。正当国会内辩论进行得难解难分之际，10月17日，美国驱逐舰“基尔尼”号又在冰岛西南被击伤，死11人。三天后，美驱逐舰“卢本·詹姆斯”号被击沉，死96人。“我们希望避免交火，”总统向全国宣布，“但还是交了火。谁先发第一枪，历史已记录在案。”美国决心对北大西洋海域的运输货船给予保护，纵使它所宣布的安全区界已伸展到贴近德国人说的“作战区”的水域，也在所不顾。罗斯福命令对北美到冰岛航线上的船只进行全面护航，美国海军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希特勒原本以潜艇战对美国国会施加压力，可是结果适得其反。11月7日参议院以50票对37票、众议院于11月13日以212票对194票通过再次修改中立法，取消禁止武装商船和关于美船不得进入战区和交战国港口的规定。从此，美国和德国在大西洋开始了未经宣战的战争。

正当罗斯福忙于处理海上冲突时，他的母亲萨拉老夫人的身体愈来愈衰弱了。9月5日记者招待会开过之后，总统就驱车前往海德公园去探望87岁的母亲。老人看到身有残疾而又疲惫的儿子回来了，强打起精神，但在9月6日晚上，她的心脏病突然发作，第二天没有苏醒过来就死去了。罗斯福对于母亲的去世十分悲痛。萨拉·罗斯福被安葬在圣詹姆斯教堂的家族墓地，旁边葬着的是她41年前去世的丈夫。总统在没有特工人员陪同的情况下露面，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送殡队伍快到墓地的时候，特工队长迈克·赖利对罗斯福的儿子说：“吉米，你照顾他一下，那里不是我们管的地方。”9月11日，罗斯福回到白宫，衣袖上戴着黑纱，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号召全国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了保卫国家，随时作好打仗的准备。

从1939年修改中立法，到1941年再次修改中立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美国卖武器，让英国自己打；接着是美国“租借”武器，还是要英国自己打；第三阶段是美国出动军舰，开始用美国船装运美国武器让英国去打。总之，美国与亲自参战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美国传记作家内森·米勒说：“罗斯福同林肯1861年的做法一样，为使全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领导，不得不施展手法使他的对手开第一枪。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总统在1941年秋仍犹豫不决。相对来说，他没有权力左右事态的发展，因此他无能为力，只好等待希特勒采取一些戏剧性挑衅行动，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但是，正当美国准备在大西洋作战的时候，奸诈狡猾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在“和谈”的掩护下，突然向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刺了一刀。正是：绥靖政策结恶果，日本偷袭降大祸。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在“和谈”掩护下

和谈掩护调兵忙，远途奔袭珍珠港；
处心积虑施诡计，美国海军要遭殃。

1941年7月，日本开始向南亚发动攻势，占领了印度支那，其中包括在金兰湾的重要港口，它距新加坡只有750英里。华盛顿认为，日本的挺进是最终向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动进攻的序幕。

7月24日，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召到白宫，罗斯福总统向日本发出严厉警告。当时在他身旁一边是在赫尔生病期间代理国务卿的韦尔斯，一边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罗斯福断言，如果日本试图夺取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荷兰人就会抵抗，英国人就会对他们进行援助；“鉴于我们自己援助英国的政策，结果立即会出现一种极为严重的局势。”如果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那个地区将实现中立，并可以保证日本人自由地购买该地区的大米和原料。罗斯福对日本人接受这项建议不抱什么希望，但认为这是“为避免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再次作出的一种努力。”

过了两天，由于没有得到东京的任何答复，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经济进行了致命的打击。他下达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大约1.31亿美元的财产，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80%依赖进口的石油贸易。然而，罗斯福并不想勒死日本。事过不久，华盛顿表示，对不适合提炼航空汽油的低辛烷石油产品，将颁发出口许可证。内政部长伊克斯说，总统担心彻底实行禁运会促使日本入侵东印度群岛，“因此仍然不愿意把绞索勒紧。他认为，最好是不时地猛拉一下绞索”。在美国实行禁运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也紧接着拒绝向日本出售石油。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这一行动是西方国家包围日本帝国的最后一步。

东条英机10月23日召开军政要员联络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日本与美国谈判的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问题。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兵，但却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会议争持不下，东条随即提出三种方案让大家裁决。一是即使蒙受巨大的困苦，或者用木户的话就是“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作好必要时开战的准备。

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坚持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杉山回答说：“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没有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

“立刻开战！”海军代表永野加重语气说，“日后再不会有开战的良机！”

陆军总参谋长杉山主张应在12月初开战，不过仍要继续同美国谈判，玩弄外交骗局，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在东乡外相看来，完成这一任务是困难的。他说：“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东条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决定再作一次退步，把谈判期限定在12月1日。会议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午夜，最后双方都作了妥协才算了事。

限期初步商定之后，说服美国人达成协议的重担就落在东乡外相的身上了。他说，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美国的方案。方案甲的措词比较婉转些，佯称陆军同意在1946年前从中国撤出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方案乙是留作万一美国拒绝方案甲时准备提出的。它包括一项在最后达

成协议之前，作为最后一着的暂定协议。它的目的是要打消赫尔对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怀疑，并向他说明，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即将其在印度支那西部的驻军撤向北部，而美国则要售给日本 100 万吨航空汽油作为报答。

在以后长达几个小时的讨论中，陆军不但一直反对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建议，而且坚持要向美国政府提出解除对日本资产的冻结，停止“破坏中国事件的和平解决”。陆军副总参谋长家田说：“战争不可避免，假如现在不打，明年、后年也得打。打，现在正是时候：神圣的日本精神将照耀我们的事业。”他认为，日本向南挺进，可能有助于德、意法西斯击败苏联，并迫使中国投降。占领东南亚对美国资源也是个巨大的打击。“我们将建起一座铜墙铁壁，凭借它，我们将把亚洲的敌人一一击败，同时也能打败美国和英国！”

家田副总参谋长的紧急战争呼吁，意外地镇服了以外相为首的反对派。他们认为，如果坚持反对南进，会迫使东条解散整个内阁，而新内阁必然会更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其实以东乡等人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反对南进，而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更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担心树敌大多会遭灭顶之灾。最后他们终于被迫同意了军方的意见。

意见“统一”后，现在轮到东乡外相去执行几乎绝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的任务了。他选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前去辅佐野村大使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东乡认为，“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

事实上，美日关系在整个 30 年代都处在紧张状态中。对造成这种局面应负主要责任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1931 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对维持太平洋不稳定均势的条约体系提出了第一回合的挑战，开始了日本用其独占政策来取代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武力征服过程。日本选择的时机是经过仔细考虑的：苏联正致力于国内事务，无力东顾；西方世界正陷于经济危机中，无力进行干预。当时唯一可能作出反应的是美国，但是担任总统的胡佛，被国内的经济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他对主张对日本持较强硬态度的国务卿史汀生所提出的经济制裁建议，一概加以拒绝，只同意发表一个表明美国立场的声明。这就是美国政府在 1932 年 1 月 7 日致中日两国政府照会的形式发表的政策声明：不承认有损于美国在华权利——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史汀生在内阁会议上继续力主采取除使用武力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对付日本破坏条约义务的行为。胡佛表示：“这只能是战争之路”。他认为“条约义务是道义性质的，因此只能对日本采取道义压力”。

1933 年 3 月 4 日，罗斯福继胡佛任美国总统。他接受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原则，支持国际条约的“神圣义务”。3 月 27 日，日本示威性地退出了国际联盟，声称日本“在建立远东持久和平所应遵循的原则上与国际联盟不合”。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一方面加强对伪满的全面控制，准备对苏联的战

1922 年 2 月 6 日，美、英、日、法、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公约》。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1928 年 8 月 27 日，法、美、英、日等国在巴黎签订《非战公约》。规定：禁止缔约国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要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争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向西方摇晃橄榄枝。外交大臣广田一再向美国保证，日美之间没有不能和平解决的问题。但与此同时，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发表了一个使赫尔“大吃一惊”的声明。这个声明进一步宣布了日本牌号的“亚洲门罗主义”。赫尔在14年后斥责说：“在短时间假装抱有和平意图之后，日本在事实上——一直到珍珠港事件时——只不过是回到它的既定的加强军备、破坏条约和进行侵略的臭名昭著的方针上去。”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目的在于独占中国。这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挑战。罗斯福想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他曾考虑对日本实行禁运。禁运几乎是罗斯福手中唯一可玩的牌，但是这张牌还打不出去。芝加哥“防疫”演说引起的反应，显示公众舆论对罗斯福的建议暂时还不能接受。国务卿赫尔和海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在这种气氛下，罗斯福只得采取见机行事、灵活反应的办法。

1938年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十分猖獗的一年。5月陷徐州，6月占开封，10月攫汉口，11月宣布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根据日本外相有田的说明，建立“新秩序”就是不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旧秩序；陆军大臣坂垣宣称，日本为了建立“新秩序”，不辞与第三国一战。面对这种形势。罗斯福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反应。5月17日，国会根据他的要求通过了10年建造军舰115万吨的庞大的海军扩建法；6月30日，英、美、法三国海军订立相互使用港口协调行动的协定。使日本更加恼火的是，美国在1939年7月26日宣布，1911年订立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后不再续约。尽管如此，这一行动仍不过是罗斯福根据日本的行动作出的有限反应。

1940年7月的一次以企业界为对象的调查表明，美国企业界人士绝大部分主张同日本继续做生意。这一倾向，日本人自然会注意到。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希特勒初期闪击战的胜利，更加刺激了日本法西斯南进的欲望。1940年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声明，干脆把英、荷、法在太平洋的属领，甚至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纳入日本的“共荣圈”，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同美国及其盟国的矛盾。罗斯福经与赫尔多次商量，决定采取避免在太平洋上与日本发生公开斗争的方针，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国和加强美国自己；同时，不让日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必要时美国不会使用武装力量，但又要克制与它争吵，让讨论和协议之门敞开。而日本也决定以和谈为掩护加快南进的步调和战争准备。1941年的美日秘密谈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日本军国主义一面进行谈判，一面竭力煽动战争。铃木将军反复说明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简而言之，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的同时，还将同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任务是不轻的。然而，在最初几个月取胜的希望还是光明的。”因此，他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嘛！”

永野将军要求大家对作战计划保密。他说，“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杉山要大家考虑选择好时机的重要性。“就作战而论，如果把开始敌对行动的时间推迟，”他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之间的军备对比将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取胜这点是满怀信心的。他认为日本能“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

把敌人挫败”。

东条则从另一方面阐述南进的必要性和绝对性，他在回答枢密院原议长提出的有关谈判的问题时说，美国在答复时用的是“华丽的辞藻”，“美国没作一点儿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说，最严重的争论是在中国的驻军问题。当他谈到这场令人沮丧的侵略战争时，还动了感情，“我们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的伤亡，家庭失去亲人的悲伤，历时四年的苦难，还花了几百亿日元。”他认为，如果把军队撤出，中国将奋起反对日本，“中国还将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东条决心破釜沉舟，宁愿冒民族剖腹自杀的危险，也要把侵略战争进行下去。

11月16日，来栖三郎特使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抵达华盛顿。两天后，野村大使把他带到国务卿赫尔的办公室。对这位个子矮小，戴着眼镜，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曾代表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使者，看上一眼就足以使赫尔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态度，都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和尊敬。”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诡诈的人……在我眼中他唯一可取之处是，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因为他娶了美籍秘书为妻。”

赫尔认为来栖很可能企图利用谈判来麻痹他们，时机一到便会向他们发动攻击。他陪野村和日本这位特使来到白宫。罗斯福总统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说：“伯利安说过，朋友之间不是没有商谈余地的。”来栖回答说，“必须找到一种避免战争的方法，太平洋像个火药桶。”罗斯福表示同意应取得广泛的谅解。他警告这位日本特使说：“追随希特勒主义和侵略道路，将不符合日本本身的最大利益，日本本身的最大利益所在，是沿着我们在当前会谈中所已勾划出轮廓的道路走去。倘若日本竟然不幸决定追随希特勒主义和侵略道路，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日本到头来肯定是失败者。”

就在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在国会发表演说，并在电台向全国作了广播。他主要讲华盛顿谈判问题，指出成功与否，有赖于下述三点：“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对中国事件的解决”；不应“对日本帝国实行直接武力威胁”，应该取消经济封锁；应尽力使“欧战不蔓延至东亚”。东条的演说，在东京获得军国主义分子狂热的欢呼和暴风雨般的掌声。

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到国务院。5时，赫尔把《备忘录》交给他们。东京的尚武心灵能有所悔悟，那将是“微乎其微的希望”。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同盟国，笼络人心，故意把《备忘录》写得冠冕堂皇。文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它政府或政权；以及在实际上废除三国同盟条约。在过去几天中，赫尔一再强调，除非日本政府恪守这一条约，所谓和平解决就不能叫人相信。

美国政府的答复，首次传到东京是在11月27日上午。电报被立即送进皇宫，那里正召开军政要员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刚好会议休会，大家在进午餐。东条宣读了电报内容，一切死寂。不知谁说了一声：“这是最后通牒！”最使东条之流恼火的是，赫尔竟然要求从中国全境撤兵。东条差不多为此暴跳如雷，他咆哮道：“满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价得来的，失掉满洲就

伯利安（1860—1925），美国民主党历史上有影响的人士之一，能言善辩，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0）手下当过国务卿。

意味着经济上大难临头！”随后他就责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尽速实施以“Z”命名的对美作战计划。

山本原任海军次官，是一个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的传奇式人物。他的双肩宽阔，胸部又大得像个圆桶，所以给人的印象还是身材魁梧。山本虽说当初曾警告一些狂妄之徒，要当心美国的工业潜力，但从思想深处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他和东条考虑问题的角度虽有所不同，但实质都是一丘之貉。他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就把理论上的战线延至马绍尔群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绍尔群岛连同加罗林群岛一起，成了日本的托管地，是日本在太平洋最东端的属地。1940年，在第一次春季演习中，山本和他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信步在旗舰“长门”的甲板上。他看到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在飞行训练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转身对参谋长说：“空军训练很成功，我想进攻夏威夷是可能的。突然的致命一击就能把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打得不能动弹。在美国重建其舰队之前，日本早已占领了东南亚，并把它的所有资源拿到手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主要是以山本心目中的英雄东乡海军大将的战术为基础的。

山本五十六，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后来在华盛顿担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他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工业实力。他断言，如果不消灭在夏威夷水域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日本在同美国的一场战争中就没有获胜的希望。山本极力主张出动航空母舰对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发动突然袭击。这样的行动将充分利用日本在太平洋上占优势的海军力量——10艘战列舰对9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对3艘航空母舰。进行这样的袭击已有足够的先例。日本已经对苏联和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1940年11月，几架英国鱼雷飞机摧毁了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作战舰队。

这位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坚持认为，如果摧毁美国舰队，日本就能够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征服菲律宾、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然后它就可以撤退到从千岛群岛到澳大利亚边缘牢固的防线后面，并且利用防线内的交通和供应线击退对这个屏障的进攻，直到西方国家被迫接受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控制为止。山本实际上是靠他自己的个人名望压倒了海军本部的反对意见。发动这场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对飞行员的实际训练是在1941年9月开始的。

在从石油禁运到珍珠港事件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令人厌倦的活动，以便赢得时间。罗斯福本想作出最后的努力来制止逐渐走向战争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他建议同日本人和解，或者达成暂时的解决办法，目的是使远东局势恢复到1941年7月的状况。这样，美国将取消石油禁运，中国和日本将开始会谈。作为回报，日本将不再向印度支那或者向中国东北同苏联交界的边境一带派遣部队，并同意即使在美国同德国和意大利交战的情况下，也不执行三国轴心协定。实际上这只是罗斯福的一厢情愿罢了。

虽说罗斯福对日本仍存有某种程度的幻想，但日美谈判仍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相反，在和谈的掩护下，日本法西斯却加紧调兵遣将，蠢蠢欲动了。11月6日，也就是早在赫尔11月27日照会之前，山本五十六就根据东条的指示发布联合舰队绝密的作战命令。

11月10日，特遣舰队司令南云中将发布了他的实施山本计划的第一号命令。虽然总参谋部和外务省达成了一项这样的谅解：如果与美国的外交谈判哪怕在最后一刻得到成功，对珍珠港的袭击也要取消，进击部队将回到北

纬 42 度、东经 170 度的集结地待命。但是，在东条英机决意推行战争政策的情况下，这种谅解是无法实现的。相反，调兵遣将和临战之前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6 艘航空母舰上的私人财物以及不必要的设备全被撤去，换上来的全是一桶桶的汽油。所有舰只一律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11 月 16 日，进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即所谓“木户部队”在内海口集中。这是一支强大的舰队，它包括 6 艘航空母舰、两艘配备有 14 英寸口径大炮的快速战列舰、两艘重型巡洋舰、1 艘轻型巡洋舰、9 艘驱逐舰、3 艘油船和 1 艘给养船。其中“赤诚”和“加贺”两艘母舰，是分别由一艘巡洋舰和一艘战列舰改装的，排水量 3 万吨。“飞虎”和“苍龙”的排水量只有 1.8 万吨，但设计比较现代化。“翔鹤”和“瑞鹤”是最新最大的母舰，826 英尺长，几乎与美国最强大的母舰“企业”号一样大小。6 艘母舰上载有 360 架飞机，其中有 81 架战斗机、135 架俯冲轰炸机、104 架高空（平行）轰炸机和 40 架鱼雷轰炸机。

第二天傍晚，山本总司令来到了“赤诚”号，给南云和主要人员送行。天一黑，“赤诚”便在两艘巡洋舰一左一右护卫下缓缓地驶出佐伯湾。舰上的灯火全部关闭，通讯设备上的晶体暂时全被取了下来，以保证不使用无线电通讯。但留在内海的舰只却发射出强波无线电通讯信号，以迷惑敌方的监听电台。

在“长门”号的后甲板上，山本背着双手在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凝视已在消失的母舰的黑影。对于“Z”作战计划他虽然怀有信心，但仍然害怕与美国开战。不久前他在给军事学院的同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处境是何等出奇啊！我不得不作出违反我个人意愿的决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全力去实现这个决定。此亦命乎？”

为了迷惑敌人，攻击舰的其他军舰，一艘艘按不规则间隔的时间，先后起锚开航了，各自按自己的航线出海，朝东京以北约 1000 英里的海面上的集合点驶去。如果所有舰只同时直接朝瓦胡岛出动，那么目标太明显了。珍珠港进击部队将在千岛群岛的择捉岛汇合。那里港湾水深，夏季浪涛汹涌，冬季出奇的平静。这个岛是个理想的汇合点。岛上只有一个三幢房子的村庄，一个小小的水泥码头，一个邮局和一个无线电台。为安全起见，“国后”

号海防艇扣住了所有外发的书信和电报，巡回艇则在希图湾兜捕渔民，封锁消息。

“加贺”号航空母舰是留在内海的最后一条舰只，正在把改进后的最后一批鱼雷装上。母舰一启航，舰长就把所有人员都集中在甲板上，宣布向希图湾进发，然后向珍珠港前进。

在“赤诚”号上，各舰长被告知了航线。有一位舰长问，如果在海参崴碰上苏联商船怎么办？回答是“击沉”。“不管挂哪国国旗，看见什么船只就击沉什么船只”。11 月 25 日黄昏，500 余名驾驶母舰飞机的飞行员拥挤在“赤诚”舰上的飞行员室内。室内的睡铺和桌子全被拆除。南云将军简要地谈到了这次偷袭。只是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才听说珍珠港一同。接着由作战参谋源田和空击队指挥官源田，指着珍珠港的模型，详细地讲明了如何向珍珠港进攻。每个飞行员都发给有美国军舰的照片和瓦胡岛附近能迫降的各岛屿的照片。如遇迫降，潜艇将在指定地点接应他们。之后，南云又作了一番动员，室内气氛异常激动，法西斯狂徒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随着战争的逼近，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在 11 月 29

日上午举行的军政高级官员联席会议上，东条首相对一些大臣的悲观情绪大动肝火。他说：“请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有能力占领东南亚，并取得足够的石油。三年内。我们逐步扩大这个共荣圈。至于航空汽油我们能想办法解决。钢铁呢，去年的产量是 476 万吨。三年后我们可以提高这个产量。”

“似乎目前倒一切顺利，”曾任过首相的海军提督冈田启介苦笑着说，“但有许多未知数。就以美国目前的军事工业而论，你不觉得多少有点危险吗？”

“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东条又怒又气，满口喷着唾沫星子说，就算我们不打，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不能向英美低声下气，在中国事变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丧失 16 万人，还有 200 多万人在吃苦头。不能再吃苦头了！如果再这样连续几年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我们已经丢了不少宝贵的战机！”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但东条仍一意孤行，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他说：“日本的兴衰全由神决定了。”

在东条详尽地阐述了日美谈判的冗长的经过后，军令部总长永野海军大将起立，激昂地宣称，海陆两军官兵都“热切希望以一死报效天皇，尽忠报国”。接着其他军政头目也报告了诸如国民士气、紧急预防措施、粮食供应以及国家经济财政等问题。

最后，东条恳请天皇批准开战。他说：“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政府与军方更紧密地团结，举国一致，确信必胜，不遗余力实现国家目标，以慰圣虑。”与会者除了向天皇鞠躬施礼外，再无别的话。就这样，天皇裕仁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罪恶文件上盖了御玺。

就在天皇批准开战三个小时后，山本用新密码给进攻珍珠港的攻击部队发出另一份稍长的电报：“登新高山 1208。”这就是说，按原定计划于 12 月 8 日发起攻击。

“登新高山”的电报，加重了先头攻击指挥官草鹿的战争责任感。他顿时觉得，他们将发起一场突然偷袭，然后疾风似地立即退回。不过，随着机动部队接近珍珠港，美国的巡逻飞机总还有可能在发起进攻前发现机动部队。如果是那样的话，草鹿已做好改变战术的准备，即使不能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也要全力进攻，力求重创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司令南云随即下令各舰长熄灯行驶，并把“Z”行动向全体士兵传达。随时作好战斗的准备。

为了欺骗对方，掩盖偷袭行动，在日本国内，宣传机器却大摆迷魂阵。

《日本时报》当天的标题是：《日本将重新作出努力，求得美国谅解》。在世界的另一边，山下奉文中将则正向各师团长、独立部队长和参谋人员宣读进攻的命令。他们一个个注意地倾听，他们知道日本的命运已处在紧要关头。几乎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

在美国方面，罗斯福总统虽然早已意识到同日本的会谈即将失败，在远东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一旦发生战争美国领土会遭到突然袭击。美国人往往看不起日本。他们认为，日本的军舰和飞机是模仿美国装备制造的，质量低劣。“近视的日本飞行员不能击中目标”。日本的“茶馆经济”在战时的压力下很快就会垮台。纽约小报《下午报》刊登一篇文章，写的是“我们如何用 60 天的时间战胜日本”的问题。绝大多数美国人过感恩节时没有过分不安的情绪。甚至罗斯福总统都设法离开首都前往温泉度假，直到国务卿给他打电话时才返回华盛顿。

在 12 月的整个第一周内，在华盛顿有一种感觉，认为有一台无法控制的机器已经运转起来，谁也不知道如何将它停下。赫尔继续同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进行毫无成果的会谈，同时他们在等待日本对美国 10 点计划的答复。罗斯福要求国会领导人不要连续休会三天以上。总统每天都同战时委员会开会。情报机构提供的关于日本军舰动向的报告不断送进来，破译的“魔术”密码透露，东京外务省已经通知它的驻外各使馆烧毁外交密码，这是即将断交的可靠迹象。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在前进，因为那些军舰在整个航行期间绝对不准发报。

12 月 5 日，星期五，罗斯福召开内阁会议，研究美日会谈问题。这时赫尔比平常更悲观了。“日本特使不想认真谈判，”他说，“我肯定他们都不想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确信，他们不光明正大，说话模棱两可，他们是我见到的最恶劣的人。”

海军部长诺克斯说：“你知道，总统先生，我们知道日本舰队在哪里。”罗斯福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要确保没有未经批准的人在场，然后才让海军部长接着说下去。“我们得到的非常秘密的情报表明，日本舰队已经出航，离开了港口，正在海上行驶。这个情报绝不能出这个房间。”

在罗斯福的追问下，诺克斯承认，关于日本舰队的动向，没有任何准确的情报，但是一切迹象表明，它在向南朝着新加坡的方向驶去。罗斯福逐个问了在座的人，一旦受到袭击，美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劳工部长珀金斯认为，总统不是想听取战略上的意见，而是想通过他们的反应对舆论进行估计。人们一致认为，如果新加坡受到袭击，美国应该援救英国人。会议结束时，有一个人乐观他说：“日本舰队出海也许是进行演习。”诺克斯发出了笑声。据珀金斯回忆说，这是“空洞而又多么滑稽的笑声啊”。

12 月 6 日，罗斯福仍亲自向日本天皇裕仁呼吁和平。来栖三郎曾告诉他，这是防止战争的唯一途径。他在电报中说：“我们两个人都有恢复传统的和睦，防止人类进一步死亡和毁灭全世界的神圣义务，这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伟大国家的人民，而且也是为了邻邦的人民。”

就在罗斯福向日本天皇呼吁和平的当天，日本报纸根据东条的指令，继续指责西方准备开战，为日军南进大造舆论。各报的标题是：“美国徒劳地拖延谈判，无意与日本和解”，“美国领导人商讨对日政策，但未有改变固执态度之迹象”，“恶意中伤，包围日本，践踏日本之和平意图，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

虽然罗斯福总统看过截获的日本“停止谈判”的照会，军政要员们也预感战争就要来临，但是他们却没有提高警惕，更没有作出必要的军事准备。就在 12 月 6 日星期六的晚上，美国上下到处都是歌舞升平，欢度周末。海军部长诺克斯仍在国家剧场观看《学生王子》；陆军情报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将军认为日本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因此并不特别忧虑。他给他的远东问题专家布拉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没有理由发布戒备令或布置夜班”；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正与夫人在迈尔斯堡安静地度周末。那天夜里，在华盛顿的军政高级官员，无论是总统罗斯福，还是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或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都没有料到一大清早日本人会袭击他们的珍珠港。

在瓦胡岛，那里的情况也和华盛顿一样，夏威夷海、陆两军司令根本就不愁珍珠港会遭到空袭。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在檀香山出席私人晚

宴后，就上床睡觉，明天上午要同陆军司令肖特将军去打高尔夫球，消除人们所传他们互不说话的流言蜚语。金梅尔和肖特都认为没有必要发布长期戒备令。因此港内 94 艘舰艇上的大部分人员，除少数值班外，都已安然就寝。那不过又是一个懒洋洋的太平无事的热带夜晚而已。

经过周末的狂欢乱舞之后，正当美国入沉入酣睡之际，停泊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小岛柱岛附近的日本联合舰队，已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必要时驶入内海接应机动部队。山本已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于是在和谈的烟幕下，一场来势凶猛的突然袭击就要发生了。正是：麻痹大意，必中奸计。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三章 珍珠港之难

珍珠军港遭袭击，有人狂笑有人泣；
惊雷唤醒沉睡梦，孤立主义该休矣。

世界风云多变，危在旦夕。出乎罗斯福和他的军政要员意料的、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了，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上午。罗斯福穿着儿子的一件旧毛衣，翻阅着集邮册，期望这个星期天会平安无事。他刚在办公桌上吃完午饭，正同顾问霍普金斯聊天。下午1点47分，电话铃响了，电话员表示歉意，说海军部长诺克斯打来电话，坚决要求和总统通话。

“总统先生，看样子日本人好像袭击了珍珠港！”诺克斯说。这天上午，海军部的电讯部门，侦获了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电文，那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向夏威夷的全部美国舰只发出的特急通知：“珍珠港遭到空袭——不是演习”。诺克斯收到这一信息，倒抽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可能是确实的，那准是菲律宾。”于是他急忙拿起电话筒，向总统报告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

“不会，不会！”当罗斯福把这一消息告诉霍普金斯时，这个洞察世界风云的政治顾问却认为日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袭击夏威夷。

罗斯福说：“这恰恰是日本人会采取的出乎意料的行动。就在他们谈论太平洋和平的时候，他们却密谋破坏和平。”他谈了一下自己为使美国不介入战争所作的努力，然后又怀着沉重的心情说：“如果这则消息属实，那就完全使我无法控制局势了，战争会越来越大；那末，日本人就要使他身不由己了。”

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与华盛顿的情况截然相反，1941年12月6日夜晚，在东京来说是个不平凡之夜。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及其军政要员，通宵未眠；他们在万里之外，通过电波，在指挥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向南亚和夏威夷群岛的进军。就在7日黎明（美国时间），日本联合舰队按照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的进攻，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它位于夏威夷群岛的中心瓦胡岛的南端，面积达598平方英里。港中央有个福特岛，是海军航空站。

12月7日这天，美国太平洋舰队共有86艘舰只停泊在珍珠港，其中有战列舰8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8艘，潜水艇5艘，并无美国航空母舰在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特遣队，拥有6艘航空母舰，载着423架飞机，循序前进，担任护航的是两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3艘潜水艇。另有27艘潜艇作为先遣队早已出发了。这支特遣舰队在11月26日离开择捉岛的单冠湾以后，选择了严寒和多雾的北方航线，隐蔽前进，以避免美国巡逻飞机和来往的商船。12月7日早晨6时许，日本特遣舰队到达了预定的停泊地点，即瓦胡岛以北230英里处，特遣舰队司令南云忠一随即命令第一批183架飞机，准备对珍珠港进行袭击。

夏威夷时间7日上午6时15分（华盛顿时间7日上午11时45分），第一批攻击队的183架飞机——水平轰炸机49架，鱼雷轰炸机40架，俯冲轰炸机51架，战斗机43架——从6艘航空母舰上一架接一架起飞了。在渊田

总指挥座机的带领下，第一次攻击机群在舰队上空盘旋了一大圈后，于6时25分从旗舰“赤诚”

号上空掠过，径直朝瓦胡岛方向飞去。

不久，东方晨曦微露，机翼下方一片漆黑的云海渐渐呈现出鱼肚色，天空开始放出蔚蓝色的亮光。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从雪白的云海四周射出耀眼的金光。

就在机动部队第一批攻击队的183架飞机从瓦胡岛以北230海里处起飞，直指珍珠港的时候，在该岛以西200海里的地方，18架机翼上涂着星形标记的飞机也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了，同样朝着珍珠港的方向飞去。这18架飞机是美国航空母舰“企业”号的SBD俯冲轰炸机。日本机动部队的官兵们，一面目送着出发的攻击队，一面祈祷神明，保佑他们攻击成功。而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官兵却与此相反，都很羡慕那些能比自己更早一点飞向夏威夷的飞行员。

为了加强威克岛的防御能力，“企业”号向该岛的海军陆战队运去了12架战斗机。本来运送飞机的任务完成后，“企业”号预定于当天上午7点半（夏威夷时间）通过珍珠港航道，8点在港内的锚地停泊。但是，“企业”号从威克岛返航的途中，由于天气不好，推迟了原来的计划。因为预定的行动计划被打乱了，所以“猛牛”司令哈策将军心里很不痛快。但是，日方的第一批攻击队开始发动攻击的时间是上午7时55分，假如“企业”号按预定计划行动的话，那么，它必将遭到和战列舰相同的命运，葬身于12米深的珍珠港内的浅海中。多亏这令人讨厌的坏天气，“企业”号才逃脱了这场灭顶之灾。

晨7时48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批零式飞机飞抵瓦胡岛北端的卡胡库角。透过云层，“加贺”舰战斗机队长志贺淑雄大尉，只能依稀辨认伸出在海上的陆地和滔滔白浪。转瞬间他瞥见了第一批突击队指挥官美津雄中佐的高空轰炸机长机，于是便等待着蓝色信号弹，那是令战斗机发动攻击的信号。这时珍珠港东西两侧的山峰上，云团簇拥，但在两山之间宽阔的军港上空，云层稀疏，阳光明亮，斜视的光线把一块块蔗田照得一片浓绿。

在这个区域里，有几架美国民航机在懒洋洋地盘旋，可是整个瓦胡基地上的陆军飞机，此刻却没有一架在空中。在希卡姆、贝洛兹和惠勒机场上，为了防止破坏，所有飞机都机翼对机翼地紧靠在一起。埃瓦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也是照此办理。在空中的美国军用飞机只有海军的7架巡逻机，它们正在西南方许多英里外巡逻。空防系统也毫无戒备。珍珠港内各舰上的780挺高射机枪有3/4无人值班，陆军的31门高射炮只有4门在阵地上，可是它们的炮弹在演习后已送回军需库，因为它们“容易松扣和生锈”。

到了卡胡库角上空后，渊田的长机开始从瓦胡岛西岸绕向珍珠港。晨7时49分整，渊田中佐用莫尔斯电码向机动部队发出命令：“托！托！托！”其含义是第一次全面攻击开始。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8艘战列舰和其他军舰，以及惠勒、希卡姆等机场上的几百架飞机。由于日本特务吉川长期活动所提供的情报，日本侵略者对全港的情况了如指掌，战斗任务明确而具体：战斗机43架用机枪扫射机场，粉碎美机迎击：俯冲轰炸机51架，负责破坏惠勒和希卡姆等机场；鱼雷轰炸机40架和高空轰炸机49架，攻击战列舰和各类舰只。于是，各类飞机腾空而起，寻找自己的捕获物。

当渊田中佐飞近目标时，面临一个战术抉择。如果他判断美国人果真毫

无准备，那么鱼雷机就直接向战列舰飞去；否则，战斗机就应该首先消灭前来拦截的飞机。前面的天空碧蓝碧蓝的，空空荡荡一片平静。此时，仍然没有一架美国战斗机升空迎战，也没有冒起任何高射炮火的烟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志贺的战斗机群后面，“苍龙”号的鱼雷轰炸机穿过科拉科拉山口横越岛屿上空，朝泊在福特岛东南沿海的庞大的战列舰飞去。这里7艘战列舰排成两列，里排5艘，外排2艘。一连串的飞机像“蜻蜓下卵似的”把鱼雷扔了下去，然后升到高空飞走了。几秒钟的寂静后，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战列舰“俄克拉何马”号左右晃动。几秒钟后，又有两枚鱼雷击中了舰身，军舰立时倾斜了约30度。

第二批鱼雷机和高空轰炸机对“加利福尼亚”号、“亚利桑那”号、“田纳西”号等战舰进行了袭击。鱼雷机没有击中“亚利桑那”号，然而几分钟后，高空轰炸机接连5颗炸弹命中，其中一颗炸弹穿过前甲板钻进了燃料储藏舱，引起了大火。顷刻之间，后舱储存的大约1600磅黑色炸药发生爆炸，并且引发了前舱的几百吨无烟火药。“亚利桑那”号犹如火山爆发。附近舰上的目睹者几乎蹦离了水面，裂成两半。只过了9分钟，这艘3.26万吨的巨型军舰的两段舰身都葬身海底了，只剩下残骸的熊熊火焰。看来舰上1500多名官兵无一能生还。再往前就是舰列的最后一条军舰“内华达”号，它的左舷中了一枚鱼雷，后甲板中了一颗炸弹，船首下沉了几英尺。各舰上的官兵纷纷弃舰跳海，企图游向不远的福特岛。但是水面已漂满了油，有些地方油层厚达六英寸。油终于着火烧起来了，在水中的人多半葬身火海。

至9时45分，这场致命性的突然袭击结束了，日本飞机离去了。但是，烟雾腾腾的珍珠港，到处是汽油燃烧的恶臭味。“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和“加利福尼亚”号战舰已经沉没。“西弗吉尼亚”号拖着火焰正在下沉。“内华达”号搁浅了。其余3艘战列舰“马里兰”号、“田纳西”号和“宾夕法尼亚”号都受重创。福特岛上的海军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没有一架能用了。

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和他的参谋们，从凌晨2时起，就在停泊于柱岛附近的旗舰“长门”上，坐着等候消息。他们一声不响地围桌而坐，时起身去看一张大地图。正当他们焦急等待的时候，突然话筒里传来了兴奋的喊声：“奇袭成功了！”这是密码军官从电讯室里的喊叫。他通过无线电收到了渊田发出的奇袭成功的预定信号：“托拉！托拉！托拉！”参谋军官们握手相庆，欣喜若狂。山本五十六更加洋洋自得，为胜利干杯。他在长期的心神不定后，现在如释重负。每隔几分钟，话筒里就重复一次前方飞机传来的捷报和美国人惊慌失措的报告。

的确，当日本轰炸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时，美国海军官兵有的在穿衣服，有的还在睡懒觉。夏威夷航空兵参谋长詹姆斯·莫利森上校在听到第一批炸弹爆炸时，正在刮胡子。他连忙赶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肖特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菲利普斯上校，告诉他日本人来袭击了。

“吉米！你昏了头吧？”菲利普斯说，“是不是喝多了？快醒醒！”莫利森把话筒举得高高的，让菲利普斯听听爆炸声。这下，菲利普斯相信了，其实是吓懵了。他大声说道，“我马上叫联络官同你联系。”就在这时，莫利森头顶上的天花板塌下来了。

海军部长诺克斯，正在宪法大街海军部的办公室里。时已过午，他感到

饿了，正要叫人送午餐时，海军作战部长斯培克将军冲了进来，手里拿着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的“并非演习”的电报。

“老天，这不大可能！”诺克斯惊呼，“一定说的菲律宾！我马上报告总统。”

当罗斯福知道这一消息后，马上打电话给国务卿赫尔。赫尔说，日本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刚到，正在外交官接待室等着接见。罗斯福认为，赫尔可以见他们，但不要提他已知道了珍珠港事件。态度要严肃、冷淡，“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打发走”。然后，总统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正在家里吃饭。总统激动地问他知道不知道已经出事了。

“是啊，”史汀生回答说，“听说来了电报，日本人正在暹罗湾挺进。”

“啊，不！我问的不是这个，”罗斯福说，“他们进攻夏威夷！正在轰炸珍珠港！”

这一消息使史汀生十分震惊。作为陆军部长他还蒙在鼓里。他感到惭愧。不过，他想，用不着再犹豫不决了。危机已经到来，它将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在国务院休息室里，野村和来栖急不可耐。直到下午2时20分才被引到了国务卿的办公室里。赫尔冷冷地与他们打招呼，拒绝握手，也没有请他们就座。

“我奉命应在下午1时向您递交这个答复。”这位日本海军将军一面用抱歉的语气说，一面把照会递过去。

“为什么要在下午1时交给我？”赫尔面容严肃、铁青。

“原因我不清楚。”野村回答。

原来，早在12月2日，以东条为首的日本军部最后确定12月8日（东京时间）发动战争。但为了麻痹美国，掩护突然袭击，以收出奇制胜之效，日本政府仍训令野村、来栖继续谈判，并警告他们不要使对方产生谈判已破裂的印象。直到12月6日20时30分，日本政府才把对美通牒发给野村，全文共分14段，陆续发出，至7日16时发电完毕。日本政府要求野村于华盛顿时间7日13时交给美国政府，即计划在进攻珍珠港之前20分钟通知美方。但由于日本大使馆译电、打字耽误了时间，所以当野村和来栖走进赫尔办公室并把对美通牒交给他时，正是华盛顿时间7日14时20分，即在日本第一批飞机开始袭击珍珠港之后一小时。

日本的这个通牒既未宣战，也没有断绝外交关系，只是在最后一段说：“鉴于美国政府的此种态度，帝国政府不得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谈判，也不能达成协议。特此通告美国政府表示遗憾。”由于赫尔已知道了这个通牒的内容，他迅速读完这个文件之后，两眼盯着野村和来栖厉声地说：“告诉你们，我在过去9个月里同你们所有的谈话，完全有案可查。我必须说，……在我50年全部公职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份文件有这么多无耻的谎言和歪曲，——这些无耻的谎言和歪曲是如此之多，以致我绝对想象不到今天在这个星球上有哪个政府能够说得出来。”

日本大使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是赫尔把手一抬，朝门口扬一扬脸，示意他们出去。野村尴尬地走到赫尔面前说了声再见，就灰溜溜地走了。但就在这两个日本人低着头转身向外走的时候，赫尔用田纳西家乡话骂道：“无赖加屎虫！”

晚上，美国助理国务卿阿道夫·柏利把两个日本使节软禁在一家豪华的

饭店里。野村大使要求给他一把武士刀，柏利拒绝了。野村一自杀，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有生命危险。

当晚 8 时 30 分，内阁在白宫二楼开会。罗斯福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阁员们脸朝着总统围成半圆形而坐。总统用庄严的语气宣布，这是自当年内战爆发时的那次会议以来最严肃的一次内阁会议。他首先列举了珍珠港的损失。这次太平洋舰队有 18 艘舰只沉没或受重创，188 架飞机被毁，159 架炸坏，美军死亡 2403 人，重伤和失踪 2233 人。但总算逃过了更大的浩劫，因为航空母舰幸亏出海去了，而且日本轰炸时漏掉了海军船坞内的油库和潜艇库。然后，罗斯福用缓慢的速度宣读了他打算在次日中午向国会提出的文告。

快到 9 时 30 分时，国会的领袖们进来了，罗斯福把夏威夷发生的事情坦率地告诉了他们。听的人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一片沉寂。罗斯福说完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问美国的舰队怎么会如此“睡在梦里”。美国人民对此也十分不满。在公众心目中，首先要查究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我们知道了日本的密码，怎么还会出事呢？”

事后查明，美国虽然掌握了一幅非常完整的日军活动情报图，但有关部门，特别是军事首脑机关，没有认真进行研究，以使这幅画满锯齿形曲线的情报图能够揭示真相。另外，还有些零星的情报资料根本未加利用。袭击珍珠港的那天早晨，一艘扫雷艇发现了港外一艘小型潜艇的潜望镜，巡逻艇迅即把它击沉。但这份情报在轰炸开始数小时以后才送达海军各指挥所。空军方面也接到了若干可疑情况的报告，但全然未予理睬。当地一位民航飞行员在早班飞行中发现了日本作战飞机，但他打电话向陆、空军司令部报告这一情况时，却遭到了嘲笑。雷达荧光屏上有关飞机逼近的报告，不是按常理被说成是从美国飞来的轰炸机后备队，便是干脆被不耐烦地搁置不理。

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调查了珍珠港的败绩。它那 39 卷听证录以严厉谴责陆、海军部，战地司令官和各级官兵而告终。该委员会查明，早在事变之前很久，国务卿就已经把责任推卸给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委员会严厉斥责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及陆军作战部门负责人杰罗上将没有通知下属各战地司令官，彼此协调配合又太差。夏威夷军区海陆军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陆军上将被查明，一贯玩忽职守，未能坚持有效的侦察和进行必要的联络，没有认识到谍报和其他有用情报的重要意义。然而，在事件发生后很久，历史学家们仔细搜寻证据，不仅发现直接有关方面的恶劣行为，而且发现金字塔式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也应当列为起恶劣作用的因素之一。

历史证明，美国这次遭受打击，完全是咎由自取。美国统治集团对于日本侵略者长期以来实行绥靖政策，对于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采取纵容态度，妄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并纵容日本北进去攻打苏联；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仅不去制裁日本侵略者，反而为日本大力输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米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所写的：“日本多年来一直利用从美国得到的物资建立海军和陆军以打击美国——当它反对我们的作战计划完成时，它就用这些东西反过来对准我们开枪。”美国姑息养奸，纵虎贻患，到头来自食其果。

其实，日本袭击珍珠港蓄谋已久。早在 1940 年 11 月，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日本南进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只有粉碎这支舰队，南进才能取胜。

1941 年 1 月 7 日，山本写信给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正式提出了偷袭珍

珍珠港的设想，主张在美国舰队主力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的情况下，以空军彻底击溃它。美国驻日大使馆从秘鲁外交官和其他方面得到了这个情报。1月27日，美国大使格鲁把这个重要情报电告国务院。第二天赫尔就把它转告了海军部和陆军部。同时，海军部长诺克斯也早就预料到：“同日本的战争，极有可能是由其对珍珠港的舰队或基地的突然袭击而开始。”

尽管如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却认为：“日本人的策略将是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他们既不会进攻菲律宾，也不会进攻夏威夷，而是将向泰国、法属印度支那推进，深入中国腹地，并且还可能进攻马来海峡。”他还认为，“日本人在适当的时机将要进攻俄国。”甚至就在12月6日下午日本进攻珍珠港前夕，罗斯福还在给日本天皇写信，呼吁和平。罗斯福等人的这种错误的战略思想，使美国军政要人完全丧失了警惕性，以致对临战前夕的许多异常现象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在珍珠港上空，按驻地陆海军共同防御作战计划规定，陆军部队应在周围20英里巡逻侦察，海军应在周围700至800英里巡逻侦察。但据后来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查明，在12月7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当地陆海军部队都没有执行这项规定。大量的事实说明，珍珠港事件绝非偶然。

最使美国人和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日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对东南亚展开了全面进攻，而且“旗开得胜”。

12月8日（东京时间）拂晓，山下奉文将军率领的日军在马来半岛靠近边境的东海岸三个地方同时登陆。进攻时，虽然浪高6英尺，但进展顺利，到日暮时，哥打巴鲁机场已经在日军手里了。就在这一天，日军还对香港、关岛、菲律宾群岛、威克岛和中途岛等地展开了进攻。

在马尼拉，麦克阿瑟的远东航空大队遭到毁灭性的轰炸。

12时25分，27架三菱制造的新式高空轰炸机隆隆飞到了克拉克机场北面只有20英里的打拉上空，对美国的“空中堡垒”和P—40B飞机进行了疯狂的扫射。随后，刚扫射了邻近一个战斗机机场的44架零式飞机意犹未尽，也赶来助威。曳光弹点着了油箱，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机场上到处浓烟滚滚，所有的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轰炸机和观测机都在燃烧。“空中堡垒”只剩下了3架，其余全部被毁。日本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战斗机也仅仅损失了7架。这是“珍珠港第二”。

至此，能用以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取胜的三股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一天之内就消灭了两股。这就是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那第三股威慑力量是英国海军上将“大拇指汤姆”菲利普斯将军指挥的强大舰队。但时隔不久，3.5万吨的大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被日本鱼雷轰炸机击沉了。从此，东条英机更加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他命令海陆军尽快占领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主要岛屿。

珍珠港事件促使了美国人的觉醒，罗斯福总统深感内疚。他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他决心把这一事件诉诸美国议会，并以此教育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击法西斯侵略者。

珍珠港这一幕结束后，下面就是由罗斯福写下他毕生中最光辉的篇章——充当一个与世界法西斯作殊死斗争的美国总统。正是：姑息养奸，招来大难；丢掉幻想，准备参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四章 向法西斯宣战

纵虎贻患教训深，三军动员要雪恨；
斩钉截铁命令下，总统挂帅看决心。

罗斯福弄清珍珠港遭难的确实消息后，表面上虽显得镇静自若，但内心却是满腔怒火。每当听到从夏威夷来的新消息，他都严肃地摇摇头。罗斯福想采取援救行动，同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讨论了军队的部署问题，指示国务卿赫尔随时向拉美国家介绍情况，使它们准备就绪，并命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所有的国防工厂和关键设施布置警戒。然而，总统不允许在白宫周围由军人站岗，因为白宫已经吸引了焦虑的美国人，他们聚集在栅栏外面，寻求新的保证和指导。

罗斯福把秘书塔利叫到他的书房时，漫长的冬天的阴影已开始降临。部长和将军们都离开了书房，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说：“请坐，格雷斯，明天我去国会发表讲话，我想口述我的讲稿，篇幅不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又把烟吐出来，开始以他通常口述信件的那种冷静的调子口述讲稿。他清晰地、慢慢地念出每一个字，小心谨慎他说出每一个标点符号和新的段落。讲稿共不到 1000 字，口述时没有犹豫，也没有重新考虑。

第二天上午，总统身披蓝色海军斗篷，乘车来到国会大厦要求向日本宣战时，在珍珠港被击沉的军舰露出的烟囱还冒着浓烟。锚地上最突出的是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歪歪斜斜的三角桅杆和“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船身。“亚利桑那”号已经成为 1000 多名海军官兵的坟墓。“俄克拉何马”号看上去就像一条试图冲上岸滩的巨鲸。一些小船慢慢地驶来驶去，从漂着一层油的水中打捞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尸体。总共有 19 艘军舰被击沉、击坏，其中包括太平洋舰队的全部作战舰只。有数百架飞机被毁，3000 多名官兵死亡或受重伤。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惨案。

当总统装着支架，由他儿子詹姆斯上尉搀扶着缓步穿过大厅时，欢呼声像暴风雨般地爆发了出来。罗斯福接受过无数次欢呼，但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在欢呼声里，有着一种发狂似的快慰之感，似乎他的出现使人们一下子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似乎所有这些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向他，并且通过他，向他们的祖国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罗斯福登上讲坛斜坡，走向演说的位置。他面对着沸腾的人群站在那里，面色安详而严峻，双目凝视前方。他一手扶着讲台，一手打开一个好像小学生使用的黑色笔记本。他的眼睛在大厅里环视片刻，看着坐在前排的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各国外交使节，然后抬头望望座无虚席的楼厅观众席，在那里他夫人埃莉诺同威尔逊的夫人坐在一起。在全国各地，美国人聚集在收音机前，倾听人们熟悉的声音。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 年 12 月 7 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蓄意的进攻。

美国和日本是和平相处的，根据日本的请求仍在同它的政府和天皇进行会谈，以期维护太平洋和平。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中队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的 1 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并未

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历史将会证明，夏威夷距日本这么遥远，表明这次进攻是经过许多天或甚至许多个星期精心策划的。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蓄意以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维护和平的愿望来欺骗美国。

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檀香山）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鱼雷攻击。

昨天，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人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的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不言自明。美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了我们的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

不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无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信赖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总统的演说历时 6 分钟多一点。现在讲话结束了，他抬起头，微笑着向人民挥手致意。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这个简单的演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于 1917 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说，份量重得多，影响深远得多。参议院以 82 票对零票，众议院以 388 票对 1 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2 月 8 日，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9 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进行了四年之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10 日又对德国宣战。接着对日本宣战的还有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

在珍珠港事变两天以后的星期二晚上，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总统在这篇“炉边谈话”中，针对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着重说明了法西斯匪徒背信弃义、惯用偷袭的办法发动侵略战争。他说，日本过去 10 年中在亚洲所走的道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和非洲所走的道路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他们所要鲸吞的国家发动入侵。

你看：

10年前，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满洲——未加警告。

在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未加警告。

在1938年，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未加警告。

在1939年，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未加警告。

同样，在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未加警告。

在1940年，希特勒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未加警告。

在1940年，意大利先后进攻法国和希腊——未加警告。

而今年。

1941年，轴心国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控制了巴尔干——未加警告。

还是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未加警告。

而现在日本进攻了马来亚和泰国以及美国——未加警告。

“这完全是一个模式。”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在强盗行径横行的世界里，就谈不上什么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个人的安全。”总统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他说：“这不仅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也将是一场艰苦的战争。我们所需要的物资、金钱必须成倍地不断地增加。生产必须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也必须加强在整个南北美洲和全世界同纳粹分子和日本军阀作战的其他陆、海、空军。”为此，他要求在一切军事工业，包括重要原料的生产部门，都实行每星期七天的工作制，以加速现有的一切生产。此外，还要建立更多的新厂，扩建老厂，把许多小厂转向战时需要，以迅速增加生产能力。

在日本方面，以东条为首的法西斯政府，虽然对珍珠港和南亚已经发动了进攻，但还没有宣布战争。在12月8日日出前一个小时东条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鸠田繁太郎报告了珍珠港的结果，法西斯头目们狂欢乱叫。会上匆匆草拟了宣战诏书，由阁员们签名后送往枢密院。

东京时间7时正，日本广播公司正式广播了日本南进的紧急新闻。消息说，“大本营陆海军12月8日上午6时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天明以前在太平洋同美军和英军进入战斗状态。”这条消息通过架设在大街上的广播喇叭传开了。行人止住脚步，惊呆了。接着喇叭里放送军乐，受军国主义熏陶的一些青年人开始鼓掌，像看球赛时那样。不过，多数中、老年人神情紧张，对日本前途感到担忧。在广场上，腰挂铃挡的卖报人挟着“号外”，东奔西跑，铃声之响在皇宫东厢第三接待室都可听见。

随后，下午零点20分，东条政府发表了“贼喊捉贼”的宣战声明。声明说：“盖确保东亚之安定，贡献于世界和平，乃是帝国既定之国策。”声明首先炫耀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赫赫战功——“支那重要地点悉归我手”——之后，对美英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说：“东亚之安定与帝国的存在正濒临危殆。事已至此，遂颁发对美国及英国宣战之大诏。如今皇国之隆替，东亚之兴废，端赖此一举。”东条号召日本人民“铁石般团结，踊跃奋起，举国家之总力从事征战，以之永久剔除东亚之祸根，奉安圣虑。”

电台里接着播放了《军舰进行曲》。歌中唱道：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正当东条之流欢庆在太平洋取得赫赫战功的时候，希特勒从东线回到了柏林。他为两件事发愁，一是苏联在莫斯科前线开始了大反攻，二是太平洋传来的消息。珍珠港事件在顷刻之间解除了苏联唯恐东面受敌的后顾之忧，现在斯大林可以几乎把他在亚洲的力量全部用来对付德国了。几个月来，德国“元首”一再催促日本攻打苏联，避免与美国交战；与此同时，东条却迫不及待，一再督促大岛浩大使向希特勒索取书面保证，要希特勒在一旦日、美开战时进攻美国。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坚持南进，向盟国“软腹部”开刀，却不愿作出任何袭击苏联的承诺。

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东条首相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他同时提醒“元首”，根据三国条约，只有在日本直接遭到进攻时，德国才有义务援助日本。

“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这个条约在政治上就死亡了。”希特勒说。

希特勒的态度如此大变，令人吃惊。因为他过去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美国不参加欧战，而现在希特勒却主张与美国摊牌了。这样一来，美国总统用不着担心对德国宣战会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了。纳粹头子开始狂热地打他的如意算盘：像美国这么一个“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国家，怎能指望保持团结呢？何况珍珠港事件的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俄国人在反攻，“德国人都在担心美国迟早要参加这场战争”。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知道希特勒“为了威信关系”已经打定主意要先宣战，于是他指示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托姆森，不要与美国国务院有任何接触。“我们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让那里的政府在这一步上抢在我们的前面。”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发表了向美国宣战的狂妄演说。“我们总是先动手！我们总是先下手！”希特勒咒骂罗斯福是和威尔逊一样的狂人。“他始而煽动战争，继而颠倒是非，再用基督教徒的伪善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把人类引向战争，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旁人是多么正当。”

“现在总算有一个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糟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大声喊叫道，“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谈判以后，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感到深深满意。”

“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照会发给美国代办，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从即日起已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的话被纳粹议员们疯狂的欢呼声、掌声淹没了。

正是在这一天，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申明德、意、日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媾和的“决心”。同时规定了瓜分世界的范围，商定在胜利结束战争之后，缔约国应根据三国同盟的精神，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事业中进行合作。

条约签订三天后，希特勒为了进一步密切同日本的友好关系，特给大岛大使颁发了德国雄鹰大十字勋章。希特勒说：“你们用这种办法同美国宣战

做得对。尽可能长久地谈下去是恰当的，但是如果发现对方只是为了拖延，为了羞辱你，而不是想达成协议，那么就必须进行打击，而且打击得越重越好。”

在反法西斯盟国这方面，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了改组。尼米兹接替金梅尔指挥太平洋海军。这位头发斑白但看上去精神抖擞的将军，一到舰队就发现了他怕发现的东西——悲观失望的情绪。士气“低到不可再低”的程度，不少人患了“恐日病”，他甚至看到珍珠港事件的打击已经使几位高级将领的头发都白了。

尼米兹召见了原来的参谋班子，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在遵医嘱吃镇静剂。“不会有任何调动，我对各位完全信任，”尼米兹说，“我们挨了一次猛揍，但是我对于最后的胜利毫无怀疑，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紧整顿军队，修复军舰，准备反击。”

正当罗斯福大事进行战备动员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匆匆来到美国；他广泛接触，到处进行反法西斯的鼓动宣传。“今天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丘吉尔富有感情地说。他在白宫南阳台上站在罗斯福旁边，向聚集在南草坪参加传统的白宫圣诞树点灯仪式的三万名听众发表演讲。“让儿童们快乐欢笑地过一夜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玩得更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也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然后再重新去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任务和艰难的岁月吧。我们决心要以我们自己的牺牲和勇敢使得这些孩子不致被人夺去他们的幸福，不致被人剥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安宁的世界上的权利。”

圣诞节那一天，罗斯福和丘吉尔还参加了在卫理公会礼拜堂里举行的一次各教派联合礼拜仪式。哈里斯牧师为总统和首相祈祷。他为首相祈祷时说：“由于上帝您有力的援助，他得以继续领导他的英勇人民，不怕流血、流汗、流泪，去建造一个新世界，使善良的人们可以在那里共同生活，而无人敢于打扰和制造恐惧。”会众歌唱《啊，小小的伯利恒镇》，里面有这样几行：

然而在阴暗的街中闪耀着
永远不灭的光芒；
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今晚集中在你身上。

圣诞节过后，丘吉尔又向美国国会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秘的天赋；但是我仍然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心。这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场内爆发了一阵自发的热烈掌声。

当天下午，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与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军政要员，举行了以“阿卡迪亚”为代号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体制，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确定希特勒是主要敌人，认为太平洋战争暂时必须是一场固定阵地的战争，目前主要是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对敌，会议还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 ABDA（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韦维尔将军任总司令。

“阿卡迪亚”会议持续了两周。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宣言》比《大西洋宪章》前进了一大步。由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代表签字的《联合国宣言》内容如下：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 1941 年 8 月 14 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所作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内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方案业已表示赞同，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

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现正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丘吉尔在 12 月 29 日动身去加拿大前，已同罗斯福共同决定了《宣言》的最后文本。在征求各参与国政府意见后，最后的修改出自罗斯福的手笔。他用自己创造的非常得意的“联合国”名字代替“合作国”。

12 月 30 日，丘吉尔打电报向罗斯福表示：如果《宣言》能够按时通过，那就是“一项蛮不错的成就了”。果然如此，两天后，即 1942 年元旦，26 个国家的代表汇集白宫，在文件上签了字，于是联合国诞生了，而全球各地祈求重见自由和建立持久和平的亿万人们，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有希望的信息。

必须记注，这一部新的世界交响乐的前奏，是在太平洋盟军节节溃败的可惊消息不绝于耳之际谱写成的。当时日军席卷马来亚和菲律宾；他们的伞兵第一次在荷属东印度降落；他们夺取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并向马尼拉进军，把麦克阿瑟和最后一支美菲军队绝望地围困在巴丹半岛南端和科雷吉多尔岛上。

我们还必须记住：这时，美国的威望正在迅速下降，在远东尤其如此。日本的宣传员得意洋洋地高喊：“美国的海军到哪里去了？”看到一向傲慢而富有的美国人竟然对于遍布西太平洋的盟友无法给以援助，甚至对自己被围的孤军也都束手无策，他们更是抓住机会尽情而痛快地大加挖苦。

为了尽快扭转败局，罗斯福在 1942 年 1 月 6 日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不能抱着防御的态度。当我们把军事力量和资源充分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敌人进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再打击他们。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把敌人挡住，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把战争带给敌人，带到敌人的本土上去。”

为此，罗斯福总统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军，工人、农民要加紧生产，为早日赢得胜利多生产物资，多生产军火。在总统的建议下，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征兵法，把要求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从 18 岁到 65 岁的男子。从 20 岁到 44 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均须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 6 个月。根据选征兵役法，对大约 3100 万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将近 1000 万人被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志愿入伍。到 1945 年，陆军约有 820 万人，其中 2/3 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 390 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 25 万人。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实行了一项重要的军事革新，就是在陆海空三军中广泛使用妇

女，尽量使男子摆脱非战斗任务。在 1942 年全国约有数十万妇女从军，担负了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任务，为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柏林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被激怒而团结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树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绝不罢休。”

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要求政府有关部局马上采取有效步骤，力求做到：

第一，努力提高生产飞机的速度，以便在 1942 年生产 6 万架，这比政府一年前订的目标多生产 1 万架。其中包括供作战用的 4.5 万架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驱逐机。而且要继续保持增产速度，以便在 1943 年保证生产 12.5 万架飞机，其中包括 10 万架作战飞机。

第二，提高生产坦克的速度，保证在今年——1942 年内生产 4.5 万辆，并且继续提高，以便在 1943 年生产 7.5 万辆坦克。

第三，努力提高生产防空火炮的速度，1942 年内生产 2 万门，并且继续提高，以便保证在 1943 年生产 3.5 万门防空火炮。

第四，努力提高运输船只的生产速度，要求在 1942 年内建造总数为 600 万载重吨的船只，而 1941 年完成的是 110 万载重吨。最后还要继续提高，以便在 1943 年建造 1000 万吨船舶。

当罗斯福向国会宣读这一振奋人心的计划时，他说：“这些数字以及生产许许多多其他武器的类似数字，是向日本和纳粹稍微提示一下：他们袭击珍珠港到底得到了什么！”国会报之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罗斯福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安全，为了进步，为了和平，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仅是为了一代人，而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人。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积弊和滴疾。”

总统说：“我们的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野蛮的犬儒主义和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我们则是出于一种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这就是眼前日夜都在深入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场斗争。”罗斯福说，“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容、情理、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报酬。”

罗斯福这一鼓舞人心的演说，在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后，在人心动荡恐惧的情况下，为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

病夫挂帅举世惊，意志坚定似钢硬；全国军民齐动员，试看顽敌再逞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五章 严峻的考验

天气越冷越刮风，严峻考验在严冬；
亚太前线连失利，艰苦环境识英雄。

美国历史学家舍伍德说，在珍珠港事变后那个被称为“灾难之冬”的日子里，罗斯福经受着美国历任总统所没有经历过的严峻考验。

1941年圣诞节的那一个星期，使人心灰意冷的失败消息像潮水般地涌向白宫，只有苏德战场苏联红军发出了节日的欢呼。当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同他们的军事顾问们坐在一起，反复推敲进行全球战争的共同战略时，他们至少可以从下面的喜讯中得到安慰：德国的装甲部队终于在白雪盖顶的克里姆林宫前不到20英里的地方被阻挡住了。与当年的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征服苏联的美梦在莫斯科城前破灭了，冰雪严寒迫使德国人走向失败，英勇的苏联红军一直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所有反纳粹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为德国闪电战的第一次失败感到高兴。”丘吉尔指出，“只要德国军队陷入东方的拼死搏斗，我们岛国遭受入侵的威胁就可解除。”

纳粹头子认为，进攻莫斯科遭到的失败，在他掌握了这个战役的全部指挥权之后就得以扭转。东京正在举城庆祝珍珠港的胜利，纳粹失败的含义几乎没有引起这个轴心国的最新伙伴的注意。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正在大力推行他那“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

美国人确实叫喊要进行一场报复日本的全面战争；但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的协议，已让陆军和海军集中力量打败德国，同时守住太平洋中部防线。英国眼前可能不会遭到入侵，但仍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使用“群狼战术”的德国潜艇正在咬断大西洋供应线，为此丘吉尔正向美国总统紧急呼救。

12月23日，当亨利·波纳尔将军飞到新加坡，从空军中将布鲁克·波帕姆手里接过指挥权的时候，他得知在退罗边界以南的霹雳河沿线阻止敌人入侵马来亚的防守计划正在破产。山下奉文将军周密计划的协同进击势如破竹，400英里长的马来半岛，他的军队几乎征服了1/3，占领了许多锡矿和橡胶种植园。在北面1600英里的香港，总督号召驻军英勇抵抗：“为英王和英帝国坚守这座城市。”可是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敌人已经突破这座岛屿的防线，分割英军的阵地。

在中国南海彼岸的菲律宾，本间将军的另外1万多名日本士兵在拉蒙湾登陆，准备在南部钳形运动的背后增添一支打击力量，这场攻势现在离马尼拉还不到60英里。麦克阿瑟宣布菲律宾首都为不设防城市，日本人不予理睬，出动飞机轰炸美军司令部所在地火星人大厦。美军撤退到已丹的最后步骤已经作出。美国亚洲舰队剩下的巡逻艇撤退到吕宋岛西岸的海湾里躲避起来，潜艇已经撤退到婆罗洲和爪哇的港口。遭到轰炸的甲米地军港的弹药和供应品，不能运抵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尔岛，只好就地用炸药炸掉了。吕宋岛上仅有的4架战斗机，在布里尔顿将军乘上最后一架美国运输机之后，于圣诞夜晚飞走了。麦克阿瑟向他告别时恳求说：“我希望你能把我们所作的努力告诉美国人民，以便维护我作为一个战士的声誉。”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最后一个登上“唐埃斯塔班”号轮船，渡过30英里宽的海峡，来到蛆抖形的小岛科雷吉多尔岛，这座岛屿扼守着马

尼拉湾的门户。菲律宾总统奎松和他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同麦克阿瑟的其余工作人员和家属一起挤在这条船上。乘客的绝望心情和马尼拉湾一片银色月光的美景形成尖锐对照。

在被日本海军飞机轰炸后的珍珠港，几乎无人还有心情欢度圣诞节。海军上将尼米兹在前一天乘坐泛美航空公司快速班机飞来就任新职。他发现瓦胡岛遭到袭击后已很低落的士气，在援救威克岛失败后就更加低落了。这个不吉祥的圣诞夜，扑灭了沉在海底的“西弗吉尼亚”号战舰船体内的最后一线生机。5个月以后，打捞队发现困在A—小密封舱里的6名水手的尸体——舱壁上用粉笔划的16个X默默地证明6位水手靠军用干粮苦熬了两个多星期，最后由于生命必需的氧气已用完而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死去。

受美英轻视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打乱了同盟国过去的一切估计和推测。日军来势之猛，往往使华盛顿和伦敦的地图室墙上的标针大大落于形势之后。某一地点告急，要赶派生力军去增援，但是被围困的指挥官甚至还没有接到无线电的通知，敌军却已先到了。

珍珠港事变后的几个月里，日本所征服的地区好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扇柄就在东京，扇子的半径长达3000多英里，向东伸展到中太平洋，向南伸到澳大利亚沿岸，向西直达印度的海岸。一个大帝国疆土扩张之迅速是史无前例的。用不着一位军事学家的讲解就可以知道，日本正在不断地为自己取得数不清的资源和基地，从而使它可以任意向各方继续推进。最可怕的前景，也就是后来险些儿成为事实的，是德军突入中东和日军打通印度，从而将实现两个轴心大国的会师和他们对一切资源的共享。当然这种前景最终并没有实现，但是在一连几个月里的许多重要时刻，连那“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士”都不敢打赌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在阿卡迪亚会议结束后，霍普金斯进驻海军医院治疗的两周期间，被称为“沙漠之狐”的纳粹猛将隆美尔突然转入反攻，利比亚方面败北的消息又逐渐传开了；日军进到马来半岛的顶端，进一步就可以包围新加坡；他们轰炸滇缅路的卸货港仰光；他们在婆罗洲、西里伯斯、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和所罗门群岛登陆，从那里可以威胁美国到澳大利亚的生命线。霍普金斯极为担心公众的士气，作为总统顾问，他尽力为罗斯福分忧解愁。他怕坏消息纷纷传来会引起孤立主义情绪的复活。他预料有人会恶意地高喊：“我们早就这样告诉你们了！”

当时美国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日本特务也非常活跃。丘吉尔刚一走，有关“阿卡迪亚”的各种决议就被一名日本特务搞到了。一个名叫“萨顿”的被革职的美国少校，在法拉格特广场的陆海军俱乐部里，从朋友口中套取了这个情报，把它转给日本间谍头子智海中佐，萨顿对其主子说，美国原先的全力以赴对日作战的意图已有极大改变，盟军将在尽量挡住日本推进的同时，集中力量击败希特勒。他甚至知道了击败日本的最后计划的详细情况：用潜艇群和大型轰炸机协同攻击，轰炸机从中国起飞轰炸九州，用潜艇把通向日本本土的水路全部切断。这一情报通过两个途径送回了日本：一个途径是当地的一个德国特务，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用密码向柏林发情报；另一个途径是用隐形墨水书写，墨水是花了2000美元从另一个德国特务那里买来的，写好后用普通的航空信写给中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本海军武官，转发东京大本营。

东条对这一情报十分重视，更加坚定了他横扫东南亚的决心。按照东条

的要求，日本南方军的作战计划，主要是摧毁美、英、荷在东南亚的基地，强占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俾斯麦群岛、荷属帝汶等重要地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南方军主力包括 11 个师团和两个飞行集团。海军出动了第二舰队、第三舰队、南遣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陆海军航空队的第一线飞机共 700 架左右。总共约 40 万人。

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日本侵略者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就对南亚展开了进攻。关岛于 12 月 10 日被日军占领，美军 330 人全部投降。同一天，日军还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岛和托拉华岛。威克岛上的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击沉日舰 2 艘。12 月 16 日，进攻珍珠港返航的一部分日本舰只前去增援，到 12 月 22 日，美军被迫投降。守卫香港的英军吹嘘说，他们至少能守 6 个月，但到 12 月 25 日就投降了。

在东南亚，东条猎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泰国。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北与缅甸接壤，南临马来亚，是日本侵略者早已觊觎的前进基地。日军进入这个国家后，东条就把同盟条约强加在它的头上。12 月 21 日条约正式签字，这样日本军国主义就把泰国绑到了它的战车上，给泰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

马来亚战役是日军侵占南洋各地的最重要的战役之一。担任陆上作战的是山下奉文指挥的第二十五军，由 4 个师团组成；海军专门建立了马来亚作战舰队。英国为了保卫它在东方的这一重要的战略据点，先后调集 10 万陆军，随之 3.5 万吨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却敌”号也到达新加坡，组成了新的远东舰队，司令是菲利普斯海军中将。英国政府想以此显示威力，试图阻止日本南进。然而，日本侵略者包藏祸心，蓄谋已久，锋芒逼人，在进攻的第三天，号称“不沉之舰”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就被日机击沉了。这对英军士气影响极大。英国军事评论家富勒写道：“这个损失对新加坡的精神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它预示着未来的灾难”。“事实上，至少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本身存在的理由也同这两艘军舰一齐消失了，它现在是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大失所望。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过如此更直接的震惊。”

的确，英军失去这两艘战舰之后，士气沮丧，不堪一击，很快就退到槟榔屿。12 月 18 日槟榔屿陷落，月底关丹失守。2 月 8 日，日军开始对新加坡发动总攻。连攻三日英军就投降了。从此新加坡这个“狮子城”，举世闻名的要塞，属于日本人了。前后 70 天，山下奉文以伤亡 9824 人的代价，自北向南席卷马来半岛 650 英里，直至占领新加坡。英军伤亡略少于日军，但是投降的军人却是 13 万之多。这一胜利，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他们再次戏剧性地向全世界炫耀了武力。日本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短短三天内攻下新加坡，只有我神武皇军才能立此殊勋。”大本营宣传部长大平秀雄宣称：“日本乃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

马来亚战役的胜利，更加助长了东条进攻菲律宾的决心。在 12 月 8 日和 10 日，日本飞机连续对马尼拉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基本上摧毁了麦克阿瑟的空军。接着，日军就在吕宋北部的阿帕里登陆。此后，又在吕宋西海岸的维甘和东南部的黎牙实比登陆，美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麦克阿瑟估计到，日军主力将在仁牙因湾登陆，由于美国空军已损失殆尽，陆军也减员一半，无法阻挡。因此，美菲军队便主动撤退到巴丹半岛，凭借科雷吉多尔要塞进行防守。他们炸毁了 184 座桥梁，及时地阻止了日军的进攻。

1942 年的第一个星期结束之前，大约三万名菲律宾和美国的士兵在一道坚固的天然防线后面挖壕固守；这道横贯巴丹半岛的阿布凯防线，穿过沼泽地和纳蒂布山上的两座火山峰。在这道防线之后约 20 英里，荒凉的马里韦莱斯山坡上的退却阵地正在进行战备。这是“桔色作战计划”设计的防御，由于有 1.5 万美国部队和 6.5 万菲律宾部队可供调遣，麦克阿瑟预料能够在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内阻止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但是，麦克阿瑟现在必须为他的灾难性的海滩防御战略付出沉重的代价。军需官透露，撤退时带的大米还不够吃 20 天，面粉只够吃 30 天，鱼肉罐头够吃 50 天。这些食品供给 8 万部队和 2.6 万名涌向巴丹的平民，还不够吃一个月。各种医疗供应，从治疗疟疾的奎宁到外科手术用的纱布，都很缺乏，这一切使他们更困难了。日军开始包围的时候，麦克阿瑟下令每人食品配给减半。罗斯福总统几次想通过日本海上封锁线向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运送给养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后来，骑兵的马已经没有什么饲料可喂了，温赖特将军含着眼泪下令把所有的军马都杀了，包括他自己心爱的良驹约瑟夫·康拉德在内。

麦克阿瑟试图重振队伍士气，他在 1 月 15 日颁布了一道命令：“美国的援助正在途中。数以千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正在调运……我们在巴丹的部队比进攻我们的日军还要多……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将挫败敌人的进攻……我们战斗，就会赢得胜利；我们撤退，就会毁灭。”但是，勇气和决心还不足以挫败日军的屡次进攻。当“数以千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未见到达的时候，一股致命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在前线散兵坑里滋长起来。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美国士兵，用粉笔在头盔上划了 V 字——不是代表“胜利”（Victory），而是代表“炮灰”（Viciim）。昼夜战斗，快把他们的锐气、精力消磨光了。

白天，敌人从空中和地面向他们发起无情的攻击；晚上，扩音器不停的嘲骂和鞭炮的僻啪作响，吵得他们不得安宁。绝望的情绪在蔓延，睡眠不足，食品、药品缺乏，使死亡率直线上升。美国兵的忿恨情绪蔓延到菲律宾人中间，二次大战期间最动摇军心、没完没了的歌词发泄了这样的情绪：

我们是巴丹的孤零兵，
没有妈，没有爸，没有山姆大叔，
没有婶，没有叔，没有侄儿和弟兄，
病无药，战无飞机和大炮，
哪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来关照。

1 月 20 日晚上，突破了纳蒂布山坡右翼阵地的 5000 名新到的日军发起进攻，麦克阿瑟的阿布凯前沿防线开始崩溃。第二天，温赖特将军的左翼阵地遭到猛烈空袭，也开始崩溃。后备部队紧急调上去支援那摇摇欲坠的前线。“我亲自选择和准备了这个阵地，它是固若金汤的，”他发电向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出保证。“我打算血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在极其困难的

情况下，士兵们仍在奋力拼搏。

东条英机为了尽快解决菲律宾战场的僵持局面，三月间又增派两个步兵师团和两个炮兵团对麦克阿瑟展开新的进攻。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为了保全面子，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了日军的俘虏，便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温赖特中将指挥，让他自己到澳大利亚去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3月11日晚，麦克阿瑟携夫人和4岁的儿子，乘着巴尔克利上尉的鱼雷艇偷偷地离开了科雷吉多尔。在尔后紧张的45小时里，巴尔克利指挥的PT41艇穿过被日军控制的海面，于13日天刚亮的时候在棉兰老岛北岸靠近台尔蒙菠萝罐头厂附近靠岸登陆。下船时，麦克阿瑟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他对巴尔克利说，他要为他和艇上的人申请银星章。“你们把我从虎口中救了出来，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麦克阿瑟的临阵脱逃，在美国军队中也引起了对他的蔑视。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老麦把他们抛弃了，所以当时军队中流行着一首用《共和国战歌》的曲调写的讽刺歌曲：

老麦老麦不窝囊，
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
罗斯福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
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
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直跳。

东条英机本来就为巴丹的战局不高兴，听到麦克阿瑟逃跑的消息后更加不快。这位战争狂人，为了污辱美国人，原准备把麦

克阿瑟生擒后，弄到东京游街示众，不料他却溜之大吉了。为此，他恼羞成怒，随即命令本间将军再次发动声势更大的进攻。

4月2日是耶稣受难日的前夕，更有意义的是，这一天也是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的生日前夕。夜幕降临时，5万名日军已集结待命，准备大举进攻。在他们后边，150门大炮、榴弹炮和迫击炮，准备举行这次战役开始以来最猛烈的炮击。在前线的另一边是7.8万名饿得发慌的美军和菲律宾军，其中只有2.7万人是列为“有战斗力”的人员，而这些人中间却有3/4的人因患过疟疾而身体虚弱。一早，天气晴朗，10点钟炮击就开始了。在日军强烈炮火攻击下，美军和菲军乱作一团，纷纷弃阵而逃，有的走小路，有的翻山越岭，有的则沿着海岸公路跑。到处是混乱，这些筋疲力尽的人是在恐怖的驱策下迈动着脚步。

4月9日，吕宋部队司令爱德华·金少将率部投降，7.6万名美军和菲律宾军作了日军的俘虏。科雷吉多尔要塞守到5月6日。7日深夜，美远东军司令温赖特将军通过马尼拉电台命令菲律宾所有的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尽管如此，棉兰老的3.6万名军队只有7000人（主要是美国人）向日军投降，其余2.9万人拒绝服从命令，带着武器上山打游击去了。至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菲律宾所有重要的城镇和港口，菲律宾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艰苦的抗战阶段。

荷属东印度是日本帝国主义与美、英、荷盟军争夺的主要战场。东条坚持南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侵夺南洋的重要资源，尤其是石油。为了不让荷印当局把石油区设施破坏，不让他们把爪哇建成强大的堡垒，日本侵略者急

于要迅速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在那艰难的日子里，盟军战区的电报长篇累牍地源源而来。每封电文只有增添人们的失望。到 2 月 23 日，战区司令韦维尔显然已经没有办法行使 ABDA（美英荷澳）战区的指挥权了。联合参谋长会议命令解散他在爪哇的指挥部，由荷兰方面负责防守这个资源丰富、人口稠密、战略上攸关大局的岛屿。在下达这个重要命令的同一天，霍普金斯接到由荷属东印度代理总督范·穆克发来的冗长而可怜的海底电报。范·穆克三周之前刚离开华盛顿回到爪哇任所。他在动身的时候给霍普金斯写信说：“我深信你对战局的处理以及对远东的总政策已经胸有成竹了。”现在呢，他用绝望中挣扎的语调恳求不要决定放弃 ABDA 战区的作战。他详细地提出他认为可以保住爪哇的办法，尤其是用美国航空母舰“兰利”号运送战斗机。电文结尾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作出坚强而积极的决定。在你们考虑期间，千万不要停止运送物资和兵员，时间从来没有这样的紧迫。”

霍普金斯回答说：“在华盛顿的各方当局一致决心用一切现存手段支持爪哇的战斗，包括输送可以派出的一切战斗机。”他说，没有放弃保卫爪哇战斗的部署。其实，这都是好心人的愿望，但不幸的是，它们不是建立在战局可怕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过了两天，“兰利”号在爪哇海战中被击沉。这个海域的同盟国舰队的大多数舰只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包括巡洋舰“休斯敦”号，就是罗斯福过去时常在海上度假时的坐舰。这时，盟国的海、空军力量都不足以阻止日军在爪哇登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岛屿被日军占领了，守军投降了。现在，澳大利亚的北海岸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爪哇投降的第二天，日本夺取了仰光，切断了滇缅路的人海通道。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博士的话来说，当时的局势“简直绝望了。”日本的太阳旗真的在南洋各地升起来了，不到半年它侵占的领土已达 380 万平方公里，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十多倍，人口达 1.5 亿多。而这些地方的安全，原来多半是靠大英帝国的力量来维持的。目前，这个传统的力量在苏伊士以东显得异常脆弱；即使在中东，它究竟有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难说。因此，罗斯福的困境是以前历任美国总统所未曾经历过的，可以说连做梦都意想不到的。

海上运输情况也十分不妙。向苏联输送军需品的整个任务，以及向英国运送军火和支援非洲与中东的作战行动，由于大西洋战争的新发展而严重地复杂化了。1 月中旬，德国向美国发动攻势。德国在这方面唯一适用的武器就是潜水艇，它现在已成为十分令人恐怖的有效武器了；而防御办法的差劲实在是难以原谅的。德国潜水艇竟然钻到可以望见纽约百老汇光芒的地方，在距离东海岸几百码的范围内，击沉了许多船只。损失的数字从这多灾多难的冬季所公布的可怕损失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来。德国潜水艇在两个月内在西大西洋击沉了 132 艘轮船。这种损失的意义从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莫里森从一本海军训练手册中摘引的材料，可以得到深刻的说明：

“德国潜艇 1942 年在我们大西洋沿岸肆虐的恶果，有如我们最大的六个战备工厂遭到总工者摧毁后所引起的全国性灾难……如果一只潜水艇击沉两艘载重 6000 吨的轮船和一艘 3000 吨的油船，我们的全部损失大约像下面的统计：坦克 42 辆，6 英寸口径榴弹炮 8 门，弹重 25 磅炮 88 门，弹重两磅炮 40 门，装甲车 24 辆，履带式小型装甲车 50 辆，弹药 5210 吨，步枪 600 支，坦克补给品 428 吨，军需品 2000 吨，汽油 1000 桶。如果这三艘船已到达目的地，而且货物已经疏散，那么要从空中炸毁同样的装备，敌人的飞机就要

进行 3000 架次顺利的轰炸。”

罗斯福对海军不够重视大西洋战争非常生气，并且为之烦恼了很长时间。但是，伤脑筋的事不只这些，恐日病、害怕战争、机构不灵等所引起的混乱也足够使人犯愁的。最典型的一次是，当一艘日本潜水艇在圣巴巴拉附近的海面出现，向一个牧场发射了几发炮弹之后，南加利福尼亚州又发生了另一次骚动。洛杉矶附近忽然响起空袭警报。驱逐截击机指挥行动起来，高射炮砰砰地作响。事后报界接到关于这一插曲的两种解释。一是海军部长提供的；一是陆军部长提供的。诺克斯说，广泛地侦察表明，发警报的时候，洛杉矶上空未发现任何飞机。史汀生则说，他手边的详细资料说明，当时有国籍不明的飞机出现在上空，可能达 15 架之多。他宣读一份自西海岸打来的电报：这些飞机“可能是敌谍操纵的商用机构所派出的飞机，用以散布恐慌，并探测高射炮阵地的方位和灯火管制的效果”。总之，陆军部也好，海军部也好，他们只能够肯定：各高射炮群一共发射了 1430 发炮弹，没有打下一架飞机，没有挨炸弹，也没有死伤。事实上，正是类似这样最高阶层的混乱，最容易引起美国人民的思想波动和恐惧情绪。可是，好像陆、海军在这一次麻烦之后还嫌不够劲，出事的第二天晚上，华盛顿竟然响起两次空袭警报。这样一来，罗斯福总统才不得不直截了当地质问陆军部，到底是谁负责放空袭警报，又是谁负责向报界解释这几起事件，并让他们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杜绝这类荒唐行为。

在这样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连续发生的日子，罗斯福的精神压力是十分沉重的。但是，这个身残志坚的强人，决心胜利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重任。他针对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悲观失望情绪，在华盛顿诞辰——2 月 23 日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他决心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人民，焕发人民的斗志。

“我们互相谈一谈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以及我们知道将来的情况又会怎么样，这在华盛顿的诞辰是极为合适的。”罗斯福说，“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华盛顿将军和他的大陆军队，不断地遇到强大的优势兵力，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物资和装备又十分缺乏。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冬天都处于福尔兹谷的窘境。

13 州到处都有第五纵队——自私自利的人，嫉妒的人，胆怯的人，他们宣称：华盛顿的事业无望了；他应该乞求和谈。”但是，华盛顿坚持自己的道路，坚持《独立宣言》，勇敢地克服一切困难，终于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胜利。

罗斯福指出，今天我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型的战争，是一场取决于全世界一切地方保障自由和正义的权利与义务的斗争，他说，纳粹分子和日本人的目的是：分割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把它们互相孤立，以便逐个包围，切断供给和增援部队的来源。这是人们熟悉的“分而胜之”的轴心政策。

“现在还有些人念念不忘帆船的时代。他们劝告我们把我们的军舰、飞机和商船都撤回领海，把注意力单纯集中在拼死防守上。”罗斯福说，“以

福尔兹谷，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的革命军曾于 1777 年 12 月至 1778 年 6 月扎营于此。隆冬时，粮食衣服缺乏，士兵不少开小差，一时士气处于最低潮。但经过一段整训后；士兵情绪猛然高涨，为以后的战役胜利打下良好基础。

为我们可以孤立主义幻想下求生存美国人，曾经想要我们美国鹰去模仿鸵鸟的战术。现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由于担心我们可能把脖子伸得太远，又想要我们的国鸟变成乌龟。但是，我们宁愿保持鹰的原来状态——飞得高，击得狠。”

罗斯福说，如果听从孤立主义者的意见，我们就要失败，全世界就要遭受法西斯的奴役。因此，必须坚决拒绝采取乌龟政策。

在4月28日的另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要求全国军民勇敢地战斗，不断地增加生产。他号召全国人民向科里登·瓦塞尔医生学习，向起死复生的“旗鱼”号潜艇海军战士学习，向英雄驾驶员休伊特·惠利斯学习。学习他们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学习他们敢打敢拼的英雄主义气概。

科里登·瓦塞尔医生，从军前是在中国活动的一个传教士。他是个简朴、谦虚、孤僻的人，年纪差不多60岁了，珍珠港事件后自动报名参军，并被委任为海军的一名少校。后来瓦塞尔医生被派往爪哇执行任务，照看在爪哇海面经过激战的巡洋舰“休斯敦”号和“马布尔角”号的伤员。

当日本法西斯军队横扫爪哇岛时，上级决定把尽可能多的伤员撤往澳大利亚。但是，有大约12名战士伤势太重不能转移，瓦塞尔医生自愿同这些战士一道留下来，虽然他明白留下来有被敌人俘虏的危险。然而，他还是决定作一次拼死的努力把这些战士撤出爪哇，他询问了每一个人是否愿意冒险，大家都表示同意。他首先得把那12名战士转移到50英里以外的海岸边。为此，他不得不为这冒险的旅程临时拼凑担架。这些战士受了深重的痛苦，但是瓦塞尔医生利用自己的医术使他们活下来了，并以自己的勇气鼓舞了他们。正如他所在单位的报告里讲的，瓦塞尔医生“好像是一个献身于自己羊群的基督式的牧羊人。”

在海岸上，他把这些伤员送上一艘荷兰小船。他们遭到一批又一批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瓦塞尔医生实际担任了该船的指挥，并以熟练的技巧，在小水湾和小海港藏藏躲躲，竟然没有被消灭。几天以后，瓦塞尔和他那一群伤员安全到达了澳大利亚。

另一个故事不是关于一个人，而是关于一艘英雄的潜艇起死复生重新参加战斗并屡建奇功的故事。

大概人们还记得，1939年夏天，在新英格兰海岸外美国潜艇“弓旗鱼”号的悲剧性沉没。船员中一些人失踪，但其他人员则得救于水面救生人员的快速和效率，“弓旗鱼”号潜艇也因此被打捞上来。这艘潜艇经过修复，重新命名为“旗鱼”号，编入现役。今天，它是美国西南太平洋潜艇队中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一员。

“旗鱼”号在那一带水域里作战，航程已有几千英里。战士们以非凡的勇敢，给敌人造成严重创伤，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它打沉过一艘日本驱逐舰。

它用鱼雷炸沉过一艘日本巡洋舰。

它两次用鱼雷射中一艘日本航空母舰。

1939年同“弓旗鱼”号一起下沉后得救的三名海军战士，今天又在同一舰艇“旗鱼”号上英勇战斗。罗斯福说：“知道曾经被认为无救的‘弓旗鱼’号又从海底浮起而在危难中为祖国战斗，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由休伊特·惠利斯所领导的机组，是一个英雄的战斗集体。他们驾驶的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作战，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不仅重创6艘日本运输舰，

而且击落了7架敌人的飞机，树立了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这架轰炸机作为一队五架轰炸机之一，飞离基地去攻击正在运送军队到菲律宾登陆同美军作战的日本运输舰。当它们飞到离目标差不多一半距离时，这架轰炸机的一个引擎失灵。这位年轻机长同其他轰炸机失去联系。但是机组人员把引擎修好，飞机又单独向目标飞去。

等到它飞抵目标上空时，其他4架空中堡垒已经飞过，丢了炸弹，捅了日本“零式”飞机的马蜂窝。

18架“零式”战斗机向这一架空中堡垒进行攻击。惠利斯不顾这种密集进攻，驾驶着飞机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把全部炸弹都丢在沿码头停泊的6艘日本运输舰上。

在这架轰炸机返航的路程中，它同18架日本驱逐机之间的追击战持续了75英里。每侧有4架日本驱逐机同时进攻。有4架被舷侧左右火炮击落。在空战中，美国这架轰炸机的无线电报务员被打死，机械员右手被打断，一名炮手丧失战斗力，只剩下一人操纵舷侧两边的火炮。这名炮手也有一只手负伤，但他轮番操纵两侧的火炮，又打下3架日本“零式”飞机。空战过程中，美国轰炸机上一台引擎被打得熄了火，一个油箱也被击中，无线电被打哑，整个供氧系统也被打坏。在11条控制导线中，只有4条没有打断。后边着陆轮被完全打掉，前边两个也被打瘪。

空战一直继续到剩下的日本驱逐机子弹被打光而折回。最后，美国轰炸机的两台引擎熄火，几乎完全失去控制，在天黑后飞返基地，紧急着陆，胜利完成了任务。

罗斯福总统讲述完这三个英雄故事后说：“我们在国内的人考虑自己的义务、自己的责任时，还是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我们的战士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吧。”“这是考验人们的灵魂的时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严峻的战争环境中经受考验吧！”正是：英雄露颖在今朝，刀枪剑戟试比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六章 挫敌锋芒

美国飞机炸东京，日本上下一片惊；
东洋鬼子吃炸弹，火光冲天煞威风。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总统一直敦促他的军事参谋部寻找办法轰炸东京，以此对这场偷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但是，这么远的距离，要轰炸谈何容易！

若从中国派飞机，虽然不愁没有志愿飞行员，可是飞去就回不来，对飞行员来说无异于自杀。直至1942年1月中旬，金海军上将的参谋部方才想出一个方案：从一艘航空母舰上出动陆基轰炸机去轰炸，航空母舰可以把它们载到离日本海岸足够近的海面，完成轰炸任务后，可以继续飞到中国大陆。这个想法使陆军航空队产生了兴趣。于是，到了3月初，24组机组人员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练习在500英尺长的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轰炸机起飞。这个训练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立德中校。

1942年4月2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立德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16架B—25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汇合。这个被命名为“迈克特遣舰队”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600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

日本大本营对美国出动这两支舰队一无所知，各机组人员自信这次任务能秘密完成。但是，三天后这种信心有些动摇了，因为他们听到了东京电台的这样一则宣传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说，美军三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之至。他们明知敌机要飞到离东京500英里以内是绝对不可能的。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和樱花的芬芳中享受春光。”

4月16日，飞行员到飞行甲板上报到，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五枚日本勋章交给了杜立德。拿到勋章的飞行员要求把它们系在炸弹上还给日本。把这些勋章在一颗炸弹上系好以后，飞行员们用粉笔写了一些讽刺话：“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请尝尝轰炸的味道吧！”这是最后一次传令会。杜立德将第一个起飞，预定在中午时飞到东京。“你们在以后20分钟或半个小时后起飞，把我炸起的火焰当作指示灯。”

最后还有一个先前谁也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如果在日本迫降该怎么办？这就由飞行员自己去决定了。杜立德不想当俘虏。“我先让机组人员跳伞，然后全神俯冲，哪个目标最上算就朝哪个目标冲去。我今年46岁了，已经活得心满意足了。”

4月17日下午，“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24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7时半之后不久，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

这艘小型勤务艇。杜立德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进攻，即使多飞 100 英里可能使轰炸机不能剩下足够的油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在进行重大的冒险：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 700 英里。

“让杜立德中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将军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这艘航空母舰在上午 8 时之前不久调头迎风。电警笛拉响了，杜立德中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纳海军上校的手，然后对他的机组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

杜立德的轰炸机准备起飞，无论是他还是他的飞行员同伙，都是第一次尝试从猛烈摇晃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作微妙的起飞。“那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蔚蓝的海水在航空母舰两侧迸裂出一簇簇浪花，”哈尔西海军中将在回忆那个危急关头时说。“吉米率领他的机组起飞了。7 时 25 分，当他的飞机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嗡嗡起飞的时候，特遣舰队的甲板人员没有一个不在帮他飞到空中去。”

电影名导演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正在拍摄，这时机动牵引车开始把飞机牵到起落位置。第一架飞机——杜立德的飞机——面前的跑道只有 467 英尺。每架飞机上都额外加了 10 罐 5 加仑装的汽油，主油箱加得满满的。杜立德开足气阀发动了引擎，轰鸣声之大，使有些飞行员直担心他把引擎烧坏。机轮挡板移开了，飞机向前冲去，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跑着。这架 B—25 轰炸机，左翼伸在母舰的左舷外，摇摇摆摆地迎着强风朝前驶去，襟翼张开着。

别的飞行员紧张地看着，不知这股强风的力量能不能帮助杜立德及时升空。如果杜立德都飞不了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B—25 开始加速了，在有些飞行员看来，杜立德的加速似乎慢得令人心急火燎。但是，就在母舰舰首被浪头抬起来的那一刹那，飞机猛地升空了，轮下只剩下几码跑道。此时是早晨 7 时 20 分。

杜立德的飞机转过弯来从低空飞过“大黄蜂”号，直接朝东京方向飞去。舰上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欢呼。其余的轰炸机也一架一架沉重地上了甲板，每一架升上天空时看着他们起飞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一切顺利。可是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水兵突然失足，飞机往前冲时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以致左手被左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感到震动，回头一瞧，只见一位水兵躺在甲板上。机身摇晃了，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会掉入大海，可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众人这才松了口气。飞机隆隆地升高了，转过弯来向其他飞机追去。时间是午前 8 时 20 分。

特遣舰队转向东驶，杜立德率领他的 B—25 米切式轰炸机向西飞去，执行后来人们形容的“轰炸和燃烧日本工业心脏”的使命。经过介绍，每一个飞行员都知道了各自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杜立德对他的同伴说，万一他的飞机被打坏了，他就“寻找一个飞机坠毁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目标，开足马力猛栽下去”。

东京大本营虽然知道空袭要来了，但是按巡逻艇“日东丸”报告的方位来判断，敌机再过上一天才能到达。所有能出动的飞机都奉命进入戒备状态，计战斗机 90 架，轰炸机 116 架。近藤信竹中将奉令立即从横须贺海军基地出

发，率重巡洋舰 6 艘、驱逐舰 10 艘去截击美舰。午前 9 时 45 分，一架巡逻机报告说，在离本土约 600 英里的上空发现一架向西飞行的双引擎轰炸机。但是，谁也不相信这个报告；美国的母舰上没有双引擎轰炸机。空袭最早也得到次日上午才会来临，因为那时敌母舰才能开到离海岸 300 海里以内。日本举国上下正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相信，美国飞机能到东京上空进行轰炸。

说来也凑巧，就在最后几架轰炸机飞离“大黄蜂”号的时候，东京开始防空演习。这次演习气氛松懈，连警报也没拉。市民们不理睬警防团要他们躲进防空洞的通知，竟有人骂他们是“庸人自扰”。到了中午，演习结束。大部分警报汽球已收了下来，三架战斗机在东京上空懒洋洋地盘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既晴朗又暖和，警报一解除，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出来游玩的人群。

几分钟后，杜立德飞到日本沿海，比预定航线往北偏了 80 英里。他折向左方。在飞机后部的领航员卡尔·怀尔德纳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战斗机，但是只发现了几架在上下翻腾的教练机。当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他发现人们对这架飞机谁也没有在意，照样干着自己的事。在经过一个兵营时飞得很低，可以看见那里的一群军官，身边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天中午，恰好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正乘着一架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回来，准备切过美机飞来的航线在附近一个机场降落，这时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东条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这架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他猛然醒悟，大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东条大惊失色，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中午 12 时 30 分整，杜立德到达了目标上空。在进行低飞轰炸时，弗里德·布里梅用瞄准器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随后，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过市空，把炸弹扔了下去，没有遇到战斗机或高射炮火的有效抵抗。除了着弹区及其附近的人们之外，东京的市民都以为美机这场空袭不过是逼真的防空演习的高潮。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上的市民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错把美机上红、白、蓝三色的圆型标志，当成了旭日标志。没有一架飞机被击落。轰炸机飞过皇宫，没有投弹。机组人员曾经用纸牌抽签，看由谁去光顾日本天皇的住所，但是杜立德下了明确的命令，除了不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炸。

美国轰炸机“光顾”东京，使日本举国上下极为惊恐。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对海陆军未能加以防范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皇军的耻辱”。山本大将对此次又惊又愧，他把追击美舰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宇垣去指挥，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侍从长近江兵治郎从未见过他脸色如此苍白，精神如此颓丧。宇垣将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型号和数量，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反措施。总之，今天胜利属于敌人。”

这次空袭摧毁了 90 座建筑物，就物质破坏而言，虽然价值不大，但对这个世代代以为日本本土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在心理上引起了难以言状的震动。日本报纸声称，这次空袭“彻底失败”，可是却把杜立德等人描绘成魔鬼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地进行非人道的、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实际上这是对日本侵略暴行的绝妙的讽刺。

这次空袭东京成功，使珍珠港事件以来感到颓丧的美军士气为之一振。

这个行动好像在保证美国即将采取进攻姿态了。各个战场上的盟军，以及每个俘虏营里的俘虏们都感到了新的希望。美国各报都用大字标题报道了空袭消息。《洛杉矶时报》在标题上得意洋洋地宣布：“杜立德立奇功！”罗斯福惯于妙语惊人，这次他宣布说，美国的轰炸机是从“香格里拉”起飞的。为这次空袭感到兴高采烈的美国公众听了更加开怀。

轰炸东京最深远的影响，是对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的巨大心理冲击。陆、海军将领们丢尽了脸，他们由于愤怒作出的过分的反应，终于导致一系列的战略失败。陆军立即削减在中国大陆前线的空军力量，把战斗机群调回保卫本土岛屿。海军参谋本部的成员感到极为羞耻。海军参谋长南云原来对即将到来的中途岛战役一直有不同的考虑，现在却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即除非把攻占太平洋中部岛屿以扩大日本的边防当作当务之急，否则整个帝国海军很快就要进行全面巡逻，阻止美国航空母舰对日本发动进一步的袭击。轰炸东京之后两天，帝国参谋本部决定准许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这次战役提前到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紧接着预定攻占莫尔斯比港的登陆作战和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基地的活动就开始了。将这三个背靠背的入侵行动安排得很紧很紧，不留任何回旋余地，这也就使每一个行动挺而走险。

为了实施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山本几乎把联合舰队的所有军舰都派出去了。这就产生了大量的无线电信号，为美国海军赢得一场出乎意料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秘密胜利提供了机会。虽然当时美国没有可与日本匹敌的海军力量，却在秘密电子战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而电子战恰恰是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取得战术优势的关键。这种情报提供的重要线索，使尼米兹海军上将得以集中他的有限的海军力量，逐个对付敌人的行动，从而破坏了日本南下和西进太平洋的企图。

日本联合舰队疯狂地追逐哈尔西海军中将正在撤退的特遣舰队，为情报分析增添了许多材料，美国正在费力地将这些拼凑在一起，以便揭开日本在第二阶段行动的秘密。从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环绕太平洋的一系列无线电站的监听者，从空中接收川流不息的密码电报，然后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给华盛顿海军部情报处为萨福德海军中校工作的密码破译人员，或者发给在珍珠港工作的、由罗彻福特海军少校领导的规模较小的太平洋舰队作战情报处。

破译密码电报的实际过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人的聪明才智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表机的不断摸索。对于华盛顿和珍珠港情报处的密码破译员来说，在日本舰队三天徒劳追逐期间截收到的大量电报是很大的收获。大量的呼叫信号告诉他们，山本联合舰队的每一艘军舰几乎都已出海，而且这次大规模行动的目的也暴露了，有价值的洞察弄清了许多五位数密码的意义，以致每天能破译截收到的全部密码电报的 1/20。这些情报，加上比较容易破译的密码电报中收集到的情报，开始描绘出一幅有关敌人部署和意图的清楚的图画。

在 1942 年的这几个危急的星期里，德怀尔和罗彻福特一起昼夜 24 小时值班。罗彻福特经常在地下室里一呆就是好几天，靠三明治和咖啡维持体力，睡在制表机之间的帆布床上。在这里，人和机器高度集中的工作，只有华盛

香格里拉是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LostHorizOn》中的神秘天堂。罗斯福的用意是为了掩盖使用了航空母舰这一事实。

顿海军部情报处和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密码破译员才能相比。这三个单位的联合工作，已经使太平洋舰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能够在截收到的日本关于目标地区上空气候的报告的帮助下，对这些目标进行袭击。无线电情报还帮助特遣舰队炸毁了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的弗里盖特暗礁，原来特遣舰队探出那儿有一艘日本供应船，这艘船曾给袭击瓦胡岛的水上飞船加过油。假如日本人再派一艘供应船到那个锚地，他们必定会惊讶不已。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根据罗彻福特的作战情报处提供的情报，全面掌握了日本海军的动向。日军预定在5月3日或该日前后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所罗门群岛登陆。预计入侵日军将有20支部队，掩护力量有几百架陆基飞机和一支巡洋舰队，此外还有第五师的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新型的航空母舰。日军的目标显然是控制珊瑚海至澳大利亚的通道，而这正是美国竭力加以保护的。这样一来，美、日两国的战略计划正好针锋相对，这就导致了所谓珊瑚海之战和以后的一系列战事。

珊瑚海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以东。早在1942年2月，日军占领了新不列颠岛及其良港腊包尔之后，就想占领新几内亚东部的莱城和萨拉莫亚，尤其是它的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莫尔兹比港，以便保障腊包尔的安全；而袭击澳大利亚北部的飞机场，就为以后进犯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奠定了基础。同时，日军还企图占领图拉吉，利用它作为水上飞机基地，以掩护莫尔兹比战事的侧翼，为以后向东南扩张创造条件。

对美、英来说，保住莫尔兹比港至关重要，它不仅能保障澳大利亚的安全，而且也是将来反攻的跳板。美国海军上将弗莱彻指挥的舰队，以两艘航空母舰“约克顿”号和“列克星敦”号为核心，就在这一带水域活动。5月3日，日军在图拉吉登陆，并占领了这个小岛。第二天，美国飞机按照破译人员提供的情报对它进行袭击，炸沉日本小型舰艇4艘。这次袭击向日军表明，美国航空母舰队就在附近水域活动。

5月7日上午10时左右，日美两国舰队在米西马岛（新几内亚东面）附近进行第一次空战。美国飞机向日本航空母舰“祥凤号”（1.2万吨）投下炸弹13枚和鱼雷7枚，击中了要害，几分钟内使它沉没了。这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击沉的第一艘日本航空母舰。7日下午，日本舰队司令官决心在美国航空母舰阻击日本登陆部队之前把它们消灭掉。他们挑选了长于夜战的飞行员27人，每人驾驶一架飞机于下午4时15分去袭击美国的航空母舰。结果日机被击落10架，另有11架在夜间返航时误入海中，只有6架安全回到母舰上。

吃了败仗以后，高木将军决定暂时向北撤退。数小时后，他以26海里的时速又朝美国航空母舰开来。5月8日拂晓，他派出20多架飞机前往搜索。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战斗眼看就要发生了。弗莱彻有雷达，但他的航空母舰配合作战才不到一周；高木没有雷达，但他的航空母舰作为一个分舰队作战却已有半年之久。弗莱彻有122架飞机，高木121架，双方旗鼓相当。高木略占优势，因为他有浓云掩护。

弗莱彻首先下手。8时15分，一位搜索机飞行员发现了日本的突击舰队。他在舰队上空盘旋，数清舰只数目，然后用无线电报告：

“两艘母舰，4艘重型巡洋舰，多艘驱逐舰，朝120度方向行进，时速20海里。方位约北东175海里。”

就在同时，日本人也发现了美国舰只。

70架飞机集中轰炸了弗莱彻的两艘航空母舰。一颗炸弹炸中了“约克敦”号的起飞甲板，但舰上人员很有办法，很快把火控制住了。“列克星敦”号却没有那么幸运，它的左舷中了两颗鱼雷，前甲板和烟囱也中了一些小炸弹。

在这次空袭中，双方都损失惨重。战斗在正午前结束。这是在敌对舰只未打照面也未直接交火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一次海战。看起来是弗莱彻胜利了。他击沉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和三艘小型舰只，自己损失了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船。就在这时，两声巨响，受创的“列克星敦”号被炸得东摇西晃，火焰熊熊。到中午12点47分，舰内机舱发生爆炸，引起大火，于是舰上人员迅速撤离。8日下午7时56分，美国自己的一艘驱逐舰奉命发射五枚鱼雷把它击沉了。海军官兵们，怀着依依不舍的神情向它告别。“它沉啦，”一位海军军官说，“它没有翻倒。它是昂着头沉下去的。亲爱的老‘列克’。它直到最后不失为一位贵妇人。”

这时，日本第四舰队指挥官井上成美决定撤回整个舰队，进攻莫尔兹比港计划无限期延迟，因为他仍怕进攻舰队遭到美国舰队的袭击。当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接到这个报告时，感到困惑不解，山本五十六命令井上继续追击，消灭残敌。大本营海军司令部也对第四舰队的行动不满，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为恼火，当即命令井上成美追击美国舰队。但美舰已漂洋而去，无影无踪了。在这次海战中，日本损失飞机105架，美国损失81架。珊瑚海之战是日本自发动战争以来，侵略锋芒第一次受挫，这对美军士气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纽约日报》宣称：“太平洋大战，日军大败，日舰沉没或重创者达17至22艘；敌寇溃逃，盟军猛追。”弗莱彻将军的部队，成功地挫败了日本南下以便控制珊瑚海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战略计划。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次遭到沉重的心理打击，这是一个将使战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宣布，这是“一个将产生决定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的胜利”。它决定性地削弱了日本联合舰队的优势，并将严重影响山本海军大将谋求在中途岛同太平洋舰队摊牌的行动计划。正是：珊瑚海上敌受挫，战略转折运筹中。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七章 中途岛之战

倾巢出动中途战，野心勃勃搞围歼；
可惜天机已泄漏，黄粱美梦全玩完。

美国飞机对东京的成功空袭，震动了日本朝野，东条一伙尤为恼羞成怒，从而更加强了山本五十六要进攻中途岛的论据。他决心要打垮美国舰队。5月5日，东京大本营终于同意了山本的计划，命令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在华盛顿，罗斯福针锋相对，命令太平洋舰队，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发扬珊瑚海战勇猛顽强的作风，坚决消灭日本海军的有生力量。

1942年5月5日，是日本“男孩节”。这一天，日本城乡挤满了游行的人群。游行队伍打着色彩鲜艳的鲤鱼旗和纸风筝，以一个频频取得军事胜利的国家所特有的欢快心情，庆祝一年一度的“男孩节”，东京帝国参谋本部选择这个吉日发布作战命令，并以天皇名义谕令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海军第十八号命令布置了“中途岛战役”的具体计划：“联合舰队司令官同陆军合作，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以西的战略据点。”这一命令发动了日本海军从未敢进行的一场最大的战役，并且倡导了一种战略，山本希望这种战略将会导致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他相信日本海军占压倒的优势，必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一举消灭美国的海军主力；然后，他打算利用个人的极高声望，劝说东条首相作出让步，从而使美国走到谈判桌边来，并使太平洋战争迅速结束。

山本接到命令的那一天，正在停泊在广岛以南景色如画的柱岛锚地的旗舰上，同他的高级军官一起，举行情况介绍会和进行摹拟作战演习。半年来，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艇，包括新服役的8万吨巨型战舰“大和”号，在它们的浮标周围闲着摇荡。现在，聚集在世界上最大军舰的宽敞密室里的海军将领们，终于得知这支舰队即将开往战场，参加一次大规模海战，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中途岛之战”。但是，日本法西斯头目们万万没有想到，中途岛之战将使日本“胜利的潮流”从此逆转。

中途岛位于火奴鲁鲁（檀香山）西北约1900公里，地处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环礁围成泻湖，最深处约20米，是天然良港。该岛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由沙岛和东岛两个主要岛屿组成，陆地面积4.7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1000毫米以上。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岛，岛上没有居民。1867年被美国占领。1903年起成为美国海军基地和夏威夷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电缆站。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中途岛是美国海、空军的重要前进基地。如果没有该岛作为前方观察哨所，美国的珍珠港将无法固守，太平洋也会随之沦入日军之手。

日军把进攻中途岛的决定性日子定为N日。但实际上作战行动将于N日前三天开始，届时日军从海上向阿留申群岛发动牵制性攻击，美国人必定会派军舰前去侦查，于是南云的主力舰队就从西北面进攻中途岛。在N日那天，入侵部队将在近藤信竹将军第二舰队的炮火掩护下，从四面八方涌上该岛。山本的战列舰将在后面300海里洋面上，一俟美国部队接近，即开入战域采取行动。随后，那些强大的战列舰上惊天动地的舷侧炮火，将实现这次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

5月20日，日本海军力量已在柱岛内海锚地集结待命。这支力量拥有11

艘战列舰、22艘巡洋舰、8艘航空母舰、2艘水上飞机航空母舰、65艘驱逐舰和21艘潜艇，连同后勤船只在内，总计200多艘。而美国方面所能集结的仅有3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日本人认为胜利唾手可得，他们决心继珍珠港之后，再给美国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按照联合舰队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进攻中途岛的舰队分为四支：山本亲自率领一支主力舰队，准备同美国舰队进行决战。南云忠一率领的第一航空母舰舰队担任主攻，它有“赤诚”、“加贺”、“飞龙”、“苍龙”四艘大型航空母舰，运载261架飞机。另外，每一艘航空母舰上还有36架基地空军驱逐舰，准备在占领中途岛以后布置到岛上。另一支入侵舰队护送12艘运输舰，载着5800名官兵，准备在中途岛登陆。15艘潜艇组成的先遣队，要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的水域布置两道警戒线，以监视美国舰队的活动。此外，还有3支舰队开到北面去攻打阿留申群岛。

5月27日清晨6时，南云的航空母舰突击舰队徐徐开出了濑户内海，朝丰后水道驶出，联合舰队其他舰只上的水兵们向他们欢呼打气。次日，计划进攻阿留申群岛的舰队从九州北端的港口出发。6月3日，日本袭击中途岛的前一天，从两艘轻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将轰炸荷兰港，以便把尼米兹的注意力引向北面。在大南边，满载着5000名进攻中途岛士兵的日本运输舰，也从里雅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出发了，随同这些舰只出发的还有一艘轻型巡洋舰，一艘油船以及一支由4艘重型巡洋舰组成的掩护部队。

5月29日早晨，联合舰队的其他舰只也从濑户内海出发了，打头的是近藤信竹中将的中途岛进攻舰队，其后是以山本的旗舰“大和”舰为首的由34艘舰只组成的主力舰队。总共11艘主力战舰、8艘航空母舰、23艘巡洋舰、65艘驱逐舰和将近90艘辅助舰只向东行驶，去进行一场野心勃勃的大海战。仅这一次要消耗的油量，就等于和平时期海军一年消耗的油量。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选定6月7日作为N日。那时的月光将对夜间行动和登陆极为有利。预定在N日前两天，当南云的舰队仍在中途岛西北250海里处的时候，即发起大规模空袭，不仅要摧毁岛上的空军力量和防御工事，而且还将击沉附近的所有美国战舰。N日前一天，一支由藤田将军率领的小型水上飞机供应部队，准备在中途岛西北60海里的库雷小岛上降落，建立基地，一方面接应登陆部队，一方面进行远程侦察，监视诱人圈套的美国军舰的来临。

6月7日，天一亮，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在栗田少将的重型巡洋舰支援大队的炮火掩护下，对沙岛和东岛同时发起猛攻，并强行登陆。在实施进攻的整个过程中，近藤中将的主要舰队将控制中途岛南方和西南方的进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指望美国人会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同时进攻搞得懵头转向，以致在日本军队完成登陆之前来不及组织认真的抵抗。

尽管日本人玩弄诡计，想迷惑美国人，但是美国海军司令部对这暗中进行的一切，却了解得一清二楚。尼米兹之所以没有上当，完全归功于他的作战情报处。该处约有120名工作人员，由罗彻福特少校领导。这些情报人员夜以继日地在海军大院的地下室里工作。日本联合舰队发出的密码电报，90%都被这些情报人员破译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关中途岛的一些情报是日本海军送上门的礼物。5月20日，日本发出的一封长电被美国方面截获。这样，关于这次入侵行动的来龙去脉全都清楚了。山本的电报有15%美方没有收到，但这次行动的规模是显而易见的。唯一搞不明白的是这次行动的目标，

因为电报中只提到“AF”。罗彻福特相当肯定地认为“AF”代表中途岛。尼米兹同意罗彻福特的看法，并奉最高统帅部罗斯福之命，亲自飞往中途岛，以确定要击退一次大规模两栖攻击还需要什么装备，需要增加多少兵力。他把所能腾出来的每一架飞机都派到了中途岛。尼米兹还把这个小岛上的驻军增至 2000 人，建立了三个弧形潜艇巡逻区，下令增设高射炮群。

为了证实“AF”的位置，尼米兹让中途岛指挥官用普通英文发出紧急无线电报，就说岛上的水蒸馏塔坏了，为了继续欺骗敌人，第十四海区司令布洛克海军少将立即回电说，有一艘供水船正前往该岛紧急供水。这个计策很奏效，日本人果然上了钩。不出 24 小时，威克岛上的日方无线电台报告“AF”显然缺水，接着东京发出命令：入侵部队要多带水。经这一证实，尼米兹决定给日军以迎头痛击。

5 月 21 日，尼米兹海军上将召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成员会议，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战斗序列。会上情报处详细介绍了破译敌人密码的情况，大量的材料说明，敌人的计划主要由两部分组成：“AL 行动”进攻阿留申群岛的最西部，两艘航空母舰在袭击阿拉斯加的美国基地后支援这个行动。“AF 行动”要求敌人的舰载机主要部队袭击中途岛，为在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掩护下从塞班出发的部队登陆作准备。第一个行动显然是牵制行动，进攻中途岛才是主要目标。东京没有给联合舰队战列舰主力舰队发出具体指示，由此可知它必定和旗舰一起停泊在柱岛，尼米兹正确地推断出山本总司令将亲自率领这支舰队，在太平洋舰队西进以保护中途岛时向它猛扑。

山本的总计划中，仍然没有暴露的关键部分是确切的日期和时间。为了保密，这些情报是用新的 5 位数字密码发出的。尽管如此，经过破译人员的全面分析，可以断定日军将在 6 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行动。根据这个推断，尼米兹可以制订他的对应战略，这个战略要求避免同优势之敌进行一比一的对抗。“我们必须以消耗战来削弱敌人的兵力——用潜艇和轰炸机袭击孤立之敌，”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下达指示，打算利用他的情报优势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以便集中力量挫败日本的先头进攻部队。随后，他就调兵遣将，暗中部署。尽管他只有 8 艘巡洋舰、17 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他必须对付山本五十六强大舰队的挑战。尼米兹召见了指挥官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少将。命令他们“用强大的攻势最大限度地重创敌人”，要他们连续发动空袭，“并遵循盘算好了再去冒险的原则”。

在南云的 4 艘航空母舰离开濑户内海的次日，斯普鲁恩斯乘“企业”号驶出了珍珠港。启航前，尼米兹海军上将在“企业”号甲板上举行了检阅，为勇敢的飞行员授勋。“我想几天之后你有机会赢得另一枚勋章，”总司令对一位飞行员说，一面把一枚显贵的飞行十字勋章别在他的胸前。

当天下午，汽笛长鸣，水手们欢呼雀跃，迎接“约克敦”号的归来。这艘在珊瑚海战中负了重伤的航空母舰慢慢靠港，后面留下一条长达 10 英里的浮着一层油膜的航道“拖船推着这艘航空母舰进入第一号干船坞敞开的闸门。几个小时以后，水泵仍然在抽船坞里的水，尼米兹穿着长筒靴，和修船工一起检查宽大的船壳。他们仔细察看了日本贴近的炸弹在船底炸开的裂口，决定用钢板焊接的办法修补用木头支撑的船壳和水密舱。“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把船修好。”总司令再三叮嘱。要想使“约克敦”号恢复全速或滴水不渗，不到西海岸进行长期修理是不行的；但是可以将它临时修补一下，使它能和第十六特遣舰队一起参战，何况它的舰载机很有可能决定这场海战

的胜败。当天晚上，1400名修船工借着弧光灯开始修船，他们一口气干了两天两夜，终于使这艘航空母舰在两艘巡洋舰的陪同和6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向战斗的最前线。

美国军舰此行要想取得成功，保密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它们在离开夏威夷水域后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但是，在5月30日上午，当“约克敦”号的舰载机在舰上降落的时候，突然增加的无线电通信传到了太平洋彼岸，被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上的一名警觉的电报员接收到了。在此之前不久，“大和”号在两艘小型战列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的陪同下驶离柱岛锚地。最前面的是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的强大的攻击部队：两艘战列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和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4艘油船，所有这些舰只将集中在中途岛附近水域，布置自己的埋伏。

两天以前，南云的4艘航空母舰已和8艘供应油船一起起航，陪同的有两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整个战役依靠这4艘航空母舰，舰上的官兵信心十足。在标图桌上最后一次演习“AF行动”计划时没有遇到故障，大家畅饮了天皇赠送的米酒，预祝战役取得巨大成功。5月29日，15艘运兵舰载着前去占领中途岛的5000名军人，在一艘轻型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的严密护卫下驶离塞班。至1942年6月1日，日本联合舰队参加中途岛战役的145艘船只全部出海了。

在前进途中，山本收到了3封令他烦恼的电报。最使他不安的是，一艘在中途岛附近水域巡逻的潜艇报告表明，中途岛的美军已处于严格的戒备状态，空中侦察十分频繁；还可以看见岛上有许多吊车，大概是在扩建防御工事。山本要把这份情报转给南云，但他的作战参谋坚持不让用无线电联络。山本曾写信给他的情妇——前艺妓“梅龙”！“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至于在他意料之中的这场决战，他在信中莫测高深他说：“我对它并不抱多大的期望。”这同他在他的军官面前表现得信心十足，形成鲜明的对照。

3日傍晚，日舰迅速地从西北方向朝中途岛聚拢，拂晓前就能抵达离目标200英里的起飞地点。当时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正在中途岛东北方向300海里之外的地方。统率这两支特遣舰队的弗莱彻正确地判断出侦察机发现的舰只，不过是日本的运输舰而已，但是这说明航空母舰就在他们后面不远的地方。晚上7时50分，他朝西南方向驶去。他深信次日将是“美国海军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到拂晓，他就能驶抵中途岛北面，恰好能袭击日军的进攻舰队。斯普鲁恩斯通过目视信号通知部下说，他们可能碰上占优势的敌人，有四五艘航空母舰，因此这次战斗的胜利“对我国是极为重要的”。并要全体指战员作好迎战的准备。

6月4日凌晨2时45分，日舰“赤诚”号上的扩音器叫了起来，飞行员翻身下床，整装待命。此时，4艘航空母舰正迎风全速行驶在中途岛西北240海里的海面上。4时30分，草鹿参谋长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指挥起飞的军官挥了挥绿灯，第一架零式战斗机掠过灯火通明的起飞甲板，冲进了漆黑的天空。甲板上的人齐声欢呼起来，接着8架战斗机相继起飞，然后是18架俯冲轰炸机。没出15分钟，4艘航空母舰甲板上的飞机全部飞上天空。空中共有飞机180架，不过舰上的人只能看见一长串红灯和蓝灯朝中途岛方向飞去。

在中途岛，雷达于5时50分发现了正在飞往中途岛的第一批日本飞机。这时空袭警报尖声呼啸，美机匆忙起飞迎战。但是，日本的零式飞机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了它们，而且在质量上也远比它们优越。15架美国海军陆战队飞

机被击落。日本飞机扑向目标，此时已没有飞机拦截。俯冲轰炸机冒着猛烈的炮火频频俯冲，炸中了建筑物、油库和一个海上飞机库。当最后一架日机飞走时，中途岛的两个小岛，已经成了一片浓烟滚滚的火海。7 时整，第一批轰炸中途岛的日机指挥官返航归来，报告对中途岛还要进行第二次轰炸。因此，7 时 15 分，南云命令第二批飞机准备进攻，卸下鱼雷，装上每个 800 公斤的重磅炸弹。于是舰上人员又卸鱼雷，又装炸弹，忙得不可开交。

13 分钟以后，日本侦察机报告，在东北 200 英里处发现敌舰 10 艘。这个消息使南云十分震惊，因为根据他的经验，这么大的舰队后面，一定有航空母舰。

7 时 45 分；南云又下达准备攻击敌舰的命令。这时，第一批轰炸中途岛的飞机正返航归来，但第二批飞机还在甲板上，返航飞机无处降落。南云只好命令把飞行甲板腾空出来让返航飞机降落。9 时 18 分，最后一架飞机降落完毕。于是南云命令舰队向北撤退，以便重新组织，把所有的飞机都加足油，装备好，然后向敌舰发动进攻。不久甲板上的飞机都装上了鱼雷。由于时间紧迫，卸下的炸弹来不及送到下面的弹药库里，人们就随手把炸弹推在一边。正在这时，美国舰队派出的飞机前来轰炸。日舰的 50 架战斗机腾空迎击，打落美机数十架，幸存的美机仓皇逃去。当日机回到舰上加油，水兵们欢呼胜利的时候，从美国“企业”号上起飞的 37 架俯冲轰炸机向“赤诚”号直扑而来。

“俯冲轰炸机！”日本舰载机指挥官渊田回忆说，10 时 24 分警报响起来了，他抬起头来，惊恐地发现美国轰炸机瞬息之间赫然出现在眼前，他爬着寻找躲藏的地方。“我首先听到的是俯冲轰炸机的撕人肺腑的尖叫，然后是一颗直接击中的炸弹的爆炸声。闪光令人目眩接着听到第二次爆炸，比第一次更响。……舰中央升降机后面的飞行甲板炸了一个大洞。升降机本身扭曲得像熔化的玻璃，掉到机库里。铁甲板卷成奇形怪状。甲板上飞机翘起了尾巴，喷着青色的火舌，吐着黑烟。当火势蔓延的时候，不由得泪流满面，害怕大火引起的爆炸断送这艘航空母舰。”

在燃烧着的旗舰的右舷方向，4 颗炸弹使“加贺”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第一颗在它的右舷爆炸；第二和第三颗砸开了舰首升降机，在舰桥的底下爆炸，使停着的飞机着火，并且炸死了舰长和他的许多高级军官。第四颗掉进机库，引起炸弹和鱼雷的连锁爆炸。救火队员奋力扑救席卷而来的火焰，当飞行官代替舰长指挥时，这艘航空母舰的速度开始降慢了。

南云还没有从他的旗舰遭受的袭击中清醒过来，抬眼望见另外两艘航空母舰也起火了，可把他吓坏了。“约克敦”号的俯冲轰炸机迅速结束了“苍龙”号。由于莱斯利海军少校飞行技术熟练，由他率领的在“企业”号舰载机起飞后一个多小时才起飞的 18 架“无畏式”飞机，抄近赶到日本舰队上空，只比麦克拉斯基的飞机晚到几分钟。莱斯利虽然开错了开关，过早地投下了炸弹，他还是带领飞机发动进攻。高射机枪开火了，两颗炸弹将航空母舰的升降机掀到舰桥上面，使停在甲板上的飞机着火燃烧起来，第三颗在机库爆炸了。

6 分钟的快速袭击，使日本人的防卫陷于瘫痪。“约克敦”号的“无畏式”飞机没有一架受损，但麦克拉斯基的 16 名飞行员被迫赶的“零式”战斗机击落。他们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海军以 47 架飞机的代价，消灭了日本海军一支精锐的航空母舰突击舰队的 3/4 的力量。

“苍龙”号的火势已经变得不可控制了，在袭击结束之后不到 20 分钟，这艘航空母舰就被首先下令放弃。柳本柳作舰长监督举行了将天皇的照片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的仪式，然后本着武士道的精神跳进火坑里烧死。一个小时后，一个志愿救火队重新登上这艘瘫痪了的航空母舰，他们为了扑灭大火而作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果，但到下午 2 时，布罗克曼海军中校的“鸚鵡螺”号潜艇赶上来发射两颗鱼雷，击中“苍龙”号航空母舰。两小时后，美国“鸚鵡螺”号潜艇浮出水面，观察熊熊燃烧的“苍龙”号，只见它在下午 7 时后不久沉没，舰上 700 名官兵葬身海底。

下午 1 时半，“加贺”号的代理舰长正要下令举行转移天皇照片的仪式，甲板下面的爆炸摧毁了轮机舱。5 时下令放弃该舰，两个小时，储油罐受热爆炸，这艘航空母舰连同 800 名官兵沉到海底，许多人活活困在机房里，南云的旗舰“赤诚”号设法继续航行了 20 分钟，为了躲避 4 架鱼雷飞机的袭击，它急剧转弯，使操舵失灵。当它在上午 10 时 40 分躲避即将到来的另一次袭击时，右舷涡轮机坏了。动力越来越弱，被炸坏的飞机着火燃烧，火苗直往舰桥上窜。南云忠一离开了他的旗舰，一时呆若木鸡。稍事镇定之后，他才把这个灾祸报告了山本五十六。而山本这时正威风凛凛地坐在他的旗舰“大和”号上破浪前进。“大和”号装有 18 英尺 1 英寸的大炮，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当初，山本以其强大的舰队为靠山，认为这次出征能稳操胜券，荣耀在望，珍珠港偷袭制胜的美梦又将重温。然而，这个惨败的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惊醒了他的黄粱美梦，使他默默无言。但山本无法抑制他的满腔怒火，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那样，命令驱逐舰发射鱼雷击沉了摇摇欲坠的“赤诚”号，然后又打肿脸充胖子，撒下弥天大谎，向手下所有的指挥官发出电令：“几乎已遭到全军覆灭的敌人舰队正向东败退”。5 日凌晨，山本又发出命令：“取消占领中途岛的行动！”

中途岛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日本损失大型航空母舰 4 艘，重巡洋舰 1 艘，飞机 332 架，兵员损失 3500 人。而美军仅仅损失航空母舰 1 艘，驱逐舰 1 艘，飞机 147 架，兵员 307 人。这次海战击沉了日本大型航空母舰的半数，损失了技术熟练的舰载机驾驶员的大半。日本海军舰队虽然在战列舰和巡洋舰方面仍占优势，但已难以远离岸基航空兵的掩护进行远洋作战了。

中途岛一战，日军丧失了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此战之后，日本被迫停止了战略上的全面攻势，放弃了对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等岛的进攻作战。东条英机听到中途岛失败的消息，犹如大火焚身，惊恐不已，但他竭力控制自己，轻声地对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说：“切勿把这一消息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日军大本营深恐这次失败引起军队慌乱，不仅对陆军严密封锁消息，甚至对海军人员也保密。从沉没舰上死里逃生的水兵被集中管理，不准外出，随舰记者也遭禁闭。东京电台还大肆吹嘘占领阿留申，击沉美舰 2 艘，击落美机 120 架的“赫赫战果”。这些做法只是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恐慌和虚弱本质。这次海战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海军舰队，也扭转了太平洋盟军的不利态势，为美国进行反攻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极大地鼓舞了盟国军民的士气。

在美国，中途岛之战已家喻户晓。人们把这一仗当作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来加以庆祝。尼米兹将军在 6 月 6 日的公报中声称：“珍珠港之耻已得到部分洗雪，必须将日本海上力量打得再无行动能力，否则不算完全报仇雪

恨。”正是：

中途岛上振军威，日舰主力大部摧；

东条闻讯丧了胆，只好封锁坏消息。

欲知欧洲第二战场情况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八章 战略分歧

第二战场难出笼，英国首相玩花灯；
老练圆滑施权术，战略分歧各相争。

美英苏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存有分歧。早在 1941 年，苏联政府就要求英国向法国北部登陆。可是英方一直支支吾吾，未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是笼统地说，英国政府在对德战争中“必将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

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后，在领导集团中开展了这样的辩论：谁是主要敌人？是日本还是德国？舍伍德在其《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一书中证实，从“纯军事上考虑”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是头号敌人，因为它拥有“比日本大得多的工业和科学潜力”。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他 1942 年 3 月 9 日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长篇海底电报中，提过“在欧洲大陆开辟新战场的计划”。他还说：“我现在对今年夏天建立这个新战场愈益感到兴趣。”罗斯福并指示艾森豪威尔将军草拟了一项向法国北部登陆的具体计划，其中包括在英吉利海峡的最狭窄地点渡海，直接攻击塞纳河以东的加来到勒阿弗尔之间的法国海岸——不同于两年后在塞纳河以西的诺曼底地区到科唐但半岛之间的登陆地点。预定滩头阵地要逐渐向东扩展，越过敦刻尔克，直达比利时沿岸的奥斯坦德和泽布勒赫。

总参谋长马歇尔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进一步阐述了在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理由：

联合国家在最近的将来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准备和发动一次强有力的攻势，如果选择任何其他地方，敌人都可利用天然障碍和通往敌方中枢的不良交通网或他们苦心布置的漫长的前哨网，来对抗我们的进攻。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加以克服，然后我们的进攻才能奏效。

联合国家只有从这里才能在敌人领土上空发动动力主攻开路的关键的优势空中活动。这是由于英国有一个四通八达的降落机场网，在其他地方则无法使用密集的英国空军力量，以配合这样的作战行动。

只有在这里，英国的大部分陆上部队才能同美国军队合作，共同投入一场总攻势。鉴于目前航运情况，不可能将大部分的英国军队运到任何一个遥远的地区，而且为了保卫不列颠群岛，也要把大部分的英国师留在英国。

在西欧，美国能够比任何其他地方集中和使用更多的兵力，这是由于海程距离和英格兰具有基地设备的缘故。

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的战斗部队主力，只有对付德国时才能同时使用，而且还要不失时机地出动。我们不能同时对日本集中使用兵力。

在这个地区成功地发动进攻，会给苏联的战场以最大的支持。

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最初名叫“围歼”，终于改为“霸王”。其主要活动是要动用美国 30 个师和英国 18 个师。本来计划于 1943 年春天开始，并采用“波利乐舞”这个代号，以表示在不列颠群岛集结必需的兵员和物资所要进行的一系列庞大的准备活动。

罗斯福总统在 4 月 1 日的军政首脑会议上批准了这项计划，并叫哈里·霍普金斯和马歇尔立即前往伦敦，将它交给英国首相和他的三军参谋长。霍普金斯行前给丘吉尔发了一封喜气洋洋的电报：“不久就要同你相见，请把火

炉生起来。”这是又一次提到他经常说的契克斯的温度。

罗斯福作为政府首脑发了一封海底电报给丘吉尔：

“在通盘考虑了联合国作战的当务之急和长远的军事问题之后，我已经得出某些结论。因为它们的性质极端重要，我得将全貌告诉你并征求你的同意。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两国间的通力合作。因此，哈里和马歇尔上将就要出发到伦敦把要点通知你。等到我得到你同他们两人交谈的结果后，我建议请斯大林马上派两个特别代表来。我希望俄国人将热情地欢迎这一计划。我想把这一计划变成联合国家的计划，而且认为还可以使它们充分配合英、美舆论的动向。”

伦敦会谈于1942年4月8日至14日举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与丘吉尔和参谋长们举行了几次会议，会上详细地讨论了美国的战略计划。在4月9日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马歇尔将军声明，美国代表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作出决定”：美国和英国的基本力量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以及应当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运用这些力量。在丘吉尔的影响下，英国代表对1942年在大陆登陆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其中空军参谋长波特认为，从空中的使用观点看来，由于气象条件不好，在1942年9月实施战役是不合适的。英国方面还企图把注意力引向印度洋和中东的危险形势。

在同英国首相会谈时，霍普金斯强调，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的最新建议有重大意义，因为美国军事领导人全面讨论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战略观点看来，这一计划是所有经过研究的计划中最为有利的计划”。霍普金斯特别强调大量的美国陆军不能无限期地“闲着无事”，他们应当在同法西斯军队的实战中取得经验。

4月12日，丘吉尔向罗斯福通报了会谈的最初结果。信中充满了乐观的语调，但是又包含着明确的保留条件。丘吉尔写道：

“我热诚专注地阅读了您的关于战争前途以及拟议中的庞大作战计划的精辟文件。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您所提出的全部建议，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也是这样。在准备发动主要攻势的同时，我们当然必须应付东方和远东逐日发生的紧急事件。”他强调英国不能完全把其它战役搁置一边，并指出了继续保卫印度洋和中东的必要性。

霍普金斯这次访问伦敦，尽管奉罗斯福之命，集中讨论英吉利海峡和海峡那一边希特勒的“欧洲壁垒”，但他还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英国其他方面的情况，并想寻找机会与这位“固执己见”的英国首相进一步交换意见，使其能接受关于尽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

当霍普金斯在星期六下午应约前往契克斯时，刚好是百花盛开的季节。他初次领略了英国郊间的动人景色，久积在他心中的诗兴油然而生。事后他告诉人说：“你只有看到这个国家春天的景色时，才开始体会英国为什么会产生出世上最了不起的诗篇。”契克斯在周末通常表现出的欢乐和魅力，这一次不见了，因为丘吉尔夫人累倒了。就是丘吉尔本人也不像平日那样精力充沛，因为灾难接踵而来，英国在中东、地中海接连失利，国内反对的力量也有所增长，在这种紧张压力下他显得疲惫不堪。在这里，作为朋友，霍普金斯就国内外问题，特别是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与首相进一步交换了意见。至于丘吉尔能听进多少，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

在契克斯度过周末之后，霍普金斯读了一篇从纽约寄来的足以使他警惕的报告，这是由美国政府监听巴黎无线电广播电台所得到的材料。巴黎广播

电台是纳粹宣传机器中比较重要和骗人技术比较高明的一个。广播说：

“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已经在英国首都商谈快十天了。根据英美新闻服务社消息，罗斯福的代表所接受的任务是要英国政府准备发动一次入侵大陆的行动。据说，罗斯福授予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全权，可以向英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试图发动一次必然会重演敦刻尔克惨剧的第二次纳尔维克战役。鉴于他们一再宣称要入侵大陆，以声援只能靠希望一次春季攻势来度日的苏联军队，今天柏林军界特发表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声明，其主旨就是：德国只能再一次郑重声明，希特勒邀请英国倾其全力来犯大陆，以便同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比比高低。柏林的人们都会记起：元首曾经向英国建议，德国愿意从欧洲大陆的任何一地后撤，以便让英国毫无困难地作一次有效的登陆。”

在这一篇由德国指使的法国广播中，有这么多准确的内容，这大有可能使人们匆促地得出结论：在契克斯的挂毯背后一定潜伏着特务，或者说，在唐宁街的青色粗呢桌罩之下必定安装着一个传声器。其实，这仅仅是比较低级的宣传伎俩而已。它显然是一条臆测的广播新闻，企图从对方激动的回答中找到一些真实的情况。这就像：一个神经质的嫉妒的男人对他所怀疑的情敌说：“千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同我老婆所干的一切勾当！”说话的人是想让他的对手大惊失色，然后轻声含糊地问道：“你是怎么发现的？”于是肮脏的秘密暴露了。这样的广播听起来很愚蠢，但在这严峻的战争中，敌人曾经试了又试。这就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惯用的宣传伎俩。

4月14日晚上10时，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同英国战时内阁的防务委员会一起开会。出席的有丘吉尔、艾德礼、艾登等大臣和三军参谋长。丘吉尔主持了这个他称之为“值得纪念的会议”，充分表现出他的优雅风度和那拿手的庄严辞藻。他对由霍普金斯先生和马歇尔上将带来的美国总统的“重要提案”表示“热诚和毫不迟疑地予以接受”，说这同战争的传统原则相符合。然而，他指出当前出现的急迫问题，是德军穿过中东，同来自印度的日军有会师的可能，这是很不祥的。英、美两国必须保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力、物资来防止这种会师；目前需要这些人力物力的最重要的地点，就是缅甸、锡兰和印度洋的洋面和天空。

英国首相说，必须在联合王国进行的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行动的庞大准备工作，难以逃脱敌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德国侦察机非常容易到达的英格兰南部港口的活动。不过，我们用大量谣言来掩盖真正的行动目标还是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我们应当设法迷惑敌人，使他们摸不透我们攻击的重点、时间、方法和方向。丘吉尔认为，我们不但绝对不必设法遮掩进攻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发表某种公开的声明：“我们两国誓以高尚的战友情谊，在一场拯救受难民族的伟大讨伐进军中，并肩作战，共同向欧洲挺进。”

马歇尔上将从英国首相的慷慨陈词中受到鼓舞。他说，他本人同霍普金斯如释重负地看到，1943年在法国北部对敌人作一次正面进攻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协议。在今后的时间里，他认为，对德空中攻势的发展和加强，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强调说，应采用突击队对整个沿海地区不断地进行袭击，这不但能困扰和迷惑敌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给我们自己的军队以实战的

纳尔维克是挪威北部的一个军港。二次大战初期，德国同英法军队曾在此发生激烈的争夺战。到1940年6月，在德方海、陆、空三军压力下，盟军最后被迫撤退。

经验。他预计在主要作战行动方面，不会缺乏军队，但确信在调拨必要的运输船只、海军护卫舰艇、登陆艇和飞机等方面会有困难。但这都是美国要对付的困难，他和霍普金斯都具有信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马歇尔将军发言之后，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也作了发言。他和丘吉尔一样，对进攻欧洲的建议表示欢迎，但也强调日本向印度进兵所带来的各种难题。他指出，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洋，通往苏联的南方线路就会被卡断，土耳其就会被孤立起来，同盟国就会失去中东的石油供应，德国人就会轻而易举地进入黑海和苏联的后方高加索。

至此，英美两国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而进攻的具体地点、时间则未作明确的规定。但是，丘吉尔和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的讲话，尤其是他们所强调的困难，为他们日后推迟这一计划和说服罗斯福改变其决心埋下了伏笔。

就在霍普金斯和马歇尔还在伦敦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于4月11日约见了苏联驻美大使馆参赞葛罗米柯，并将他写给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交给了他。

宣读了这封信后，罗斯福声称，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并且愿意采取具体的步骤，以便从苏联战场上引开希特勒的部分兵力”。罗斯福认为，在1942年夏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会延搁。总统补充说，为此目的，他已向英国派出了自己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他的任务是了解英国人对这些行动准备到什么程度”。

罗斯福在给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的信中说，他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军事建议，即利用我国军队以减轻贵方”在苏德战场的“困难”。总统写道：“我认为这一目标意义重大。”为了讨论这一问题，罗斯福建议苏联在最近期间内派遣外交人民委员和一名军事代表前来华盛顿洽谈。他说，在“最后确定我们共同行动的战略方向之前，我必须听听你的意见”。最后总统写道：“美国人民对你们武装力量的出色战斗深为感动，我们希望在摧毁希特勒的军队和物质力量方面，将给你们比现在更多的援助。”

经过研究，苏联政府同意了罗斯福总统关于苏美谈判的建议。这时，苏联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更为迫切，因为许多情报表明，德国军队准备在东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4月5日，希特勒向自己的参谋部表示，他打算在东线恢复进攻，以便击溃苏联的武装力量，并截断苏联与大部分最重要的供应来源的联系。希特勒企图扼守其战场中心地段的阵地，占领列宁格勒并与北线的芬兰军队会合，进而在战线的南段突入高加索地区。这次被认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最新战役的目的，就是在顿河区击溃苏军，越过高加索山脉，夺取高加索石油产区。

4月20日，斯大林复信罗斯福，信中指出，苏联政府同意派遣苏联人民外交委员和一名军事代表同美国总统会晤，以便就最近期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交换意见。信中指出，苏联代表还将访问伦敦，同英国政府交换意见。

鉴于英国政府模棱两可的态度，苏联政府决定：苏联外长首先访问英国。在这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开辟第二战场应与从不列颠群岛实施，并要有英国武装力量的积极参加。因此，首先查明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是合适的。此外，苏联还面临着一项结束与英国人关于缔结同盟条约的马拉松谈判的任务。还在4月初，人民委员就接到了英国政府关于为最后达成这一

条约而访问伦敦的邀请。

1942年4月24日，英国战时内阁召开会议，讨论苏联代表团的访问问题。会上达成了关于与莫洛托夫讨论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在他访问华盛顿之前不作最后决定的协议。同一天的下午，外交大臣艾登同苏联大使谈话时强调，英国政府希望，外交人民委员在伦敦期间，将不仅讨论“政治问题，而且也要讨论军事战略问题”。艾登以自己的名义声明，这样的讨论将对首相产生促进作用，因为目前他虽然接受了第二战场的思想，但对第二战场的时间和规模还有些犹豫和怀疑。

莫洛托夫一行在停留伦敦期间，与丘吉尔首相和其他军政要员举行了多次会晤和讨论。当苏联外长详细介绍苏联战场情况和苏联政府对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立场后，丘吉尔声称，无论是英国和美国，都准备“以最大的兵力”进攻欧洲大陆。他说，目前，英国政府正在研究关于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问题，并将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一任务。同时，丘吉尔强调：“一俟出现适合进攻的条件，就在西欧建立第二战场，但是，现在英国政府受到自己条件的约束。”他指出，在1942年以前，美国不可能拥有必需的武装力量。丘吉尔断言，英国和美国也不可能在这一年拥有足够数量的登陆器材。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5月29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由伦敦抵达华盛顿，并于当天与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两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谈时，总统建议在第二天即5月30日，在有美苏军事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第二战场的问题，莫洛托夫同意总统的建议。第二次会谈时，只有霍普金斯参加，罗斯福告诉苏外长，“与许多美国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必须首先打败希特勒，然后再打败日本。因此，他准备在1942年尽一切努力，以便减轻苏联对希特勒战争的负担”。罗斯福说，他就这一问题跟美国军人们商量过，一些军事专家总是看到困难的一面，因此“我们应当推他们一把”。总统接着宣布，到年底美国将拥有400万人的陆军和60万的海军。他说，美国军人认为，进攻欧洲可以通过英国进行。因此，已经向爱尔兰派出了第一批美国军队，今后派出的人数将会继续增加。总统强调在欧洲登陆应当通过海峡进行。“要想保证进攻欧洲战役的胜利，只能在1943年进行。”

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苏联政府可能产生的不满，总统声称，他正在说服美国军人承担风险，并以6—10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实施登陆。即使不能保证这次战役将取得胜利，但“为了在1942年援助苏联，应该作出牺牲。也许还得经受一次敦刻尔克……但是，这次战役在影响德国人的士气方面，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将缓和局势，并将进一步提高红军的士气”。总统问，人民委员对他的以6—10个师的兵力在欧洲登陆的建议持何种看法。

莫洛托夫答道，在苏德战场上，双方部集结了大规模的武器装备和军队。1942年夏季，这里将发生重大的战斗。目前红军和苏联人民的士气比战争初期更加高涨。但是，在希特勒占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要考虑到红军退却的可能性。苏外长强调，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在1942年的援助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美国和英国能从苏德战场上引开40个德国师，即使不是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军队从法国向英国的一次大撤退。1940年5月，德军占领荷兰和比利时，侵入法国，击败了英法军队。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军共30余万人，溃退到法国北部敦刻尔克地区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于5月27日到6月4日丢掉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通过英吉利海峡向英国撤退。

流的德军师，那么，在 1942 年就可能击溃希特勒，或者至少能预先决定他的命运。至于总统的以 6—10 个师的建议则是足够的。

1942 年 6 月 1 日，美国总统和苏联外长举行最后一次会谈。

罗斯福通知说，他和参谋长们讨论了登陆战役的船只问题。他说，美国政府目前正向英国派遣军队和飞机，以便在那里集结用来进攻欧洲的敌军。美国人还开始向英国派出登陆舰艇。总统表示：“我们希望在 1942 年建立第二战场，然而时间问题取决于船只。我们可以通过制造大量船只的办法来加速第二战场的建立。为了加快开辟第二战场，参谋长们提出，苏联政府应大大缩减它在 1942—1943 合同年度的供应订货单。”罗斯福说，如果把对苏联的供应由原来规定的 800 万吨缩减到 200 万吨，那可腾出大量船只，用来把美国军队、坦克和飞机调到英国实施进攻。

在会谈结束时，莫洛托夫提醒说，苏联政府派他到美国来，首先是为了就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接着他问罗斯福，他应当如何向莫斯科和伦敦报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罗斯福回答道：“我可向莫斯科声明，美国政府力争并希望在 1942 年建立第二战场。英国和美国都在这方面进行着大量的准备工作。加速组织第二战场的办法之一就是缩减美国对苏联的供应，以便腾出辅助吨位，把美国军队调往英国。”总统并告诉苏外长，他可以在伦敦说，美国政府等待着英国联合作战部司令官蒙巴顿海军上将和英国空军参谋长波特来的到来，以便征得他们对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同意。

经过紧张的穿梭会谈后，1942 年 6 月 9 日，莫洛托夫又回到伦敦。他向丘吉尔详细通报了罗斯福总统的下述思想，即开始以 6—10 个师的兵力在空军的掩护下在大陆实施登陆，因为这个数量的军队较容易保证吨位的供应。同时罗斯福指出，为了第二战场的开辟，不惜冒第二次敦刻尔克的风险。苏联方面对这一建议的反应是，以 6—10 个师的兵力开辟第二战场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要减轻红军作战的压力，就必须从苏德战场上引开并以战斗牵制至少 40 个师的德军。

英国首相马上反驳说，他无论如何都不去进行新的敦刻尔克冒险，不管谁建议他这样做。随后又声称，以 6 个师的兵力于 1942 年秋天在法国登陆的实际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为此目的，通常用于海上运输的必要的吨位已经停止使用，新的登陆舰艇已经建成。但是，这次登陆是否能够实施，将取决于当时可能出现的具体形势。丘吉尔宣称，一俟他得到罗斯福关于第二战场的建议，他就立即加以研究。

然后，丘吉尔交给苏联外长他曾答应过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说明了英国政府为了缓和苏德战场军事形势能做些什么。关于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备忘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正在为 1942 年 8 月或 9 月在大陆登陆一事进行准备。如以前业已说明的，登陆部队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有关的特殊登陆舰艇。很明显，如果为了采取行动而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某种行动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会让敌人乘我们失败之机而大肆宣扬自己，那么，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因为在事前很难说，到时候是否会出现进行这种行动的形势。我们因此无法许下任何诺言。但是，在看来是完善而明智的条件下，我们当毫不犹豫地让我们的计划付诸实现。”

在莫洛托夫离开伦敦的第二天，丘吉尔就在他的内阁会议上报告说，经

过军事形势的仔细分析，他和参谋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非我们打算留在那里，否则不在法国大举登陆；除非德国人与俄国作战中再次失利，因而上气不振，否则不在法国登陆。”很明显、丘吉尔的态度已经是 180 度的大转弯了。

为了说服罗斯福，英国首相又于 1942 年 6 月 18 日至 25 日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会晤开始前不久，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战胜了日本海军，致使太平洋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平衡。

相反，在北非，英国人没有什么成就可夸。德意联军神速进攻利比亚，他们离埃及只有托卜鲁克要塞一城之隔了。

英国首相急急忙忙出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担心美国政府与莫洛托夫会谈以后，可能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积极支持苏联。丘吉尔打算亲自说服总统放弃在 1942 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并回到原来的计划——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英国外交常务次官卡多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首相出访华盛顿是为了说服罗斯福，不论美国人对莫洛托夫说什么，实际上在 1942 年进攻欧洲大陆是无法完成的战役。”

6 月 19 日至 20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德公园举行了秘密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只有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会谈中讨论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大西洋会战的进程和许多其它问题。6 月 20 日，丘吉尔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关于盟国必须定下迫切的战略决心的照会。照会指出，虽然正准备以 6 个或 8 个师于 9 月初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但是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处于何种境地，这对他们都没有帮助”。丘吉尔建议“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以代替 1942 年在法国北部登陆。首相认为，这样既可保护英国在那里的“海外”利益，又可间接地减轻苏联人的负担。

经过丘吉尔的大肆活动和说服动员，终于在 7 月 25 日的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开展以“火炬”为代号的北非和西北非战役。这样一来，英美两国政府不顾苏英、苏美公报确定的义务，完全拒绝了在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为此，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写道：

“1942 年在地中海实施任何战役，无疑会使 1943 年经过英吉利海峡实施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根据马歇尔将军的看法，7 月决定意味着“他和哈里·霍普金斯 4 月离开伦敦时制定的相当可靠的战略的结束。”

西方列强政府出尔反尔，蓄意不愿在法国登陆以便尽快粉碎共同的敌人，取而代之的是实施外围行动战略，而这种战略需要的努力要少得多，而且其间接的目的是为了使苏联在与法西斯德国的单独作战中消耗罄尽。

为了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英美两巨头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由丘吉尔向莫斯科跑一趟，亲自向斯大林解释这一战略计划变更的原由。恰好，7 月 31 日，斯大林邀请英国首相和帝国参谋长访问苏联“共商作战的紧迫问题”。为了避免关系闹僵，行前，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嘱他如何进行这次艰难的谈判。电报说：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盟友的性格，以及他面临的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我想，我们应当尽量设身处地分析问题，因为不可能期望一个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的人会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对待这场战争。首先，我们应十分具体地告诉斯大林：我们对 1942 年的行动步骤已经作了决定。我们不必告诉他我们拟议中的作战行动的确切性质，但我想我们应当不折不扣地

告诉他，这些行动是都会兑现的。”

原计划丘吉尔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时没有美国代表在场，但哈里曼心想也许跟首相前住会有好处，于是罗斯福打电报授权他前往，但没有给他特别指示。因此，哈里曼随丘吉尔于8月12日抵达莫斯科。当晚丘吉尔和哈里曼就同斯大林举行了一次长谈。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英国大使。讨论的中心是1942年剩下的时间里和1943年的英美战略计划，以及它们对苏联战局的影响。

当丘吉尔向苏联领导人说明了“痛击”的各种可能性，全面地解释了所以推迟它的原因，还把横渡海峡的主要作战行动计划和打算使用的兵力告诉了他。双方随即争执起来。斯大林说，如果你们害怕德国人，不愿意冒险，那就不能赢得战争。他庄严地宣告，虽然他不同意英美的主张，但他不能强迫他们行动。从这时起，西方的来客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是哈里曼的原话。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政府对“火炬”行动不感兴趣。他带讽刺地指出，西方同盟国没有把已经答应的物资运到苏联。他讲到苏联为在东线牵制280个师的德军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他说，他认为英美派6个到8个师在瑟堡半岛登陆并不是太难的事。丘吉尔详尽地说明了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所冒的风险，但斯大林毫无所动。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英国的陆军像苏联人那样打德国兵——就像皇家空军打德国人那样——他们就不会被德国人吓到这种地步。丘吉尔说：“只是由于俄国军队的勇敢，我才原谅了这一句话。”

哈里曼回忆说，有一次丘吉尔为了维护英美的政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辞令，使英方的译员竟搁起笔来听得出神，一时忘了逐字作笔记的责任。丘吉尔却不能原谅这样的失误，他把译员狠狠地训了一顿，然后重新把他的话讲了一遍，让这个不幸的小文官记下来照翻。在这段有趣的插曲中，斯大林仰天哈哈大笑，对丘吉尔说：“我不懂你的话，但我喜欢你的精神。”此后，气氛有些和缓，但这一次会场的情绪总是不够友好。最后，哈里曼问到通过西伯利亚运送美国飞机的计划，斯大林直率地说：“光靠计划赢不了战争。”问题给岔开了。

跟着丘吉尔给他讲述了对德国轰炸的情景，还表示希望，如美国空军参加，轰炸就会大大加强起来。这样，他们两人之间才第一次有了一致的看法。斯大林主张对德国的军事设施和重要建筑要狠狠地轰炸。从这时起，紧张的气氛才开始缓和，双方对共同的目标也逐渐有了一致的认识。斯大林一句，丘吉尔一句，不多一会儿，他们两人就把德国重要工业中心大都干得精光了。

丘吉尔利用他老练圆滑的手腕，抓注这更为友好的交谈气氛，又把话题拉回到第二战场上来。他解释“火炬”行动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以及它的战术如何。他强调保密的必要。他说，他但愿有斯大林所享有的对报界的权力。这样一说，紧张的局面又进一步缓和了。斯大林表示担心“火炬”行动可能引起的政治反响。

丘吉尔画了一只鳄鱼，指出扫它柔软的下腹（指地中海），同打它的嘴（指法国北部）是一样重要的。然后，他回到苏联战场，说我和罗斯福都正在探讨，等到我们在埃及打败隆美尔之后，或许有可能派遣一支同盟国空军参加苏联战场南线的战争。他征求斯大林对这一建议的意见。斯大林简单扼要地回答说：“我将感激地接受这个建议。”

为了整个反法西斯的利益，为了不使关系闹僵，随后斯大林总结了“火

炬”行动的战略上优点，表现出他对这个作战行动所牵涉的复杂问题是了如指掌的。他具体地要求政治方面的问题要特别审慎处理，并希望这项行动能够尽快提早实行。他认为“火炬”行动在军事上有四个好处：

这将直取敌人的后方；
这会惹起法国人同德国人之间的火并；
这会使意大利失去战斗力；
这会使西班牙觉得保持中立更有利。

这次会谈长达3小时40分钟。会后，丘吉尔和哈里曼都感到非常高兴，正如哈里曼在他的海底电报中所说的，他和丘吉尔都对斯大林理解“火炬”作战行动深受鼓舞。当他们告辞时，斯大林说：“愿上帝保佑这次创举成功！”

8月15日晚上，丘吉尔就协同作战问题到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作了最后一次会谈，双方气氛亲切融洽。这次谈话终了时，斯大林问道：“到克里姆林宫我住的房间去干几杯好吗？”虽然丘吉尔的座机准备在凌晨起飞，他当然还是接受了这一邀请，而且在那里逗留了7个钟头，谈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让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冰岛相会的可能性。丘吉尔希望斯大林有机会访问英国，并保证给他一次“隆重的接待”。斯大林对这个邀请表示感激，并说，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款待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胜利。丘吉尔直到凌晨3时30分才回到下榻处，然后拟了一封长电报给罗斯福，把它发了出去。4时30分丘吉尔开始了到德黑兰去的9个半小时的飞行。对一个行将68岁的人来说，像他这样的精力可以说是超凡的。他向罗斯福通报说，会谈在最友善的气氛中结束，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私人关系建立起来了。

之后，罗斯福给斯大林发了一个海底电报：

“遗憾得很，我不能参加你和丘吉尔先生在莫斯科的会议。我充分认识到战局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关于你自己的东线的需要。我认为，我们正在西南太平洋获得了一个日本人难以拔除的立足点。我们的海军在那里损失惨重，但是收获和损失还是相抵的。我们将要对敌人继续保持沉重的压力。

“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大家真正的敌人是德国，我们必须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集中我们所有的军队和我们的威力来对付希特勒。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关于海运的安排是人力做得到的，都要马上做到。另一方面，8月份就要从这里运出1000辆坦克给俄国，其他急需物资，包括飞机，也在赶运之中。

“请相信我，我们正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大的力量在援助你们。美国人民懂得，俄国今年在作战中是首当其冲的，付出了最大的伤亡代价，对于你们所作的杰出的抵抗我们是充满着崇敬心情的。”

罗斯福一再表示，决心以“火炬”的光辉战绩，来配合苏联军民的英勇斗争，并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应有的贡献。到此，这场“战略分歧”的风波才算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问题仍未解决。正是：西方列强，反复无常，好话说尽，诺言健忘。欲知“火炬战役”的情况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九章 运筹帷幄

总统指挥百万兵，自古兵机在速攻；
火炬战役获大捷，欧非战场相呼应。

美英领导集团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后，罗斯福就召集军政会议。着手制定实施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

对美英来说，“霸王”计划与“火炬”计划相比较，无疑后者对他们好处更多一些。如果美、英于1942年在西欧登陆作战，那就要同法西斯军队作殊死的斗争，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这是英美所不取的。而北非和西非是法国维希政府的殖民地，这时维希政府同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一旦占领北非，对英国来说，盟军可以威胁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可以确保直布罗陀的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进而掠夺这些殖民地，特别是中东的石油；占领北非之后，英国并可北上意大利、巴尔干，进取东南欧，恢复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因为英帝国摊子太大，实力空虚，顾此失彼，这就决定了它的战略。

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同日本军队携手；西边从达卡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急于消除这个威胁。另一方面美国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1942年7月15日，即霍普金斯等赴伦敦前夕，罗斯福对这位心腹交底说，如果进攻西欧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么可供考虑的是北非和中东。丘吉尔提出的“火炬”有很大的优点，“它将使我们获得西非，并为最后控制地中海奠定基础”。在这里，美国的目的，就是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的儿子伊利奥特作了很好的记录。

1942年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制“火炬”的具体作战方案，经过反复磋商，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达尔贝达）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瓦赫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

根据作战计划，前往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的部队从英国出发，前往卡萨布兰卡的登陆部队直接从美国出发。参加“火炬”作战的英国运输队应于10月26日前全部驶离英国的港口。美国的部队则于10月24日从美国的港口乘军舰出航。参加这一战役的英美远征军，必须在同一时间到达各自的登陆地点。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作为美英联合作战部队的总司令，来指挥这次即将开始的登陆战役。

艾森豪威尔是罗斯福总统的一员爱将，也是总统亲手提拔起来的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二次大战前，艾森豪威尔只是麦克阿瑟手下的一名中校军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到总参谋部任作战计划处处长。他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与太平洋战争有关的战役。从美国参加战争时起，艾森豪威尔官运亨通，飞黄

腾达。他沉着、稳健、勤奋、果断，每天工作 14 至 18 小时。他所领导的作战处被称为全军的“主要神经中枢”，成了罗斯福总统指挥战争的有力助手。总统为了表彰他，授予艾森豪威尔少将军衔，这立即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为了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2 年 6 月，马歇尔建议艾森豪威尔去伦敦指挥欧洲盟军作战部队，总统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艾森豪威尔回忆说，“从此使他真正地接近了战争”。但他当初最大的希望是指挥一个师，而不是统帅几十万大军。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的首要任务，是把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组成一支能完成重大战斗任务的武装力量。当他来到伦敦时，由他管辖的有 366 名将军，许多人的军阶都比他高。

为了加强盟军的团结，艾森豪威尔很注意搞好与各方面的关系，但他到伦敦不久，就与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艾森豪威尔应邀去听他讲演，在这位将军开始讲话不久，嗜烟的艾森豪威尔抽了几口。报告人立即用愤怒的语调大声喊道：“谁在抽烟？”“我，”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不准在我的会议室里吸烟。”他立即默不作声地把烟掐灭了。事后艾森豪威尔并未因此对这位英国将军产生不好的印象。他说，这是“性格坚毅、精力充沛、具有良好职业修养的人”。艾森豪威尔在“刻苦奉公、遵守纪律方面”为部下作出了榜样。

在北非登陆是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进攻性的战役。它既有战略意义，又有道义上的意义。盟国最初计划于 1942 年 10 月在北非登陆，由于艾森豪威尔坚持要作好准备工作而推迟了一个月。“火炬”行动不只是对美英军事政治同盟效率的第一次考验，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也是严峻的考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指挥一个战役，而且是如此大规模的战役。这位总司令焦急万分。“火炬”行动能使他军事上成名，前程远大，而想到可能遭到失败的后果，难免不寒而栗。

10 月底，差不多拥有 900 艘舰艇的巨大舰队驶离英国海岸，这支舰队要航行 1900 海里。10 万名士兵连同坦克、大炮、弹药、装备走上了新的战斗航程。

10 月 5 日，载着艾森豪威尔的“飞行堡垒”终于把他送到了直布罗陀。盟军指挥部设在这里。丘吉尔打电报给他说：“直布罗陀的岩壁掌握在你手里，是不会发生危急的。”次日，他们就向“法属北非”发动进攻了。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与西属撒哈拉接壤，西临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是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面积约 45 万平方公里。1912 年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其北部狭长地区和南部的一个地区划为西班牙的“保护地”。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北临地中海，隔海与西班牙、法国相望，东部与突尼斯、利比亚接壤，南部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交界，西部与西属撒哈拉、摩洛哥相邻，面积约 238 万平方公里，1830 年起沦为法国属地。突尼斯位于非洲北端，北、东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与阿尔及利亚相邻，面积约 16 万平方公里，1881 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 20 万军队，500 架飞机。在法国土伦和法属北非各港口，尚有 4 艘战列舰，12 艘巡洋舰，40 艘驱逐舰，20 余艘潜艇和其他船只。维希政府及其法属北非的军政首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有联系。他们中有些人不愿站在德国一边打仗。魏刚、吉罗、朱安等法

军将领，与美国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墨非关系也很密切。魏刚曾向墨非表示：“假如你仅仅带 1 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 20 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其态度由此可见。

为了争取这一战役的顺利进行，美、英两国除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外，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争取法军归附，企图兵不血刀地占领法属北非。为此，罗斯福总统曾费尽心机。为了从良心和理智两方面向北非的法国人发出最有力的避免流血的呼吁，特组织“心理作战队”随军前进，以便通过各种现有工具——报刊、广播电台、电影院、宣传画等等，来进行反对德国和支持盟军的宣传。

11 月 7 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把在法军中“享有盛誉”的吉罗将军接到直布罗陀，想利用他的影响使北非的法国倒向盟国。与此同时，墨非在阿尔及尔与法国军事长官进行密谈，并决定把盟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告诉正在那里探视儿子病情的维希政府的武装力量总司令达尔朗，企图取得他的支持。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由于达尔朗在此，朱安的职权就不可能起作用。一贯忠于贝当的达尔朗认为，如果他支持盟国，希特勒必然要武装占领法国全境，维希政府也将因此而垮台。所以，他只答应用电报请示贝当后再定。

为了争取维希政府和法属非洲各国领导人对“火炬”行动的支持或守中立，罗斯福总统曾分别给维希政府首脑贝当、西班牙头目佛朗哥、葡萄牙总统卡蒙纳将军、阿尔及利亚总督夏泰尔以及摩洛哥的苏丹和突尼斯的统治者发出了字斟句酌的电文，要求他们为盟军提供合作。这些电文要在军队登上海滩的同时发出，美国和英国国内所有的国际无线电台都要同时播出准备了几个星期的相同的节目。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发了文告，其中的每一个用词，无不是经过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反复推敲的，对许多字眼还作了修改，因为显然政治上稍一疏忽都是会断送许多生命的。

最有意思的，就是草拟致贝当的信的过程。丘吉尔曾提醒罗斯福，贝当“利用自己的名望给我们事业所带来的损害，是任何地位稍次的人物都做不到的。对他不能太仁慈了。”但是，罗斯福总统还是本着以反法西斯大局为重 的精神给这位没有骨气的元帅发出了如下 一封电报：

我是以美国元首的名义致电给你——法兰西共和国的元首的。

当你的政府在 1940 年签订了停战协定时，我们谁都无法预见到德意志帝国将要强加于法兰西人民身上的那套完整的掠夺行动纲领。

那套纲领，通过讹诈和抢劫，已经剥夺了法国人民谋生的手段，夺去了他们的储蓄存款。它瘫痪了法国的工业和运输业，洗劫了法国的工厂和农场——这一切都是为了纳粹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利益，而在他们政府的统治下，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生存的。

作为法兰西和法兰西人民的一个老朋友，当我想到那痛苦贫乏和最优秀的法国男子背井离乡的景况时，我的愤怒和同情与日俱增。德国没有放过任何机会来挫折你的伟大民族的士气，贬低你们的名誉和地位。

德意志和意大利对法兰西辛辛苦苦建设的帝国垂涎三尺。今天，他们正想入侵和占领北非，以便实现他们控制和征服那个大陆的全部阴谋。

我知道你懂得对非洲的这种征服并不会就在那里打住，而会成为德、意两国的前奏曲，进而他们就要威胁征服美洲半球的大块土地，大规模地逐步控制近东和中东并想在远东同一心要控制整个太平洋的日本军事头子携手会

师。

当然，很明显的，入侵和占领法属北非和西非，会构成对美国 and 美洲所有共和国的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正如会敲起法兰西帝国的丧钟一样。

根据我们敌人的意图和计划的一切证据，我因此决定派遣强有力的美国武装部队到北非去，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管理机构一道合作，来制止德、意两国在国际上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案中的这一最新罪行。

这些不屈不挠的美国军队都配备有足以进行现代战争的大量武器，在我们对共同敌人的协同作战中这种武器将发给你在北非的同胞。

我现在正把一切情况向北非的法国当局详加说明，呼吁他们为抵御轴心的威胁而同我们进行合作。我的明确目的是支持并援助法国当局和他们的政府机构。这就是这些美国军队眼下要达到的目的。

我无需告诉你，最终的和更大的目的就是轴心的枷锁下把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解放出来。这样做，我们也就自然地保证了南北美洲的安全。

我也无需一再向你宣称，美利坚合众国不想占领别人的领土，而且永远记住我们之间的历史性友谊和彼此之间多方的援助。

我向你并通过你向法兰西人民表达我的深切愿望和信念：我们大家不久都会进入更幸福的日子了。

不料罗斯福这封 10 月 15 日的电报发出后，竟受到贝当这个不识时务的无耻之徒的敌视。他马上回复说：“我今天晚上接到你的军队侵略北非的消息时，感到不知所措，甚为悲哀。我读了你的电报。你用无以辩解的借口……法兰西和它的‘光荣’存亡攸关。我们受到袭击。我们的天职是保卫自己。这就是我所下的命令。”

这样，贝当为了所谓维希政府的“光荣”，就与盟军展开了一场不自量力的搏斗。11 月 8 日凌晨，由 500 多艘军舰和运输船只组成的一支庞大的美英联合舰队，载着 10 万大军，在大量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在预定的目标登陆：美国巴顿将军率领的部队攻占卡萨布兰卡，由仇恨德国法西斯的法国贝图亚尔将军组织内应，但因没有截断法国与摩洛哥总统诺盖的秘密电话线，内应未能成功，诺盖和海军将领进行抵抗，战斗到 11 日才告结束。攻占奥兰的是美国第二军，他们遭到了法军的顽固抵抗，到 10 日战斗完全停止，盟军占领了奥兰。在阿尔及尔的登陆最为顺利，这是由于法国马斯特将军等五人小组事先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暴动，把军政要人都逮捕起来，城防瘫痪，盟军登陆时没有遇到什么认真的抵抗。

为了减少牺牲和尽快稳定局势，在盟军占领阿尔及尔后，罗斯福特邀法国吉罗将军来到这里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号召北非法军停止抵抗。盟军指挥部又与维希政府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达尔朗达成停战协定。11 月 10 日，达尔朗发出停火命令。

12 日，阿尔及尔以西的战斗全部停止了。13 日，盟军同以达尔朗为首的法国陆海空军达成了最后协议；法国在北非的军政官员及和平居民与盟军合作，盟军承认达尔朗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所有法国军队。接着艾森豪威尔又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与法属西非的行政长官布瓦松达成协议，把西非也争取过来了。

但是，达尔朗这个臭名昭著的附敌分子，继续任用维希官员，包括那些曾同纳粹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此外，他还继续执行镇压抵抗运动的政策，把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分子关在监狱，封闭了他们的《战斗报》，这就更

加激起了法国人民对他的仇恨。自由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以及英美报刊群起而攻之，强烈谴责反动透顶的达尔朗。1942年12月23日，达尔朗被年轻的戴高乐分子沙佩勒刺杀身亡。此后，吉罗便掌管法属北非的军政事务。

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完全出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意料之外。后来证明，德国最高统帅部差不多直到最后才弄清盟军的意向。面对形势的突变，希特勒最初作出的反应是混乱的。他曾下令立即加强克里特岛的守军，而该地距离新的战场十分遥远。他解释说，采取这项措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非洲运送增援部队。他命令秘密警察把魏刚将军和吉罗将军带到维希那里监视起来。他要求伦斯德元帅准备执行占领法国非占领区的“安东计划”，但在他给予新的指示之前，不要越过法国的分界线。

希特勒在这24小时中，一直沉湎于这种想法：力求与法国结成联盟，使它参加对英美的战争，目前要尽力加强贝当政府反对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决心。

11月8日上午，这位老朽不识时务的法国元帅贝当，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表示法国部队将抵抗英、美的入侵。贝当的这些行动助长了希特勒上述想法。纳粹最高统帅部在那个星期天的大事日记上强调说，希特勒一心想达成“与法国的全面合作”。这天晚上，德国驻维希代表尼达向贝当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德法结成紧密的联盟。但是，当希特勒听到阿尔及尔发生的一切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告诉墨索里尼的外长齐亚诺，他毫不幻想法国会有什么协同作战的愿望，他已决定“全面占领法国，登陆科西嘉岛，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

希特勒这一决定，在维希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首先受到威胁的是驻守突尼斯的埃斯特瓦海军上将，他是维希政府一名忠实的走卒。随着事态的急转直下，他的惶恐不安与日俱增。由于他距离西西里和突尼斯东部边境上的敌军较近，因此他的处境比达尔朗或诺盖的处境还要糟。他的高级幕僚的优柔寡断也不下于他。11月9日，德国空军部队占领了利比亚的扎维亚飞机场。同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部队开到突尼斯。当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轴心部队由东方开进突尼斯，而盟军部队也由西方直逼突尼斯的时候，埃斯特瓦心情沉重，举棋不定，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最后他带着大部分守军往西投奔吉罗将军去了。但是，在比塞大港，却有三艘鱼雷艇和九艘潜艇向轴心国投降了。

经过奋力拼搏，希特勒赶在艾森豪威尔之前，拿下了突尼斯。在他和墨索里尼的坚持下，为了守住这个桥头堡，共投入了25万德国和意大利的部队。经过紧张准备，敌我双方于1943年3月下半月展开厮杀。在盟军方面，这时亚历山大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群，至少有20个师又4个独立旅，人员和装备齐全。而德、意联军只有14个师又2个旅，人员和装备缺额很大，且又处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两支大军之间，态势十分不利。3月6日，隆美尔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进攻，使用了所有的三个德国装甲师。每次进攻都在惨重的损失下被击退。严酷的事实使这个不可一世的“沙漠之狐”认识到，轴心国的军队若再留在非洲，就等于“明显的自杀”。3月9日，隆美尔请他的属下阿尔林将军代理指挥军队后，便返回欧洲养病，并向“元首”要求迅速从北非撤军。结果隆美尔成了希特勒眼中的“悲观主义者”，从而失去了对非洲军团的指挥权。

现在，蒙哥马利指挥的第八集团军正向前推进，以围攻敌军主要阵地，

即马雷特防线。这条防线是法国人在战前防备意大利入侵突尼斯而修筑的一条长达 20 英里而且组织严密的防御系统。在轴心国方面，敌人正加强固守，他们已在这个隘口修筑了工事，并由希特勒的装甲师和墨索里尼的步兵师占领着。鉴于马雷特阵地的敌人防御力量雄厚，计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和六个意大利步兵师防守，并由第十五装甲师作为后备，蒙哥马利决定派一支侧击纵队，以便突破这个隘口，并在敌军主要前线后方站住脚。这样一来，德、意军面临被合围的威胁，不得不北撤马雷特防线的守军，并于 4 月中旬退至突尼斯北部，终于成了“瓮中之鳖”。

1943 年 4 月 19 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国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远征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 18 天的战斗，于 5 月 7 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

25 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 5 月 13 日宣告投降。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尔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良好条件。

北非大捷有力地鼓舞了盟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军民的斗志，运筹帷幄的罗斯福总统尤为高兴。他对指挥这一战役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称赞不已。他在白宫对记者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完成了一件多么漂亮、多么艰巨的工作，他现在是多么细心多么巧妙地在指挥着他手下的士兵。我今晚要对你们说——也对他说——我们完全信任他的领导。对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品格高度奖赏，就是英国政府通过丘吉尔先生在卡萨布兰卡首先提议，由他出任即将来临的伟大的盟军作战行动的最高统帅。”

谈到法属北非将来的前途，罗斯福用词非常严谨地说：“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岁月中，就已建立了那种指导我们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我们整个民主大厦的基石就是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和只能来自人民的原则。”

“我们作战的目的之一，”罗斯福进一步指出，“正如《大西洋宪章》所阐明的，是今天被征服的各国人民将重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无论在哪里都毋庸置疑：联合国家的坚定不渝的宗旨，就是要恢复各个被征服的民族的神圣权利。”

关于太平洋战争局势，罗斯福说：“我们不指望浪费时间，慢慢地、一个岛一个岛地越过广阔的太平洋前进，直到最后打败日本。直接通往东京的道路比比皆是。我们对所有这些道路都会加以考虑。”当时的太平洋形势令人欣喜，继中途岛大捷之后，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日本大本营又向联合舰队和第八方面军下达从瓜达卡纳尔岛撤退的命令。在瓜岛战役中，日本被击毙 1.5 万人，病死 9000 人，另有 1000 人被俘。罗斯福多次强调，要乘胜前进，向敌人发起更猛烈的冲击。

为了推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在“火炬”战役期间，罗斯福总统又以病残的身体，爬山涉水，远渡重洋，在 1943 年 1 月 14 日至 23 日，前来北非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首相举行了为期 8 天的会谈，并在这里会见了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从 1942 年秋冬到 1943 年初，欧亚战场都出现了有利的形势。苏联经过苦战，于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1 月，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重大胜利；1942 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经过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卡纳尔岛一系列的海战，

指 1944 年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战役”。

取得了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北非战场，盟军突破敌人的阿拉曼防线后，又取得登陆突尼斯的巨大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希望举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对今后的战略方针进行商讨。但是斯大林拒绝参加会谈，理由是他要留在国内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阶段，其真正原因则是对美英拒绝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作出明确保证表示不满。罗斯福、丘吉尔和他们的参谋人员对日后战略的讨论，证明斯大林的疑虑是有根据的。

会议开始时，丘吉尔重新念了一段他在“火炬”行动和阿拉曼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给罗斯福电报中的一段话，因为这是卡萨布兰卡会议要审议的一个最明显的、急迫的目标。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第一，攻克地中海的非洲沿岸，在这一带建立海军和空军设施，它们对于开辟一条横贯的军事交通的有效走廊是必要的；第二，利用在非洲沿岸的基地，在最短时间内以有生力量去打击轴心国的下腹部。”

美英两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罗斯福到达之前已经开了三天会议，并对最后击败突尼斯的德、意法西斯军队之后可能发动的几次战役进行了审议。打算进攻的目标包括撒丁、西西里、克里特、罗得岛、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本土。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参加会议之前，就已进行过许多争论，此后因马歇尔一直力促在1943年进攻法国北部，争论更加热烈。在美国，不仅海军极力主张加强太平洋战场，人民也有强烈的对日复仇情绪，舆论中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在欧洲是为拯救英国而战，亚洲战争才真正与美国切身利益有关。经过反复讨论、磋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并没有改变以欧洲为主战场的战略总方针，但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仍未作出明确的保证。

卡萨布兰卡会议最主要的决策之一是宣布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罗斯福根据事先准备的讲稿对记者说：总统和首相对整个世界大战的局势作了分析之后，更加坚定不渝地确信，只有把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力量彻底消灭干净，世界和平才能到来。这就是说，这次战争的目标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要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在日后几代时间内，世界和平将有可靠保证。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的毁灭，也不是要毁灭意大利和日本人民，而是的确意味着要摧毁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那种用以征服和奴役他国人民的法西斯势力。

在卡萨布兰卡的八天中，在罗斯福住的“达累斯沙达”别墅里，有好几家得到骨肉团聚的机会。除罗斯福的大儿子埃利奥特中校之外，还有小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尉，他在大西洋舰队的一艘巡洋舰上服役；有英国特种勤务旅突击队的伦道夫·丘吉尔上尉，还有罗伯特·霍普金斯中士，他们是奉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从突尼斯前线特来会亲的。美国报纸对此有所批评，说国外有许多那么幸运的士兵和水手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假期去会见自己的父亲。但罗斯福并没有过多地理会这种议论，仍广泛地进行联系，对年轻的战士们进行鼓励和慰问。

1月30日，罗斯福回到华盛顿不久，斯大林格勒之战就胜利结束了。2月2日，德国第六军团残存的9万人，包括军团总司令保罗斯元帅和23名将军都当了俘虏。对德国侵略者来说，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希特勒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损失共达150万人左右。现在，在许多殷切期望的人们看来，通往胜利之路已经是一条宽

广而平坦的康庄大道了。但在美国，对于“无条件投降”这句话的争论却开始了。许多美英宣传专家认为，罗斯福这句话的提出，将迫使德、意、日三国不惜孤注一掷地拼死抵抗，因而无谓地使战争延长并多付出代价。这些评论家认为罗斯福总统公开说出这句话则是一个“弥天大错”。

罗斯福则坚持认为，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能搞妥协，不得让另一个《十四点》提出的“例外条款”再产生出一个希特勒来。罗斯福要使这一始终不渝的宗旨深入美国人民和其他被侵略的各国人民。他还要使德国人深切地感到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既不能借助于武力的延续，也不能通过一种动听的合理的新精神的诡计，来给他们赢得一个易于到手的和平。他要确保一旦战争胜利了，这一信念也将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罗斯福从北非回来，明显地老了，对战争的过度操劳，严重地损害了他那病残的身体。为了调换一下工作环境，从1942年夏天起，罗斯福大部分时间在华盛顿以北66英里的马里兰群山中所名叫“香格里拉”的别墅里办公。这是一所只有四间卧室的简朴山庄，里面有总统专用的浴室，还有一间客人用的浴室。另外，有秘书人员、电话总机、特工人员的篷屋，周围是陆战队的营地。

这里空气新鲜，环境幽雅。闲时，罗斯福就坐在装有纱窗的小走廊里，观赏卡托克廷山谷的美景。工作累了，他喜欢玩赏自己的集邮，打打单人纸牌，在自己图书室送来的书籍上签上名字，或是签上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F·D·R。照他说，他起初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人们总是借了白宫的书而不归还。他的一位朋友打趣地问他：“总统先生，你认为人家对经过你亲笔签过名的书可能会收敛些吗？”但是总统总相信这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那一年8月，他把一本书送给他的顾问舍伍德，这是人家送给他的一本老旧的《诗篇》。他通读了这本书，还在某些段落上打了记号。罗斯福作记号的一个地方，其中有第三十九首诗篇的最后一节诗：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在“香格里拉”别墅里，罗斯福在起居室或走廊里批阅送来的文件，草拟和发出给马歇尔的函件以及给丘吉尔、斯大林或蒋介石的海底电报。总统同他的统帅部密谋筹划，指挥着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争。他虽然非常劳累辛苦，但不时地收到来自各条战线的胜利消息，他的心情就无比欢快。罗斯福经常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更重要的是赢得真正的和平。”正是：总统决胜多奇策，将士争先立战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旨在划分势力范围和夺取世界霸权。其主要内容为“进行公开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拆除经济壁垒”、“裁减军备”和“公正处置殖民地”等。

第三十章 史迪威将军在中国

身兼六职难指挥，美蒋各自有算计；
将军陈词为抗战，一片热心付流水。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一下子改变了整个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新蜜月”；罗斯福总统想靠蒋介石政府顶住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攻，并为日后的反攻提供重要的基地。从此美援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但为时不久，这个幻想就破灭了。史迪威将军成了这一悲剧中的牺牲品。

珍珠港事件后，德国参加了对美战争，日军开始击溃分散在太平洋各岛屿的美、英、荷军队。这一打击虽然最后证明是使美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转折点，却使无数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丧失信心。战争爆发不久，《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满怀希望地说，尽管美国最初遭受了损失，但它决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但是，重庆蒋介石政府的看法却和《纽约时报》不一样，大多数官员对日美开战欢欣鼓舞，如释重负。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没有飞鸟的夏天》一书中写道：“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五亿美元、十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如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而这意味着美钞跑进官吏的腰包，跑进军队司令官的腰包，意味着枪炮送到胡宗南手里，以便将来攻打延安。”

对于珍珠港事件，《纽约时报》社论撰稿人的估计和国民党人的实际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悲剧。同盟虽已结成，但进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战争。美国决策人员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作为一股抗击日本的巨大力量，而国民党政权却想利用它同美国的结盟捞取金钱、武器，以及帮助他们赢得国内最高权力的影响力。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把援助当作一种手段，“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蒋介石等人却相信，有了外援就能为我所用，根本不必进行什么改革。这些矛盾给虚构的“太平洋战略的钥匙”投下了第一个漫长的阴影。

甚至在日本席卷美国在太平洋的分散的前哨基地时，在中国的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就力求提醒罗斯福政府，不要过分看重同中国的盟友关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曾预言，国民党人会同日本缔结事实上的停战协定，而让美国人继续进行战争。国民党想要捞取大量美援，“主要是打算在战后采取军事行动”。期待国民党人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倒助长了他们的“尔虞我诈”倾向。马格鲁德解释说，蒋介石把他的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

海军武官麦克休在写给海军部和白宫的报告中，建议对中国现有的军事价值不要再作乐观的估计。尽管如此，麦克休由于一贯主张给予国民党以政

治上的支持，提醒华盛顿不要吝惜对中国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如果这样做，那就要冒促使蒋介石“排外”或与日本妥协的风险。这位武官说，美国的策略必须迁就蒋的要求，同时给“委员长的宠儿陈纳德”提供一支空军去打击日本。

这些来自重庆的报告虽然在政治内容上不尽相同，却证实了中国在当前战争努力中的军事价值是靠不住的。但是，罗斯福却认为，在日本最终被打败以后，亚洲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法、荷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两支主要的力量可能会赶快填补这一势力的真空。因此，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希望经过稳妥地改组亚洲将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美国在塑造战后亚洲的面貌方面应起主要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1942年12月，经马歇尔提议，由罗斯福批准，成立了盟国的中国战区，建议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同意担任此职，但是要求罗斯福派一名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而此人“不必谙熟东方旧情，只要有品学而热心之人，便可合格，并以中将为合适”。

根据马歇尔总参谋长的推荐，罗斯福总统决定派遣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来华。可是史将军“谙熟东方旧情”，而且特别诸熟中国旧情。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北伐时期，日本在华北侵略扩张时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他曾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等职，四次来华，前后在中国驻了10年，会说中国话，也了解中国官场黑幕和老百姓的苦境。根据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交换的函件，史迪威将军享有以下权力：监督和控制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之下，指挥在华美军及可能拨予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在中国的国际军事委员会，以及以委员长的参谋长身份行事，改善、维持和控制滇缅公路中国段。

1942年1月29日，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接受任命之前，提出受命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拥有指挥权。但是，日后这一问题成为史迪威与蒋介石交恶的一个触发点。

史迪威受命后，于1942年2月9日去白宫晋见罗斯福。对于这次晋见，史迪威是有不满情绪的。他在日记中写道：“造访白宫，12点至12点20分。罗斯福十分愉快，但极为淡漠。就好像我是一个前来找他的选民。他海阔天空地泛谈对战争的见解，言不及义，我插话问他有没有带给蒋介石的信。他显然没有，又花了5分钟找了一些震惊世界的事来谈。最后他算说到正题上了——‘告诉他（指蒋介石），我们在做的事是维持住中国，我们还打算一直维持到中国收回全部失地’。他接着说，他认为蒋夫人最好不要接受这个或那个组织的邀请来这里。那太像一些妇女俱乐部的宣传旅行了。总统这一点是正确的。他令人感到亲切、愉快……而又感到空空洞洞。”

在参战初期，罗斯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太平洋上，美国主力东移之前，希望中国顶住日本的进攻。他相信中国的战斗潜力，愿意继续加强中国军队，以便将来打击日本。

194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已经阻遏住日本的攻势，美国海军希望得到增援来保持太平洋上前进的势头。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在罗斯福的战略布局中，虽然仍在大西洋之后，但是与丘吉尔的想法大不相同。丘吉尔的次序是大西洋、

地中海、北非、印度洋，只有在取得地中海后，才能将兵力调到印度和东南亚打击日本人。丘吉尔对中国人能作出战争贡献没有信心。丘吉尔出于对大英帝国前途的疑虑，长期猜疑和排斥中国。他不愿意在印度和东南亚使用中国军事力量打击日本，为的是保持英国殖民帝国。

在 1942 年和 1943 年，罗斯福总统为“维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步骤。这些措施除了供应军事物资、加强中国空军、训练军官和技术人员等军援之外，还给蒋介石政府近七亿元的贷款。罗斯福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1943 年 1 月 11 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规定的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 1901 年北京议定书所赋予的特权，其中包括在华驻兵权、通商口岸制度。北平使馆界、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等等；美国声明放弃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特权、美国军舰在中国领水内享有的特权。美国参议院根据罗斯福的请求，于 1943 年 2 月 11 日一致批准上述条约。此外，1943 年 12 月 17 日，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的请求，废除了 1882 年至 1919 年制定的一系列的排华法。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与此同时，罗斯福还注意在国际事务中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2 年 3 月 3 日，史迪威将军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经印度前往重庆，迎接他的这座陪都本身就是满目疮痍。

1937 年以前，重庆是长江峡谷上游的一座死气沉沉的省城，日本的进攻使它变成千百万难民的一个拥挤的避难所，其中主要是国民党政府机关。沿着穿过重庆市中心的这条大江的陡峭斜坡，老鼠、虱子、疾病、饥饿和日本人的轰炸侵袭着老百姓。在外围的小山上，有钱有势的人都安适地住在自己的别墅里。蒋介石挑选了其中一座别墅作为史迪威的官邸，可是这位美国司令官觉得那是一座令人扫兴的坟墓。

史迪威从到达之日起，就拒绝接受像别墅那样的一切虚假的权力象征。他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就提出他要指挥已进入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蒋表面上同意这一要求，可是私下却抱怨史迪威态度傲慢，对他这位委员长不够尊重。他说，“这个美国人的举动根本不像一位参谋长或一位顾问，而是一位独断独行的司令官。”

史迪威于 3 月 11 日前往缅甸前线时，完全没有料想到那里竟是这样一种局面。中国或英国司令官，都不想为了他们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牺牲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中国司令官不愿接受美国人的指挥，英军则希望抽身去保卫印度。当然，蒋介石只不过曾授予史迪威一点名义上的权力。史迪威在缅甸急得团团转，他再次回到重庆，希望蒋介石能指令中国陆军司令官服从他的指挥，可是没有成功。史迪威所得到的口头上的保证，在他返回前线时变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种情况下，1942 年 3 月在缅甸的战斗几乎各方面都是灾难性的。组织散漫、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英、中部队，根本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抱有明确目标的日军的对手。史迪威发现他已无法激励自己部队的士气，并很快就看出，他并没有指挥那些归他统率的中国部队的实权。日本人掌握了制空权，使他几乎无法接济和调动他的部队。到了 4 月中旬，战斗已明显地失败了；到 5 月初，在缅甸的英军、印军和中国部队，已经彼此失去联系，乱成一团。史迪威本人率领一个纵队披荆斩棘，经山间小道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得以安全抵达印度。当那些疲惫不堪、虎口逃生的士兵于5月29日到达印度时，这位美国将军公开承认：盟军已经在缅甸遭到“惨重的失败”。

史迪威对这次战役的失败，满腔怒火，在一份55页的报告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和中国指挥官贻误战机的行为。他得出结论说，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他们不屑同中国人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对于蒋介石，史迪威更是十分严厉地加以指责，尤其是因为他阻挠了这个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的工作。史迪威写道，中国现有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事实上是无可救药的。只有依靠一批在“新军”中由军官们重新加以整训、装备和指挥的中国士兵，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史迪威在缅甸溃败时抱有的“新军”美梦，在他准备返回重庆时在内心深处扎了根。到了重庆，他向蒋介石递交照会，要求彻底改组蒋介石花费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

当时蒋介石管辖的军队大约有380万人，由300个师组成，受12个军区司令官的统辖。各师的忠诚和素质差别极大，以司令官个人的好恶和派系的倾向而定。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大约只有30个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大部分力量主要依靠他在相互竞争的势力之间施展手腕，使其保持平衡。他力图视忠诚的程度使用大量的经费和物资去操纵地区司令官。部队的薪晌由将领任意发放，他们编造假名册，虚报人数，然后把余额塞进自己的腰包。这是无本生利的大好买卖。

为了维持部队满员，军官们横征暴敛，强征农民入伍，其残酷程度，同英国19世纪征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美国记者曾作过如下的报道：“中国农民一遇到征兵就像碰上水灾或饥荒。饥荒、水灾和干旱，同征兵相比，犹如水痘和瘟疫。这种毒害遍及整个中国农村。”

“部队的士兵如果有人死了，”这位记者继续写道，“他的尸体就被扔在路边。他的名字仍旧留在名册上。只要他的死亡没有上报，他就始终是一宗财源，并且由于他不再吃喝，他给人提供的钱财就更多一些。他的口粮和所关的薪饷就成了他的司令官口袋里长期的纪念品，而他的家属只好把他忘掉。”

但是，蒋介石所最关心的，不是改革这支杂牌军，而是把它一直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有谁能够给部队分发金钱和武器，或者安排军官的训练，蒋就会失去控制，他那炙手可热的正统地位也将随之垮台。同时，蒋介石的办法是保证使那些经过挑选的“可靠师团”能够得到奖赏和倚重。这样，“总是一片忠诚的胡宗南就为他自己及其监视中国西北地区共产党根据地的40万大军赢得了特殊的恩宠”；而与日本人对抗的部队却享受不到什么特殊的照顾。

为了消除这种军事上的恶劣状况，史迪威打算精选30个师进行改编、训练、重新装备，置于新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改组中国军队的建议主要是组建两支新的集团军。一支在印度建立，由从缅甸撤退下来的中国残余部队组成，并招募新兵加以补充。与此同时，另一支规模较大的30个师的兵团将在中国云南省西部调集。这两个兵团在美国人的指导下由中国军官自己指挥，它们在重新训练和装备后将调往缅甸，在英军协助下重新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史迪威认为，这一“简单的改组”将在中国造成一条活跃的军事战线，并为中国经由缅甸获取更多的援助铺平道路。但是，这一计划刚一出笼就遭

到蒋介石的愤怒拒绝。这位独裁者转弯抹角地威胁说，除非史迪威和美国重新估价现行的政策，否则他就要同日本单独媾和。几天之后，蒋介石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调遣美军三个作战师前往中国；第二，立即建立一支拥有 500 架作战飞机的空军，交给反共亲蒋的陈纳德指挥；第三，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 5000 吨物资。蒋介石并电告当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迫使华盛顿的官员尽可能召回史迪威。

在这一事件后，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直到 1944 年晚些时候两人最后闹翻为止。在史迪威的日记中和他的总部里称蒋介石为“小人”，称宋美龄为“白雪”。这位美国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必须设法扫除这帮坏透的家伙，让一些实实在在的人来领导一切”。他在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报告中说，除非陆军部和总统全力支持他迫使中国进行军事改组，否则蒋介石所要求的大量援助将被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敌手。史迪威要求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除了史迪威不断向陆军部抱怨而外，唯一经常以批评的态度报道国民党人消息的，是美国国务院的“驻外机关”派驻重庆美国使馆的一批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史迪威的参谋人员，他们撰写了一些报告。使馆参赞文森特，把国民党人描绘为一群自私自利的小集团，“他们的唯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他写道，中国还可能有救，但就看能否扫除现在的领导集团，代之以一个至今尚未发现的“自由主义革新派”。另一位在史迪威麾下兼职的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报告说，统一战线“肯定已经成为陈迹了”。他强调说明，美国的援助必须针对日本和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为了蒋介石打内战。首先，美国决不当拿起武器去直接或间接地对付目前华盛顿差不多还毫不了解的中国共产党人。谢伟思劝告美国人到延安去发现谁是真正的革命派。另一位美国官员戴维斯说，仅仅由于美国在中国提供了援助和武器，这些东西便成了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既然史迪威领导着美国代表团，他自然成了这场斗争中卷入得最深的美国人。而且，史迪威为了抗击日本想要改组中国军队的决心，同蒋介石的基本战略背道而驰。“在蒋委员长看来，这些现实几乎同共产党或日本人一样，是对他的严重威胁。”

文森特、谢伟思和戴维斯所写的这些敏锐的、几乎是一针见血的报告，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相反，罗斯福却愿意遵循柯里提出的方针，而这种政策显然是以偏袒亲蒋的陈纳德和依靠“个人外交”为特征的。罗斯福决定在 1942 年至 1943 年期间，和重庆互派高级人员进行互访。大致按照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罗斯福将派遣威尔基前往中国，蒋介石将派他的夫人宋美龄作为他的特使晋见总统。

蒋夫人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在美国从 1942 年 11 月逗留到 1943 年的 5 月。作为白宫的客人，这位特使利用一切机会去纠缠总统的助手、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可能会影响外交政策的行政官员。在乱哄哄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和美国公民举行的集会上，宋美龄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游说。她宣称，“中国不仅为它自身而且也为全人类而努力奋战”。她吹捧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最受人民信赖的领袖”。

1944 年，革命力量、外国侵略力量和一项矛盾的美援计划汇集在一起，使中国的紧张局面达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在盟军终于开进缅甸，日本在中国中南地区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势时，战斗达到 1938 年以来的最高潮。蒋介石继续拒绝把他的武装部队用于抗击日军，而磨擦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内战的

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就不但促使史迪威而且也促使罗斯福考虑要在政策上作根本的变动。有几个月，总统看来认清了新的现实，甚至想部分地抛弃蒋政权。但是，这一方针未能得以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在这时，蒋介石又向华盛顿提出了10亿美援的要求。白宫认为，重庆政府动用1942年的贷款还不到一半，他们既没有用于抗日前线，又没有努力遏制通货膨胀，并且仍旧维持美元和法币之间的人为的低汇率（20比1）来牟取暴利。实际上除了斯坦利·项白克而外，谁也不赞成提供新的大笔贷款。美驻华大使高斯坚持认为，“现时要支持任何这类贷款的建议，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考虑，都是没有牢靠的基础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把蒋的要求说成是敲诈勒索。他气冲冲地说：“连一个镍币也不打算再借给蒋介石，让这个骗子去跳长江吧！”最后，罗斯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理由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没有修改美元与法市的汇率，而且也没有充分承担中国作战地区的任务。因此，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向重庆方面提供贷款。

从此，美蒋关系出现新的僵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沙勒博士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披露了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史迪威和罗斯福都重新致力于同延安进行接触，想必是为了把共产党的力量结合到中国政府和美国军援计划中去。”9月，美国迪克西使团团团长包瑞德上校从延安转来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份邀请赫尔利前去访问的函件。信上说，共产党武装部队热烈希望在抗日战斗中与美国人合作。史迪威也发现他自己深为共产党的建议所吸引，并为他们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想法把武器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

但是，在史迪威能够采取行动之前，他必须取得实际的指挥权，而这件事情仍然颇成问题。蒋介石原则上同意罗斯福先前提出的要求，但这并没有成为事实。蒋扬言，在他能够亲自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和武装共军的计划之前，拒绝交出任何权力。然而这些限制条件取消了史迪威担任总司令的全部目的。而且，当史迪威和赫尔利在9月中旬商谈的时候，中国的战局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又吵着要把中国的远征军撤出缅甸。

在绝望之中，史迪威愤怒地提醒马歇尔，除非他立即掌握指挥权，战区可能要土崩瓦解。第二天，即9月16日，史迪威把宋子文请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如果他不能马上得到充分的指挥权，他就要敦促华盛顿“完全撤出中国，另行建立基地”。

史迪威的信件在1944年9月16日送达马歇尔和罗斯福，这时他们正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出席“八方”会议。晚餐时，总统和罗斯福夫人在抱怨蒋介石的班底“贪得无厌和穷奢极欲”时，流露出了他们对中国局势的担忧。在史迪威提出警告的影响下，马歇尔在魁北克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责备蒋介石的电报，由罗斯福批准发出。电报说，拖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不给史迪威指挥部队的全权，美援即将停止。电报谴责蒋介石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并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出席会议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再行拖延，你们和我们力求挽救中国的一切努力定将付之东流。”

史迪威9月19日亲自把这份最后通牒交给蒋介石，打断了他和赫尔利的一次私下会谈。史迪威“称心如意的复仇感”在他纪念这件事的一首诗里表达了出来。

我等了好久，要想报仇——
终于时运来了，
我瞪眼瞧着那个小子，
兜屁股踢他个够。
旧日的标枪准备在手，
对准目标，算好时候，
我直刺过去，只剩枪柄留在外头，
捅得他两面穿透。
小杂种浑身发抖，
无力说话，开不了口，
他脸色发青，肌肉颤抖，
强抑着自己不吐哀声鸣啾。
为了我一切困乏的战斗，
为了我所有灾难的时候，
我终于有机会一显身手，
叫那小子当场出丑。
我晓得我仍须忍受，
进行一场令人厌倦的竞走，
可是啊，天赐的欢乐多么酣畅！
我已叫那小子颜面尽丢。

9月23日，当史迪威还认为赫尔利在支持他的时候，向这位总统特使递交了一份要求联合对抗蒋介石的建议。史迪威希望到延安去，以便在那里向“赤色分子提出一些建议”。他将要求共产党人承认蒋介石名义上的职权，同时认可史迪威是实际上的野战军司令官。那时他将把共产党部队调到黄河以北，并给予可以装备五个师的军用物资，抗击日军。

在史迪威把这份毫不起作用的建议交给赫尔利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和宋子文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示蒋原则上同意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但坚决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这个职位。这样做将是“故意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赫尔利在蒋介石的信上附加了他自己的评论，告诉总统史迪威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如果决定把史迪威调开，总统希望蒋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采取认真的新的主动行动的想法就可得到保证。最后，赫尔利宣布蒋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赫尔利赞成这个决定。

在1944年9月25日到10月1日的一个星期里，问题悬而未决。由于不能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罗斯福总统迟迟没有答复蒋介石——赫尔利9月24日的最后通牒。

10月10日，这位特使又在给罗斯福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

赫尔利这个臭名昭著的善于拨弄事端的政客，向总统提出了一个狡猾阴险的问题，即对“失去中国”的责任问题，这是罗斯福所不愿接受的。总统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之后，终于在10月18日决定召回史迪威，另选魏德迈去接替他在华的职务。就这样，这位英勇善战并颇有见地的史迪威将军，作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罗斯福在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令人痛惜的不光彩的角色。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在1944年11月以赫尔利、魏德迈接替了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以后，就决定性地转到了完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路线上。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谈到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斗争时，认为他父亲“押错了宝”。他在评论罗斯福总统对待蒋介石夫妇的态度时说：“他对共产主义毫不温和，但是他对蒋氏夫妇却表现出温和，他让自己相信蒋夫妇是懂得在战后中国实施民主的承诺的。在这方面，我母亲就不那么轻信他们。”正是：总统押宝终失策，祸患从此无尽头。欲知罗斯福日后如何进行国际周旋，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一章 “三巨头”会议

举世闻名三巨头，运筹帷幄多计谋；
战略反攻鸣号角，二战史上大名留。

1943年11月下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同蒋介石会谈之后，紧接着又飞抵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了“三巨头”会议。这一会议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号角，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

1943年，各条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实现了根本的转折。在历时200多天的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军队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总损失，大约是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最终地粉碎和制止了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略攻势，迫使它转入战略防御和退却。苏军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希特勒的军队已被赶出了顿巴斯和左岸的乌克兰。1943年11月6日，红军解放了基辅。苏联战场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就致电斯大林，热烈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这一伟大的胜利。电报说：

“你统率下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我谨向您祝贺。为保卫这座已使大名永垂不朽的城市而进行的160天史诗般的战役，以及全体美国人都为之庆祝的决定性胜利，在这场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纳粹及其同伙的战争中，将永远保持为最光辉篇章之一。

“你们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指挥官和战士，以及在工厂和田野支援他们的男男女女，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增添了自己祖国部队的荣誉，而且以自己的榜样激发了一切联合国家重新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彻底打败共同敌人，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

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最后几股轴心国军队的包围；非洲敌军被迫投降，仅突尼斯一役，敌人就损失30万人。“火炬”战役胜利结束后，美英远征军正向意大利本土进军。7月25日，当巴顿的新七军和蒙哥马利的老八军席卷西西里时，墨索里尼终于遭废黜，巴多格里奥元帅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下，出来接管了意大利政府。罗斯福兴奋地向美国人民宣告：“轴心上已裂开第一道口子。”“但是，”总统补充说，“我们对意大利提出的条件仍旧跟对德国和日本一样：无条件投降。”1943年9月8日，在艾森豪威尔军队的强大攻势压力下，意大利政府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正在把两支进攻的箭头一步步地向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逼进。美军继在瓜达卡纳尔取胜之后，又于3月8日击毙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向所罗门群岛一带进逼。

为了促进胜利形势的发展，研讨盟国协同作战问题，1943年11月22日至11月26日，12月2日至7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分两段举

行美、英、中三国会议。罗斯福的本意是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可是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因为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他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把一个会分成两个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是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在盟国的胜利已成必然的情况下召开的。开罗会议举行前，罗斯福曾经踌躇满志地对儿子埃利奥特透露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俄国和英国在欧洲，英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 18 世纪状态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满怀热情，丘吉尔半心半意，蒋介石则是抱着讨价还价的目的要求罗斯福增加军援。整个会议是关于远东战略问题的辩论。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极力主张把日本驱逐出缅甸，保证中国陆上国际交道线，加强中国军队力量，作为最终打败日本陆上主力的重要战场。丘吉尔否定缅甸有重要战略价值，他更不希望由中国人和美国人收复缅甸。他认为打败日本靠海上力量就够了。但是他和蒋介石不便过于反对罗斯福的意见，因此有条件地同意进行缅甸战役。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同蒋介石秘密讨论了远东战后统治安排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在国际保证下，使大连成为苏联可以使用的自由港。根据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的暗示，蒋介石同意了这一安排。

罗斯福总统认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本部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机场对轰炸日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罗斯福一再试图说服蒋介石改组他的腐败政府，结果毫无成效；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支持这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中国独裁者。

当时美国统治集团永远不会允许他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游击队。罗斯福召回了在中国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满足了蒋介石对金钱的没完没了的要求，并试图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以便提高蒋介石的斗志。这些办法都失败了，只是实现了一个最紧迫的目标：中国仍在作战。

开罗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它宣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外，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答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开罗会议一结束，罗斯福就带着一个 70 来人的班子乘“圣牛”号飞机前

往德黑兰。这次航程大约6个小时，要越过巴勒斯坦全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如此仓促。“我们应该有一点多余的时间，”他说，“以后我也许再也不会飞这条航线了。”他和飞行员布赖恩少校拟定了一条路线，使他们几乎能够飞经圣地的每一处名胜古迹。“低飞！”他下命令，“当你飞临每一处遗迹时，尽你的胆量贴近它兜兜圈子。”

他们首先飞临贝尔谢巴及其著名的井泉，继而飞越山谷，翻过濯濯童山，来到伯利恒。布赖恩把飞机倾侧得似乎快要使一只机翼触及地面了。罗斯福凝视着耶稣诞生的小教堂，心里真希望降落。接着，飞机沿着大路朝那路撒冷飞去，不到一分钟，就已经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上空盘旋了。罗斯福一一辨认那些神圣的建筑物，并且激动地向坐在他旁边的麦金太尔报出他们的名称：大卫墓和天国之门！耶稣拱顶；耶稣受难地，坡上是伊斯兰陵墓；大马士革之门，圣墓教堂，哭墙。接着，他们绕着橄榄山的梯田形山坡飞了一圈，山顶上耸立着耶稣升天教堂，然后朝死海飞去。他们从这里沿着约旦河一直飞抵那个小小泛光的加利利海，海上还有渔民在打鱼呢！

飞机穿过巴勒斯坦上空后，总统就陷入沉思了。对罗斯福来说，在德黑兰会议上的艰巨任务就是同他认为“难以捉摸”的斯大林建立自己同丘吉尔保持着的那种私人关系。据美国外交官墨菲说：“总统的计划是使俄国人感到，美国人绝对相信他们，并把苏美两国在战时与平时的合作置于任何其他未来的联盟之上。”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在三巨头会谈之前，1943年10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外长预备会议。总统想派韦尔斯参加，但是由于普遍谣传这位副国务卿同一位卧车服务员有同性恋关系，使他不得不辞职。罗斯福很尊重这位老朋友的意见，对他的辞职感到难过。赫尔在进行他在战争期间唯一的这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时，以顽强的意志争取说服俄国人发表一项四国宣言，保证成立一个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组织。斯大林向赫尔保证，一打败德国，苏联就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罗斯福心想，这次会议就以上问题能达成协议，就算取得“重大成果”了。

当罗斯福一行抵达德黑兰时，斯大林为了罗斯福的安全而友好地建议他移住苏联大使馆。丘吉尔则住在附近的英国使馆。总统的车子驶进使馆大院的绿色大门，在一幢大而无当的建筑物前面刹住。这幢建筑物很像一所百万富翁的豪华住宅。但已年久失修，不复有昔日的光彩。它那富丽堂皇的门楣上的油漆显出裂纹，墙上的灰泥大块大块地剥落，里面的泥草露在外面，活像一个从破洋娃娃肚子里漏出的木屑。纳粹分子离去前在墙上到处乱涂的字，给人一种讽刺味儿。

罗斯福的安全由苏联警卫和便衣人员负责。埃利奥特说，他们个个都是6英尺以上的彪形大汉。斯大林前来拜访罗斯福时，后者故意不让美方翻译在场，只让斯大林的翻译帕夫洛夫担任翻译。罗斯福对他儿子说，“这是表示我的信任和毫不猜疑的一个姿态。”罗斯福和斯大林握手时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早就想同你见面了。”斯大林说，由于军务繁忙，迟迟未能实现，感到抱歉。罗斯福感谢斯大林把主要客房让给他住，并向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们在正式开会之前，举行了一个赠剑仪式：丘吉尔从伦敦给斯大林带来了一柄“斯大林格勒”之剑。仪式简短而动人。一位年轻的英国上尉高擎着那柄修长笔直的宝剑，丘吉尔作了一席感情充沛的简短发言，斯大林用俄语致答词。接着，首相庄严地双手托剑，把它赠交斯大林；斯大林接过主剑，

俯首吻了一下精美的剑柄。他缓慢地把剑从鞘中抽出一段来，然后又迅速插入，把它交给伏罗希洛夫。仪式到此结束。

“我想看一下宝剑。”罗斯福说。他右手握住剑柄，试试它是否平衡称手。这把剑的制作实在精美绝伦，你拿在手里简直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倒像是你自己手臂的延伸。罗斯福高兴得笑起来：“真是登峰造极的杰作！”他把剑高高举起，从空中猛劈下来，雪亮的钢刃发出一道寒光。

第一次会议于下午4点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三巨头外还有霍普金斯、艾登和莫洛托夫以及三国的参谋部的负责人。斯大林和丘吉尔共推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会议。他在会议开幕时说，他很高兴把苏联人作为“家庭小圈子里的新成员”来欢迎，并向他们保证说，这次会议将始终像朋友们的聚会那样，在各方面都充满着完全坦率的气氛。他相信三国的代表会紧密协作，不仅在战争的整个期间，而且将继续到子孙后代。丘吉尔说，这里所体现的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权力的最高集中，而人类幸福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些与会者手中；他祈望这些人将不致辜负上帝所赐予的时机。斯大林说，这次兄弟般的集会的确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时机，而这个时机极需与会者明智地使用他们各国人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

德黑兰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军事问题。在三巨头介绍了各自战场的情况后，集中讨论了斯大林所要求的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丘吉尔虽然口头上下反对“霸王”行动，但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极力避免与德军主力正面作战。他要进行地中海战役，在意大利迅速北进的同时进军巴尔干。丘吉尔称他的主张是“四面包围战略”。斯大林要求美英军队于1944年5月间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说他不能作此保证。双方争执十分激烈，以致斯大林愤然站了起来，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事好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后来在罗斯福的调解和参与下，会议才得以进行下去。

斯大林对丘吉尔说，他想问一个颇为欠妥的问题，就是英国人是不是真正相信“霸王”行动，或者他们仅仅是把这作为一种给苏联人鼓气的手段而才表示同意的？老奸巨猾的丘吉尔虽然使尽了辩论家的艺术，辞令动听，委婉得体，这是他拿手的本领；但是斯大林却挥舞大棒，对他老练的敌手的躲躲闪闪和弄虚作假毫不留情。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则居中调解，充当公认的会议主持人。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确定在1944年5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是德黑兰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一个重要决定。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斯大林的意见。

德黑兰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更为复杂。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罗斯福主张把德国肢解成五个相互分离的国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他希望有一个软弱的德国和强大的欧洲。在斯大林作主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一直取笑丘吉尔”，说他对德国人怀有“某种神秘的喜爱”，不愿对德国采取严厉措施。据埃利奥特叙述，罗斯福夫妇对丘吉尔的私下评论更为直截了当，说“丘吉尔先生总是赞成不要对德国采取严厉的态度”，而且“他的情绪是随着对俄国人的恐惧感的增加而加剧的”。斯大林所暗讽的也正是丘吉尔内心的隐秘——战后利用德国来制约苏联。

斯大林丝毫不掩饰他对纳粹的仇恨。为了嘲弄丘吉尔，他半开玩笑他说，

他认为至少应处决 5 万名纳粹分子（军官和技术人员），一经俘获，立即处决。丘吉尔一听，跳了起来，大声说道：“任何这类做法，是与我们英国的法制感完全抵触的。英国人民决不支持这类集体谋杀。我借此机会表明，我最强烈地认为没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否纳粹，在未经适当的法律审判前就可以由行刑队实行处决，尽管事实确凿，铁证如山也罢。”斯大林紧盯着情绪激动的丘吉尔继续说：“一定要枪毙 5 万人。”丘吉尔更生气他说：“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也不同意这种做法。这时，罗斯福出来打圆场。他笑着说：“我又要来调解你们的争执了。那么减为 49500 人行不行？”

德黑兰会议从 1943 年 11 月 28 日开到 12 月 2 日。在忙忙碌碌的四天里，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会议桌上和吃饭时都进行着磋商，又单独同斯大林会谈过几次。罗斯福发现这位穿着米色军装、戴着元帅的大金质肩章的苏联领导人信心十足，意志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端庄，倔强，严肃，没有一丝笑容，令人难以捉摸”。罗斯福对弗朗西丝·珀金斯说，“开始，我感到非常沮丧。我们所做的事情本来可以由外交部长们来做。我整整考虑了一夜，决意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那天早晨，在前往会议室的路上，我们赶上了温斯顿，我跟他讲：‘温斯顿，我希望你不会对我要做的事情感到恼火。’丘吉尔只是抖动了一下嘴上的雪茄烟，哼了——声”

罗斯福坐着轮椅到斯大林面前，通过翻译开始交谈。谈话好像十分友好和秘密，其他俄国人也凑到我们面前听着。他的脸上还是没有笑容。然后我用手捂着嘴低声说“温斯顿今天早晨反常，情绪很不好。”

“斯大林眼里这时露出一丝模糊的笑意，”罗斯福说，“我断定我的做法对头。我在会议桌旁一坐下来，就开始拿丘吉尔的英国绅士派头、约翰牛、他的雪茄烟和他的习惯取笑。斯大林开始露出笑容。温斯顿脸色绯红，皱着眉头。他越是那样，斯大林越好笑。斯大林终于捧腹大笑起来，三天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光亮。从那时起，我们就建立了私人关系，斯大林自己偶尔也说些打趣的话。冰层打破了，我们谈起话来就像男子汉和兄弟一般。”

后来，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评价了与他共事的两位巨头。“丘吉尔这种人你要是不盯着他，他就会从你的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而罗斯福呢！罗斯福不是那种人，他只掏大硬币。……”

经过充分协商和激烈争论，军事问题比较快地得到了解决。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将在 1944 年 5 月 1 日前后进行。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将配合这次战役发动一场攻势。斯大林还重申了向国务卿赫尔作出的保证，打败希特勒之后，俄国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在会谈中，棘手的政治问题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三巨头就战后要控制的战略基地问题进行讨论时，丘吉尔说，英国不想取得任何新领土，但希望保持它原有的领土和重新要回从它手中被拿走的领土。具体是指新加坡和香港。他说，尽管他可能最终要自愿让出帝国的一些疆土，但他不会不经过一场战斗而被迫放弃任何东西。

罗斯福多次主张英国应把香港归还中国，印度应当独立，但丘吉尔的回答是：“我不愿葬送大英帝国。”罗斯福看到在战后要维持旧殖民帝国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在太平洋上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新格局。其中，国民党中国将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国。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向罗斯福表示，战后不希望在 中国港口看到英国军舰。但可有美国军舰。罗斯福个人向蒋介石保证形势会

是他所希望的那样。

德黑兰会议上已经出现了美苏英三国就中国问题进行斟酌的明显征候。在几天前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密议后双方就大连港问题达成默契。在 1943 年 11 月 30 日三巨头午餐会谈中，当三方就苏联取得欧洲不冻港的问题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后，斯大林问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丘吉尔立即反问斯大林对《开罗宣言》有什么看法，并且表示有兴趣弄清楚苏联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斯大林表示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港口。罗斯福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而且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斯大林立即发表意见说，中国人会反对这个提议的；但罗斯福说，他认为他们会同意在国际保证下把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的。接着，斯大林在远东方面作了两件口头承诺：第一，赞成《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第二，打败德国后，苏联红军将增援东部，协同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后面这一点，对美国军方和罗斯福的战略布局都有很大影响。

会上，罗斯福对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成作了很具体的设计。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三个圈：当中的一个圈标明“执委会”，右边一个圈标上“4 个警察”，左边圈上写着“40 个联合国家”。这一构思就是以后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大会。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的监视和平的四个警察”概念表示感兴趣。斯大林还赞成他提出的不准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和他们的殖民帝国的其他地区的建议。这些地区将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会谈中还讨论了在德国失败后肢解德国的计划，西方领导人还表示默许苏联继续占领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是在 1939 年加入苏联的。

对波兰战后的地位问题分歧较大。丘吉尔指出，英国打仗是为了保卫一个独立的波兰；他提出讨论波兰未来的政治制度和边界问题。斯大林拒绝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发生任何联系，指责它同纳粹分子勾结。这样，双方就在波兰未来政府的问题上形成了僵局。关于波兰领土问题，苏方坚持保留 1939 年红军占领的那个地区，并认为，所形成的边界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提出的边界（寇松线）是一致的。然而，在伦敦的波兰人坚持恢复波兰 1939 年以前的边界。斯大林建议，为换取波兰接受寇松线，波兰应该得到德国的一块领土以补偿自己失去的领土，这样波兰的西面边界就可以移到奥得河。丘吉尔答应敦促在伦敦的波兰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罗斯福没有参加这些讨论。然而，由于他对苏联的安全要求表示同情，所以在同斯大林谈话时，他私下对领土转移表示支持。但是，他强调说，他不能公开参与这样的安排，因为这会引起上百万波兰裔美国选民的反感。

在星期二的晚餐会上，丘吉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把毕生贡献给弱者和无援者的事业的人”，这个人凭借他的勇气和在 1933 年的预见性行动，“坚定地引导着他的国家在激烈的民主自由气氛中，顺着国内政治和党派倾轧的惊涛骇浪前进”。在向斯大林祝酒时，丘吉尔说斯大林堪与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并驾齐驱，堪称“斯大林大帝”。

根据记录，在答话时，斯大林元帅说，授予他的荣誉其实是属于苏联人民的；要成为一名英雄或伟大的领导人并不太难，如果你不怕同苏联人这样

罗斯福在 1944 年 1 月 24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告诉赫尔：“印度支那不应该归还法国，应由国际托管。法国统治这个地区将近 100 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他们开始时更糟了。印度支那人民有权利过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的人民相处的话。他说，红军的确是在英勇作战，因为苏联人民不许可他们的军队里有别的品格。

德黑兰会议标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高峰。尤其是丘吉尔 69 寿辰之夜，会上的气氛更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在英国使馆的大餐桌边，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生日宴会使大家显得无忧无虑。和其他任何生日宴会一样，这里也有一块蛋糕以及蜡烛、礼物、祝酒和赤诚的感情——罗斯福还亲自配制了马丁尼酒，更增添了随便的气氛。所不同的是，客人是三个大国的首脑，而他们的诚意则对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前途有重大影响。

正如三巨头签发的德黑兰宣言所说的：“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国家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忱。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离开这里时，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罗斯福从德黑兰返国途中，特地到西西里岛去视察战场并看望部队。他原来还想去意大利，可是两军正在卡西诺前面交战，为安全计，他不能前去。但是，他确实到了被炸成一片焦土的英雄的战斗堡垒马耳他，那里的人们曾经蹲在迷宫般的洞穴里躲过了 3000 次空袭。他飞到奥兰时，“衣阿华”号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就这样，罗斯福再次穿过海峡，从风平浪静的海上回国。这次通过海峡时，由于纳粹分子埋伏在那里等候，比上一次还要危险得多。

圣诞节前夕，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向全世界作了一次广播演说。他告诉美国人民，在德黑兰和开罗会议上，他同英国、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就当前军事情况，特别是就尽快从许多不同方向加紧对敌人胜利进攻，进行了充分的会商，并取得完满的成果。他称赞丘吉尔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诚心诚意地为这位伟大的世界公民祈祷。”（当时丘吉尔在非洲又一次患了严重的肺炎。）对于斯大林，罗斯福说，“他是一位把巨大的、刚强无比的决心同忠诚不渝的优良品格结合在一起的人。我相信他真正是代表了俄罗斯的灵魂和心胸。我认为我们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最后，总统号召全国军民为尽早地消除世界上一切邪恶势力而英勇战斗。他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坚定我们在各地为人类更美好的日而战的信念。”正是：

远渡重洋为合作，万水千山不惧多；
只要理想能实现，甘愿献出满腔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二章 在另一条战线上

大选之年锣鼓响，政党相争竞选忙；
谨慎勤政为国家，明枪暗箭不胜防。

四年一度的大选又来到了。虽说这场华盛顿的争夺战不像欧洲和太平洋的战斗那样充满着腥风血雨，但其激烈程度也并未稍逊。罗斯福除了精心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反法西斯战争外，还必须抽出一定的精力来对付这方面的挑战。

其实、政治上的诽谤中伤早就开始了。跟往常一样，总统的家庭受到了旁敲侧击。罗斯福对他的几个儿子感到很自豪。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到前线去了。吉米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们在太平洋历尽艰难险阻，屡建战功。埃利奥特以大无畏的精神执行了艰巨的侦察任务。富兰基在一艘驱逐舰上自始至终参加了地中海战役，他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出生入死，得到了上级的最高嘉奖。约翰尼在太平洋舰队上英勇奋战，同样受到赞许。美国传记作家奥尔登·哈奇说：“敌人不会给他们特殊优待，因为老子是总统就可使儿子们免遭炮弹轰击——情况甚至只会相反。”但是，每一次罗斯福的孩子立功晋升就引来一阵喧嚣。有一次一个儿子来信说：“爸爸，有时我真希望我们中有人被打死，这样他们也许不会再找我们家庭的麻烦了。”

罗斯福为孩子们产生这样的想法而感到伤心。他在紧张中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啊，即使没有这种苦恼，负担也已经够沉重的了。他的孩子就像别人的孩子一样在战斗，他也完全像别人一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太不公平了！当他把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的儿子斯蒂芬·霍普金斯已战死在太平洋的消息告诉哈里·霍普金斯的时候，他看到过哈里脸上的痛苦神情，这才是前几个月的事。如今，说不定哪一天哈里也会告诉他……想到这里，这位意志坚强的人眼里涌出了泪水。

至于总统夫人更是政敌们火力集中的目标。为了慰问前方战士，埃莉诺到南太平洋去了一次，这是一趟艰巨而危险的旅行。她之所以要去，完全是受良心驱使。反对派把这次慰问称为公费旅游，把它说成是寻欢作乐或往自己脸上贴金。但那些被包围在孤岛上的指战员们发来的报告都表明，美国士兵们是欢迎她的。她鼓舞了士气，比美国服务组织的半打电影作用还大。

1944年春天，她又想到英国去访问那些即将开展“霸王”行动的战士们。罗斯福反对这次出访，他说：“在选举年，你这么做只会给我的敌人提供更多的炮弹。”不过，她还是执拗地去了。在伦敦，埃莉诺得了重感冒，艾森豪威尔的外交顾问劝她推迟访问，但她仍冒着滂沱大雨出发了，10天之内访问了26个兵营。这样大的工作量，即使一个身体好的人也是难以做到的。总统夫人的访问，在部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士兵们说：“万万没有想到总统夫人会远渡重洋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定要以英勇作战胜利完成‘霸王’行动来报答总统和全国人民的关怀！”

对罗斯福本人的攻击，主要是针对他的健康状况。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1921年以来，每逢他参加竞选，人们总是大叫大喊，说他不能担任公职，更不能担任总统。他早已向那些人显示过他们是何等的错误，他将再次向他们显示这一点。有时他心里也承认自己心力交瘁，想回到海德公园过安逸的

生活。但是，一想到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一想到争取真正的持久和平，他就鼓起全身的力气进行最后的冲刺。他不能打退堂鼓，就像一支军队的司令官不能在炮火下辞职一样；更不能设想，他竟然不去亲自实现为之奋斗已久的和平。不行，不参加竞选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他将找到力量的源泉。因此，他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新主席罗伯特·汉尼根捎话说，他将参加竞选。“我内心的一切都在呼唤我回到哈得孙河畔的家乡，”他说，“但是，如果人民下令，他将会像一个好军人那样去战斗。”

民主党人要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解决的唯一难题是谁当选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这次又想让亨利·华莱士当他的竞选伙伴，但是党魁们和南方保守分子十分讨厌华莱士。当时有一股担心罗斯福健康状况的暗流。至少对他们来说，把华莱士这样激进和乖僻的人放在继任总统职务的位置上是不可思议的。汉尼根警告总统说，华莱士可能会破坏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且提名他需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罗斯福表示同意。“我真不想再经历1940年那样的一次代表大会，”他说，“那会使党发生严重的分裂，现在它就已经够分裂的了。”他总是不愿意当面使人不愉快，于是就委托一位朋友向华莱士转达了这个坏消息。

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挑选替换华莱士的人费了很大的周折。本来吉米·贝尔纳斯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如果放开手脚公开交锋，他是会获得提名的。他为人很好，经验丰富，外交知识渊博。但是中央情报局及其新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却讨厌他。他们硬是不答应，而党的领导人则不想为了一个在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去得罪这样一个颇有影响的集团。因此他们否定了贝尔纳斯。

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过了，道格拉斯大法官、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以及杜鲁门参议员，都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兴趣。比较起来，杜鲁门还算容易被接受的。他自从1934年当选为参议员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罗斯福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他在检查战争工作中贪污情况的一个国会委员会里任主席时，取得了一些声望。而且，他既不引起保守分子的仇视，也不引起开明分子的反对。总统以下结论的口气说，“就选杜鲁门吧！”但是总统表示的赞同不是绝对的，罗斯福在给汉尼根的一封信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的信中说，他愿意同杜鲁门或道格拉斯一道竞选。为了安抚仍在参加竞选的华莱士，他又给代表大会常务主席塞缪尔·杰克逊参议员写了一封信。他说，如果他是代表，将投华莱士的票。

罗斯福披着那件人们熟悉的海军斗篷，以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了争取连任的竞选，当时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总统只能把很少的一部分时间和心思用在政治方面。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战争都在步步逼近高潮。随着部队步步向前推进，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处理。于是，没等代表大会开幕，罗斯福就前往珍珠港会见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们，准备部署下一个战役。总统乘坐火车前往西海岸，途中在芝加哥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时汉尼根上火车告诉罗斯福，杜鲁门不相信总统会支持他，仍坚持要发表支持贝尔纳斯的提名演说。罗斯福答应处理这个问题。在到达圣迭戈后，他给汉尼根打电话，电话打到黑石饭店汉尼根住的套间，当时杜鲁门正站在汉尼根旁边。

“鲍勃，你叫那个家伙听话了没有？”总统问道。

“没有，总统先生，”这位民主党主席回答说，同时故意让杜鲁门听听筒里的话，“他是我对付过的最不听话的密苏里顽固分子。”

“好吧，你替我告诉他，如果他想使民主党在战争中途分裂，那他要负责。”

汉尼根挂上电话，转过身来对杜鲁门说：“现在你还要说什么？”这位参议员茫然无话可说。就这样，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罗斯福和杜鲁门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

罗斯福在圣迭戈海军基地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广播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提出了他的竞选主题。“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他问道，“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为所有的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像样的生活水平。”为此，罗斯福在着手制定的一项新的经济权利法案中提出了这样的蓝图：

人们有权从事有益的有报酬的职业……

人们有权挣得足够的收入，以便提供充分的衣食以及娱乐；

每个农民都有权种植和出售农作物，其收益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过着像样的生活；

每个商人，不论大小，都有权在不受国内外不公平的竞争和垄断者控制的气氛中进行贸易；

每个家庭都有权拥有像样的住宅；

人们有权享受适当的医疗……

人们有权得到适当的保护，在经济上不必担心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

人们有权接受良好的教育；

所有这些权利意味着安全。战争胜利后，我们必须准备落实这些权利，去实现使人民过幸福美满生活的新目标。

罗斯福的竞选对手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及其同样保守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布里克。杜威年富力强，善于拉选票，是一位老奸巨猾的职业政客。他向提出新政的这位年逾62岁的“疲倦老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富有煽动性他说：“现在是需要进行改变的时候了，是需要结束一人政府的时候了。”他要求把这个国家的事务交给精力充沛、更热心的人来管理。

杜威的指责是想巧妙地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竞选中的一个秘而下宣的问题上，即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有人谣传，罗斯福的身体已经垮台或者患了心脏病。共和党人高兴地散发了一幅在他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时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好像是一个形容枯槁的呆傻老人，后来，罗森曼声称，这幅照片是从一个不恰当的角度拍摄的，根本不像总统。然而，很久没有见到他的朋友们为他那衰老的面容感到震惊。看来，他消瘦得如此厉害，以至他的衣服再也不适合穿在他那一度强健的身躯上了。但是，布鲁恩医生说，罗斯福的憔悴面容，不是像绝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所致，而是由于总统坚持减轻体重，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些身体虚弱的迹象。罗斯福从珍珠港回来后，过了几个星期又向布雷默顿海军造船厂的工人们发表了讲话。罗森曼听着总统讲话时的颤抖声音，心情非常沉重。他担心总统竞选不成了。演说还没作完，他那一直没有使用的两腿的肌肉就痛得吱吱作响，表示抗议。钢制的支架带深深地卡进了足踝浮肿的肉里。但是，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终于胜利地作完了这次演说。

在布雷默顿讲话之后，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罗斯福的人数急剧下降

了，而支持杜威的人数却相应地上升。因此，总统决定出去进行巡回竞选。他重申了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诺言，并保证：“我们将不使时钟倒转！我们将前进！”他在纽约市的一个集会上，带着调皮的眼神指出，反对派散布消息说，他曾把他的“小狗法拉”丢在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岛屿上，后来派了一艘军舰把它找回来，使纳税者付出了两三百万元乃至 2000 万元的“不能令人容忍的代价”。“我不怨恨攻击，但法拉确实怨恨攻击，”他假装义愤地宣称，“你们知道，法拉是苏格兰狗，他的苏格兰脾气是狂暴的，它会反对对它的恶意指谤。”

9月23日，罗斯福在卡车司机国际兄弟会发表了一次竞选演说，其气势之磅礴，情绪之激昂，丝毫不亚于他过去的几次竞选。总统顾问舍伍德说，它大可以作为政治策略和战术的一篇杰作来研究。在开场白中，罗斯福说，“好啦，这里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四年之后，这四年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四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 1933 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 11 岁。”对这三句话，听众报之以哄堂大笑和大声欢呼。在这三句话里，罗斯福打发了对他是个老头子而且“是个累坏了的和虚弱的老头子”的谴责。他把注意力带回到“胡佛不景气”和新政的基本成就上面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那些喜欢他的人作出保证说，同样的罗斯福仍然同他们在一起，并非飘浮在人们望不到的、只是由一些“像丘吉尔和斯大林那样神秘的、天神般的人物所占据的最高层的某处”。

罗斯福进一步说，“在共和党中有着开明的心胸宽大的分子，他们为使该党现代化和跟上美国前进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战斗着。不过共和党中，这些开明分子却不能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从他们所盘踞的地盘上赶走……在我们绝不动摇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的决心中……全国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同样讨厌由这样的人作出的这种竞选演讲，这些人只是在短短几个月前才第一次认识到国际生活的事实——当时他们才开始研究民意测验的纪录。”这是罗斯福在争取独立派共和党人的选票，争取对排斥威尔基感到愤懑不平的那些开明派的支持。罗斯福在其后的演说中从来不忽视向这些独立派呼吁，在他看来，他们构成一个集团，大到足以在坚定不移的派别之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罗斯福对他参谋班子的顾问舍伍德说，如果在选举日真有 5000 万人投票的话，你可以大致估计，大约有 2000 万人确定要投民主党的票，另外 2000 万人确定要投共和党的票，不管辩论问题怎样或候选人是谁。这样就剩下 1000 万人，他们或多或少是不受拘束的独立派，在竞选期间这些人是有待说服的，而正是对这 20% 的人必须发出最强烈的呼吁。

人们普遍认为，罗斯福在卡车司机国际兄弟会的演说，在竞选运动中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激发了那些过分自信的民主党人下决心急起直追，踊跃登记和投票；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打乱了杜威的深思熟虑的自信，使他开始转过来向他们之中“意志不坚定的最机灵的最闪者”疯狂地进攻。杜威越来越觉得，他必须迎合自己眼前的听众的各种偏见，才能博得掌声。为求得这班人的欢呼，每当他提到罗斯福的得力助手霍普金斯、伊克斯或弗朗西丝·珀金斯时，都能引起他们发出叫嚣和嘘声。然而，杜威却忽视了一大批还没有下决心的投票人。这些人也许对罗斯福政府产生了厌倦，而准备承认这是“变动的时候”，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变动带来的是倒退现象紧接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种“正常状态”。

在这次竞选中，罗斯福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他的健康状况。无稽的和难以置信的恶意谣传层出不穷，然而也总有一眼可以看出的某种佐证，他的腿部和臀部的虚弱的肌肉，已经变得软绵绵了，几乎是僵死了。人们现在觉得，他将永远不能站起来和走路了。因此，他必须坐着发表他所有的演说，或是坐在宴会桌旁，或是坐在停放在某空地中间的他的汽车上。但是，罗斯福夫人支持他不甘愿承认体力上的失败，正像1921年他第一次得病时她做过的那样。在这次竞选演说中，罗斯福又重新穿戴上使他疼痛难忍的腿支架。

1944年10月21日，罗斯福将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发表演说，看来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亲眼看到他们的总统的脑子依然灵敏。他打算在市内巡视一圈，使他能穿过全市几乎每一个行政区。当罗斯福的列车于21日早晨开进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时，他的运气真是坏透了，那天正好天色昏暗，秋风怒号，细雨蒙蒙。埃莉诺、麦金太尔医生和总统军事助理沃森“老爹”，哀求他不要出去了。但他坚决不肯，因为不去就将给他的敌人提供炮弹。那么，是不是至少不坐敞篷汽车呢？不，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吃得消的。他承认有点冒险，但这算得了什么？难道他们指望他在这样的年纪就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吗？

罗斯福拒绝了妻子和友人的劝阻，冒雨乘着敞篷车来到布鲁克林。他在海军造船厂停了一下，然后穿过冒雨排队等候的人群继续前进。人们欢呼跳跃，欣喜若狂，这声音使总统感到欣慰，以至连雨点打在脸上都不觉得了。欢呼声在前面一浪高过一浪，总统的汽车飞速驶过行人稀少的昆斯区街道，再绕回开过三区桥。曼哈顿区的尖塔消失在迷雾之中；在下面的河里，灰色的货船顶着东风穿过“地狱门”。在布朗克斯区，一座座褐色砂石房屋的临街的正面挂着欢迎总统的旗帜。罗斯福看到那些从公寓窗口打出的一面面的小旗，心里真是感动极了。当他驱车经过时，他挥着脱下的帽子致意，斗篷在风中飘扬，他全然没有理会这恶劣的天气。埃莉诺登上汽车，陪丈夫沿着热闹的曼哈顿大街驶过最后一段路程，最终回到了她在华盛顿广场的寓所。总统又冷又累，可是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盛大的欢迎使他兴高采烈，精神振奋。那天晚上，他就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平生最亢奋激昂的演说。

在这篇演说中，罗斯福向他的对手发出他独特的尽情嘲笑。他说：“人人都知道我今年本来是不愿意再次竞选总统的。但是，这次竞选既已展开了，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变得非常渴望赢得胜利了。”

霍普金斯后来写道：“总统告诉我，当他说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卑鄙的一次竞选时，他的话是当真的。他说，他认为他们好多次不择手段地攻击他，是蓄意地也是很恶毒地这样做的。他特别反感的是诽谤个人的运动，他认为这是经过严密组织的行径。”

由于罗斯福全力以赴从事竞选，杜威的势力被压了下去。罗斯福再次取得了美国人民的信任。同往常一样，选举团的表决是一边倒的，结果是432票对99票，但是民众的投票结果却是罗斯福历次总统竞选中最势均力敌的一次。他得到了2560万张票，杜威得了2200万张票。对总统来说，选举中最令人宽慰的事情是选民们抛弃了孤立主义，迫使那些不管属于什么党派，只要搞过孤立主义的参议员、众议员都落选了。这样的结果清楚地表明选民们授权当选人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

同往常一样，罗斯福到海德公园投票。选举的那天晚上，他的朋友和邻居们前来祈祷祝贺。总统笑咪咪地在柱廊里欢迎他们。他们唱起了胜利的歌曲，欢呼，挥手，总统也向他们招手致意。一切和以往几次的情况一模一样。

11月9日，罗斯福回到白宫后，总统、罗斯福夫人和霍普金斯三人作了一次关于今后问题的谈话，霍普金斯就此写道：

“罗斯福夫人力劝总统把国内问题放在他心目中的首要位置。因为她觉得，如果他不能始终坚持竞选中有国内方面的诺言，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有失去美国舆论拥护的真正危险。她尤其希望总统不要前往英国和法国，目前不要接受国外重大的表态，因为她认为那对美国人民不会是太合适的。

“她让我们两个人牢牢记住，我们绝不能仅仅满足于竞选作出的保证，总统对于保证他的内政改革得到贯彻，在道义上是负有责任的，特别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组织好，以便使人人能够就业。她强调说，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任务。她还希望不论总统还是我，都不要认为发表过演说就万事大吉了。”

美国人常说，罗斯福夫人充当总统的耳目，还有许多其他人，特别是霍普金斯，也都助于履行这种职能。“但是，毫无疑问，罗斯福夫人又有其独特之处，”舍伍德说，“她充当了自己丈夫的良心的保持者和经常的代言人。”

话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又以顽强的毅力，拖着病残的身体，投入紧张的工作。正是：

争取连任又当选，四届总统真少见；

年老体残心力瘁，壮心不已堪称赞。

欲知10多年来一直为罗斯福出谋划策、赴汤蹈火的总统特别助理的情况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三章 总统特别助理

霍普金斯受人赞，既有卓识又有胆；
全心全意为国家，贡献之大难说完。

在罗斯福的朋友中，关系最密切和帮助最大的要属路易斯·豪和哈里·霍普金斯了。作为罗斯福的智囊和“参谋长”，路易斯·豪成功地帮助罗斯福参加总统竞选，并最终把他送进了白宫。但不久路易斯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罗斯福夫妇是非常悲痛的。继路易斯·豪之后，霍普金斯成了罗斯福的高参。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间，可以说，罗斯福的每一项重大决定和任何困难问题的解决，没有一项不是在霍普金斯的参与下完成的。他既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又是罗斯福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当霍普金斯作为“客人”住在白宫的那几年，他一般被认为是为总统出谋划策的“危险人物”。仇视他的决不只限于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内阁内外，罗斯福最忠实的朋友和同事中，也有不少人极不喜欢霍普金斯，对他享有实际权力和影响的特殊地位，甚为不满。许多人奇怪，为什么罗斯福要把他留在身边。

对于这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总统特别助理，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对国家的贡献之大，哪怕作个粗略的估计也是困难的。”罗斯福有意识地培养这位有识之士，向他灌输政治和军事的艺术和科学，然后委之以决策大权。这除了总统喜欢他，信任他，并需要他之外，没有其他解释。霍普金斯来自中西部玉米地带，是一位福利工作者，习惯于把钱看作一种应该尽快花掉的东西。他是一位放荡不羁而又富于韬略的革新家，在出身、教养和待人接物方面都与罗斯福大相径庭。但是，他身上的一些素质，包括某些令人惋惜的缺点，却得到了罗斯福的欣赏和喜爱，这原因之一可能只是因为这些缺点太不一般。对他们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之一，是观察深入的美国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在1938年写的一段话：

“许多新政派人物的死板固执，使罗斯福感到讨厌。霍普金斯决不如此。他天生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提出要求，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退让，什么时候跟罗斯福直截了当打交道，什么时候得绕一些弯子……霍普金斯灵活、机警、精明、大胆、有见地、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这样一个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必然得到罗斯福的宠爱。”

在战争期间，霍普金斯的功勋尤为卓著。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总统把功绩优异勋章授予霍普金斯时，陆军部在嘉奖令中说他为解决战争面临的多种问题表现了“洞察一切的判断力”。舍伍德说，“这话对霍普金斯实在太妙了——洞察一切的判断力——这表明他观察问题深入敏锐，并表明这种观察力后面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以及继之而来的战争年代中，霍普金斯认为他的工作，他应尽的天职，就是去找出罗斯福真正需要什么，然后寻求途径，使一切困难，哪怕是罗斯福本人可能出现的动摇，也不足以妨碍它们的实现。霍普金斯决不会犯威尔逊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犯的错误。豪斯自称对威尔逊总统的心理比总统本人掌握得更透彻，因而使他与威尔逊之间出现了致命的裂痕。罗斯福可以把任何使命委托给霍普金斯，派他前往五角大楼或唐宁街，而绝对相信霍普金斯不会单凭臆测，就对首脑的政策或意图吐露一句决定性的话。对罗斯福判定的范围，

霍普金斯决不擅自越出一步。

霍普金斯首次访问莫斯科是在 1941 年 7 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还不到 1 个月，当时罗斯福曾致电斯大林：“我要求你对他完全信任，就像你直接与我谈话一样。”在那个时候，罗斯福还从未与斯大林有过个人接触，但是斯大林相信他的话。斯大林与霍普金斯谈话之坦率，是他对以前来自西方世界的战时使节从未表露过的。值得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并未携带罗斯福要他怎么说或怎么做的任何书面指示。罗斯福常常说：“哈里是实现我的意图的理想使节。他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外交礼节’。任何官样文章碰到他，都会被他用个落花流水。他跟一个外国要员谈话的时候，知道怎样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把脚搁到会议桌上，说道：‘啊’是吗？’他正是这种以超纪录的迅速抓住问题实质的能耐，使他获得了丘吉尔的欢心。”

丘吉尔对此也有同感，他说：“我曾参加过几次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行政要人有 20 人或者更多。每当讨论茫无头绪，在座的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哈里·霍普金斯总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性的问题：‘的确，总统先生，这就是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我们是不是要谈谈这个问题呢？’结果，他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受到重视，大家一重视，问题也就获得解决了。”

一次，丘吉尔、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宫楼上椭圆形办公室共进午餐。他们商量当天下午的正式会议上将提出讨论的重大问题。像往常一样，罗斯福和丘吉尔谈起来总是漫无边际。这时就得靠霍普金斯把这些翱翔天外的想象拉回到地面，以便考虑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这么做的时候一贯是单刀直入的。于是，丘吉尔回头对他说：“哈里！战争结束以后，英王陛下政府打算报答你，授予你一个贵族称号。”霍普金斯有些不愿意地回答说，贵族院议员的头衔，他并不渴望。但丘吉尔马上接口道：“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称号。你应该被称为‘抓根本问题勋爵’。”

尽管霍普金斯为工作废寝忘食，身体又长期虚弱，但他还是向往生活的乐趣。他爱好赛马、看戏、逛夜总会，爱好与时髦、漂亮、才气横溢、好寻欢作乐的人在一起。和他作对的报纸骂他是“浪荡子”，他听了反而高兴、自豪。他觉得那使他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总统的保健医生麦金太尔将军有一次说：“我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要使哈里感觉到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只要他认为他已恢复健康，他就会跑到市里去，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梅奥医院。”罗斯福对这位任性的朋友这些逢场作戏的行为，感到有趣，但同时对他的健康也相当忧虑。他的态度既像一位溺爱子女的父亲，又像一位亲密的兄弟，对他的任性虽然觉得可以宽恕，但为了他的健康，对他的活动又认为必须严加约束。

1939 年 5 月 21 日，正当霍普金斯因多次病魔缠绕、卧床不起的时候，罗斯福既含蓄又幽默地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哈里：好孩子！教师说你增加了两磅。2 磅等于 2 元。希望你继续有所增加，把收入存入小小的储蓄所。”信中夹着两张 1 元的钞票。8 年之后，他不在人间时，钞票还夹在那里。据认为，霍普金斯留下的财产，除了这点钱，恐怕就不多了。他一生虽然生活任性放荡，但可以为众人慷慨解囊，从不聚敛财富。

霍普金斯于 1890 年 8 月 17 日生在衣阿华州的苏城，与纽约的海德公园似乎不知相隔多远。他 51 岁生日那天，随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大西洋会议后回到华盛顿。会前他是从伦敦飞往莫斯科的。一位朋友问他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的情况，他说道：“我真不相信我会到那里去，走上克里姆林宫的楼梯，去

会见一位统治着 1.8 亿的巨人。我一直在问自己：霍普金斯，你这个苏城马鞍匠的儿子，你要在这儿干什么呢？”那位有些心直口快的朋友听到这里打断他的话说：“算了，哈里，你不要跟我讲这一套。你第一次踏进白宫的时候，你曾对我说，你这个马鞍匠的儿子竟会在那儿。你第一次访问唐宁街十号回来，你说的也是这么几句话。你不要再吹嘘你那卑微的出身，不行吗？这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唯一的一种自命不凡的表现。再说，很可能其他许多马鞍匠的儿子也到过克里姆林宫。当你走进那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时，你应该想的只能是：你是总统的私人代表，因此理所当然，你有权到那里去！”这一点给予霍普金斯很深的印象。

1945 年，他完成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使国外回来，在欢迎会上他致答词时说：“当你有整个美国政府的力量作后盾的时候，要做好这一类工作是并不困难的。”

哈里是戴维·霍普金斯和安娜·皮克特的五个孩子中的第四个。他家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克尔说过：“凡是对遗传学有兴趣的人，哈里是最好的研究材料，他是他父母性格的混合物。”戴维·霍普金斯，人们都叫他“奥尔”和“老爹”，他是一个可爱、老练、随和但又没有一定主意和得过且过的人。他不论住在哪里，总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公民之一，但他从来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他前前后后换过不少工作：当过报差、矿藏勘探员、马鞍匠、旅行推销员，还开过小店铺，但他的主要乐趣是滚木球戏，他在这方面有专长，而且靠打赌赢过不少钱。戴维不论干什么买卖，他用的信笺顶上总印着“生意兴隆”几个字，这表现了一种雄心勃勃的乐观主义气质。他的儿子哈里也继承了一些这种气质，尽管他有时难免疑虑不安，但最后总是重又燃起热烈的希望。

当哈里·霍普金斯从格林尼尔学院毕业不久，正赶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曾先后打算进陆军，海军或海军陆战队服役，但因左眼视网膜分离未能入伍。最后他加入红十字会，被派往新奥尔良，指导墨西哥湾分会的工作。在这里显示了他的才华和超凡的工作能力。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提升，指导东南部各州整个红十字会的活动，总部设在亚特兰大。

1921 年，他回到纽约，立刻通过他的老朋友约翰·金斯伯里找到了一个职业，担任改进纽约市卫生状况协会的主任。

霍普金斯第一次见到罗斯福是在 1928 年的竞选运动中。这一年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竞选总统，罗斯福竞选纽约州长。这次会见给霍普金斯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罗斯福为史密斯所作的“快乐的勇士”提名演说时便大为激动，那时史密斯是霍普金斯崇拜的偶像，霍普金斯曾为他奔走呼号。但是，对罗斯福来说，与这位面黄肌瘦的社会工作者会见，不过是多握一次手而已。但其后，霍普金斯日益引起了罗斯福的许多朋友和罗斯福夫人的注意，罗斯福夫人对福利工作一向是很关心的。

霍普金斯所以对罗斯福产生迷人的兴趣，是从 1931 年 8 月 28 日听他在州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说开始的。在这篇演说中，透露了这位年轻州长的最基本的社会哲学思想。罗斯福说：“什么叫国家？国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的合法代表，它是这些人为了互相保护和过幸福生活而创建的。”“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关怀那些陷入逆境以至不靠别人的帮助连最起码的生存资料也无法获得的公民。这一职责是每一个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罗斯福强调指出，“政府对这些不幸的公民理应给予帮助，这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一

种社会责任。”

为了实现这些，罗斯福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是在纽约州成立了临时救济署。霍普金斯担任了这个救济署的主任。当时经济危机日益恶化，就业问题每况愈下，需要救济盼人越来越多。后来霍普金斯通过以工代赈，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对缓解失业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了罗斯福推行新政的有力助手。后来罗斯福当选了总统，他也因此而一步登天，走上世界政治舞台。但在未来的12年中，他的薪金却比1932年还低。然而，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他为救济别人而支付的公款却高达90亿元。

霍普金斯不仅是一位救济工作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业余诗人，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些诗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瞧这雪——瞧啊，
快来瞧呀，
它像我的床铺一样白。
这皑皑白雪就是一张床铺，
在它冷冰冰的怀抱中安眠，
爬到它洁净的覆盖下安眠吧。
最好就在这宁静的白雪下安眠吧。
何必站起身来另找睡处。
瞧这雪——瞧啊，
快来瞧啊，

它像我的床铺一样白。还有一首，表现了他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爱，以及他对货币兑换商的态度。

在炎热的6月，一行行玉米排得又长又直。
衣阿华的玉米可说是用温情的手培育的，
它那金黄多汁的姿态是柔和的，
它那金黄的色泽是美好的，

衣阿华人对待玉米就像老练的银行家注视着自动收录器中的股票行情，
太湿——大于——霜冻太早——太迟。

衣阿华农民总是在暗中注视着。

霍普金斯的救济工作虽然博得了穷人的拥护，但却受到富户和商人的怒骂和批评。《华盛顿邮报》曾发表过一位弗吉尼亚妇女写的诗，最后几行是：

虽然我们还在付税，
霍普金斯先生！
我们正在磨我们的斧头，
(霍普金斯先生)
边用我们的拇指试试它是否锋利——
现在我们要老实告诉你
我们不是什么他妈的笨蛋，
霍普金斯先生！

反动势力拼着老命，想依靠他们昔日的“威望和影响”重整阵容。他们的主要希望是要在群众心目中把新政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把“共产主义”这顶帽子扣到罗斯福政府的头上，尤其是霍普金斯头上。《俄克拉何马日报》驻华盛顿记者写道：

“美国政府的第二号人物，现在就是尖酸刻薄的哈里·霍普金斯，是在社会救济工作方面大权独揽的人物，也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

“虽然他不是内阁成员，虽然他的职务是‘临时’的，他的部门不用说也不是属于‘紧要’的一类，但是这位喜欢吵架的先生权力之大，几乎超过了罗斯福身边的其他任何人。”

《芝加哥论坛报》曾在报头地位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霍普金斯把它放大了，还装上镜框子。在《把坏蛋们撵出去》的黑体标题下，该报社论说：“霍普金斯先生是个顽固分子，他之所以在新政中占有显著地位，就是由于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的钱花在最荒唐的事业上；在这方面，华盛顿的任何胡闹分子都是望尘莫及的。”

在战争期间，霍普金斯不仅受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反对，而且还成了德国法西斯攻击的主要目标。德国人在其对美国的宣传中，充分利用霍普金斯，扬言他为了捍卫英国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正在使他的国家陷于介入战争的处境。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把霍普金斯描绘为西方野蛮主义的工具，处心积虑要由华尔街来奴役欧洲，把欧洲古老的文化降低到好莱坞的水平。由于纳粹宣传中这样重视霍普金斯，结果反而提高了他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霍普金斯的个人生活也是不幸的。1932年他与一位名叫巴巴拉·邓肯的女士结了婚。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但不幸的是这位短命的夫人于1937年患癌症死去，从此霍普金斯一直独身。

直到1942年7月30日，在朋友们的劝促下才又和路易丝·梅西结婚。婚礼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由罗斯福总统担任男傧相。主持婚礼的是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德的拉塞尔·克林奇牧师。在场的有罗斯福夫人，霍普金斯的三个儿子和他的女儿，梅西夫人的直系亲属，马歇尔上将和金海军上将等。一般人可能认为，一向紧追着霍普金斯不放的那种仇恨现在会暂时收敛一些吧！不，如果这样想，那就错了。自从他结婚以后，对他的恶毒攻击更是变本加厉了。

扑面而来的攻击就是所谓“游艇事件”。婚礼之后两周，参议员普伦蒂斯·布朗接到他的选民的一封揭发信。信中叙述的故事说，有一个名叫弗吕豪夫的，向政府表示愿意出售他的停泊在底特律码头的私人游艇，因此政府征用了，但迟迟没有把它改装作为海军之用。经过调查才发现，所以推迟改装工作，是为了让总统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同他的新娘子能够荡漾在五大湖上取乐。据人推测，游艇的费用还出自纳税人身上。“据我看来，这就是坏风纪和它的孪生物——灰心绝望——所构成的‘行为’的又一个例子。”写信的人愤怒地指出，“当然，霍普金斯先生的蜜月不关我的事，但是为他个人的方便而推迟改装一艘已被征用的游艇，以及十之八九动用了纳税人的钱作为驾驶费用，这可关系我的事了。”

参议员布朗把这封信交给海军部长诺克斯，经过反复查对纯属恶意的捏造。实际情形是，霍普金斯和他的新娘子是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农场里度

的蜜月，在婚礼举行 11 天后，他就返回华盛顿工作了。而有关“我的凯第四号”游艇的谣言却继续流传了许多星期。事实上三个月之后，在北非登陆前夕，霍普金斯还请教律师究竟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恶毒的谎话，回答是：“大概无法可想。”他对之无可奈何的还有另一个流行相当广的谣言：霍普金斯夫人收到比弗布鲁克勋爵赠送的价值 50 万美元的绿宝石，这份结婚礼物是为了酬谢她的丈夫在分配给英国的租借物资上尽了力量。这个谣言影响所及，使众议员约瑟夫·马丁宣布，要建议国会对哈里·霍普金斯以及租借物资的整个班子的公私活动进行调查。当然，这种建议是绝不会兑现的，因为毁坏他名誉的人不会傻到如此程度，竟愿让霍普金斯获得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机会。

当然，霍普金斯早已听惯毁谤并学会对此不屑一顾了；或者，再怎么样也得装着无所谓的样子。他知道真正猛烈的攻击是来自帕特森——麦考密克——赫斯特的报纸，这些攻击正是表明他们对罗斯福的仇恨，他们因孤立主义一时被挫败而发泄不满。往常的话，他会对此嗤之以鼻他说“见他妈的鬼去”，然后继续干自己的事。可是现在却不一样。这些攻击不仅对着他本人，也对着他的妻子，而且在一些下流庸俗的例子中，更是如此。因此，他感到难受而动怒了，他决定以诽谤罪来控告他们。他确信，指出所有这些材料是怎样被戈培尔所利用了，会有助于他的讼事。但是，罗斯福劝他罢休。“这是一场斗争，你会在这场斗争甚至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惨败了。整个诉讼过程将给他们以良好机会来大肆造谣诬蔑，而到头来你能得到什么呢？让你赢得一张判决书和得到一些赔偿费，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霍普金斯实在是十分勉强地接受了这一好心的劝告，不过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同他受到挫伤的感情相比，还有一大堆更加重要的事情要他去花费心思呢。当时，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辉煌胜利，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面和瞩目的未来图景。为了推动胜利形势的发展，霍普金斯还要急着协助总统，和高级将领们在一起，策划下一步的战略大反攻哩！

1943 年圣诞节前夕，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向全世界作了一次广播演说。这是多年来霍普金斯第一次没有同罗斯福在一起过的圣诞节。他同他的夫人和女儿当时已搬进乔治城那幢小巧而令人感到振奋的房子。霍普金斯对他的新环境以及美好世界的前景都感到十分高兴。但时间不久就病倒了，先是住在海军医院，然后又去梅奥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5 月初，他便到硫磺泉去长期休养了。

他在生病期间，曾收到宋子文多次要钱要援助的电报。这位国民党外交部长在电报中说：“几年前当你也住在医院时，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国际原则即将受到危害，你竟不顾医生的禁戒从医院赶了出来。今天，又有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就要做出来了……”在宋子文寄来的另一封信上，霍普金斯写道：“我无法在这里管这类事情。告诉他们说我病了。”他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而只顾要钱的丑恶行为十分反感。

1944 年 2 月 2 日，他知道一个命名为“燧发机”的两栖作战行动已经开始，这是对马绍尔群岛的一次进攻。他知道，他的 18 岁的儿子、一等兵斯蒂芬，就在那个地方的海军陆战队里，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可以想象，最近这几天我多么想念你，然而我希望一切都过得很好。我相信一定是这样。日本人是绝对经受不了我们在马绍尔给予他们的打击的。

“戴维也在那里某个地方的一艘航空母舰上，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了。

“一两天前，我听说过罗伯特的消息，他正要给派到一个新的战区去，他将在那里等待时机到来时参加大规模的欧洲进军。

“路易斯和黛安娜都好，她们正在共享新居。

“我已在海军医院躺了一个月，也许还得在这里再住上两三个星期。以后我准备到迈阿密海滩去休息一个月。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这一次我似乎没有往常那样容易恢复健康。……

“一有时间就给我写信，不过我想你在以后几周内会很忙，战斗会很紧张，因此我不希望收到你的信。

“总之，你要知道我希望你一切顺利。”

这封信一直没有寄出。在霍普金斯乘火车去佛罗里达的途中，收到总统发来的一份电报：“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告知你，斯蒂芬在夸贾林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我们至今除了知道他举行了海葬外别无详情可以奉告。他的母亲也已得到通知。我坚信一俟我们得悉详情，我将比以往更加为他感到骄傲。我很想念你，罗斯福。”

后来获悉，斯蒂芬是在战斗的第一天牺牲的，即他父亲给他写那封信的前一天。当时他正在把弹药运送到一个单独的机枪部队去。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在战争中每天都有几千名士兵干这种工作。斯蒂芬一直干到倒下去为止，他和许许多多青年人一样，奇迹般地表现出同样的勇气。霍普金斯为自己小儿子的英勇牺牲感到骄傲。不幸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同窗好友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一期间他还收到两封在战争期间新交的朋友的慰问信。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一封是约翰·迪尔爵士写来的，他本人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活了。他写道：“哈里，这场战争使你太伤心了。我还没有见到过有谁曾经为了我们共同事业的进展而提出过更多的明智和勇敢的意见。究竟谁了解这一点呢？总有一天，这一点必须让人们知道。今天马歇尔将军同我谈到了你曾经起到的和至今一直在起着的伟大作用。所以希望你忍痛节哀，早日恢复健康，俾同诸友聚首共欢，继续执行你的伟大使命。”

另一封信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4年2月13日写的，由罗斯福总统转到在梅奥医院的霍普金斯手里。这封信这样写着：

斯蒂芬·彼德·霍普金斯 18岁

“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

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

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证明了他的勇力，

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

——莎士比亚

当霍普金斯还在医院的时候，盟军已于6月6日渡过英吉利

海峡进入诺曼底，法西斯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在这胜利的日子里，霍普金斯躺在床上一直在考虑1939年以来发生的各种问题。他考虑过那些妨碍生产的隘口是怎样冲破的，战略物资的奇缺是怎样解决的，孤立主义是怎样战胜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怎样发展和巩固起来的……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渗透着他的一份心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杜鲁门总统为霍普金斯颁发了“ 优异服务勋章 ”。长期和他共事的史汀生部长在给他的信上说：“ 你的优异服务勋章包含的内容是，在具有极深远意义的危机中，你的贡献是十分出色和成功的。不仅如此，你还是凭着一种同样伟大的谦虚和勇敢来完成一切的。勋章象征着对你的工作的承认，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正是：为国费神心力瘁，辅佐总统第一人。欲知战略大反攻情况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四章 战略大反攻

第二战场终揭幕，东西战线相比武；
各路大军齐反攻，试看好雄逃何处。

在苏联红军节节胜利的推动下，美英盟国经过长期准备和反复协商，全世界人民久已盼望的向西欧进军的第二战场，终于在 1944 年 6 月 6 日揭晓了。

这天凌晨，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美英 2395 架运输机和 847 架滑翔机，从英国 20 个机场起飞，载着 3 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着陆。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 1136 架飞机，对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 10 个堡垒，投弹 5853 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太阳升起之后，盟军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霎时，炮火连天，地动山摇。

大约早晨 6 时 30 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此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在这次战役中，盟军共准备了各类飞机 1.3 万多架，战舰、运输舰和各种类型的登陆艇共达 6000 多艘。参加战役的指战员和后勤人员共 287 万多人。到了 6 日夜晚，将近 10 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已上岸了，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已被突破，从而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

德国人对英美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登陆的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由于 6 月 5 日狂风大作，英吉利海峡恶浪翻腾，西线德军大部分将领认为盟军不会在这时进攻。6 月 4 日，驻巴黎的德国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这时，因为天气不好，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德国的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舰艇，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登船出发的。

1944 年 6 月 5 日夜晚，隆美尔的司令部里正举行一场酒酣耳热的晚宴，参加的人不多，但都气味相投，元帅本人倒不在场。原来这位素来宠爱妻子的丈夫在巴黎停留了一下，为的是给他的娇妻露西买一双鞋，然后再飞往德国。晚宴由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主持。参加宴会的有作家约恩格，前不久从美国获释返国的总领事法伊弗，最高司令部的李斯特上校，军事记者施拉姆，斯派达尔的妹夫霍尔斯特医生，以及隆美尔的海军顾问鲁格中将。

鲁格将军回忆道，席间曾就意大利、苏联、法国的政策作了一场“十分激烈的讨论”，并且谈到“希特勒的日后计划进展得不够”。白兰地饮过数巡，打仗的经验也交换过了，席上的气氛可说充满信心。在为期四年的堪称太平的占领期间，这次晚宴如同其它许多宴会一样，是在 6 月 6 日凌晨 1 点 35 分散席的，这时德国第七军忽然报告说，科唐坦半岛东海岸发现有伞兵降落。接着第十五军也报告，在卡昂以东到德奥维一带也发现伞兵。雷达屏幕上显示出大批轰炸机正编队飞行，而且愈来愈近了。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正横跨英吉利海峡滚滚而来。

为了应付盟军可能在加来海峡地区进攻，早在 1943 年末，德国就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境内集结了约莫 60 个师的兵力。从沿海滩设置障碍、炮位

的配置、碉堡营建和德国向该地区增援等情况判断，德国最高司令部认定加来海峡就是“可能入侵地区”。值得一提的插曲是，当初希特勒一直坚信登陆会在诺曼底发生，尽管他手下的将军们曾向他提出专门性的忠告。德军大部将领认为，盟军将在最接近巴黎的地区登陆。他们收到的情报说，在英国本土正集结一支单独的部队，将由巴顿将军指挥。德国人不断截获大量有关巴顿“进犯部队”的无线电通讯。他们的侦察飞机发现坦克和卡车（其实都是些假模型）正在集结，以便越过海峡发动进攻。“泄露”给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活动的德国情报网的各种消息表明，正在酝酿一场大进攻。盟军轰炸机对前往加来的通道的轰炸，其猛烈程度不亚于施之于诺曼底的。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按照罗斯福的指示，在进攻前夕，盟军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军从海岸雷达上看来，好像有一支舰队正从第厄普向东驶去，开往加来。这些虚张声势的行动，使德军更加相信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

德军竭尽全力为对付这次进攻而进行了准备工作。希特勒任命“常胜将军”隆美尔为海峡防区司令。这个“沙漠之狐”富于想象力而且颇为自信。一次他对希特勒说：“依我看，敌人休想在这些地段上登岸。”作了如上断言之后，他要求把西线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全部划归他指挥，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这位精力过人、如狼似虎的隆美尔，已经加强了海岸线的防御，他在海滩的通道上布满了钢铁路障，其中不少处还埋设了地雷。海滩上布雷区扩大了，混凝土炮位也增加了，可是有一样最必需的事隆美尔没有做到。他没有能说服希特勒把装甲师配置到可以对盟军武装力量立即发起进攻的据点上。

当6日下午3时纳粹头子醒来时，已经传到的坏消息使他立刻行动起来。他急忙批准派两个装甲师到诺曼底去，但已为时太晚。此时，希特勒所大肆宣传的“大西洋壁垒”已被突破。一度吹嘘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从天空中被赶走，德国海军也从海洋上被赶走，虽然战争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不再有什么疑问了。

美军从诺曼底突破之后，接着便是英军开过卡昂，盟军节节胜利。已顿将军向东推进，邓普赛爵士将军和英国第二军往北攻向布鲁塞尔。希特勒面临着法国和比利时的丢失和东方战场的强大攻势。盟军正配合苏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德国本土进逼。前线传来的胜利消息，使罗斯福心花怒放。从诺曼底发动进攻的时刻起，这位年迈力衰身残的三军总司令，就一直坐在白宫地图室里，精心地注视着前线的进展情况。胜利，使他增加了无穷的活力；胜利，使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在西战场上，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三军团，7月30日攻克阿夫朗舍之后，即开始向在诺曼底一线的德军进行大包抄。8月19日这个钳形攻势完成，形成了阿尔让唐——法莱斯口袋，包围德军八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结果俘敌五万人，毙敌约一万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在这个包围圈封闭后的48小时，有人领我步行通过这个地区，那里的景象只有意大利诗人但丁才能形容。你完全可以在死尸和烂肉堆上一气走几百米而踩不着别的东西。”

在盟军从南北两翼紧缩包围圈的六天中，大量德军从法莱斯和阿尔让唐的缺口中逃跑了。溃退的德军向塞纳河方向狼狈逃窜。德军西线总司令克鲁格元帅被撤职，8月17日莫德尔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克鲁格怕希特勒把诺曼底的失败归罪于他，所以在回国途中于梅斯服毒自杀了。

盟军乘胜前进，长驱直入，向法国心脏地区进逼。8月15日，由于法军和美军又从法国南部登陆，进展顺利，所以德军这时从整个法国前线溃退。盟军势如破竹，展现在盟军前面的是平坦宽阔的公路，青葱翠绿的一望平川。巴顿属下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师长勒克莱尔将军重回祖国，凯旋归来，不禁感慨万端他说，这似乎是“1940年战局的重演，不过胜负双方可颠倒过来了——敌人在我出其不意的攻击下乱作一团，溃不成军。”

8月19日，盟军占领了塞纳河西岸的芒特。这一天巴黎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解放自己的首都。盟国各路大军纷纷奔赴塞纳河上，强占渡口，追击溃敌。1944年8月25日，法国第二装甲师从巴黎的南门和西门进入首都。当天下午，奉艾森豪威尔的命令，法国的勒克莱尔将军光荣地接受了德军的投降。

到3月底，西线德军已损失50万人，其中半数是被俘的；并且损失了几乎全部的坦克、重炮和载重汽车。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用来保卫第三帝国了。曾经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已无人防守，西线绝大多数德国将领都认为大势已去。斯派达尔说：“地面部队已不存在了，更不要说空军。”于9月4日重新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伦斯德在战后对盟军提审人员说：“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9月间就结束了”。

在太平洋战场，形势发展也很快，盟军节节胜利，日军节节败退。

1944年6月6日，即欧洲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同一天，斯普鲁恩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国第五舰队从马绍尔群岛的马朱罗基地启航，以米彻尔海军中将作为司令的第五十八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为先导。这支突击队此时已有15艘航空母舰和956架飞机，紧接着是由535艘舰艇组成的两栖作战部队，载有12.7万名地面作战部队的官兵，其中2/3是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向西北方向进发，直指马里亚纳群岛。

6月13日，米彻尔将军派出7艘新型快速战列舰去袭击塞班岛和附近的提尼安岛。14日，他派出两个航空母舰突击组去袭击硫磺岛和乳岛的飞机场，以切断日本本土同马里亚纳群岛的空中交通联系，从而完全孤立马里亚纳。另外两个突击组在群岛西南海域巡游，以直接支援攻击部队在塞班岛登陆。此外，还有若干潜艇在日本舰队附近进行监视活动。

6月15日凌晨，美军陆战队在大量坦克和炮兵的掩护下，开始在塞班岛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便命令决战，要第一航空舰队开始进攻。这一天东条还把停放在横须贺的海军航空兵的120架飞机拨归联合舰队，丰田便用这批飞机组成八幡航空队，调往硫磺岛由第一航空舰队指挥。然而，第一航空舰队的1308架飞机，有480架参加比亚克岛作战，无法调回。分散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陆基飞机大多被炸毁，实际上能够参战的飞机不到总数的20%。这时，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又令小泽治三郎指挥的日本第一机动舰队前来参战，电报重复了1905年东乡海军大将在日俄战争中鼓舞士气的名言：“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官兵，奋发努力！”

持续两天的马里亚纳之战，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美国人称这次海战是“马里亚纳群岛火鸡大狩猎”。美军以两艘油船和80架飞机的代价，击沉了

1936—1939年法西斯德国在西部边境建筑的防御阵地体系，全长500公里。大部分地段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对峙。齐格菲是德国13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之歌》中的英雄，相传以龙血沐浴后，全身刀枪不入。防线以此命名，含有牢不可破之意。1945年3月，为英美联军所突破。

日本 3 艘大型航空母舰，重创 4 艘航空母舰，击毁小泽 92% 的舰基飞机，72% 的水上飞机，以及 50 架以关岛为基地的飞机，总数在 475 架左右。这一胜利为美军占领马里亚纳主要岛屿大开了方便之门。从此，日本海军只有招架之功，再无回手之力了。

8 月 10 日，美军完全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从此，这座被视为保护日本本土的屏障，所谓太平洋上的“防波堤”被攻克之后，就切断了日本同加罗林群岛的联系。同时美军取得后勤基地，可以继续西进；取得潜艇基地，可以袭击日本同南洋各地的海上运输船舶；取得空军基地，远程轰炸机 B—29 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对日本列岛造成直接威胁。所以美国舰队在马里亚纳海战取得胜利和攻占塞班岛以后，日本朝野惊恐万状，东条内阁被迫辞职，由朝鲜总督、“高丽之虎”小矶国昭接任首相，但等待他的是更惨重的失败。

在苏德战场上，战局发展更令人鼓舞。从 1944 年 6 月 10 日开始的苏军夏季攻势，节节胜利。到 8 月中旬，红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包围了德国 50 个师，深入到芬兰的维堡，消灭了中央集团军，而且在六个星期内，在这条战线上推进了 400 英里，到达维斯杜拉河与华沙隔河相望。同时，在南线从 8 月 20 日开始发动新攻势，月底就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供给德军天然汽油唯一重要来源的普洛那什特油田。8 月 26 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德军开始从那里仓皇撤退。9 月间，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其领土的德军开火。

到了 10 月初，神速的苏联红军跨越波兰，进入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到达希腊和土耳其的边境。英国部队已在希腊登陆。控制东南欧的问题现在已迫在眉睫。丘吉尔对此异常关注，认为应当毫不迟延地召开另一次三巨头会议。很明显，在竞选当中让罗斯福长途跋涉是困难的，但丘吉尔采取不容争辩的立场说：“向前推进的俄国人绝不坐待密执安、南达科他和俄勒冈各州选举结果的报告。”这位首相并建议，他和艾登外长应当马上前往莫斯科，试图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划分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达成谅解。这个建议使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大伤脑筋。如果美国派观察员参加，会给人以这种印象，即美国愿意支持可能达成的任何决定。如果美国回避这一会谈，欧洲国家可能认为是美国自己承认对“欧洲政治问题洗手不干了”。

当时的形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 1944 年底，德日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在欧洲，战火正从东西两线向德国中心地区迅猛燃烧着，德国法西斯的寿命屈指可数。这时，德国统治集团试图与美英单独媾和，以便集中残余力量同苏军死拼到底；甚至幻想美英与苏联冲突起来，从中渔利。因此，随着战争的胜利进展，美英与苏联之间在欧洲地区的矛盾和互不信任越来越明显，迫切需要取得谅解。由于德国即将被彻底打败和欧战即将结束，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怎样处理战后的欧洲事务，成为美苏英急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尚在负隅顽抗。当时美英估计，要彻底打败日本，并迫使它无条件投降，还得苦战一年半的时间，可能还要付出 100 万人的死亡代价。因此，美英希望苏联早日对日本参战。所以，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如何协同对日作战，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商讨和解决上述重大国际问题，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偕同他们的外长、参谋长和顾问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为时 8 天的会议，史称“克里米亚会议”，或“雅尔塔会议”。

美国大选胜利结束了。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冒着刺骨的寒流宣誓就职。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短和最阴沉的就职仪式。他也许预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坚持要他的13个孙子孙女都来华盛顿参加就职仪式。当时没有游行，也没有举行豪华的舞会。总统是在白宫的南门走廊而不是在国会举行宣誓。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讲话还不到五分钟。他期望着即将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举行会晤。在讲话中他谈到了他的指导原则。“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不能单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别国——遥远的国家——的幸福。……我们认识到正如埃默森所说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过了两天，他带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参谋班子向雅尔塔出发了。

雅尔塔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是沙皇所喜欢的一个避暑胜地。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会是因为斯大林一再表示不愿意离开苏联。尽管罗斯福在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前往马耳他的途中得到了休息机会，到马耳他后又换乘自己的专机“圣牛”号飞往克里米亚，但这次旅行对罗斯福来说仍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不要再让我们犹豫不决了！”丘吉尔开玩笑说，“如果把所有可能举行高级国际会议的地点都编进一台计算机的程序里，然后指示计算机选择一个最糟糕的地点，它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雅尔塔。”雅尔塔周围的地区曾在德军退却时遭受掠夺，它的美丽的自然风光掩盖了原始状况。丘吉尔带去了大量的威士忌酒来抵抗流行的斑疹伤寒、虱子和臭虫。美国海军的一个消毒小组不得不把罗斯福的住处消毒三次，然后才住进去，会场设在利瓦吉亚宫，那里有50个房间，但只有一个洗澡间。

雅尔塔的设备条件虽然是简陋的，但是苏联人尽量要他们的英美客人相信他们的接待是友好热情的。这是一个饱经战火、疮痍满目的地区，住所又如此有限，按照当时的记载，16位美国陆军上校只能挤在一间卧室里。在罗斯福下榻的利瓦吉亚宫中，霍普金斯有一个单间卧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只参加了几次正式会议。他病得很重，雅尔塔的大宴会他一次都没有参加。

罗斯福和丘吉尔于星期六，2月3日，到达雅尔塔。斯大林及其一行于星期日清晨到达，下午4时，他和莫洛托夫前来拜会罗斯福。罗斯福在向东道主为客人所作的种种舒适和方便的安排表示道谢之后说，在“昆西”号横渡大洋的旅行当中，他们就美国人是不是会在苏联人进入柏林之前而先进入马尼拉一事多次打过赌。斯大林笑了起来，并说那些把赌注压在马尼拉的会赢。罗斯福谈到在克里米亚这里所看到的破坏情形。斯大林告诉他，同乌克兰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在克里米亚德国人受到翼侧包抄，因而没有时间实行原定的破坏计划，然而在乌克兰他们却以虐待狂式的心计和方法破坏一切。斯大林随即问起西线的情况，罗斯福告诉他，马歇尔上将随后要详细谈到那里的主要局势，但这时他能够说的是，预定在2月8日和12日各发动一次有限度的进攻，而英美部队的主要推进约在一个月左右开始。斯大林听了感到高兴，并表示希望盟国不久可以攻下鲁尔和萨尔，从而剥夺德国人剩下的仅有的煤炭来源，因为苏军已经占领了西里西亚盆地。罗斯福说，随着同盟国两支部队从东西两方面逐渐接近，他认为有可能由艾森豪威尔同红军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取得战术行动上的直接配合。

这次会见是在利瓦吉亚宫总统的书房里进行的。在5时前几分钟，他们移往大舞厅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斯大林提出，罗斯福总统应再次主持会议。

历时三小时的讨论，几乎完全是关于当时的军事形势的。安东诺夫将军宣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详细分析了东线的进展，他表示希望盟国会很快在西线推进，并以轰炸使德国交通线陷于瘫痪，借以防止德国军队从西线越过德国调到东线来，马歇尔回顾了西线的局势，波特代表空军发言，坎宁安谈到德国技术的新发展有可能恢复潜艇的威胁。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提到，也许盟国可以通过从亚德里亚海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一次远征，给苏联东线战役以帮助，但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会议开完，在罗斯福举行的宴会上的一次非正式交谈中，丘吉尔说，他是经常被当作一个反动派而“被痛打”的，然而三个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只有他可以随时由他的人民投票把他赶下台。他接着说，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而引以为荣的。斯大林随即开玩笑地说，首相明显地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丘吉尔答复说，他不仅并不畏惧，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就有把他们的政府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他继续谈到小国的权利，并引述一句很贴切的谚语说：“老鹰应当允许小鸟去唱，而不管它们为什么唱。”

在为期八天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目标是使苏联加入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并争取苏联作出参加对日本作战的保证。然而，对苏联来说，则希望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第一，取得恢复战后经济的资助，其中包括对德国索取赔款；第二，重新获得 1905 年日俄战争时失去的远东领土和确定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第三，获得一个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新边界。对苏联人来说，由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次遭到德国入侵，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在东欧建立一个安全区。

事实上，1944 年 10 月英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谈时，丘吉尔曾用数学方式在一张纸条上写出过在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指导方针，然后把纸条拿给对面的斯大林看。他建议，苏联人在罗马尼亚的势力占 90%，在保加利亚占 75%，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势力同英国相等，在希腊占 10%。斯大林当场表示同意，后来美国也默认。

丘吉尔在莫斯科时没有把波兰列入清单，在雅尔塔会议上波兰成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致使三巨头进行了六天六夜的争论。会议指定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从而批准了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但用多少德国领土作为补偿的问题则留在战后解决。由于苏联军队已经全部控制了波兰领土，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尽管十分激烈，但是主动权完全在斯大林手中。斯大林的态度十分明确而强硬。他说：“波兰问题对苏维埃国家说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历史上，波兰从来就是敌人借以进攻俄国的走廊”。为此，决不容许波兰建立反对苏联的政权。

关于德国赔偿问题，斯大林要求“按功取偿”，提出 200 亿美元的赔偿额；丘吉尔提出“各国各取所需”，而德国尽其所能；罗斯福表示希望苏联遭到的一切破坏都能得到恢复，但是他认为，“靠赔偿是不可能补偿一切的”。罗斯福表示美国不想要德国的机器和劳动力，没收德国在美国的财产就可以了。丘吉尔的态度实际上是反对斯大林提出的索赔数额，认为“会议不能用数字来束缚自己”，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罗斯福同意接受苏联提出的 200 亿美元的数字作为讨论的基础。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态度大为恼火，指责丘吉尔反对苏联提出的赔偿要求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雅尔塔会议没有就赔偿的具体数字达成一致的意见。

雅尔塔会议还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是由罗斯福、斯大林商定，事后让丘吉尔参加签字的。在罗斯福的外交活动中，最受到攻击的是他参与制定这个秘密协定。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一次秘密交易。作为提出协定的目的——迅速打败日本，这是正确的。然而作为达到目的手段——背着盟国和中国、侵犯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则是荒谬和错误的。

协定以明确的语言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三个条件：第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第二，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即：将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第三，千岛群岛交予苏联。而且规定，“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上述协定签字时，中国人面毫不知情。中国作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被列为“四大国”之一，当以它的主权和利益为对象的讨论中，却被排斥在外，直到杜鲁门上台后才通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有这样一个协定。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践踏，实质上这正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丑恶表现。在罗斯福政治生涯的晚期，他的一个突出的政治思想是，战后世局由美苏两家说了算。《雅尔塔协定》就是一个例证。尽管罗斯福在与斯大林谈判时一再表示他不能代表中国人说话，但事实上却扮演了越俎代庖的角色。

斯大林在与罗斯福谈判时指出，如果苏联提出的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就难以向本国人民说明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战争，很难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向一个并未攻击它的国家作战。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就容易用“与国家利益有关”的理由向人民和最高苏维埃交待。这一解释究竟有多少道理是值得分析研究的。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把根据《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享有的各项特权逐步交还给了中国人民。从后果来说，还没有到不可弥补或不能挽回的地步。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光彩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记忆。

雅尔塔会议是罗斯福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他在会上进行斡旋、调停、运用手段图谋实现美国的利益目标，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开玩笑，并力图采取捷径确保会议的成功。有时经过一轮会谈和宴会，他变得精疲力竭，面色苍白。有时他情趣横溢，非常幽默。他密切地注视着苏英两国领导人的态度和情绪的变化。当争论激烈时，他还喜欢拿印度问题和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来刺激丘吉尔。罗斯福所努力追求的是他所设计的今后的“世界秩序和持久的和平”，也就是美国力图控制战后世界的设想。

雅尔塔会议虽然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协商，但三巨头总算“如愿以偿”，会议程度不同地都满足了他们的希求。为了庆祝会议的“圆满结束”，2月8日晚上，斯大林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2月10日临别前，丘吉尔还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三国领导人频频举杯祝贺。

斯大林元帅提议为首相的健康干杯，形容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政府人物。他说，当欧洲其他的地方在希特勒面前俯首帖耳时，正是主要由丘吉尔先生的英勇卓绝，英国巍然屹立，分散了希特勒德国的力量。元帅最后说，在历史上，一个人的勇气对于世界未来的历史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像这样的例子他不能举出几个。他要为丘吉尔先生，他的战友和一个勇敢的人物，干

一杯！

丘吉尔首相在答词中为斯大林元帅，作为一个强国的强有力的领袖，于杯。这个国家曾经顶住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面冲击，打断了它的脊梁骨，将暴君们从它的国土上赶跑。他说，他知道在和平时期不亚于在战争时期，斯大林元帅将继续领导他的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斯大林元帅然后提议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他说，他和丘吉尔先生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相对说来，下定决心还比较简单。这两个国家都是为它们自己的生存而同希特勒德国作战。这里有第三个人，他的国家未曾遭受侵略的严重威胁，也还没有濒临即时的危险，他就以多半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更广阔的考虑，成为导致全世界动员起来以反对希特勒的种种手段的主要锻造者。在这一点上，他提到，在结成反希特勒联合和使各盟国保持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总统最突出和关系最重大的成就是“租借供应”。

罗斯福总统在答词中说，他觉得这次宴会中的气氛亲如一家人，他愿意用这些来着重说明美英苏三国之间的关系。他说，在过去三年间，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更巨大的变化还在将来。在这里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都正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给这个地球上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以安全和幸福的可能。

在随后为三大国联盟祝酒时，斯大林元帅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一致并不太难，因为有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他说，困难的任务是在战争以后，因为各种不同的利益倾向于使盟国分道扬镳。他说，他相信现在这个同盟将经得起这个考验，而且我们有义务来保证使它经得起，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要像在战争时期一样牢固。

丘吉尔随即站起来激情地说，他觉得，我们都正如站在一个山巅上，我们面前展开着未来可能性的光辉。他说，在现代世界上，领导者的职责就是要把人民从森林里引出来，走进和平与幸福的阳光灿烂的平原。他觉得，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达到那个美好的目标，要是由于惰性和漫不经心而让这个目标从我们手中失掉，那将是一个悲剧，而历史是不会宽恕我们的。

是的，人们渴望胜利，但更希望争取到一个持久的和平。当雅尔塔会议闭幕时，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人们仿佛听到了进军柏林的炮声。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好雄末日已来临。但是，就在胜利到来之时，罗斯福的身体却越来越支持不住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五章 未完成的画像

总统报国力耗尽，鞠躬尽瘁为黎民；
胜利前夕失主帅，举国悲痛泪满襟。

1945年4月9日，罗斯福在温泉休养时，他年轻时的女友露西·拉瑟弗德夫人乘一辆有篷的大旅行车携同著名女画家肖马托夫前来为总统画像。4月12日，当罗斯福坐在皮扶手椅上，画家正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总统瞧着露西的眼睛，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头痛得要命。”没等这幅像画完，总统的头已垂到了胸前。这位伟大人物从此就与世长辞了。

话说罗斯福拖着疲倦的身体从雅尔塔回来，就赶到阿林顿去向一位亲爱的朋友最后告别。总统军事助理沃森“老爹”已在离开阿尔及尔两天之后死于航行途中。就这样，动荡的激流又卷走了罗斯福的一位知心朋友和亲密助手，霍普金斯病得也很厉害。这位身体虚弱、勇敢无畏的人，为他的祖国和他的朋友鞠躬尽瘁，耗尽心血。罗斯福简直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霍普金斯，他这些年怎么能对付得过来。沃森将军生前受到人们的敬爱，白宫里的人亲切称他为“老爹”，他的死令人悲伤。这对罗斯福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

在他母亲死的时候，罗斯福内心虽然很痛苦，但他没有向任何人表露他的真正感情。在他的老朋友和忠实的同事——路易斯·豪、马文·麦金太尔和利汉德小姐去世的时候也都是如此。

然而，对于沃森“老爹”的死，他却没有试图掩饰自己的悲怆，泪流满面，痛苦不已。在遗体面前，流连忘返，久久不能离开，以致深知他的人都感到惶恐，因为这使人联想到他自己的健康日趋衰退。

罗斯福从雅尔塔回来后，一直感到疲惫不堪，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身上储存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与他共事多年的国务卿赫尔早就病倒了，已经提出了辞职，从此繁重的外交重担也压在他的身上。罗斯福这些天来，心急如火，感到必须向国会讲话，时间越快越好。因为那些人还有力量使他建立一个联合起来的世界的希望化为乌有，就像当年破灭威尔逊的美梦一样。

3月2日，总统在国会讲话，是准备坐着讲的。他想，让他的敌人去做文章吧，反正他无须再参加以后的竞选了。在人山人海的议会大厅里，响起了司仪宣布“总统到”的喊声。罗斯福的轮椅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飞快地推过来。只见他用自己有力的双臂一撑，一下就坐进了麦克风前的扶手椅里，听众安静了下来。他一开口就离开了原来的讲稿，口气是那样满不在乎，几乎是开玩笑似他说：“我希望诸位能原谅我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姿势，坐着讲我要讲的话。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明白，不在我的腿上绑10磅重的钢条能使我感到轻松得多，更何况我刚刚结束了一次1.4万英里的旅行。”

“这是一次漫长而富有成果的旅游。但究竟是否完全有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你们。”总统由于感情激动，声音变得深沉洪亮起来。“因为除非你们这些在这个美国国会大厅里就坐的人，在美国人民的支持下，赞同在一个名叫雅尔塔的地方达成的原则协议，并提供你们的积极支持，否则这次会议就不可能产生持久的成果。”

“我们还要扎扎实实地干上好几个月。我以为，只有在这个国际和平的大厦上砌好最后一块砖头之后，我们美国人坚定不移地、无私无畏地共同为

之奋斗的目标才能实现。”罗斯福深信：“我们在通向和平世界的大道上，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随后总统详细介绍雅尔塔会议上所达成的各项协议。

罗斯福特别谈到美国关于安全理事会中投票表决的建议已得到接受；接着在谈到希望联合国会议将在旧金山召开时，他说：“我们满怀信心地一致期望，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将在那里最后签署生效，依靠这个宪章，世界和平就能得到维护。”总统希望参议院批准宪章，并答应参众两院合组一个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民主党与共和党人数均等。他说：“世界和平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样渴望和平。”

他已经意识到威尔逊 1919 年从巴黎带着成立国际联盟的注定要失败的提议回国时的情形，同他现在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因此，他呼吁国会两党议员在应付眼前的艰巨任务方面都给予支持。“25 年前，美国作战人员期望全世界的政治家完成他们为之战斗和蒙受痛苦的和平工作，”他说，“我们没有完成，那时我们使他们失望了。我们不能再使他们失望，我们期望全世界能生存下去。……我确信，国会和美国人民将承认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永久的和平结构的开端。”

总统洪亮悦耳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现在他的调子又低沉了下来，他的结束语不是激情奔放的慷慨陈词，而是谈家常般地心平气和、朴实坦率。他说：“朋友们，这就是我能提供你们的唯一消息，因为我对这一点的体会太深切了。我相信你们也会体会到这一点的。”

人们先以片刻的沉静向总统表示敬意，然后就开始欢呼起来。这声音像狂风暴雨一般爆发出来。议长雷伯恩和副总统杜鲁门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他登上轮椅，缓慢地穿过群情激昂、震耳欲聋的阵阵欢呼。直到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国会大厅才平静下来。

这年春天，华盛顿的气候反常，一连好几天气温高达华氏 80 多度，甚至 90 度以上。这种反常的天气甚至比盛夏的酷热还叫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总统有许多事情要做，行政事务堆积如山，许多人都在等候谒见总统。白天忙着会见客人，晚上还要加班批阅大量的文件。夜以继日，他独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埋头工作。年轻的秘书奥格登少校，有时送来重要文电要等上好长时间，因为总统沉浸在高度集中的思考中，迟迟认不出他来。奥格登站在那里端详着这位坐在那张堆着一叠叠文件的桌子后面的人物，心里百感交集。他感到总统似乎一天天地变得疲乏衰颓、迟钝木然，好像他那宽阔的肩膀上压着千斤重担似的。

保健医生麦金太尔将军嚷着要他的病人减少工作，让他松弛一下。总统夫人埃莉诺附和着发出焦虑不安的抗议，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罗斯福感到，比起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德国的艾森豪威尔部队的士兵们来，或者比起冒着枪林弹雨战斗在硫磺岛的礁岩上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来，自己就更没有理由休息了。为了赢得战争，有多少人牺牲了，有多少朋友和同事病倒了，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不止一次地对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说：“我痛恨战争，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和平，必须要敢于作出牺牲啊！”

随着总统身体愈来愈坏，麦金太尔医生着急了，劝阻又不听，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他和总统夫人一块邀请了几位外交使团的朋友帮着说情。加拿大大使麦卡锡是总统的一位好朋友，以前他经常陪罗斯福去温泉休养。他对总统说：“好好到温泉休息一个月，会使你恢复活力，更加精神饱满地工

作，要从长远考虑啊！”

“那么长时间可不行！”总统说，“不过，我打算在四月份去旧金山之前，先到温泉去呆两三个星期。”在好多朋友的劝促下，他终于在耶稣受难日3月30日离开了白宫。

春天，佐治亚的乡下，一片生机。温泉附近开着一丛丛白色、粉红色和黄色的杜鹃花。松树山下的桃树已经挂满蓓蕾。当罗斯福乘着火车来到温泉时，已经精疲力竭，消瘦不堪，连老朋友们的问候都顾不得答礼了。复活节做礼拜时，他把眼镜掉在地上，接着又把祈祷书掉在地上。他一次也没有笑过，人们都说，他太疲劳了，早就该休息了。

但是，温泉的自然环境，尤其是这里的残疾人奋发向上的志趣，对他产生了无穷的魅力。再加上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和调养，他的精神逐渐好起来了。布鲁恩医生说：“在一周之内，他的脸色和自我感觉显然好转。”胃口也比过去好多了，总统又开始批阅文件和处理一些工作了。

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鼓舞，更使罗斯福精神振奋。美英军队已经渡过莱茵河，并且像他们的坦克部队那样迅速推进。苏军正在柏林的一片废墟上作战。在太平洋，美军已经在距日本只有350英里的琉球群岛的冲绳岛登陆。然而，罗斯福已不再用很多的精力考虑战争问题了。他用绝大部分精力集中考虑他想参加当月早些时候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并打算在五月份同埃莉诺一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弗朗西丝·珀金斯说，战争期间横渡大西洋有危险，而他却用手捂着嘴低声道：“欧洲战争五月底以前就要结束了。”

罗斯福体力稍一恢复，就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早晨8点30分起床，首先阅读报纸和信件，每天和白宫直接通话五六次，并让“地图室”值班员及时汇报各个战场的进展情况。他还经常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保持着联系。4月5日，菲律宾总统奥斯曼尼亚前来温泉和罗斯福会晤，他是在1944年8月1日奎松逝世后接任的。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罗斯福打心底里喜欢这位举止文雅、头发花白的菲律宾人。他告诉奥斯曼尼亚，他希望能于国会规定的1946年7月4日之前宣布菲律宾独立。

为了更好地恢复体力，休养精神，在温泉期间，罗斯福通常是上午工作，下午和随身工作人员乘着他心爱的大型“帕卡德”敞篷汽车出去兜风。晚上起草他预定在4月13日为杰斐逊纪念会要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发表的演讲稿。他不想把它弄成一次政治性的演说，因为在自己的伟大抱负面前，党派偏见已失去原有的意义。他在讲稿的第一句话中就作了开门见山的说明，他把杰斐逊称作是“所有民主人士中间最伟大的一个”。他说：“在有历史意义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回顾一下托马斯·杰斐逊作为一个美国的世界公民的品格。”

“今天，杰斐逊在其缔造中起过如此伟大作用的我国，正在全世界为人的权利进行的斗争中起着惊人的巨大作用。

“今天，我们是庞大的盟军的组成部分——这支有血有肉、由钢铁和意志组成的大军，正在欧洲和亚洲消灭着制造战争和煽动仇恨的人。”

罗斯福在这篇讲话中，着重阐述了赢得战争和赢得和平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战后的世界和平，具有无尚的向往。这是他留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重要的精神财富。他写道：

“我们要和平——持久的和平。我们要的不仅是结束战争，而且是结束一切战争的前奏——是的，结束政府之间解决分歧的这种野蛮、不人道而且

完全行不通的办法。

“曾经一度强大的纳粹邪恶国家正在崩溃。日本军阀们正在自己的本上上得到他们进攻珍珠港时自找的报应。但是，单单战胜我们的敌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竭尽我们的全力去战胜使得这种恐怖成为可能的怀疑和恐惧，无知和贪婪。

“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杰出的科学家，有一次谈到“科学的友爱精神，它把分散在地球的四面八方的一切不同宗教的信徒都团结成一个家庭。”今天，科学已经使得地球的四面八方如此靠近，以致无法使各地互相隔离。今天，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出的现实：要让文明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培植人类关系的科学——各种各样的一切民族在同一个世界上和平地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的能力。

“让我向大家保证，由于大家——你们千百万人——同我一致决心使这项事业能够持久，我的手也就更加不颤，我的步子更加坚定了。

“这项事业，朋友们，就是和平。不仅是结束这一场战争——而是结束一切战争的前奏。是的，永远结束靠大规模屠杀整个民族来解决政府间分歧的这种不现实、行不通的办法。

“今天，在我们反对可怕的战争灾难——在我们进而作出人类的任何一代在世界上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对持久和平的贡献时，我要求大家保持自己的信念。现时能够做出多么坚实牢靠的成就，我以为，将决定于大家有多大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同我们一起献身于缔造持久和平的各位，对于所有的美国人，我要说：唯一会限制我们明天成就的因素就是我们今天的迟疑。让我们怀着坚定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1945年4月12日，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佐治亚阳光明媚，早晨的空气经过一夜的净化，显得格外清新。田野里色彩鲜艳，百花盛开，生气盎然，就好像大地刚刚在黎明时刻才诞生出来的一样。罗斯福醒来时感到心神愉快，精力充沛。他盘算这一天上午除了处理几件急办的公文外还要抽暇润色他的讲演稿，下午参加温泉市长弗兰克·奥尔科举行的传统的野餐会。弗兰克将在地坑里烤一只公猪和一只羔羊。宴会上有上等的烈性威士忌。还有乡间的提琴手来演奏轻快的古老乐曲，着实让人们享乐一番。晚上还有精彩的演出，一些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小伙子将在院子里的小剧场上装扮黑人演出滑稽节目。不管表演多么拙劣，一定是挺有趣的，因为罗斯福喜欢这群勇敢的小伙子们寻欢作乐的活泼劲儿。这将是多么快活的一天啊！

正当总统批阅过当天几件公文后，露西·拉瑟弗德夫人同艺术家伊丽莎白·肖马托夫进来了。拉瑟弗德夫人委托肖马托夫画一幅总统的水彩画像，以便珍存留念。于是罗斯福按照画家的要求披着他的海军斗篷，在陈设简单、装有松木嵌板的起居室里，坐在一张玩纸牌用的小桌前，处理信使从华盛顿带来的一小袋官方文件。罗斯福用草书签署了延长商品信贷公司的期限的法案。然后，他对劳拉·德拉诺大声说：“我就在这里签署法律！”信使走后，总统又审阅了一些其他的文件，其中包括他准备第二天晚上为庆祝杰斐逊纪念日广播讲话稿。12时45分，他注意到将近吃午饭时间了，于是罗斯福对画家说：“我们还可以再工作15分钟。”

肖马托夫女士紧张地进行速写；露西·拉瑟弗德夫人默默地坐在一个窗户旁边，能完全看到总统，她的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劳拉·德拉诺东奔

西跑，护士萨克利小姐在一边守护。快到1点钟的时候，护士突然发现总统的头在前倾，他的双手在藤椅上乱摸。她和露西急忙走到他跟前，跪在地上，抬头望着他的脸问道：“你是不是想吸烟？”他轻声说：“不，我头痛得厉害。”于是，护士和露西急忙到外面打电话，叫布鲁恩医生速来总统的别墅。

突然，肖马托夫女士尖叫起来，她从屋子里跑出来求援。总统的贴身男仆阿瑟·普雷蒂曼和菲律宾血统的服务员埃斯彭西利亚急忙跑到起居室。他们把不醒人事的罗斯福从椅子上扶起来，在光亮的地板上抱着他从惊恐万分的妇女身边走过，来到旁边的一间卧室里。他浑身发凉，但出汗很多。大约15分钟后布鲁恩医生来了。他立即确诊为严重的脑溢血，并采取了急救措施。罗斯福始终没有苏醒过来，但是在整个别墅可以听到他那紧张的呼吸。工作人员和他的朋友们在起居室焦急地守候着。大家都不作声，默默地为他祈祷。下午3时35分，罗斯福停止了痛苦的呼吸。

罗斯福总统的遗体运回华盛顿后，并没有像以前的林肯总统和后来的肯尼迪总统的遗体那样，安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人瞻仰。他生前不希望那样做，他的遗愿得到了尊重。

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都沉痛地悼念他。斯大林、丘吉尔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表彰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极端危难时刻，他没有下定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人类就会陷于可怕的境地，在若干世纪之内人类的整个前途就将沉沦于屈辱和灾难之中。”

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没有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虽然没有让画家完成他所希望的水彩画像；但是，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在他逝世25天后，作恶多端的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他逝世三个多月后，日本法西斯也投降了。他的画像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在世界人民心中却树起了一座丰碑。人民，爱好和平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他在这一伟大战争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美国人民隆重地纪念了这个伟大的日子。他们怀念富兰克林·罗斯福，人们用各种形式抒发了对这位伟大统帅。这位资产阶级伟大政治家的悼念之情。在一首诗中，人们对他作了这样的赞颂：

你虽然生在富豪之家，
却一点也不骄娇自夸；
你是一个强者，勇敢的开拓者，
病魔把你打倒了，
你却以坚强的毅力、勇敢地站起来……
在那令人恐怖的经济危机年代，
是你入主白宫，实行新政，
解脱了资本主义的垂危，
拯救了数以千万计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
……
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战争也检验了你的伟大的统帅才能。

人们不会忘记，
在那法西斯强盗横行的年代，
在那孤立主义十分猖獗的日子里，
是你——富兰克林·罗斯福，
以伟大的魄力，创造性的智慧，用“租借法案”援助了正在
受难的反侵略的人民。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
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
你更以坚毅的勇敢精神，
领导美国人民进行了这场神圣的战争。
你不惧花甲之年，病残之躯，
远渡重洋，与英苏首脑多次会商……
战争，耗尽了你的精力，
战争，过早地夺去了你的生命。
你虽然没有活到胜利这天，
但你可以死而无憾，
值得告慰的是：
就在你逝世不久，德意日法西斯相继垮台了。
而今，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
这三个臭名昭著的人物，
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你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名字，
却像一座屹立在蓝天的丰碑，
永远值得人民纪念，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罗斯福年表

1882年1月30日 生于纽约州海德公园村，是荷兰移民克拉斯·马腾森·范·罗斯福的第八代后裔。

1887年 5岁时，随父亲进白宫见到克利夫兰总统。克利夫兰告诫他，长大了不要当美国总统。

1896年9月1日 入格罗顿公学，1900年6月毕业。

1900年9月25日—1904年6月 就读于哈佛大学。担任校刊《红色哈佛报》编辑、主编。毕业时获文学士学位。

1900年12月8日 罗斯福的父亲詹姆斯逝世，终年72岁。

1904—1907年 就读于哥伦比亚法学院，未毕业。

1905年3月17日 与远房堂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侄女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结婚。

1906年5月3日 埃莉诺生第一个孩子（女），取名安娜·埃莉诺。

1907年生詹姆斯。1909年3月生小富兰克林（后夭折）。1910年生埃利奥特。1911年生第二个小富兰克林。1916年又生了约翰。

1907年春 通过纽约律师资格考试。进入华尔街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律师事务所。

1909年 参加纽约州参议员竞选获胜，开始了从政生涯的第一步。

1911年 初次拜访伍德罗·威尔逊，对威尔逊的知识、治国方略表示折服。

1912年 为威尔逊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及为威尔逊竞选总统出力奔走，引人注目。

1913年3月17日 由于威尔逊成为美国第28届总统，罗斯福被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任职到1920年，对美国海军颇多建树。

1914年7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请假3周与民主党党阀支持的詹姆斯·杰拉尔德竞争联邦参议员职位，党内提名遭到失败。

1915年5月7日 美“露西塔尼亚”号客轮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被德国鱼雷击沉，1198人死亡，其中有128名美国人。

1916年夏 罗斯福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约翰——保罗——琼斯航行，1900多人参加了为期25天的航行训练。在美国参战后，这些人中有80%获准到海军服役。

1916年8月29日 美国国会批准了扩充海军的法案，而且将总务委员会所提出的5年扩军计划改为3年内完成。

1917年4月6日 美国对德宣战。宣布站在协约国方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11月11日 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6日 西奥多·罗斯福逝世。

1919年6月28日 在凡尔赛宫签署对德和约。

1920年 在总统选举中，与詹姆斯·考克斯搭档，任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被共和党候选人哈定——柯立芝击败。

1921年 回纽约重操律师旧业，成立恩梅特——马文——罗斯福法律事务所，并担任一家信托储蓄公司的高级职务。

1921年8月 在芬地湾游泳时突然患了小儿麻痹症。

1924年 去佐治亚州温泉治病，病情有好转。6月，在纽约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露面。

1927年1月1日 罗斯福出资17.6万元，成立医疗小儿麻痹症患者基金会，在佐治亚温泉建立非赢利性质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水疗中心，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温泉成了病患者希望的象征。1928年10月 宣布接受纽约州州长候选人提名，并赢得州长职位。这是瘫痪后第一次担任重要公职。第二年发生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0年 连任纽约州州长。

1932年 被民主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以极大优势战胜在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胡佛。

1932年7月2日 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实行“新政”的许诺。

1932年9月12日 开始在全国巡回演说，会见选民，宣传施政纲领。

1933年3月4日 就任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睦邻政策”。同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

1933年3月6日 发布全国银行休假令。

1933年3月8日 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12年任期中，一共举行了998次记者招待会。

1933年3月9日—6月16日 实施“百日新政”。

1933年3月12日 发表第一次“炉边谈话”，同美国人民恳谈银行问题。这种形式后来一直延续下来。

1933年4月19日 宣布放弃金本位。

1933年11月17日 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1933年12月5日 关于禁酒的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被废除，从而结束了近14年的禁酒局面。

1934年1月10日 宣布美元贬值40.94%。

1934年6月28日 宣布美国经济情况已有改善。

1935年5月27日 最高法院宣布“新政”主要支柱之一《全国工业复兴法》违背宪法。

1935年8月14日 制定社会保险法。

1936年1月6日 最高法院宣布“新政”另一重要法律《农业调整法》违背宪法。1936年4月18日 罗斯福的顾问、智囊团主要成员路易斯·豪溘然长逝。

1936年8月14日 在纽约肖特夸夏季讲学中心发表“我憎恨战争”的演说，博得孤立主义者和一般老百姓的喝彩。这次演说目的是为了竞选连任总统。

1936年11月3日 以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再次当选总统。

1937年1月20日 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承认有“三分之一的国民住不好，穿不好，吃不好”。

1937年2月5日 要求国会通过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国会未予通过。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罗斯福于9月4日发表不准向双方运送武器弹药的声明。

1937年10月5日 在芝加哥发表对侵略势力进行隔离的“防疫”演说，受到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1938年1月6日 发表声明反对需经公民投票才能决定宣战的建议。要求国会批准陆海军的额外拨款。

1938年5月17日 国会根据罗斯福的要求通过10年建造军舰115万吨的《文森海军扩军法》。

1938年6月11日 宣布对日本实行飞机和制造飞机的重要原料的道义禁运。

1938年12月15日 在取得中国政府继续抗日的保证后，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一笔2500万美元的信贷。

1939年4月15日 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出信件，要求他们不对31个国家发动侵略，遭到希特勒的讥笑嘲弄。

1939年7月26日 美国宣布1911年美日商约在1940年1月26日满期后不再续约。

1939年9月1日 纳粹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39年9月1日 罗斯福照会英、法、意、德、波各国政府，希望不要诉诸武力，和平解决争端。

1939年9月8日 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1939年9月21日 强烈要求国会废除中立法中的禁运条款。

1939年10月11日 任命一批物理学家组成核研究委员会，由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担任主席。

1939年11月4日 国会应罗斯福要求取消武器禁运，实行“现购自运”原则，是为修改1939年中立法。

1940年1月26日 废除美日商约。

1940年4月9日 德军入侵挪威、丹麦。

1940年5月10日 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

1940年5月13日 巴黎陷落前夕，罗斯福宣布加强对盟国援助。巴黎于6月14日陷落。

1940年5月16日 罗斯福要求国会批准给陆海军拨出11.82亿美元的追加预算，每年生产5万架飞机的计划。

1940年6月10日 罗斯福去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讲演，斥责法西斯侵略行径。

1940年6月19日 组织两党联合政府，延揽共和党人史汀生和诺克斯分任陆、海军部长。这两人反对孤立主义，拥护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罗斯福还未经国会而成立了军火生产、战时人力、物价管制、粮食生产、运输等机构。

1940年7月20日 签署建造两洋海军法案。

1940年9月2日 绕开国会以行政命令方式与英国达成驱逐舰换取基地的交易。

1940年9月16日 签署美国和平时期第一个征兵法。

1940年9月22日 日本军队开始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罗斯福于9月25日宣布给中国2500万美元贷款；26日宣布对日禁运废钢铁。1940年9月27日 德意日签订三国公约。

1940年11月5日 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第三次当选总统。

1940年11月29日 谴责德意日三国公约矛头针对美国。

1940年11月30日 日本、伪满、汪伪相互承认。罗斯福宣布给中国

1 亿美元信贷。

1940 年 12 月 17 日 建议对英国出借武器。在记者招待会上阐述“租借法案”的意义。

1940 年 12 月 29 日 宣布美国应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

1941 年 1 月 6 日 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不虞恐惧的自由。

1941 年 1 月—2 月 8 日 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访英，为建立英美反法西斯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 7 月中旬，霍普金斯再度访英，同丘吉尔商谈进一步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问题。

1941 年 1 月 10 日 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3 月 11 日《租借法案》成为法律。3 月 27 日，国会拨款 70 亿美元供执行《租借法案》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向盟国提供了价值大约 500 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

1941 年 4—5 月 美日秘密谈判未获结果。5 月 27 日宣布“全国无限期紧急状态”。

1941 年 6 月 22 日 德国进攻苏联。6 月 24 日罗斯福宣布援苏。

1941 年 7 月 23 日 日军侵占印度支那。7 月 24 日罗斯福警告日本，此举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并宣布对日禁运汽油。

1941 年 7 月 26 日 命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美日贸易完全中止。

1941 年 7 月 26 日—8 月 2 日 罗斯福特使霍普金斯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在莫斯科期间，霍普金斯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就相互合作和提供军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从而开始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苏合作的新局面。

1941 年 8 月 1 日 命令禁止一切航空汽油出口。

1941 年 8 月 8 日 日本建议近卫与罗斯福在檀香山会晤，遭美拒绝。

1941 年 8 月 9—12 日 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大西洋会议，14 日宣布《大西洋宪章》。

1941 年 8 月 17 日 警告日本政府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武力行动。

1941 年 8 月 27 日 近卫建议与罗斯福会谈，美国以条件不成熟加以拒绝。

1941 年 9 月 7 日 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逝世，享年 87 岁。

1941 年 10 月 9 日 宣布武装美国商船，还击进攻者。

1941 年 10 月 16 日 日本近卫内阁垮台，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任首相兼陆军大臣。

1941 年 10 月 30 日 批准给予苏联 10 亿美元信贷。

1941 年 11 月 17 日 国会应罗斯福要求修改 1938 年中立法，允许武装美国商船。

1941 年 11 月 26 日 国务卿赫尔奉罗斯福之命，向日本提出被日本称为最后通牒的《四点口头声明和十点备忘录》。

1941 年 12 月 6 日 要求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

1941 年 12 月 7 日 日本袭击珍珠港和英、美、荷在太平洋的其他属地，日本对美英荷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 年 12 月 8 日 美国对日宣战。罗斯福在国会演讲，称 1941 年 12 月 7 日是“一个耻辱的日子”。

1941 年 12 月 22 日 丘吉尔抵达华盛顿同罗斯福会谈，决定建立英美

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统一英美战略。通过这一机构，共同使用两国资源，互相补充兵力。1942年1月1日 发表由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宣言》。

1942年1月21日 罗斯福委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2年2月7日 致电蒋介石，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财政援助，并称颂中国英勇抗击日本的行为。

1942年4月1日 批准将美国太平洋沿岸的美籍日本人及日侨迁到内地集中管理。

1942年4月18日 批准空袭东京。

1942年6月5—7日 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到惨败。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400多架。兵员损失3500人。

1942年6月12日 美苏和英苏公布关于苏英条约和苏美合作协定，以及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

1942年11月8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美英远征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滩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军队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兵力11万人，使用飞机1700架。

1943年1月14—23日 与丘吉尔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向记者宣布将战争进行到底，直至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1943年2月2日 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被围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残存的9万人，包括保卢斯元帅和22名将军都当了俘虏。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损失共达150万人。

1943年2月4日 罗斯福向斯大林祝贺斯大林格勒大捷。

1943年3月20日—5月13日 美英法军队在突尼斯展开进攻，德、意军在非洲失败。

1943年7月25日 墨索里尼垮台，遭废黜。

1943年8月14—24日 罗斯福、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会谈，讨论开辟第二战场等问题。1943年9月3日 美英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

1943年9月8日 意大利已多格里奥政府向盟国投降。

1943年11月22—26日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开罗会议，发表《开罗宣言》。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三巨头会议，发表《德黑兰宣言》。

1943年12月2—7日 罗斯福与丘吉尔、蒋介石继续在开罗举行会谈。

1943年12月15日 美军在新不列颠岛登陆。

1944年6月6日 美英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参加这一战役的指战员和后勤人员共287万人，动用飞机1.3万多架。

1944年6月18—30日 委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结果之一是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国派出驻延安美军观察组。

1944年6月18—20日 日本舰队在太平洋莱特湾遭到决定性的失败。日本陆军飞机丧失殆尽，参战的9艘航空母舰被击沉3艘，另4艘被击伤。

1944年8月21日 在罗斯福倡议下，中苏美英四国代表在华盛顿巴敦橡树园大厦举行会议，商讨战后国际组织事宜。

1944年9月6日 派赫尔利使华。

1944年9月18日 电蒋介石指出中国战场局势严重，要求让史迪威立即统率全部中国军队抗日。

1944年10月18日 接受蒋介石的坚决要求，决定召回史迪威，以魏德迈接替。

1944年12月17日—12月30日 美军在莱特岛登陆作战。

1944年11月7日 战胜杜威，第四次当选总统。

1944年11月24日 美军B—29飞机首次自马里亚纳群岛基地起飞轰炸东京。

1945年1月20日 罗斯福第四次宣誓就职，担任美国总统。1945年2月4—11日 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举行雅尔塔会议，签订《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25日 美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1945年3月9日 美军B—29飞机大举轰炸东京。

1945年3月26日—6月30日 美军实施冲绳岛登陆作战。

1945年4月12日 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因脑溢血去世，终年63岁。遗职由副总统杜鲁门接替。

